

炎黃 春秋



彭真
萬里
林楓
彭德懷
黃克誠

一个看守员眼中的



今天又说陈独秀

一家大饭店与

四位国家元首的故事

台湾轮船上的大陆小姐

司马光与宋神宗密谈实录

总第7期
1992年7月出版

悠悠天下

第一陵

——萧克执行会长一行参加
黄帝陵活动散记

斯京●



四月三日，载着中顾委常委、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肖克一行的面包车缓缓驶入黄陵县城，他们应陕西省政府邀请，前来参加黄帝陵祭陵典礼和整修黄帝陵工程奠基仪式。

黄帝陵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编为古墓葬第一号，因此有“天下第一陵”之称。它坐落于黄陵县城北面一公里的桥山之颠，桥山总面积八千五百亩，山下有沮水环绕，山上有古柏八万余株，树龄一般在千年以上，是全国最大的古柏群。

整修黄帝陵工程是中央领导李瑞环同志提议并一直关心的，他曾说：“我们有必要、有义务把黄帝陵修复好，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后代。”今天，肖克想到的同样是这一问题，因此，他一来到黄陵，就不顾旅途劳顿，实地进行考察，就连与整修工程有关的具体问题也关心备至。

四月四日清明节，公祭黄帝陵暨整修黄帝陵工程奠基仪式正式开始。

九时整，鼓乐齐鸣，鞭炮声响彻云霄。

讲话仪式由肖克领衔，他自谓参加这隆重仪式，对于一个年过八十的人，真是幸运。他说：“今天我们公祭轩辕黄帝之陵，就是要弘扬炎黄以来几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继承和发扬我们民族自强不息、刚健有为、威武不屈、勇于创



造、勇于开拓的优秀品格，为实现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而奋斗。”他指出，在当前形势下，重新整修和保护好黄帝陵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他相信，这项功在中华的雄伟工程一定会在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共同努力下屹立于桥山松柏之间。

肖老之后，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光英及陕西省各界代表也讲了话。在群众敬献祭品过程中，情景令在场人感叹不已；三男三女敬奉祭品，桃、梨、苹果、桔子，还有粟米所做龙、凤、花草礼馍；四柱红烛一柱柱点燃，火苗跳跃夺目；他们三叩三拜，将酒洒向大地，衷心祭祀人文始祖。看到这等虔诚的场面，作为中华炎黄子孙，无不为之动容，立于肖克身旁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李宝光也禁不住流下了热泪。

肖克执行会长在黄帝陵时曾留下八字墨迹，这八字是：“慎终追远，继往开来。”肖老说，“慎终追远是个

老词，今天我赋以新意，慎终，就是社会主义要搞得更好，才能达到共产主义；追远，就是要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把社会主义建设得更好。”今天，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正是按肖克执行会长所说的，调动社会各方面炎黄子孙的力量，共同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祖国统一大业而努力奋斗。

萧克执行会长(中)与参加祭陵活动的港澳台同胞在一起



顾问:

伍修权 楚图南 费孝通

屈武 谢冰心 杨静仁

冯文彬 王朝闻 赵朴初

胡絮青

特邀编委:

王俊义 冯其庸 张 铨

张国琦 李学勤 刘颖南

苏双碧 常 征 温济泽

戴 逸 韩劲草 魏久明

魏 燕

社长(法人代表):杜导正

副社长:方 实

丁洪章

宋文茂

总编辑:洪 炉

总经理:徐 孔

本期执行副总编辑:杜卫东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1003-1170

社址:北京海淀区北洼路5号

邮编:100037

美术编辑:杨子建

石家庄市塔冢印刷厂印刷

本刊专稿

●悠悠天下第一陵

——萧克执行会长一行参加黄帝陵活动散记

/斯京1

●云湖之畔赞《讲话》

——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研讨会侧记

/张蕾4

英杰谱

●一个看守员眼中的 彭真、万里、林枫、 彭德怀、黄克诚

/权延赤6

●周恩来

与谢和赓夫妇

/张志才 陈桂英62

●李先念走出“死区”

/屈德骞75

春秋笔

●风雨五十年，

今天又说陈独秀

/麦阳30

●开国第一文化冤案

——江青与陶行知及其弟子的恩恩怨怨

/唐文权20

●民初怪杰杨增新

/辛平67

●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的
傅作义

/舒云 48

殒星篇

●元戎兼诗人的

黄兴

/吴泰昌 58

时代风

●一家大饭店与

四位国家首脑的故事

/李玲修 35

●赵新先与

“999”交响曲

/傅溪鹏 40

●中国第一对模特佳偶

/石湾 16

人海浪

●红土地的召唤

/阿蕾 79

●法医陳西

/杜凌 71

●风在大海边

/李硕儒 25

●无喉者与白衣天使 /罗燕萍 15

古镜台

●新发现的秘史：

司马光与宋神宗

密谈实录

/李裕民 53

●明末张居正改革失败始末

/黄爱平 59

古今谈

●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

到底是谁首先发现了美洲

/徐青 19

●神农氏与神农架 /尹笋君 55

同根结

●台湾轮船上的

大陆小姐

/庚秉堂 89

赤子心

●华人王安，

美国电脑界的巨子

/卢云 85

神州光

●诗城益阳巡礼

/艾若 83

文萃园

●伦敦唐人街 /玫林 61

●伦敦见闻 /玫林 24

●吴昌硕先生的风趣

/吴长邨 96



云湖之畔赞《讲话》

——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研讨会侧记

本刊记者 张蕾

壬申5月，初夏的第一场小雨伴随着首都诸文化单位的60多名学者、作家，来到环山临水，风景秀丽的密云云湖度假村，参加由《炎黄春秋》杂志社、北京电视台、云湖度假村、崇文区文化馆和《爱我中华》杂志社在这里举行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研讨会”。

到会并发言的有中顾委常委伍修权、人大常委会委员段苏权，学者、作家李锐、周而复、冯征、苏双碧、张伯海、曾克、朱乔森等。出席会议的还有黑伯理、李宝光、权延赤、李玲修、师秋朗、成汉昌、王伟等作家、学者和老同志，以及毛泽东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

新朋友老相识欢聚一堂，大会呈现出一派团结、热烈的气氛。

中共密云县委书记韩国梁代表县委和县政府到会祝贺。

与会者紧紧围绕《讲话》，并结合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艺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与南巡讲话精神开展了热烈的讨论。

主办单位代表，《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同志在致词中说：“《讲话》正确总结了‘五·四’运动以来我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阐明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回答了无产阶级文艺发展道路上的一些重要理论与政策问题，过去，现在，今后仍然是我国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要遵循的正确道路。”

伍修权同志深情回忆了自己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的成长道路，表达了一个跟随毛泽东革命几十年的老兵的心情和感想。赞扬《讲话》精神鼓舞、教育、启发人民继承、发扬了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的革命传统。对于我们今天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为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新的贡献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老作家周而复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印证了《讲话》精神的伟大和正确，他说：“许多优秀、杰出的作品，都是作家深入生活的结晶，脱离生活，就意味着创作生命的终结。”老画家黄钧先生则结合自己新旧社会的不同经历和不同服务对象，阐述了《讲话》对他的教育和影响。

李锐、师秋朗、李玲修等都有精采发言。

会上还推荐了一些以改革开放为主旋律的优秀文学作品，介绍了创作这些作品的经过，与会者呼吁全国文艺工作者深入到改革开放的火热斗争中去，创作出更多的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

会议的业余时间轻松而愉快的。代表中的画家、书法家们大显身手，为会议和代表们奉献出精美的作品。被称作“猫”王的孙菊生老先生已有82高龄，别看他头发胡子都白了，但却神清气爽、步履敏捷，作画时握笔有力、下笔如神，画出的猫眼似能转，毛似会动，深受大家的欢迎。爱唱歌和会跳舞的代表们更是如鱼得水，休息时便聚集在度假村的歌舞厅一展歌喉与舞姿。喜欢散步和远足的代表们，则在夕阳的余辉中三三两两地走出度假村，去大坝观赏水天风光。

密云水库山清水秀，作为会址的云湖度假村象一颗镶嵌在水库旁的明珠。这里有气势雄伟的水库大坝和副坝，还有形态逼真的象鼻山。山下，南北两条通往北京市区的水道，象两位步履轻盈的少女，缓缓的，静静的流淌着。为了保证北京的饮用水清洁，这里不发展旅游事业。但是，秀丽的山川美景却丝毫没有因为缺少游人而逊色。云湖度假村和研讨会一起，在代表们心中留下了隽永的记忆。

5月7日，会议最后一天，天空云开日出，沐浴过新雨后的山川大地分外妖娆，与会代表们心情格外开朗活跃，他们都将以实际行动和新的成就来贯彻毛泽东的《讲话》精神。

作家、艺术家在生活第一线

——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50 周年



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在朝鲜前线为志愿军战斗英雄佩戴纪念章

这几幅照片摄于 40 年前,当时正值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10 周年,我国老一代文学家艺术家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深入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不仅创造了一批优秀作品,也为新一代文艺工作者创造了范例。〔摄影:李书良〕



画家罗工柳(左一)、作家巴金(左二)、作曲家王莘(左三)在朝鲜前线战壕中访问志愿军指战员



在朝鲜前线坑道中的作家巴金(左二)黄谷柳(左一),作曲家王莘(左三)画家罗工柳(右一)、剧作家胡可(右二)和志愿军战士



作曲家王莘和志愿军战士在朝鲜前线坑道中一起练唱演奏他所创作的歌曲



著名老作家巴金(右)和黄谷柳在朝鲜前线坑道中写作

一个看守员眼中的

彭真、万里、林枫、彭德怀

权延赤

在卫戍区总医院为父母陪床，空闲时间不少。喜欢去对门的主任办公室，同协理员施公园聊天。他有一段这样的经历，这样的耳闻目睹……

黑夜。监护对象陆续送来了，有：彭真、刘仁、万里、林枫……

为外宾作随身警卫的任务结束后，回到警卫师干部大队。大队是直属营级单位，我们干部队员一般是23级，每月工资52元。

大队驻地在万寿路罗道庄，平房大院，前院有4个兰球场大，后院是我们的菜地。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际，人们天天在动荡，这所大院也不例外，突然来了命令，把东面一排营房全腾出来，由泥瓦匠隔成小间。更奇怪的是围墙也加高了，几乎有二层楼高。院里本来绿化不好，只有几棵小树，再被围墙隔断外界，便不由人不出“大墙内”的感觉。

果然成了大墙内。先是大队干部表现出紧张神秘，然后中队小队干部开会，会后，那种紧张神秘的气氛便弥漫全院，很快，全体干部队员开会，大队长作动员，向我们宣布命令，执行监护任务。大意是周总理把一批老干部交给了我们，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政治任务，要执行“四不”政策：一、不准发生自杀；二、不能让红卫兵抢走；三、不能体罚或变相体罚，不准污辱人格；四、不能让随便离开。

动员之后，各小队开会，小队长给我们布置任务，每人都要表态，怎样完成任务。

紧张一番之后，监护对象陆续送来。记得都是黑夜，用吉普车陆续送到。第一批送来的是北京市委的领导干部，有彭真、刘仁、万里、郑天翔；然后是林枫；然后是叶子龙；然后送来一批高级将领：彭德怀、黄克诚、谭

政、王尚荣；然后是罗瑞卿；后来又送一些叫不出名的老干部；再晚些时候还送来一名英国教授，据说在北京教授外语，是间谍，叫克鲁克，呆没几天就送走了。

被泥瓦匠隔开的小单间陈设很简陋：一桌一椅一床。靠门处刚刚能放一只小方凳，由我们执行监护任务的队员坐。我们的任务是2小时换一哨，轮流坐在那只方凳上，昼夜进行“监护”。

走进监护室时，彭真在门口停了一下步，回头望一眼天空，深深吸了一口新鲜空气……

北京市委的同志来时，神情都比较严峻，同时也深藏了沉重。我18岁由山东蓬莱参军，对地方干部不大熟悉，见面就能认出来的只有彭真。因为在我参军时，彭真已经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他的照片，广播里也经常能听到他的名字。

他身材魁梧，走路缓慢稳重，下车后并不东张西望，仿佛对这个新环境是怎样一种条件毫无兴趣，也不关心。他的脸孔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沉重表情，目光里流露出压抑和迷茫。从见面的最初那一刻，我本能地想到刘少奇不久前讲过的一句话：“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走进监护室时，彭真在门口停了一下步，回头望一眼天空，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便举步跨入门坎。他的举止神态给我留下较深刻印象：沉重而不紧张，迷茫而不慌乱，仍然保持了政治家的从容不迫的风度。

这是令人暗暗赞佩的。因为当时的形势，“文化革命”是从北京开刀，北京市委的领导都是首批被打倒，就算“铁案如山”，不可能再翻身了。

彭真没有被这种严峻的形势压倒。他认真整理一

黄克诚……

下床铺用具，象是我们部队行军到了一处新宿营地，喜爱秩序的战士总是要把房间归置整齐一样。他又抬腕看了一眼表。后来我们发现，他戴的是一块“上海”表。我们曾为此议论：“那么大官，怎么才戴块‘上海’表？”“人家爱国么。”“你小子说什么？”“哎呀……”是啊，那时那种形势怎么还敢讲彭真爱国？

到达不久，彭真就坐在桌前开始读报。他读得真仔细，似乎没有发觉门口坐着战士，两眼不眨地“监护”着他。他的目光首先扫一遍标题，接着便从第一版开始，逐篇逐段逐句逐字地看下去。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他是真读进去了，决不是为了消磨时间。他的阅读总是伴着深沉的思考，眉宇间不时凝出浅纹。

2个小时很快过去了。换哨下来，我心里暗想：他可真能沉住气。

几天后，队员们免不了悄悄议论几句：

“到底是干过大事的，真有股子静气。”

“那是有经验，听说他坐过国民党的监狱，好几年呢，读了好多理论书……”

更深的大家不敢谈，在那种特定的形势下也认识不到，只是觉得人家干大事的和咱们普通人不同，那么大的压力，许多事情都没明朗，心情沉重是肯定的，但决没有任何颓丧，还活得那么认真，还整天地学习、思考，也真不容易。要在今天讲，还可以说出个承受能力强，这个承受能力也是几十年奋斗，无数次生死考验锻炼出来的。

这些老干部在被监护期间，有“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是我们给总结概括出来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读报，所有被监护的老干部都读得真仔细。每人只给一份人民日报，他们都是读了又读，边读边想，似乎一字一句都不放过。

第二大任务就是写材料。彭真经常对着桌上的纸

沉思，他的目光很富感染力，能够带着你一道回到过去的年代，追回遥远的往事。他的目光真诚、严厉、认真，象法官在审阅自己过去的历史，每一件事，甚至踩下的每一个脚印，都要用最严厉的目光仔细审查一遍，仿佛要严责自己，是否把全部的生命和力量都献给了所追求的理想和事业。这样反复思考之后，便开始动笔写。

他写的内容我们看不到，但是，那认真的严厉的态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过去我给黄克诚同志当过警卫，偶尔听首长们闲谈，知道彭真精力充沛，工作起来可以忘记时间。现在他身陷囹圄，那种精神我仍然可以强烈地感受到。

在所有被监护的人员中，彭真总是睡觉最晚的一个，但他起床不比任何人晚。不到9平米的小房间，100支光的大灯泡整天整夜地亮着，所有人在开始都睡不好觉，灯光刺眼，不习惯。经过十几天，人们渐渐习惯了，也就能遵循时间入睡。唯有彭真，半夜12点以前没有睡过觉。这大约是长期紧张工作养成了习惯吧，到了“监狱”也改不掉。

有天晚上，他思考问题写材料，快下一点了，可能是全神贯注，竟忘了身处何地，忽然抬头望住我问：“有夜餐吗？”

我怔了一下。他来到这里后，很有经验，除了要求解手，不同我们讲话，知道我们有纪律，注意不给我们带麻烦。这是他第一次提出“非份要求”。

我蠕动一下嘴唇，望一眼门外。监护室是一大排平房，中间走廊，两侧都是不足9平米的被泥瓦匠用砖头仓促隔开的小房间，说话之声附近房间都可以听到。

“这儿没夜餐。”我小声说，稍一停顿，又显示“立场”地生硬地补充一句：“从来没有加餐这一说。”

彭真并不在意，低头继续写材料。

“晚饭你可以多弄点……”我低声喃喃。

彭真望我一眼，轻轻点点头，便继续他的思考和写材料。实在说，我很感动。那时我便体会到，他不给我们找麻烦，对我们是理解和爱护的，知道我们的难处。

这以后，彭真吃晚饭时加了量。过去只拿一个馒头，后来是拿两个，吃一个留一个，留在夜里吃。如果吃米饭就多盛点，剩半碗饭留下来作夜餐。

这些受监护的老干部的第三项大任务就是接受批斗。这真是考验人，那么大岁数，一斗一上午，一直就那么弯着腰，我们多次小声议论：“唉，换咱们年轻人也受不了啊！”

我悄悄试过，弯上20分钟腰就受不了了。可这些老干部，少则一上午，多则一天2场，甚至3场，早晨出去，半夜才回来。十几个小时就那么90度地弯腰，光靠身体是坚持不下来的，完全是靠着精神和意志。

特别是冬天，受罪受大了。记得彭真那时只穿一身中山装，没有大衣。他受到的批斗最多。原因是他过去干工作最多。凡属他过去工作到过的地方，如今都要再去“消毒”，接受批判。我们私下曾小声议论：“唉，过去



工作越积极，现在越倒霉，反而是不干工作的现在好过了……”

大年三十，二七机车车辆厂要过什么“革命化的年”，组织批斗大会，非让把人押去不可。我们开了七辆吉普车，2名队员带一名老干部，来到二七厂。我印象很深，那正是大雪之后，雪厚近膝，天气奇寒。到厂后，先在一个房间里等，厂里组织人打扫露天广场。露天广场有个舞台，把雪扫掉。我们向“造反派”们交待政策：“只许文斗，不许武斗；批判可以，但不准打。不许红卫兵把人抢走……”

交待完政策，他们就带人带走了。我们在屋里等，听到吼声有些乱时，怕出事，就赶到现场看看。没见到红卫兵冲上台打人的情况发生，多少松了口气，但也看下去，一排老同志，全是“喷气式”，衣衫单薄，一站几个小时，一动不许动，鼻涕在寒风的刺激下滴出，不许擦，都结成了冰……

我们忙离开了会场。

会议快结束时，也是我们最紧张的时候，因为这时最容易发生红卫兵抢人的情况。我们把车开到台侧，会议一结束就赶紧跑上台，两人带一名，带上车马上驶离。

彭真同志从来不曾对群众表示不满或愤怒，他知道群众不明真相，当他坐在车里时，目光仍是那么平静，一声不响地望着前方，好象是望着未来，眼神里竟深藏了一种自信。回到监室，他从来不会唉声叹气，也没有灰心丧气地往床上瘫倒。他总是弄一盆热水，认真地泡泡脚、洗洗肿胀的两腿。换过水，又洗洗脸，然后就去拿报纸。

他居然还能平心静气地看报纸，而且看得那么认真专注！我们确实为此感慨不已。

现在讲起来容易，听着也就那么回事，如果身历其境，不要说经受一番，就是目睹半年，你也会感慨万千

了。那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那一种精神和肉体的残酷折磨，若没有极坚强的信念作支柱，是决坚持不下来的。我们此后议论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小伙子也熬不下来呀，这些老干部能活下来本身就是感人的事迹！”

这话并不夸张。意志坚强，但不够十分坚强，那也是活不下来的。有位副部长初来的几个月，每天坚持洗冷水澡。我印象很深，他也是位久经考验的老革命了。他盼望着出去以后继续工作，为人民出力，所以坚持锻炼，不让身体垮掉。他吃饭吃的多，大冬天，我们用凉水洗脸都怕冷，可他每天早晨打盆冷水擦脸，我们坐在门口都能感觉到他身上发散的腾腾热气。

可是，这样一位朝气蓬勃的老干部，后来被关到团部，却一天天瘦下去，慢慢地，慢慢地死了。听说死因不明，医生就做了解剖。据说当时医生都目瞪口呆，这位副部长是悄悄吞下大量棉花，每天吃，吃得肠梗阻，也不言声，人就这么一天天瘦下去，直到死也没作一声。这种自杀要经受多大的痛苦啊，要有怎样的意志力来忍受那长期的肠梗阻而慢慢死去？肯于忍受如此剧痛去死，就可以想到活下去需要忍受什么样更巨大更沉重的痛苦。

死得难，活下来更难，要是活得乐观那可是更加更难。

在监室里，万里说：“我是放牛娃出身，跟共产党毛主席干革命，我不会反对毛主席，不会反对共产党。”

这些老干部中，活得最乐观的就要算万里了。他是我所见到的唯一的囹圄中有笑脸的老干部。

万里身材也很高大魁梧，从关进来那天起，他的神

情始终是轻松的，只有在读报和思考问题时才表现出严肃，其余时间都是轻松乐观，甚至象没事的人一样。仿佛周围发生的一切都不过是场滑稽剧，他相信很快就会散场，到那时，他还是他，真正的革命干部。一切黑帽子最终都戴不到他头上。

和所有老干部一样，他关心形势，读报特别认真仔细，不放过一点内容，从中了解运动情况和社会形势。送报纸的战士姓曲，山东人，说话嗓门大，家乡味很浓。他不到20岁，思想感情很单纯，领导怎么说就怎么信。

这天上午，我刚走到院子里，准备去换哨，小曲神色慌张地跑来了，手里还拿着几张报。

“小曲，”我招呼他：“报纸没分完乱跑什么？”

“老、老施，”小曲立住脚，喘息着，紧张得话也讲不连贯了，“不，不得了。万、万里，我给他送，送报纸，他，他跟我拉老乡！”“别急，慢慢说。”我皱了皱眉。

小曲大喘两口气，平静一些，这才讲清了经过。他送报纸来到万里房间，刚把报纸放桌上，万里忽然笑眯眯地望住他叫一声：“小曲，咱们是老乡哩。”

小曲吓了一跳，本能地后退一步，痴痴地望住万里没吱声。也难怪，所有被监护的人还没一个跟他讲过话。现在万里讲了，而且一张口就说“咱们是老乡”！

“你还年轻啊，”万里仍然在笑，不过眼里多了一种感慨的神情，“你不要以为关起来就是坏人。我还会出来的。我是放牛娃出身，后来参加革命……”

小曲一边听一边往后退，眼睛都直了，不等万里讲完，扭头就跑，逃一样跑到院子里。

我笑了，宽慰他说：“老乡就是老乡，他山东，你山东，这有什么可害怕的。”

“这，这不犯立场？”

“你执行你送报纸的任务就行了，犯什么立场错误。”

“可，可他拉老乡关系。”

“只要你没做违犯纪律的事就行，他违犯纪律是他的事。”我这样劝说。

那时，我们的纪律很严。比如，监护人员一律穿便衣，记得每人还发了一套印着格子的布衬衣。不许写信、不许打电话，不许探亲假，不许任何家属来队。执行监护任务前，都给家里去了通知信；外出执行任务。从此，一年多再没与任何人来往，信函全部断绝。

我换哨来到万里房间，在靠门的小方凳上坐好，毫无表情地执行“监护”任务。

万里正在写材料，工夫不大，掀起眼帘，望住我。我有任务，不敢马虎，只好眼对眼地坐着不动。

万里两眼亮了一下，好象是目光与我相遇碰出了火花。随即，他脸上绽出浅浅一层笑。

“我没什么问题。”他不慌不忙说，“我会出去的。”

我不吱声。纪律没有规定万里不许讲话，但是规定了我们不许和他讲话。

“你们年轻，不懂。我早晚是要出去继续为人民服务的。”

我抿了抿嘴唇，还是不吱声。

“我是放牛娃出身，跟毛主席共产党干革命，我不会反对毛主席，不会反对共产党。我自己就是老共产党员，我怎么会反对共产党？”

我听着是这个道理，但我一声也不响。

“我有错误，但不是反党，是工作中的错误。没有错误的人是不存在的，列宁这样讲，毛主席也这样讲。有了错误就改，改了就好，但不是反党。”万里朝我肯定地点点头：“我相信党，我早晚要出去。你还年轻，很快你会明白。”

我始终不曾吱声。实在说，当时我并不真正理解万里讲的话，对于他讲的“早晚要出去”也是半信半疑。直到他真出去那天，我才对周围人感叹：“难怪万里说我还年轻……”

按照规定，被监护的老干部每人每天“放风”两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军队干部都是单独放风，彼此不许见面。北京市委的干部是同时关进来，所以不怕让他们见面，上下午都是同时“放风”。所谓放风就是在院里散步。

能见面不能说话。每到“放风”时，北京市的干部在院子里各站一位，象公园里的转椅一样，同时在院子里转圈散步，但彼此保持着固定距离，不许接近，更不许讲话。

刘仁、郑天翔、赵凡等北京领导人都很严肃，永远是一副思考的神情默默散步。

唯独万里不同。他走路身体稍向前倾，一边走，一边活动身体，嘴里哼着小调，两手还甩来甩去地打响榧。其他人眼睛总是望着前方，只有万里扭动着颈项左顾右盼看院里的风光。无论警卫们如何板着脸孔，虎威虎势，他都毫不在意，没有丝毫愁容，反而乐呵呵地，仿佛散步是一种很惬意的享受。

记忆中，他还有个半导体收音机，好象就他一个有，散步时有时也拿着，边走边听广播，嘴里还不停哼小调，没有拿收音机的那只手仍然甩下一圈又一圈的响榧。

有件事给我留下印象很深。他不知从哪搞到一些瓜子，散步时一边嗑瓜子一边哼小曲，步子越走越快，追上了前面的赵凡，捏几个瓜子送给赵凡，将瓜子按在赵凡的手心里，却并不说话。因为纪律规定严禁他们彼此说话。

“保持距离，”警卫大声喝斥：“不许接触！”

万里嘴里并没停止哼小调，好象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一样，步子放缓些，与赵凡重新拉开距离；手里没了瓜子，响榧甩得更起劲。我忍俊不止，噗哧一声笑，流水也似地转过身。

夜里睡觉时，我们躺在床铺上悄悄议论：

“喂，万里可真够稀拉啊。”

“人家又没穿军衣，还要走正步啊？”

“这样关着，整天挨批斗，整天乐呵呵，这人可够不简单的。”



中南海会见美籍华僧寿治(右二)等人
一九八四年六月一日,国务院代总理万里在

“过去不懂啥叫革命乐观主义……”

“嘘!说话有个把门的,小心抓你个立场问题;……”

那时说话有顾忌,现在可以说心里话了。现在回想起来,那确是革命乐观主义,只有对前途对未来充满自信的人才可能乐观得起来。

批斗会是最叫人头疼的事,可是万里仍然能“乐观”。我记得很清,每到批斗会,总有红卫兵按住万里的头,叫他弯腰。

可是,弯下不大工夫,红卫兵刚一松手,万里就把头抬起来,腰也挺直了。还满不在乎地朝台下望,好象看热闹戏一般。

“低头!”红卫兵吼,“把腰弯下去!”

“我累了,”万里望望身边的红卫兵,好象是望着不懂事的小孩子,需要告诉他们一点起码的知识,“真的,我是累了。”

他的声音不大,讲得认真,还点一点头。

红卫兵不听一加一等于二的真理,动手把万里的头重新按下去。万里似乎决心要维护他讲的真理,不火也不急,红卫兵的手刚一松开,他就又抬起头,直起腰,脸上甚至还带着一层浅笑,说:“我是真累了。”

看到这里,我们这些负责监护的人都忍不住又“噢”了。笑过之后,也有担心,就是惹火红卫兵下狠手打人。不过,凡是我到场的批斗会,还没发生严重的打人事件,万里也从没有一次“老老实实低头认罪”。

他就是不肯低头,不肯“老实”。

林枫把头一挣,闪向一边,平静而坚决地望住造反派:“我或躺或站,决不弯腰低头!”

另一个不肯低头的是林枫同志。

林枫个子高,虽然偏瘦,但是骨架子大,全身有棱有角显得很结实。当时听议论,知道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党校校长。还听说他的罪名是刘少奇的三驾马车之一。

林枫和多数老干部一样,在受监护期间显得很老实,很规矩,服从我们管理,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叫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实在说,没见这些老干部时,担心来了不好管理,怕我们水平低,怕他们出难题。接触到这些老干部,那种担心很快就消失得干干净净,甚至觉得失望:怎么这样窝囊啊?一点也不轰轰烈烈。这样的人当初怎么能指挥千军万马,发动亿万人民去打江山?连大声说话都不会……

来了2位搞专案调查的人,同林枫谈话。我们不许听,远远守在门外。忽然,那屋里截断钢筋似地崩出两声:

“胡说!造谣!”

我的心大跳一下,激动起来。这是林枫的声音,虽然不是大吼大叫,却比专案人员的大吼大叫还要坚硬有力。

“我是共产党员,我此生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你们说了不算,历史会作出结论!”

我眼前象划过一道电闪,豁然一片明朗,并且鲜明地看到了当年的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斩钉截铁的声音给我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也使我享受到那种轰轰烈烈的满足。

我终于明白,林枫之所以不给我们这些当兵的出难题,甚至表现得恭恭敬敬,老老实实,是因为他知道我们不过是奉命执行任务。他的意志、勇气和力量,只有面对专案人员才轰轰烈烈地表现出来。

12月底,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10万人的批斗大会,被批斗的有18个“黑帮”,林枫是其中之一。

那天也是雪后，天寒地冻，朔风凛冽。造反派剥掉林枫身上的大衣，只给他留一身单衣，细铁丝拴块大铜牌子，沉甸甸吊在脖子上。说是“沉点才好低头认罪。”

可是，林枫是扬着头走上台前，直着腰板站定了。

“低头！”一片吼叫声里，2名造反派去按林枫的头。林枫个子高，造反派不得不用力，费了些手脚才将林枫的头按下去。并且喘着粗气警告：“批判时老实点，不许直腰！”

大会开过一段时间，那2名造反派的手大约是按累了，不得不松弛一下。这边刚一松，那边林枫已经挺直腰杆抬起头。

造反派怒骂着又伸胳膊去按林枫的头，林枫把头一挣，闪向一边，平静而坚决地望住造反派：“我或站或躺，决不弯腰低头！”

这声音讲出太平静太清晰，一字一咬，因而更显出逼人的力量。2名造反派一怔，竟愣神了。可是，“低头”的狂吼怒叫使他们醒来，其中一名造反派把眼睛渐渐眯细，刺人的目光象机枪一样在林枫脸上扫来扫去。

“你再说一遍？”他从牙缝里挤出一声。

林枫坦然望定造反派，目光不躲不闪，声音不紧不慢：“我或站或躺，决不弯腰低头。”

“好，我叫你躺！”吼声未落，造反派猝发一拳，拚力捣在林枫肋扇上。

林枫无声地倒下去。他挣着手脚似乎还想站起来，急风骤雨般的拳脚猛烈袭来，他没能站起，彻底躺平了。

从林枫被打倒那一刻，我们负责监护的同志便闻风而动地朝台上冲。“造反派”拦阻，费不少力气才冲上批斗台，抢出林枫，塞进吉普车，迅速驶离现场。这次批斗会，18名“黑帮”都遭受毒打，当时被称为“血染18块”。

汽车上，林枫脸色苍白，呼吸粗重。吉普车颠簸，林枫象是有伤，一个劲咬牙。车轮碾过什么突出物，汽车向上一跳，接着又摔下来。林枫一口气没憋住，从鼻子里哼出一声。

“怎么了？”一名战士问。

“没什么……喘不上气。”林枫讲得吃力，他不敢松开牙齿。我们的任务，不但要“监”，而且要“护”。伤了人死了人都算事故，算失职。几个人一商量，汽车直接开进医院。

一检查，不得了。林枫被打断4根肋骨，一条胳膊粉碎性骨折。他躺着说：“不疼……就是心里难受。”

进一步检查，更不得了。肝肠都被折断的肋骨刺破了。

“或站或躺”的林枫，就这么“决不弯腰低头”地含冤而逝。据说昏迷前他讲过这样一段话：“一个共产党员，在敌人的威迫面前坚持信仰容易，受到同志的委屈和误伤坚持信仰不容易，被自己的组织错误地处理，不公正地对待之后仍然坚持信仰难上难。能够坚持才是真信仰。我是真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叶子龙很快被放出去了。还有一个人关的时间也不长，就是那个“英国间谍”克鲁克……

与北京市委的干部们比较，监护在林枫斜对面房间里的叶子龙同志情况稍好些。

我能记住叶子龙，是因为听说他给毛主席当过秘书。毛主席的秘书怎么也关进来了？我确实难以理解。

叶子龙是小个子，偏胖，戴个金丝眼镜。那时很少有人戴这种细边金丝镜，这也是我能记住他的原因之一。记忆中，他和北京市委那些干部不同，很少被带出去批斗。我很难想出他哪次被带出去批斗。当时我们有过私下议论，都说他掌握大量机密，不能随便拿出去乱审乱批。他脑子很好，每天就在屋里写材料。大概搞机要工作的都是这种性格？他极少讲话，但两眼有神，显得精明强干。他很能写，一本一本往上交，我们不知他写什么，但我远远见过他写的字，字很小，不拿到眼前是辨认不清的。

他关在这个院子里的时间不长，很快就离开了。还有一个人呆的时间不长，就是那个“英国间谍”克鲁克。

克鲁克关在这里实在有点不伦不类，他从里到外，与我们的老干部没有丝毫相同之处，常令我们目瞪口呆。

他是瘦高个儿，穿件翻毛领的皮夹克，走路一溜快步，皮鞋咔咔作响。引人瞩目的是那满脸大胡子，很象马克思。他能讲一口北京话，在那个年代很少能见到会讲中国话的外国人。我是晚上换哨坐到他的屋门口。他正准备睡觉，已经铺了床，又弄盆热水洗脚。

他的腿脚都长满了密密的毛，这本来就令我新鲜了。可是洗完脚后，他并不忙于倒水，而是打开一个小瓶，我还能认识那是雪花膏一类的护肤品，心里纳闷：洋鬼子真怪，洗脚不洗脸，不洗脸还要往脸上擦油……

克鲁克已经将雪花膏在手中打匀，我甚至闻到了那种高级香脂味，鼻子不习惯地喷两下粗气，忽然大吃一惊：“他在干什么？他居然抬起右脚，很仔细地将雪花膏抹在脚上，腿上，比我们抹擦脸油还要仔细认真！抹完右脚抹左脚，就那么油漉漉地钻了被窝……”

第二天我就把这一重大发现告诉了战友们。那个年代，脸上擦油，被人闻出香味都要警惕戴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帽子，这个克鲁克，他居然把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搞到了脚上。

从那天起，我们背地里就不再叫他克鲁克，而是改叫假马克思。

当然，现在我知道了，不但外国人，中国人也有不少往身上抹护肤油的，特别是有些妇女。不过，在60年代，我这个当兵的实在无法想象无法理解。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彭德怀、李克农
步入停战协议签字会场。

克鲁克没关几天就走了，据说回国了。

彭德怀看报，一年多的时间里只讲了三句话：“刘少奇好长时间没出来了……”“陶铸怎么不出来了……”“贺龙也不见了……”

走不了的是我们的老干部，特别是高级将领。北京市委的干部可以同时放风，能见面，部队的高级将领们却不能见面，放风时要一个一个单独进行，不能相遇，就连上厕所也须警惕不要相遇。

按照规定，我们在屋里坐着监护，屋外还有领导轮流值班，当总指挥。监护对象要上厕所时，须报告：“解手。”我们马上向屋外报告：“×号解手！”如果外面的总指挥回答：“可以。”我们就带人上厕所。如果外面回答：“等一等。”那就说明厕所所有人，只好委屈监护对象多憋一阵儿。彭德怀元帅和黄克诚大将关了很久，多次在批斗会上见面，却始终不知道彼此关在一起。

有次，彭德怀报告：“改（解）个小手。”外面的总指挥同意了。走向厕所时，恰好黄克诚端了脸盆准备倒水。负责监护的人先一步出门，一眼瞥见彭德怀，慌忙回身将黄克诚堵回去，直到彭德怀解手后回到监护室，才让黄克诚出去倒水。负责监护的同志“警惕性高”，受到表扬，彭德怀与黄克诚却终于未能知道关在一起。

我父亲1940年参军，1948年拿着伤残证复员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父亲当过八路军，所以我一懂事便知道彭德怀元帅。我自小就崇敬彭德怀元帅，却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会在这样的场合这样的情况下见到彭德怀，并且负责“监护”他。说穿了，其实就是看押。

彭德怀元帅戎马一生，我见到他时，军装已经与他

无缘。他穿上了一身黑呢子中山装，头发斑白，身体却依然结实精悍，完全是一种军人气质。无论站或坐或散步，腰总是挺得正直。他不说话，不抽烟，总是保持着威严的沉默。带着军人的固有习惯，他的时间观念很强，即便生活在囹圄之中也不变。具有特色的是他从不把表戴在腕子上，而是扔在桌上。作事前，从桌上抓起表，看一眼，叭，丢回桌面上。做完事，还是抓起表看一眼，然后叭地扔回桌面。

他的两眼总是目光炯炯，很有神。但他毕竟老了，看书要用放大镜。

他的生活很有规律，上午看报，下午写材料，随时准备迎接批斗。

彭德怀看报细致入微。只有一份人民日报，他每天都要用去一个上午，手里抓着放大镜，眉毛微皱，眯着眼，一个字一个字地用放大镜照过去，嘴唇蠕动着，并不念出声。

在我的记忆中，彭德怀读报，一年多的时间只讲过3句话，都是用放大镜照过每一行字之后，在沉思默想中独自喃喃出来：

“刘少奇好长时间没出来了啊……”

“陶铸怎么不出来了？”

“贺龙也不见了……”

每当他喃喃一次，脸色就阴沉一层。我明白他在想什么，佩服他的敏锐，承认他的分析力，但我什么也不能说，只能坐在门旁，默默望着他。

他即便沉思，也是身体正直，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独个儿神情郁郁，四周无人迹踪影……

每天下午他都是写材料，只要不出去接受批斗，笔就不肯停。写字不能拿放大镜，所以字写得很大，写在格纸上，然后订成本，一本一本往上交。

我不可能知道他写的具体内容，但由于他写的字大，能看到只言片句，知道他写的只有两个内容。一是

给毛主席写信，二是交待材料。

他给毛主席写了好多好多信，就是希望能见主席一面，想当面谈一次话。他说许多事情下面人不了解，只有见主席才能讲清。

一本又一本交上去，彭德怀始终未能见到毛主席。而下面不明情况的群众，也继续一次又一次地批斗彭德怀。

有次军队系统在工人体育馆开批斗大会。午饭后，我们二名警卫带一名批斗对象，将彭德怀、黄克诚、谭政、罗瑞卿、王尚荣等将帅带到了会场。

我们总是提前到场，在休息厅里等候批斗会开始。就在这时，卫戍区一位副司令员进来了。

“彭德怀带来了吗？”他进门就问。

“来了。”我们的同志回答，“首长有什么事？”

“提审。”他边说边跨进门。我们本来有纪律，不允许外人直接与监护对象接触。但他是卫戍区副司令，是我们的直接领导，我们接受任务都是从他那里接受，怎么好阻拦他呢？何况他又是“提审”，我们更不敢说什么了。

这位副司令走到彭德怀面前，双腿一岔，气汹汹两手插腰，把头朝彭德怀伸去，瞪起眼问：“彭德怀，你认识不认识我？”

彭德怀打量对方，象是回忆，终于没想起来。摇摇头说：“不认识。”

“你不认识？”这位副司令眼睛又瞪大一圈，咬着牙发出低吼：“我叫你认识认识！”

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眼前掠过一道黑影，只听“啪！”副司令将一记耳光重重地打在彭德怀脸上。

当时，师警卫参谋和大队长都在场，都为这一记耳光大吃一惊。那个副司令咬牙切齿地还要打，大队长慌忙横身挡在中间，警卫参谋也上前帮忙劝阻，帮忙往开拉。那个副司令似乎不解气，一冲一冲地还想揪彭德怀，打彭德怀，同时发泄着咆哮：“你他妈不认识我，你压了我那么多年，压了我两级，我今天非叫你认识认识不可……”

我们都围上去，帮警卫参谋和大队长将这位副司令拉开，拉走。这件事引起全体监护人员的义愤，一时议论纷纷，都说：“领导要求我们注意政策，为什么他自己带头违犯？而且为私不是为公，说压了他两级，这是革命还是泄私愤，图报复？……”

“不要议论了……别议论了！”大队长提高嗓门叫，他也一样显出义愤，“这件事我们会向上级反映的，批斗会就要开始了，这件事回去再说。”

批斗会结束后，我们情绪大，路上议论，回来还议论。大队长当晚就向师警卫科作了汇报，又逐级汇报到上级有关部门。

这件事，我们只听说大队长向上级汇报了，没听到任何处理意见或决定。大家本来就不舒畅，特别是对关押元帅和将军有不满，现在又遇了这件事，更是整天发牢骚，许多人都公开表示不愿再干。上面大概知道了我

们的情况，把我们这些人全调去参加支“左”了。

也难怪我们“闹事”，毕竟我们都是军人。让军人看押曾经是军人钦敬的元帅和高级将领，心里实在不是滋味。何况他们还受到极残酷的折磨。罗瑞卿大将的腿断了，伤口流着血水还要用筐子抬到台上去批斗；谭政大将经常独坐椅子，淡漠的目光凝视着墙壁，几个小时不动一动；王尚荣将军身体不好，几次晕过去……他们都是指挥过千军万马，令敌人闻风丧胆的英雄人物啊！他们为民族和人民的解放立下了不朽功勋，现在却要这样对待他们，无论讲什么样的大道理，都不可能叫我们心服口服。

我还得去监护我曾经 警卫过的黄克诚大将。当我 向他的监室走去时，背上就 象压了块巨石。

最使我难受的，莫过于“监护”黄克诚。我不敢见他，见到他真比上刑还难受。我对大队长说：“别的还勉强，黄克诚那里不能勉强我去看。我给他当过警卫，你想我怎么受得了？”

大队长摇头：“受不了也得受。”

上级规定，我们这些监护人员必须不断地轮换监护对象，怕看一个人看久了，看出感情。怕接触多了熟悉了，聊起天来。

于是，我还得去监护我曾经警卫过的黄克诚大将。当我朝他的监护室走去时，背上就象压了块巨石，压得我抬不起头，喘不上气，迈不开步。多少往事象过电影一样从脑中闪过……

那时，我叫他首长。给他送过报纸，陪他散过步，还同他下过棋。庐山会议后，他很少再出去开会，大部分时间在家看书学习，看报看大参考。他不再穿军装，改穿一件旧的中山装，戴一副近视镜，出门拿着拐杖，很少用来拄地，多数时间只是携带，走路步履很快，沉默的时间多。大街上任何人见了，都不会想到他是大将，会以为他是名桃李遍天下的教书匠。

他住在大水车胡同4号，院子很漂亮，进门一个大葡萄架，浓绿欲滴。每当葡萄成熟时，他自己的家人很少吃，基本都分给了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他的老伴在东郊上班，早出晚归，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我任驻地警卫的几年中，从没听见他们发生任何争吵，一家人和睦睦。他有4个孩子，当时都在上学。黄克诚有辆灰色的吉姆车，孩子们从来不坐，他和老伴也极少坐。黄克诚说，我没什么公事，私事用不着乘公车。

公务员和我关系不错。有次我去送报，公务员正在搞卫生，看见我便招手：“喂，首长的衣服真威武，真漂亮。来，叫你开开眼。”

他打开衣橱叫我看看。一套大将服，一套礼服，整整



黄克诚大将

身陷囹圄。过去的岁月，他待我们象父子一样亲近随便，现在还是象亲人一样迎上来：“你怎么来了？”

我流水也似地低下头，别提多尴尬了。当我重新抬起头时，黄克诚已经近在咫尺地立住了脚，嘴唇微张，已经发不出声，目光在瞬间变换出各种复杂的情感。他的手本是要伸出来的，现在僵在面前，两脚也粘住一般不动了。恰似面前横出一道万丈深渊……

“情况都正常，请继续保持警惕。”

交班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我象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身子一缩，坐在了靠门的小方凳上。

于是，黄克诚蠕动一下嘴唇，脸上掠过一丝浅浅的不易察觉的苦笑，缓缓转身走回桌前，坐下来拿起报纸，一声不响地翻阅。

我的眼睛模糊了，泪水差点淌下来。这就叫生活，这就叫现实，这就叫历史。

他本来身体不好，现在更显单薄瘦弱，当他翻来复去没完没了地读那一份人民日报时，他是怎样的一种心情？他当然知道我在两眼不眨地“监护”他。他能理解我吗？他能谅解我吗？

我的目光在湿漉漉的液体中朦胧，朦胧中看到黄克诚捧着紫颤颤的葡萄向我走来，看到黄克诚微笑着朝我招手：“来，小施，杀一盘。”看到黄克诚伸手捏捏我的衣服厚薄，小声问：“不冷吧？”看到黄克诚一边散步一边扭过头来望住我：“小施，你父亲的病怎么样了？……”

转眼间，这一切都消失了。我听到黄克诚沙哑的嗓音：“报告，解手。”

经屋外总指挥批准，我低低说一声：“去吧。”这完全是例行公事的语言，这种语言毁坏着我们以往一切最美好的东西。我还得跟随他一道去厕所，看着他解手。因为发生过一事故，有个很能吸烟的很瘦的老同志，忘了叫什么，上厕所时，久久不出来。监护人员进去一看，已经用马桶盖击头自杀了。后来虽然抢救过来，但毕竟是危险事故，以后就作了硬性规定，上厕所也要跟紧不离开。

返回监房时，我深深叹口气。他理解我叹气的意思吗？

他没有任何表示。

黄克诚有严重的痔疮，上过厕所需要弄盆热水坐浴。这是我过去就熟知的。监护室里条件差，只能将凳子颠倒过来，把热水盆架在上面，然后坐上去。这是我唯一可以帮他做的一点事。他总要坐半小时，然后换盆

齐齐挂在衣橱里。真威武真漂亮啊。首长穿上这套衣服会是什么样呢？我心里想象着。从我来到首长身边，还没见他穿过。他一直是穿中山装，也穿过黄呢子衣服，蓝裤子磨得很薄了，随时要破一般。他把军衣保管得这么好，放在方便取出的衣橱里，好象随时在等待那声召唤，重新穿上他的大将服，奔赴新的战场……

可是，一年又一年，他没有听到召唤。闲下来，他就同我们下棋。棋盘是另一种“战场”，在这个战场上他也是求胜心强。

战士中有个小吕，棋下得好。黄克诚最喜欢同小吕下。有次出现僵局，两个人都想胜，不肯停止较量。早过了开饭时间，炊事员几次来叫，黄克诚不动地方。他嗓子沙哑，湖南口音很浓。他说：“打完这一仗再吃。”

我怕饭凉了，揪揪小吕的后衣襟：“认输了吧。”

“凭什么我输？”小吕子不明白我的意思，大声说：“不行，有一口气我就得争到底。”

黄克诚笑了：“好兵。”

忘了那盘棋谁输谁赢，只记得黄克诚走向餐厅时，目光里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嘴里小声念念有词：“好兵啊，好兵……”

我相信他盼望继续带兵，盼望重上战场。老天捉弄人，那个能想到，“战场”竟摆到了大墙内！

我终于跨进那个难跨的门坎。

9平米大的地方，走进一个80公斤的大人，那还不是一眼就看清？我的目光与黄克诚的目光刹那间便相遇了，撞击一团火花。

“小施！”黄克诚脱口叫出声，那一刻他肯定忘记了

无喉者与白衣天使

罗燕萍

进手术室前,教授不停地对亲人们讲话,尽管声音沙哑,但是不肯闭嘴。亲人们悄悄录下了他的话。大家都明白,这是他留给世间的最后语言。因为他患了喉癌。

几小时后,教授被推出手术室。他嘴唇翕动着,再无任何声音从喉中发出。他的喉头被摘除。他哑吧了。语言是人类表述思想,交流情感的工具,失去了语言,便失去了那座与人联系的五彩桥梁,教授的痛苦是正常人所难以体会的。

1990年10月22日,教授住进北京卫戍区医院五官科。26天后,亲人们接到教授打来的电话,重新听到了教授的声音:“我很好,现在我可以出院了……”当亲人们赶到医院时,第一眼就看到笑容回到了教授的脸上……

无喉发音训练,给每一个无喉者带来了福音。北京卫戍区医院五官科从1987年以来,已连续举办15期无喉者食管发声训练班,使几百名无喉者获得了新声。

为使患者早获新声,医护人员不但要做医疗技术上的工作,更须搞好心理护理工作。因为心理康复是语言康复的基础,语言康复又反过来促进心理康复。所以,理解患者,做无喉者的知心朋友是对医护人员的基本要求。

1990年10月18日,一位69岁的老工人住院参加食管发声训练班。他实行喉切除术已经一年半,由于身体上的痛苦,生活上的不便,心灵上的创伤,他变得

换水洗手。

我能做的另一件事就是在批斗会上扶他一扶。军队系统开批斗会,我们可以参加,要求2人架一个,架上台去。我不愿去架黄克诚,感情上实在难以承受。后来又同意执行这项任务了,因为我知道他身体不好,怕弯腰站工夫大了会晕倒。我架他,实际是搀扶他。手头吃着力,开一次会三四个小时,回来胳膊又酸又疼。我的用心黄克诚是明白的。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谢意。这对我痛苦的心灵是不小的安慰。

黄克诚有一样与彭德怀不同。彭德怀天天写材料,一本一本往上交;黄克诚很少动笔写材料,不来人索取,他自己不会交材料。

他象是在等待什么,一切顺其自然。

一年后,批斗会基本没了,真正的审查才开始。那时叫提审,每天送他们去摩托营那里接受提审。这正是黄克诚等待的“交锋时刻”。

我们不许在现场,只能在院子里守候。那些个日子真热闹,我们也感到某种开心。军队的几名元帅、将军,每人一个房间,每个房间都吵声不断,有时吼声象打雷,说一个惊心动魄一点儿不假。

一向深沉文雅的黄克诚,到了这时完全换成了另一个人。受提审的军人中,他变成火气最大的一个。每

性情暴躁,易怒易激动。一进训练班便发出这样那样的询问。别人无法马上理解时,他便烦躁发脾气。护士在病员脾气大发时,始终保持热情和微笑,耐心地从口形和手势上来理解病员的意思,反复猜测,请病员用点头摇头来评判猜测的对不对?这样一来,病员转怒为喜,当护士猜错时,不但不再发脾气,反而象作猜谜游戏一样开心地笑起来。于是,护士又及时将这种“猜谜”改为“笔谈”,对病员交待的每件事都认真去办,使病员很快稳定了情绪,创造了医疗训练的良好条件。31天后,这位老工人可以用食道进行发声,并可以作简单对话了。曾经暴躁的脾气也渐渐变得祥和起来。

无喉者在接受食道发音训练时,普遍存在的心理障碍是自卑、自弃,爱面子,怕人笑。

有位54岁的干部,开始练习,觉得怪声出口不好意思,医护人员便鼓励他放开思想,并且适当集中发声场所,造成氛围,以便互相感染,互相影响启发。当他能发出一些单词的时候,又觉得自己比别人声音难听,医护人员又及时引导他与自己比,不要与别人攀比,使他看到进步,增强信心,同时还根据他存在的问题,耐心细致地进行个别辅导,启发他的语性,这样坚持一段时间,举一反三,一通百通,仅用一个月时间就能进行一般对答会话了。

5年来,经北京卫戍区医院五官科无喉食管发声训练班训练的几百名无喉患者,全部重新获得了新声,从个人的不幸中摆脱出来……

当吉普车驶向摩托营时,他就象听到了冲锋号一样,眼里漾出战士冲锋陷阵时才会具备的那种特有的锐气。

负责提审他的2名专案组人员都是三、四十岁的正值盛年的精悍军人,大约是特意选出的硬手吧,火气也都十足,走路说话都带着某种不可一世的盛气。黄克诚似乎从来不曾把他们放在眼里,一见面,不等张嘴就用目光开始了交锋,撞出一团团火花。

房门一关,吵声立刻开始。专案人员喊,黄克诚就对着喊,专案人员拍一下桌子,黄克诚必定也跟着拍响桌子,一步也不让。几个提审的房间,就数黄克诚所在的房间最激烈,拍桌子声和吼声,几乎整个营区都能听见。

天天“打雷”,天天“放炮”,我的精神在“雷炮”声中振奋起来。无私才能无畏,雷声炮声是一个证明。不论大字报小字报登出多少“惊心动魄”的“事实”和材料,我都不相信。若不是真正有信仰,真正无私地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给了革命事业,贡献给了人民,是决不会发出这种气壮山河的“雷”声“炮”声的。

我眼前打开了一扇熟悉的门,对,那是旧式的橱门,里面整齐干净地挂着大将服,真威武,真漂亮。那大将服使我想象到过去,也想象出未来……

〔责任编辑:晓渡〕



事业上比翼齐飞
生活上互敬互爱

中国第一对模特佳偶

石 涛 ●

1989年秋天，沉寂的京城时装模特界曾有过一次令人瞩目的“大雁南飞”——以李扬与叶继红、王一鸣与张亚凤、林季涛与张锦秋这三对恋人为主体，组建成了深圳国际展览中心时装模特队。三位男模，分别担任了经理助理、队长和业务代表，而叶继红、张亚凤和张锦秋则于同年12月角逐首届中国最佳时装模特表演艺术大赛，分别取得了冠军、第四名、第八名的好成绩。一个立足未稳的新队，竟然在中国的“十大名模”中占有三个席位，真可谓一炮打响。于是，深圳国际展览中心时装模特队名声大振，被公认为一支具有雄厚实力、并能与各国同行竞争于世界T台的专业队伍。

三年过去了，曾一时传为佳话的这三对恋人，有两对已经和平分手，李扬、叶继红和张锦秋也都由于各种原因而先后离队，唯有王一鸣与张亚凤情深意笃，于1992年2月11日在北京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成了中国第一对结为伉俪的名模。

如今，身为深圳国际展览中心时装模特队经理的王一鸣，还兼任着该队的教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当模特教练的才能，要超过我做经理的才能。我的职责，就是发现人、培养人、推出人。”在第二届中国最佳时装模特表演艺术大赛中，该队的陈娟红、宋红艳、褚红分别获得了冠军、第四名和第六名。与第一届大赛一样，无论团体还是个人，在二十余支参赛队中，又名列

榜首。面对“二连冠”的殊荣，作为教练，他怎能不感到自己肩负的担子有多重呢！模特界新旧交替的频率是很快，只有不断发现、培养和推出新人，才能保持一个强队的实力地位。因此，王一鸣眼下一心思想的，就是如何再振雄风，争取夺得“三连冠”！

王一鸣今年32岁。在各时装模特队的教练（或称艺术指导）中，是最年轻的一位。耐人寻味的是，国内几支强队的艺术指导，全都是资深的女舞蹈演员，像他这样由男模成长起来的专业模特教练，在国内也许是一无二。

王一鸣当上模特，纯属偶然。他并非出身艺术之家，父母均是北京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精神病科大夫。他高中毕业之后，曾下乡插队当农民。回城之后，在北京汽车八厂做工。1984年，当时在中国铁路文工团的李艳萍，举办中国第一个以设计师名字命名的时装展示会，委托中国铁道报的一名记者为她物色时装模特，在一次舞会上，碰巧发现了伟岸英俊的王一鸣。未曾想，从他被选作男模那天起，就爱上了时装表演这一行，凭着一种悟性、一种灵气，刻苦钻研，终于成了一名卓有成就的专业模特教练。

王一鸣说：“我的启蒙老师是李艳萍。”但李艳萍并非模特出身，而只是年轻时曾是一名优秀的舞蹈演员，也许正因为是她受过严格的形体训练，而又有服装设

计师所独具的审美眼光,把王一鸣一引上模特舞台,就使他走出了一条与纯舞蹈演员出身的教练迥然不同的路。

可以说,王一鸣是在实践中“滚”出来的。中国铁路文工团在为李艳萍举办时装展示会时所组建的“红菱艳”模特队,是北京最早成立的一支带有专业性质的时装表演队。从那时起,王一鸣就协助经理招生,显露了他在挑选模特儿方面的特殊才能。没过多久,他就出任北京印染厂时装表演队队长,后来成为国际名模的石凯,以及刘亚美、邱莹等高手,都曾是他的队员。此后,他又相继为北京广告公司时装模特队和中国时装表演团效力。因此,像他这样经历了四五个专业模特队的创建过程的教练,在国内也是唯一的。见多识广,就积累的经验而言,他比那些眼睛只盯着一个队的教练要丰富得多。

作为模特教练,王一鸣自认为他的强项是强化训练。

1986年底,北京广告公司时装模特队刚完成招生工作,外聘的艺术指导王榕生和吕国琼都还没有到任,而北京电视台却急着要录制一台元旦播放的时装表演节目,在此情况下,只得通过刚入队的张亚凤的关系,把还在北京印染厂时装表演队担任队长的王一鸣请来了,在中国大剧院,对她们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强化训练。而在这一批新人中间,就包括后来在1988年摘取“今日新模特国际大奖赛”桂冠的彭莉和1989年赢得中国第一顶模特皇冠的叶继红。尽管她们的成名,与王榕生、吕国琼的培养密不可分,但她们从一点不会走到能上舞台表演,在电视上亮相,这入门的第一课,是王一鸣教的。

如果说进入第一代中国“十大名模”之列的叶继红、张亚凤和张锦秋都是致于成熟之际才正式受训于王一鸣的话,那么,进入第二代中国“十大名模”之列的陈娟红、宋红艳和褚红,就完全是他一手培养出来的了。尤其是将代表中国于今年7月赴洛杉矶参加世界超级模特大赛的陈娟红,当初就是他二赴杭州,亲自将她由喜得宝丝绸公司时装表演队“挖”来的。

1990年10月,当杭州喜得宝丝绸公司时装表演队在广交会上演出时,因为距离较远,王一鸣并没有注意到陈娟红,所以在陪经理杨诉去杭州“挖”人时,原定的模特名单中,没列入陈娟红。用王一鸣自己的话来说,“陈娟红是我多问了一句话问出来的。”作为教练,他的愿望是,最好能培养从未经过训练的生坯子,这比已接受过他人培训并当了一段模特的人,可能要更容易出成果一些。于是,到了杭州,他私下里就打听:“你们这里有没有刚招进来,还没有上过台的模特?”得到的回答是:“有。陈娟红刚招进来两个月,虽说曾随队参加了亚运会和广交会期间的演出,但实际上她还没有受过正规训练。”他一见身高1米79的陈娟红,果然外型条件极佳,令他喜出望外。年仅20岁的陈娟红哪有勇气离开人称天堂的杭州呢?为了得到她父母的支持,

王一鸣接连两次赶赴桐乡县,去做她父母的思想工作,真可谓“三顾茅庐”,终于把这棵好苗“挖”到了深圳。

发现了具备名模条件的人才,作为教练,王一鸣显得分外激动。他觉得,让模特创造成名的机会,这是他应尽的责任。陈娟红进队之后,他就是把她当作第二届中国“十大名模”的获奖选手进行培养的。而陈娟红是属于内向型的姑娘,接受能力比较慢。于是,他也就只得耐着性子对她进行辅导,反反复复地给她灌输模特的特殊意识。他想,家长放心地把她送到深圳,交给她培养,就是希望她在这里能够学有所成,跨入名模的行列。功夫不负有心人。除陈娟红出乎意料地夺取了第二届中国“十大名模”之冠外,与她同时从杭州“挖”来的褚红也成了第二届中国“十大名模”之一。而喜得宝丝绸公司时装表演队参加这次大赛的三名队员,就原先的技术水准而言,均不在陈娟红、褚红之下,却全都名落孙山。两相比较,这就显出王一鸣在培养时装模特方面,确有高人一筹之处。

在我想来,他这个男模出身的教练,在训练女模特时,总比不得像李晓筠、吕国琼、凌云等女艺术指导那样得心应手,便当自如。单就说动作示范吧,难道他能比李晓筠、吕国琼、凌云她们做得还到家吗?当我就此向王一鸣发问时,没想到他回答说:“虽然我不是女的,但我有我的教学方法。我有一个观念,尽量不要让模特来模仿教练。因为任何一个教练的示范动作,都不可能非常精确。我所注重的,是向她们传授一种意识,靠技术启发、技术指点,让她们找到一种万事俱备、水到渠成的感觉,而不要让她们单纯模仿教练,形成固定的表演模式,把教练当成须臾不能离开的拐棍。尤其是对初学者来说,在她的心目中,教练的每一个动作,无论好与坏,也无论是否适合于她,她都觉得是对的。因为她不懂,对教练有一种盲目的信任,盲目的崇拜。因此,也就越是模仿得像教练,越是能博得教练的欢心。而有的教练,恰恰是这样,要求学生完全模仿自己。训练时,不时地嚷嚷这个动作错了那个姿势不对,仅注意一些表面的东西。我不是这样。除了教会她们比如转圈之类的零散技巧外,我传授给她们的,主要是一种模特意识,帮她们作心理分析,让她们找出各自的气质特征,然后





尽情发挥……”

这就是他的诀窍。

提起成就，在王一鸣和张亚凤接受我采访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从历史来看，她比我辉煌得多，潇洒得多。别看她比我小五岁，但作为时装模特，她比我的资格要老。她是吕国琼老师最早在东城区文化馆时办的‘服装广告艺术表演班’的首批学员。应该说是咱们国家的第一代时装模特了。”

张亚凤高中毕业之后，先在北京市农村区划办公室当了半年描图员，进“服装广告艺术表演班”时，才18岁。在她们那一代模特中间，她是最年轻的。她很幸运，跟吕国琼老师没学多久，就遇上法国服装设计大师皮尔·卡丹要在中国举办时装展示会，派他的助手卡尔多先生和在中国的代理人宋怀桂女士来挑选模特儿。说来也巧，挑来挑去，在他们那个班，就挑上张亚凤这么一个女孩子。

若论漂亮，张亚凤在班上并非出类拔萃。但是，在一群女孩子中间，她绝对是最显眼的。或者说，她是最独具魅力的一个。难怪卡尔多和宋怀桂一眼就看中了她，说她天生就是个模特儿呢！

她的迷人魅力，首先在于她黝黑的肤色，加上闪亮狡黠的眼睛、宽厚性感嘴唇，洋溢出一种难得的异域风韵。因此，从她登上天桥那天起，就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赢得了“黑玫瑰”的美称。

张亚凤是在鼓楼的门洞里接受正规的专业训练的。原先，她们只知直来直去的走，经宋怀桂点拨之后，才找到了时装模特的那种特殊的自在感。身为艺术家的宋怀桂，毕竟在时装之都巴黎生活了许多年，并深得皮尔·卡丹先生赏识，她传授给中国模特的，是一套职业性很强的国际流行技巧，张亚凤感到很新鲜，很诱人。因此，她对宋怀桂所传授的每一点每一滴，都细心

领会，记得很深很牢。训练了两个月之后，1983年9月下旬，张亚凤就参加了在民族文化宫大厅举办的皮尔·卡丹服装展示会的演出。这不仅是她第一次登台，而且也是北京的时装模特儿第一次公开亮相。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惊异地问卡丹先生：“哪来这么好的模特？是从日本还是香港请来的？”

张亚凤回忆这次演出时说：“在这之前，我从没有上过台，当时，连妆都不会化，是别人给我化的，心情很激动，但又很紧张。一心想走出去，可又怕走出去。每回一走出去，就想往回跑；到了台前，连观众都不敢看，扭身就往回走，就像是衣服架子似的，穿好了跑出去，又很快就跑回来……而卡丹先生却对我们很欣赏，觉得我们不做作，表演比较自然。”

这说明，她一开始走的路子就很正。时装表演最忌讳的，就是搔首弄姿，矫柔造作，只注重表现模特自己。一个好的时装模特所追求的，应该是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意境。

在民族文化宫的演出获得成功之后，卡丹从二十余名模特中选出六名佼佼者，随他去上海演出。能被这位世界著名的服装设计大师选中，这对初上天桥的模特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鼓励；张亚凤是这六位幸运者之一。当时，上海服装公司已经成立了专业模特队，但她们的尚未见过受训于卡丹代理人的中国模特展示卡丹设计的时装。因此，当张亚凤她们在锦江饭店演出时，上海服装公司竟在现场架起了三台摄像机！她们连演了三场，场场轰动。这六位佼佼者中，除刘鹤系中央歌舞团的舞蹈演员而外，其余的五位——石凯、孙幼婷、曾燕、尚小梅和张亚凤，后来都成了蜚声中外的名模。而在这五位中，又数张亚凤年龄最小。

1986年底，张亚凤终于成了北京广告公司时装模特队的一名专业队员。第二年，该队出访泰国。泰方来挑人时，却偏偏甩下了她。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她的肤色偏黑，像个亚热带姑娘。话是这么说的：“你别生气，就是你的形象把你耽误了。若把你请去，好像请的不是中国模特，而是我们本国的模特呢？”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在只剩她一人在队留守时，是中国丝绸进出口公司和《时装》杂志社来挑人，组团访问西德，把她挑上了。这个出访团是以上海服装公司时装表演队的模特为主体组建而成的，北京就挑上两名模特，而另一名不是别人，就恰好是张亚凤的男朋友王一鸣。王一鸣是出访团里唯一的男模。在此之前，中国男模从未走出国门，登上欧洲的模特舞台，他是第一个。值得骄傲的是，在他之后，再未有中国男模有过这样的际遇。这也许就是他后来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卓有成就的模特教练的得天独厚之处。

那一次，他们在西德一个半月，访问了法兰克福、汉堡、杜塞尔多夫和慕尼黑，尤其是在新兴的时装城杜塞尔多夫参加世界女装博览会的演出，令他们大开眼界，长了许多见识。那时，尽管他俩刚相爱不久，但成天忙于演出和观摩，根本没顾得上谈情说爱。以至在我采

访他俩时,想从张亚凤的相册里找出一两张这对佳偶在西德时“亲热”一点的合影,都未能如愿。然而,无论怎么说,这是他俩唯一一次结伴出访、同台演出。每当说起这次西德之行,他俩就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之中。

这对T台伴侣,相爱了许多年,确实是一向将事业置于爱情之上的。当然,也首先是事业才使他俩走到一起,互萌了爱慕之情。而相爱日深,又使他俩的事业变得更加辉煌。张亚凤之所以能在首届中国最佳时装模特表演艺术大赛中居于“十佳”第四名,就是与王一鸣的指导和帮助分不开的。可以说,这也是命运的有意安排。

无论是作为教练,还是作为恋人,王一鸣对张亚凤是了解最深的。他认为,要让张亚凤在比赛中能有超常发挥,就得扬长避短。她的长处是什么呢?经过初赛彩排时的观察分析,他就发现,就在于她的肤色与众不同。为了使她这枝“黑玫瑰”更娇艳,形象更突出,他特意为她设计了外国黑人模特儿似的头型,编织一根辫子,从脑门往后垒,垫成三角形,隆起一个高点。这样,就把头型拉长,使她脸部轮廓更清晰,区别于任何选手。与此同时,在脸上化妆上,不用白的粉底,而是用暗咖啡色,配上白色的衣服,大裤裤,与肤色形成强烈反差。一出场,就显得很亮,使观众的注意力一下子就都集中到她身上。此外,他还给她设计了既能充分发挥所长又能避开所短的表演线路,让评委有一个最好的感觉点……张亚凤是个很有灵气的模特,越是在她成为全场目光焦点之时,她的自我感觉就越好,越能将技术技巧发挥到最佳水准。更何况,她知道,还有她最亲爱的人在一旁为她壮胆助威呢!

在张亚凤成为“十大名模”之一以后,人们就都知道中国模特舞台上有这样一枝独具魅力的“黑玫瑰”了。
〔责任编辑 晓渡〕

“殷人渡海”、“慧深与扶桑”。

1、殷人渡海。从公元前14世纪商王盘庚迁都到殷(今河南安阳西北)。商朝就又称殷朝。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伐纣灭商后,有商人从鲁国(今山东一带)乘船顺太平洋暖流到阿拉斯加、加利福尼亚,直到美洲,这就是“殷人渡海”,房仲浦先生写了众多的文章支持殷人首到美洲的观点,Mertz先生在《PaleInk》(《淡漠》)一书中也主张中国人首先到美洲,并认为《山海经》中所写的就是当时加州的情况,一些考古发掘也为此观点提供佐证:墨西哥发现了公元前1500到公元前1000年的“olmec”文化,有人认为这是亚洲文化,很可能是殷人带去的,美国也在加州海底发现了石锚,其石料经北大地质系化验证明只有台湾一带才有,很可能有中国人那时去过美洲。

2、慧深与扶桑。慧深是南北朝时中国和尙,他到过扶桑,并描述曰:扶桑“东去中国万余里”,“其国有文字”《南史》中也提到“扶桑”,曰:“扶桑……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扶桑叶似桐,初生如笋,国人食之”。这里“扶桑”在什么地方?扶桑木是什么?是很有争论的问题。

中国人一提扶桑,就会想到日本南北朝后,中国史书一直认为扶桑即指日本,有诗为证,如韦庄《送日本国僧》曰:“扶桑正在渺茫中,家在扶桑东更东,此去与师谁共到,一船明月一帆风”,鲁迅先生《赠增田社》曰:“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但是,1761年,de Guignes先生据《南史》及其他汉语资料,提出“扶桑”是墨西哥,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影响,从此引起“扶桑”指何地的国际争论,主要观点有三种:

①指美洲、②指亚洲(日本、库页岛)、③此说无凭证,纯属编造。

自1913年中国就已讨论这个问题,至今无定论。持第一种主张最坚决的就是朱谦之先生还有台湾学者卫聚贤、邓拓在《燕山夜话》中亦著了文持此观点。

扶桑木为何物?主张扶桑是墨西哥的人认为:或是玉米,它是印第安人培育出来的品种;或是仙人掌,这两种东西均是美洲特产,也是美洲特色,随处可见,嫩时可食,与《南史》所记之扶桑木相仿。

中国和拉美的来往,有正式记载是在明中叶,之前若有,就是殷人及慧深,但是这方面的资料欠缺,有待进一步考古发现。即使今后证实美洲首先发现者是华夏先辈,客观来讲,其历史意义也远逊于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因为前者只不过是一种移民或旅游,后者却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相联系,对世界历史的进程起了重大的作用。

1992年10月,联合国将举行盛大的纪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500周年的活动,读者若对此问题有兴趣,不妨留心留意,捕捉一些新鲜有趣的材料观点,品评韵味,以资消遣。

徐青

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 到底是谁首先发现了美洲?

是谁首先发现了美洲?这个看似既明确又简单的问题在1982年成了史学界突出的“国际问题”。这一年11月29日,爱尔兰大使提出,首先发现美洲的并非哥伦布,而是爱尔兰人,随之,冰岛人声称是他们的先人首先发现美洲,以后,又有荷兰、法国、印度、日本、土耳其、葡萄牙等国纷纷宣布首先发现这块神秘大陆的是他们自己,在国际上一片纷争“首发权”的浪潮中,中国也提出了“中国人首先发现美洲”的观点,赞同者既有中国史学界著名的专家、学者,如交通部航海史专家房仲浦、北大教授朱谦之、邓拓、台湾学者卫聚贤等,又有外国的中国学专家,如美国的Mertz先生,法国的deGuignes等,别的国家以何为据来说明其对发现新大陆的贡献暂且不管,中国的理由是什么呢?这就是:

开国 第一文化冤案

——江青与陶行知及其弟子的恩恩怨怨

唐文权

1951年在全国范围大张旗鼓开展的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是建国以后第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大运动。这场运动以文教界为重点，波及各行各业，狼揭猛批，上纲上线，开建国后历次思想政治运动之先河。而其声势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即在事过40年后的今天看来，也是够得上“等级”，有资格溢之为“开国第一文化罪案”的。

然而，对于当年运动的绝大多数经历者来说，无论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也不管是作为“动力”或“对象”的，他们在批判武训和当代新武训陶行知，以期努力肃清自身或他人头脑中的《武训传》流毒时，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在评论武训和陶行知是是非非的公案之内，还包含着另一桩江青和陶行知恩恩怨怨的公案。

陶行知是《武训传》这部电影最直接有力的催生者。早在20年代，他就是武训艰苦办学精神的崇拜者和宣传者。抗战时期在经济条件极端恶劣的情况下，为了维持设在重庆的育才学校，他又倡导新武训精神，自励励人，以期战胜困难，坚持办学。他曾有一个通过文艺形式向社会广泛宣传武训精神的计划。其中内容之一即是约请田汉和安娥夫妇分写有关武训的话剧和歌剧，请孙瑜负责武训的电影。1946年7月，在反内战运动高潮期间，他因劳累过度突患脑溢血逝世，四海惊悼，成为国人共仰的民主先驱。为了实现他的遗愿，孙瑜根据当年陶行知所赠有关武训的材料，写成电影文

学剧本，并为中国电影制片厂执导此片。1948年中影迁台湾，孙瑜于次年2月加入昆仑电影制片厂，并继续执导拍摄为昆仑厂买下的《武训传》。据此，陶行知实为《武训传》问世的原动力。

《武训传》于1950年底完成，初映即赢得了一片赞扬之声。在中南海试映时，一百多位中央委员观看了这部影片。映完后，许多中央委员都称赞影片拍得好。朱德热烈地握着孙瑜的手说：“这部影片很有教育意义。”1951年春节后在各大城市公开放映，京、津、沪等地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文章，对武训精神和《武训传》几乎作了一致肯定的评价。《大众电影》杂志特为组织专辑，并把它列为观众喜爱的十大影片之一。

但很快从最高层中传出了不同意见，顿使情况骤变。5天后出版的《文艺报》四卷一期以醒目的位置刊登了一组批判文章。5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四卷二期则发表杨耳《试论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直接把这场批判挂连到陶行知身上。6天后，《人民日报》转载经过修改后的杨文，并将题目径用请问句标示，显得更具战斗性：《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5月20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显著地位发表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社论严肃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它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

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社论还一一罗列了发表在京津、沪等地十几家报刊上40余篇赞扬武训精神和《武训传》的文章，点名批评了1951年初出版的3本颂扬武训的新书。这一场“开国第一文化冤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胡乔木1985年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这场被“过份夸大”至于“达到简直不能令人置信程度”的运动，不但是“非常片面”、“非常极端”和“非常粗暴”的，而且批判方法“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

为这一批判运动推波助澜的江青，这时在文化部文艺处挂名任职。批判运动开始后，她终于走到前台，投入讨伐。她用李进之名，率领一支由《人民日报》和文化部组成的有12名成员的“武训历史调查团”，直奔武训家乡山东堂邑进行调查。作为结果，写出了一篇长达数万字的《武训历史调查记》，从当年7月23日到28日，分6次在《人民日报》全文刊出。文章之长，连载之久，在惜字如金的《人民日报》都是罕见的。由此，为正在轰轰烈烈推行的批判运动添加了不可多得的发旺的燃料。

在运动中，一批声名显赫的上层民主人士相继公开著文检讨方始过关。文艺界一大批知名演员和导演更是在劫难逃，尤以三十年代在上海时与江青有过恩怨关系的赵丹等人首当其冲。《人民日报》特为武训的赵丹发表专文，《赵丹与武训》，足见一斑。在教育界，运动的声势更是凌厉异常。文件三令五申，号召斗争，肃清流毒。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教师暑期集中学习，开展人人过关的面上运动。教育部的机关刊物《人民教育》带头引路，在一年多时间里接连发表了十几篇批判陶行知及其学生的文章。

这样，在建国不久的政治舞台上峥嵘初露小试锋芒的江青，便一石二鸟，分别在文艺界和教育界击中目标，踩着已经死去的武训和陶行知，踩着在世的陶行知弟子及其“武训精神”的信从者，悄悄地以文化教育为阶梯，向权力中心爬去。

对于陶行知来说，批判《武训传》和武训精神使他的形象受到严重损伤。他的身后荣名从四海仰慕的辉煌顶峰被推落到少人问津的晦暗幽谷。从此，陶行知成为一名“可议人物”，其人其事连同其教育思想，被一并划入禁区。虽有少数几位风骨铮铮的朋友冲破警戒线，喊出了诸如“陶行知的教育遗产是新中国教育学的源泉之一”（陈友松）和“我们必须对陶行知先生给以重新评价”（邓初民）的呼声，但1957年“反右”之风一刮，又把陶行知卷到乌有子虚之乡。此后，除个别人笔下偶一涉及，在大多数中国人记忆中，大教育家陶行知这个曾经大红大紫的名字被逐渐淡忘了。直到1981年，以纪念陶行知诞生90周年为契机，人们才开始重新评价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并重新审视当年批判《武训传》一事。这样，人们在欣喜地拂去当年泼在陶行知身上的污垢，重新摩挲这颗尘封一世（30年）依然光采照人的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明珠时，理当对那场使陶行知及其学

生含垢蒙辱的文化罪案加以冷静的反省。于是，我们发现江青的插手介入，与其30年代以来陶行知及其学生的恩恩怨怨不无关系。

三十年代援助江青之恩

陶行知及其学生与江青初识于1933年。

这一年夏天，原名李云鹤的江青因同居者俞启威被捕，从北方初来上海。她以张淑贞之名被介绍到陶行知及其学生主办的晨更工学团。

以创办晓庄学校而风动海内外的陶行知，因为不满南京政府所为，支持进步青年学生，其学校于1930年春被封，身遭通缉。在经历了流亡生活和“九一八”抗日救亡运动洗礼之后，思想更趋进步。1932年秋，他为了探索中国教育革命的新路，提出了“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工学团主张，倡导将工场、学校和社会打成一片，以求中华民族的新生。他先在宝山县和上海市之间的孟家木桥创办了山海工学团。当年冬天，又派晓庄学生徐明清和王洞若在上海北新泾镇陈更村创办了晨更工学团。陶行知放手将晨更交给中共党员徐明清负责，使晨更成为中共在上海的一个地下工作据点。在“文总”领导下的“教联”、“左联”、“剧联”和“社联”等组织均积极在此开展活动。正是在上述特定背景下，江青因“剧联”的关系被介绍到晨更，受到陶行知及其学生的庇护。

从某种意义上说，江青是在晨更第一次领受革命集体生活的教育。在晨更，十几名成员过着一种带有战时共产主义色彩的集体生活。他们继承和发扬了陶行知在晓庄倡导的有关做法。他们为学龄儿童办学，为女

1967年2月22日江青在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上发表煽动性讲话。



工和农妇开办幼儿园。清晨和夜晚,又分别为上日、夜班的工人办读书班。他们组织小先生送学上门,送学进村,为宣传抗日救国,组织歌咏队,排演小型活报剧、皮影戏、上海小调等,日常生活安排也很有规律。早起有晨会,上午分头工作,下午在自置的菜田里劳动,晚上轮流进行内容丰富的集体学习活动,其中有学习马列理论著作的读书班,时事讨论会,文学讨论会,外语学习班等等。他们做饭烧菜轮流值班,吃的是大锅饭,黄豆芽、南瓜汤是家常菜肴。除了一日三餐,没有1分工资,生活相当清苦,但大家工作情绪十分高昂。初到上海的江青很快融入到这个特殊的革命集体之中。对外,她和王洞若负责为数十名小学生任教,并为店员班上课。对内,她教大家唱歌和学习国语注音符号,与田原共同负责主持时事讨论会。她还同吴甫生一起跟随田原学习日文,据当事人回忆,她为此还专门添置了一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日语词典。

不难理解,在这样的集体生活环境中,初到上海尚无很多社会联系的江青,必然会与陶行知及其学生建立颇为密切的关系。据知情者回忆,江青曾有好几次通过陶行知设在市内的“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负责人曹建培找陶行知谈事。特别要指出的是,江青同徐明清和王洞若的关系非同一般。徐是这个小集体的负责人,也是江青在此最重要的同性伙伴。她是浙江临海人,大革命失败后无处容身,慕陶行知开明办学,投考晓庄。1928年她在校先任共青团书记,1930年初继任党支部工作。晓庄被封后,她辗转来沪,奉陶行知之命负责晨更,继续坚持地下工作。王洞若是江苏镇江人,在晓庄时受国家主义派的思想影响。但学校被封和同学死难擦亮了他的眼睛,促使他在政治上逐渐转向。同时,他在个人婚姻生活上的苦闷也因个性活跃的江青到来而有所舒缓。江青到晨更后,他们同教小学,接触较多。王洞若的才华无疑有助于加深彼此的交情。他实在是江青在晨更最重要的异性伙伴。在陶门弟子中,有关此时的王洞若是江青的追求者一事并非秘密。

平实而论,江青在晨更时期政治上颇有进步。1933年夏,共青团上海沪西区委来晨更发展团员,建立支部。江青和王洞若不久都入了团。当年冬天,俞启威被释后来沪与江青重晤,临时在静安寺路找到一灶披间住居。俞要求重新入党,中共沪西区委为考验他,命他参加1934年“一·二八”两周年游行示威活动。在这次活动中一位名叫“王大个”的晨更同志被捕,他从狱中传出话来,说敌人业已注意到游行队伍中的江青,正欲搜捕。在风声日紧的情况下,江青随俞启威重返北京,结束了这半年多晨更工学团生活。

待到江青第二次来到上海时,已是1934年夏天。

她同俞启威北返后,事情并不顺遂。俞的入党问题既未解决,经济来源也无保证。在无奈之中,江青再度单独来沪,继续寻求陶行知及其学生的帮助。

但此番来沪情势已有所变化。因为左倾路线的影响,晨更的活动很不隐蔽,引起当局严重注意。徐明清

多次受到当局查询,无法容身晨更,经陶行知介绍,转往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从事女工教育工作。不久,当局突击搜查并封闭了晨更,逮捕陈企霞等5人。所以,江青此时来沪再也不能重温晨更的旧梦了。

在百般困难中,陶行知又一次伸出援手。把江青介绍到基督教女青年会所办的小沙渡河女工学校担任高级班语文教员,帮助她在上海找到了一个立身之处。不久,又因为徐明清和王洞若的关系,江青参加了“教联”。当时在“教联”沪西区委中,党团负责人为孙达生,徐负责组织,王负责宣传。据称,江青当时表现不错,组织上准备解决其入党问题,并让她在“教联”沪西区委中担任一定负责工作。

就在此时,出现了一个意外事件。1934年10月,江青突然被捕,身陷囹圄。有关此事起因,据当事知情者忆称,江青时为帮助黄炎培先生所办的农学团组织演戏,在兆丰公园约一名叫阿东的同乡青年帮拉胡琴。阿东原在青岛负责地下党的电台,后调沪在团中央工作。他的身份已暴露,处在敌人跟踪追查之下,所以江青与他一分手即被逮捕。江青被捕后,孙达生等曾通过关系到狱中查找。个月后将由女青年会出面保释江青出狱。可惜我们现在无从得知在探监和保释过程中,陶行知究竟起了多少作用。不过,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即江青保释后继续得到陶门弟子的帮助。

三十年代开罪江青之怨

江青第3次来到上海已是1935年春天。

这一回来沪后,江青主要同“剧联”打交道。据江青后来得志时向美国女作家路易斯自述经历时所说,是“剧联”写信要她来沪,点名要她主演《娜拉》。但有的人瞧不起她,她发愤钻研剧本,深入角色,终于一举成名。这位飘飘然然的“红都女皇”在自夸自赞之时,有意略去了许多基本事实。江青(此时起用“蓝苹”的艺名)此番初演成功实在离不开许多朋友的帮助。她既得益于对苏联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艺术素有心得的章泠的执导,也受教于当时在影剧界颇有名望的赵丹和金山(他们分别出演剧中男主角郝尔曼和柯洛克斯齐),更离不开章、赵的共同好友唐纳的关照。唐纳是一位与“剧联”关系甚密的进步文艺工作者。过去,他在一些文章中被描绘成纨绔公子,恐怕主要是受累于和江青的那一段罗曼史。唐纳多才多艺,既当演员,又任报刊编辑。在银幕上,他以英俊潇洒的小生现身,拿起笔头又能写出一手漂亮的文章,在影剧评论方面某种程度上起着舆论导向的作用。同这样一位“影报双栖”的明星人物发展关系,对江青来说,其价值不言而喻。所以,尽管影剧界中追求她的颇有人在,她却唯独留意于唐纳。唐纳一铸丘必特挽弓,立中芳心,马上同居。随后,在唐纳推助之下,江青相继出演《大雷雨》和《钦差大臣》的主角,在影片《狼山喋血记》中也担任角色。从此,“蓝苹”的剧照及大大小小的捧场文章频频出现报端刊尾,上海影剧界新添了一名二流明星。

灯火辉煌欢腾活泼的影剧生活，显然有别于昔日默默无闻清苦冷寂的教育事业。风度翩翩气概不凡的艺术家，更不同于手执教鞭粉尘沾身的教书匠，生活环境和性质的变化，使江青与“教联”的联系渐少，也与陶行知及其学生的来往渐疏。

1936年春夏之际，江青和唐纳戏剧性的婚变事件一度成为上海滩上的热门话题，由此引发陶行知的感慨劝导，从而开罪江青，成为一个不可解开的冤结。

1936年4月26日，赵丹、唐纳、顾而已这三位好友，特邀陶行知的好友大律师沈钧儒担任证婚人，在杭州六和塔下举行别开生面的集体婚礼，报端披露后，顿成上海市民酒后饭余谈论的一大艳事。然而蜜月未满，江青和唐纳即发生婚变。江青借口返乡探母，迟迟不归上海。据陶门弟子中知情者的说法，是江青对唐纳颇有不满，认为唐纳有小市民习气，故而怀念旧情，又去寻找俞启威。而据江青自述当初与唐纳虽行婚礼而未立婚书的“理由”，也似可以印证这一说法。在1937年5月31日出版的《联华画报》第九卷第四期中，江青以《一封公开信》为题，解释这一“留有余地”的做法：“在举行仪式的时候，三对当中我们没有婚书，因为我们明白如果一旦不相爱了，婚书是没有用的。我和他都没有把这种形式放在心里。”当不耐相思之苦的唐纳追到山东，从江青之姐处得知江青已到天津俞启威那里，愤恨失望之极，在给江青和郑君里留下遗书后，即在济南一家旅社服毒自尽。幸而及时发现获救，而那封写于6月26日留给“阿莘”的哀艳凄绝的绝命书被好事者公诸于世，不但上海大小各报刊载，连南京《中央日报》也以《轰动济南之唐纳自杀事件》加以披载，致使海内轰动，脍炙人口。作为变情者一方的熟人和殉情者一方的朋友，陶行知自不能不对此表示关注，当陶行知从报上得知唐纳自杀未遂的消息后，出于对年青朋友的关心，写了一首《送给唐纳先生》的诗，劝勉对方：

听说您寻死，
我为您担心！
您要知道：
蓝草是蓝草，
不是属于您。
您既陶醉在电影，
又如何把她占领？
为什么来到世界上？
也要问一个分明。
人生为一大事来，
爱情是否山绝顶？
如果您爱她，她还爱您，
谁也高兴听喜讯。
如果您爱她，她不再爱您，
那是已经飞去的夜莺。
夜莺不比燕子，
她不会再找您的门庭。



如果拖泥带水，
不如死了您的心。
如果她不爱您，而您还爱她，
那么您得体贴她的心灵。
把一颗爱她的心，
移到她所爱的幸运。
现在的时代不同了！
我想说给您听，
为个人而活，
活得不高兴；
为个人而死，
死得不干净。
只有那民族解放的大革命，
才值得我们去拼命。
若是为意气拼命，
为名利拼命，
为恋爱拼命，
问我们究有几条命？

尽管诗中对变情者并无苛责之词，但将其比作另找“门庭”的夜莺，劝唐纳不必为之轻生，却绝对是冒犯蓝草之词。

于是，这首小诗便成为睡醒必报的江青必欲报复消恨的事由。

江青得知怨端前后

然而，这首发表在邹韬奋刚刚创办(1936年6月7

日)于香港《生活日报》上的小诗,在当时并没有广泛流传,也不曾为江青所寓目。虽然在7月10日陶行知离港前夕,《送给唐纳先生》一诗连同另外20余首同期所作诗篇,已汇编成《行知诗歌集》,由生活书店在当年11月出版。但是,剧烈动荡的时局几乎把人们的呼吸目光全部吸引到救亡大业上去了,这一小小的诗集在当时并未引起较大的反响。

因此,在江青不知陶行知“诋毁”自身的情况下,她与陶行知及其学生继续保持比较好的关系。

1936年11月下旬发生的“七君子事件”,把陶行知及其学生与江青一起推到了抗议当局消极抗日的政治斗争前列。陶行知因为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并担任救国会领袖,与沈等7人作为“同案犯”被当局通缉,并同被起诉。在持续半年有余的全国抗议浪潮中,终以当局公诉书的提出而达到高潮。1937年6月下旬,宋庆龄、何香凝等具状江苏高等法院,要求与七君子同时收审。爱国无罪则与沈等同享自由,爱国有罪则与沈等同受处罚。宋等登高一呼,各界纷纷响应,顿时汇成一个爱国入狱运动。这种义无反顾、视狱如归的精神,确实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族格。在此过程中,上海影剧界中的许多著名导演和演员,和应云卫、袁牧之、赵丹、郑君里、金山、王莹等均在具状要求入狱者之列,唐纳和江青也在报端公开亮出同一立场,尽管他们此时已经分离,但无论就国家民族的公谊,还是与沈、陶等的私情,他们的声援都不失为一种见义勇为的豪举。这一行动,与陶门弟子在教育界的声援抗议活动,与陶行知在美国组织推动爱国华侨和美国上层知识界如杜威等的救援活动,完全桴鼓相应,一致敌忾。

“七七事变”之后,在王洞若的帮助下,江青和徐明清一起经西安前往延安。此后,她便以江青的名字行世,开始其生活中全新的一页,成为另一个更广阔的舞台的表演者。待到陶行知再度与她相见,已是1946年春。作为“第一夫人”的江青,已非当年沪上“阿苹”。她趁国共和谈尚在进行,从延安到重庆比较方便,专程前去医治龋齿病。到重庆后,她曾相约唐纳见面,但唐纳出于种种考虑有意回避了。陶行知则与她一度聚首在山城。3月9日,陶行知和李公朴以创办不久的重庆社会大学正副校长名义举行校董和教授联席会议,并宴请两路远方来客。一为刚从狱中释放的叶挺和廖承志,一为刚从延安来渝的邓颖超、滕代远和江青等。据当事

人忆称,江青是日因到医院治牙未曾到席。但江青后来专程到重庆管家巷28号陶行知住处相访,并邀请陶行知和王洞若随机同往延安。据此看来,在陶行知生前,江青对他尚无恶感。笔者推测,江青对陶行知反目怀恨是在其死后不久的1947年,而导线则是《送给唐纳先生》一诗的入目。

陶行知1946年7月猝然去世后,他的朋友和学生为了纪念他,曾开展过一场颇有声势颇具规模的悼念活动。汇编其诗作印成《行知诗歌集》,便是其中组成部分。这部诗集于1947年3月由大学出版公司印行问世,因陶氏新丧国人痛惜之故,诗集流传颇广,举凡与陶氏有交谊者莫不争相致之。江青极有可能是在这本诗集中得知陶氏把自己称为莺莺燕燕的雅喻,由此怒不可遏。

同时,另一条消息也可能引起江青的极度不快。1946年12月9日在纽约举行的陶行知追悼会曾引起海内外的注意,追悼会由杜威博士和冯玉祥将军担任名誉主席,美国诸著名人士分别讲演逝者一生事迹。讲演之后,由游美著名演员王莹和刘良模合唱陶氏喜爱的四首歌曲。这条消息先后刊载于当年12月30日的重庆的《新华日报》和次年2月15日的延安《解放日报》,当入江青之目。王莹其人,与陶行知有安徽同乡之谊,却与江青有剧坛争角之仇。1936年夏衍发表《赛金花》剧本后,双方为争演此剧主角,形同水火,一时曾成为上海影剧圈中一桩很有影响的事件。这一争角之败,曾被江青引为终生大辱之一,王莹也从此成为她切齿难忘的仇人。按照江青的人生原则,仇人的朋友也是自己的仇人。王莹如此颂陶,足使江青旧恨新仇齐涌心头。陶行知地下有知,恐怕也难以逆料。

人世间恩怨相报和爱恨相替,始终是实际生活和文艺创作中的一个永恒的主题。恩其所恩,怨其所怨,也始终是除超凡入圣者外的肉身凡胎无从超越的一方欲界。为了鉴衡有关恩怨所施是否得宜,人们又铸造了公德和私德这两重社会道德尺度。持此度量陶行知及其学生与江青之间的恩怨公案,人们不难判断其德与不德。

(作者附记:陶夫人吴树琴先生和陶门弟子徐明清、方明、吴萧生诸先生曾为本文提供情况,原陶行知研究会刘季平会长的夫人吴瀚先生热情鼓励,尤所感谢。)

〔责任编辑:张蕾〕

伦敦,这个古老神秘、历史悠久令人神往之地,终于出现眼前了。对于香港人来说,“英国”——具有特别的意义了。雨蒙蒙,从阿姆斯特丹乘飞机到伦敦只需四十分钟,伦敦时钟比中欧国家拨慢一小时,飞机于中午十二点起飞,到达伦敦市还是中午十二点。

原以为“香港人”过关不免多些麻烦。其实,只要办好签证,海关并不难“过”。

虽然伦敦的建筑和风景与中南欧许多国家大同小异,我仍想通过观察,比较,找出它的特点。地铁也是和机场相连接的,但地铁车比香港、荷兰旧,座位上的绒布差不多磨平了。在地下铁,看到与荷兰、法国、比利时等大城市普遍看到的现象,这就是乘客中人种复杂,什么肤色都有,像国际场所。据说一些伦敦本地人对此现象甚为不满,宁可搬往郊外或小镇

居住。一个小时后,走出地铁口,有几位小姐手拿一束短短的玫瑰花,见到男士,往对方左胸一戴,算是兜生意。(一般给几便士就行了)。这些日子,常从报上看到英国经济不景气的报道,如失业人数增加,流浪汉多等。(皇家书院发表英格兰威尔斯露宿者达七十万)。

经实地观察,比想像中要好,街道整洁,井然不紊,偶尔看见一两个流浪汉。而巴黎的地下铁月台旁常常看到流浪汉睡在椅子上。夜生活方面,与西欧其它国家差不多,一般人不太有夜生活习惯,即使在大城市,也只是部份地区较热闹。最令我奇怪的是,在伦敦不太容易看到“黄色”东西,也没看见“玻璃橱窗内的女人”,据说英国人较保守,对“黄色”、“色情”管制较严。

〔香港〕作者:玫林

伦敦见闻



——美籍华人画家吕吉人成功寻秘

风筝，在大洋那边

·
·
·
·
·

李硕儒 ●

出国十年的他回来了。尽管如今他已是美国专业画家联盟会员、美国艺术家同盟会员、三次获奖走遍世界的美籍华人画家，但他还是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自己的大地。

在从纽约到上海的大型客机上，他曾不止一次地透过舷窗望着浩瀚的太平洋：哦，太平洋，跨过你的脊背就是我的故土，就能见到我朝思暮想的年迈的父母，激我好学催我登攀的师友了……

此时，一幕 29 年前的回忆倏地蹦到他的眼前：阳春三月，上海马路边的梧桐杨柳已经绿漾漾地蹿出新芽，妈妈领着他来到南派国画大师、时任中国美协上海分会副主席、上海画院副院长的贺天健先生的公寓：

“吉人，喊贺公公、贺婆婆。”妈妈恭敬熟稔地一面与贺老夫妇寒暄，一面指点着 15 岁的吉人。

吉人拘谨腼腆地喊过“公公”“婆婆”后又恭谨地站在老人面前深深鞠了一躬。

“好，好，这就是吕家二公子？”高大健朗的贺老打量着吉人，喜于心却严于外。

“这个老二就是天生爱画画，三、四岁起就到处涂涂抹抹，今天画素

描,明天刻剪纸,这就中了他父亲的下怀,所以打发我带他上门拜师……”

“言重了,言重了,我知道叔陶兄的苦心。”贺老一面说一面审读着小吉人的素描、剪纸和诸多画作。沉吟片许,才盯视着他母子说,“画的不错,不错。可国画学来很难,相比之下,西画要容易的多,而且好赚钱。”

“可他就是喜欢国画呀。”妈妈说。

“是的,公公,我就想跟您学国画!”吉人忘记了拘谨,马上与妈妈应和。

“哈……”贺老朗声大笑,“好好,我就收下你吧。”

第二年,从师贺老学画一年以后的小吉人竟在2000多名考生的竞考中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上海美专预科班!

“愧如昨日啊!”吕吉人啜了一口空中小姐送来的咖啡,又陷入另一幕回忆:

……1976年深秋,尽管马路旁到处滚落着萎黄蜷缩的梧桐叶,人们还是从中看到了光明与希望,可不知是因为“四人帮”垮台后老人兴奋过度,还是连日疲劳,大师贺天健却心脏病复发,吉人听到电话后,立即带妈妈、小弟敬人跑到贺家,兄弟俩用藤椅把贺老抬进电梯,然后送往上海大华医院。第二天,当吉人又来医院探望恩师时,老人好多了。他看着忧心如焚的吉人,握住他的手说:

“……不要怕……我,身体底子好,会好的,……会好的。你,可以……放开手脚画了……千万,别停笔。你……是我,最有出息的……学生。”说到这里,老人握着他的手还很有力。

没想到,几天后,当吉人又去看他时,老人竟说不出话了。他紧紧攥着吉人的手,嘴唇艰难地蠕动着,虽再吐不出声音,但从口形吉人辨认得出,老人再再叮嘱他:“画,画……”

如今,一代宗师已经长眠地下,他的满意弟子却载誉归来,将先后在上海、北京,然后再赴东京、横滨、巴黎、纽约、香港、台北举办画展,其悲其喜、其甘甜其苦涩一齐绞在他的心里,可毕竟他就要拥入母亲的怀抱了,他将把他的成绩与不足一起呈现给母亲,呈现给他养他的祖国。

二

1991年末,仲冬的上海虽然寒流缕缕,冷风兼夹细雪,那天上午,上海美术馆里却是春意融融,恰如佳节。原上海市长汪道涵先生亲提“吉人画展”四个大字,百岁老人、国画大师朱屺瞻老先生提写了“吕吉人画展”,原上海市文联主席、著名作家杜宣提字曰“吉人天相”,原上海市美协主席沈柔坚先生提曰“丹青新面”,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提曰“吕吉人之画贵在有一双中国人的眼睛”,国画大师谢稚柳提曰“画格新风”,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著名画家贺友直先生提曰“中国花外国花一株树开两种花吉人老弟笔生花”……在吕吉人上海画展开幕式上,上海文化界名人,画坛师友程十发、沈柔坚、贺友直、孟光、齐木、戴敦邦诸先生纷纷出席祝

贺,在摄像机、镁光灯的交相辉映中,吉人搀着年迈的父母一一恭迎答谢。

晚饭后,坐在沙发里的爸爸啜了一口绿茶说:“吉人,你知道吗,今天是我最高兴的日子。”

“……你们都没辜负我。大哥一个学纺织的,却靠自己的努力,成了今天日本千叶大学井上靖文学研究的学者;老三从意大利留学回来后很为长进,他出了好几部医学专论,如今已是西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副教授、内科主任;老四在冶金系毕业后,继续从事他的专业,他已经成了他们厂的一名管理人员;老五去年从日本学习回来,现在是一家出版社的副编审,美编室主任……妈妈和我都是八旬老人了,能看到我们的五子都登了科,此生足矣了,足矣了……”

“爸,这都是靠你和姆妈的苦心哇……”

……1947年,当吉人降生在这个家庭的时候,正逢盛年的父亲精力过人,稳健精干,他除了把自己的印绸厂自己的公司经营的井井有条外,他的那一座三层楼的家庭也建造的古雅温馨,颇有学术氛围。父亲虽属民族企业家,但因幼年清苦,使他向不奢华,惟爱诗、书、画。吉人记的,从他记事起,父亲管束的就极其严厉。他给他们五兄弟规定:吃饭不能出声不能掉饭粒,穿衣要干净不能奢华,每人每天要临一张大楷写一篇日记,不管多忙,爸爸都当晚在灯下为他们批阅打分。父亲不是教育家,可由于他对儿子们素怀厚望,颇知张弛相济、恩威并施。孩子们谁若说了脏话犯了错误甚或有失仪态,必然或跪香或以木板击手,绝不姑息;可同时,他同妻子又每月必携其五子定期看京戏、观美展、去博物馆参观。一次,夫妇俩带孩子去观京戏,因为天黑路滑,路上又刮起大风,母亲坐的包月不慎被风掀倒,致使她手腕骨折,为不扫孩子们的观剧雅兴,母亲匆匆去医院包扎治疗后,又陪全家来到剧院看戏。为使孩子们了解大自然热爱大自然,这一家还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即:春天必阖家游苏杭,秋天必去公园赏菊,夏天的夜晚,要借领孩子们去公园乘凉的机会,互相讲星星月亮的故事、排戏演戏耍杂技……为熏陶孩子们的文化素质,父亲给他的五个爱子从小人书到世界文学名著不知买了多少藏书。藏书自要整洁有序且要阅读率高,为此,父亲又添了大批书柜书架,排定五个儿子轮流负责保管借阅,并为之提名曰“五人图书馆”。自然,最迷人的还是他家那丰富的藏画,从一层楼到三层楼,每室每房都错落有致地挂满名人字画,从唐寅的兰竹,到文征明的书法,从黄宾虹的山水,到张大千的人物……更多的还是藏在父亲那一个樟木箱中的几百幅轴画。最使五兄弟高兴的是每年盛夏阳光最好的日子。因为每年此时,父母亲总要选一个最佳天气,打开樟木箱,取出一轴轴珍藏的轴画小心翼翼地拿到三楼阳台上晒画。这时,五兄弟都瞪起贪婪好奇的眼睛,一面听父亲如数家珍地讲述,一面欣赏那一幅幅写意山水、工笔重彩、梅兰竹菊、鸟禽走兽、春夏秋冬……如同进了大英博物馆,这一天,五兄弟总是废寝忘食、观赏流连、乐此不疲……如今谈起来,他们还回味无穷地称这一天为他的“文化祭”……往事如烟,回味着这多彩多

姿、如梦如幻的过往，吉人似乎又跳回到童年……

“受人滴水之恩，也要以泉相报啊，”妈妈插话说。几十年来，虽论绕膝面前抑或漂洋过海跋涉泱泱大千世界，只要想起妈妈的声音或想到她的一颦一笑，吉人的心里就升腾起无限的温馨感笃实感。妈妈一向忍辱负重、乐于助人、贤德笃厚。日寇进攻上海时，作为医生的妈妈曾自愿申请参加救护队，冒着枪林弹雨，为爱国将领孙立人包扎过伤口；几十年中，她曾不间断地接济过一位不沾亲不带故的孤寡老人，直到她安然离开人世，这些乐于助人、助人、不愧对别人的品格总是如涓涓细流般注入吉人的心田，他愿意听妈妈讲话，希望她讲的更多更多，“父母对孩子的教育甚至做出的牺牲都是我们的天职，但对于养育过你的中华文化、教导过你的师长友人是万万不能忘记的。”

的确，吉人在做每一幅画的时候都没有忘记过老师的教导，更没忘记他文化的根，如果说他在国际画坛上取得了一些成就，那只能说明中华文化根基的雄厚和中国人的智慧与自信。吉人没有忘记他的师长们给了他多少民族文化的滋养与磨砺：

吉人自15岁成为大师贺天健的入室弟子之后，连续八年坚持每周去贺家上一次课。贺老教学历来重基础重源流重师承，8年中，他从唐朝的王维教起，直到清朝王时敏、王鉴、王翬、王原祁、鄂南田、吴历等清朝六大家。在教学中，贺老把历朝历代大家们不同风格的皴法、点法都画给学生，讲出他们不同的师承、发展和特点，并且辅以诗词吟给他们听。有的如王维虽没留下画作，贺老却从他的诗词和别人对他的评论中臆想出他的山水皴法画给他们示范。在教画的同时，贺老也讲中国艺术史和各路各代的艺术风格与风气。每次课后都留下大批作业，有理论有画作，理论要融汇贯通，画作要求每幅临十张，且要背诵所教大家们的画作。因为基础扎实，天资聪颖，第二年他16岁时即考入上海美专预科。

当时的上海美专，真是名家荟萃，俨然一座艺术大观园。林风眠、颜文樑、吴大羽、唐云、江寒汀、程十发、应野平、郑慕康、余云阶、孟光等南派大师、教授云集比较，轮番授课，使好学多思的吕吉人目不暇给，如同进了一个魔幻的世界，他贪婪敏慧的眼睛如同一架不知疲倦的录影机，先生们的每言每教每幅课徒稿他都不失时机地录入他大脑的屏幕；他的大脑又如同一块永不满足的海绵，师长们的每点师承每项创见他都溶入自己的心智。不知是他先天的素质还是后天的习惯，多少年来，他历来是快节奏、少睡眠，行动起来如风如火，每天睡眠只需5小时足够。学校规定晚10点熄灯，他常常待同学们入睡后偷偷爬起，跑进素描室再画从老师处借来的画稿。就是用业余时间，他临完了《八十七神仙卷》。郑慕康先生是他的工笔老师，他每天向先生借画稿，直到郑先生一张不剩。国画最讲师承，吕吉人却一个心眼只想多学多知，在他上学期间，除坚持师承贺老，虽论国画西画，每位先生的课都听，每位先生的画都借去临摹，为的是博取众长，兼收并蓄。于是他顺利地升入大专班，于是他的第一幅创作《上海来的》在

第一学期就成了朱梅邦先生在上海徐汇区少年宫讲国画课的范例，时年他16岁。也就在16岁的暑期，他被邀任徐汇区少年宫国画班指导教师，课堂上听讲的都是徐汇区各中小学的美术教师，与同龄人一样，1966年吕吉人从上海美专毕业后就经历着“文化大革命”的种种磨难种种坎坷，他当过10年工人，直到七十年代末期才进了《文汇报》社做美术编辑，可不管期间多少风雨多少灾难，他始终潜心创作、不放画笔，因此，即使在那个年代，他的两幅作品还是被中国美术馆所收藏，他的画作曾多次在上海、北京、香港、新加坡展出和出版。

三

1981年仲夏，中国大地进入了一个姿彩纷呈、万花烂漫的季节。

他考取了纽约艺术学生联盟大学。入学第二天，他即搬入一套月租120元的公寓楼，同时在一家中国饭馆找了一个洗碗打杂工的差事。

国度不同，教学方法也大相径庭。一次画模特，那模特摆好姿势坐在课室里等待学生们去画。看着金发碧眼的模特，他坐在画桌上维妙维肖地勾画着她全身的每一个部位。就在他快要画完的时候，也是金发碧眼的教授走到他的身边，他看着教授，等待他的评判。

“OK,OK,”教授抚着自己的下巴不断点头。可看了一会儿，他笑着拍拍吉人的肩说，“吕先生，你画的实在很好，就是太累了。我们是大学生，每个人都曾经画过不少模特儿，因此，在上这种课的时候，不必全身都画，你只把你感受最深的部分画好、画出你的理解和感觉就可以了……”

吕吉人深深点头，他明白教授的意思是毕其全力、攻其难点，不要重复做无用功。

又一次上创作课，也是一位模特儿坐在前面，供学生们各扬所长，创作一幅人物画。同学们都用碳素线描，吕吉人却用中国的水墨，教授看到后非常高兴，他被中国的颜料、画笔、宣纸迷醉了，称吉人的画为“神奇妙笔”，学期结束时，教授在他的五幅作品上都判了蓝点（最佳为红点，蓝点次之，黄点最差。）。然后展出，不少人看过后纷纷来电话要求购画，教授赞美说：“你已经有了自己的面貌。”

如果说在纽约艺术学生联盟大学的课堂上他是从基础理论上了解西画融汇西画，那么，在Rowy's这家纽约最大的修画公司工作期间，他才真正了解了西画的渊源，比较了东西方绘画以致整个东西文化的长短、从而走上“扬中华传统之技法，写世界风光之精萃”（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的题词）的自己的艺术道路。因为工艺精密，这个公司集中了一大批来自各国的艺术家为之修画补画，各地收藏家的藏珍品大都送往这家公司修补，也正因为此，这里经常有从拉斐尔、丢勒、伦勃朗到赛尚、德加、梵高等不同国籍不同时期各派艺术大师的珍品流荡。以前，吉人也欣赏过这些珍品，但那是在画册上和博物馆里，今天，他不但可以看，还可以触摸可以修补，可以欣赏够研究透。他沉溺了他迷醉了，他

甚至怀疑过这是不可企及的梦……然而渐渐地，他的精神出现了极大的倾斜与失衡。他发现一幅不大的只有50年历史的美国画就标价五、六万美元，而一幅西方世界名画竟高达7000万！相比之下，一幅我国明代唐伯虎的名画仅仅标价72000美金。更使他难于忍受的是，他在这个公司修画四年多，修理的大多是西方名画，日本画也修过二十多幅，而中国画却仅仅修过两幅！为弄清原因，他做了多方调查与研究，原来，外国纸张制做时切断了切原料的植物纤维，纸浆里放入大量的化学物品、漂白剂和酸性物质，这纸虽看上去豪华漂亮，但不出50年就要发黄发脆、生霉点、出黄斑，所以不管其画多么珍贵，到时总要送来修补；相比之下，我们的纸张虽外观不如他们的精美，但却能耐久耐磨，没有他们的那些缺点，因为我们的宣纸用的是天然原料，长纤维，不含酸。了解到这些，他为我们民族骄傲，为我们祖先发明的造纸术自豪，可当他问及美国人这个问题时，回答却是：“西画是艺术珍品，坏了自然要不惜代价地去修补；而中国画在那粗糙的纸上涂涂抹抹就是一张，它本不是什么艺术品，坏了也就不值一修了。”

“照你们的说法，难道日本画也比中国画珍贵？否则为什么也有这么多日画送来修补？”他要同他的外国同事一争高低。

“那自然。日本的浮世绘线条简练古朴，色彩绚丽单纯，且人物有变形感，所以，早在维也纳画派时期，西画就吸收了他们的技法和审美观念，你难道不知道？”话语中带着几分嘲弄。

“我自然知道，可我从来就没以为然。”吕吉人有些不堪忍受了，他挥了挥拳，“你们偏爱日本的纸，认同日本的浮世绘，可你们知道吗？日本的造纸术来自中国；日本的浮世绘也是他们在我国明代时从中国国画中学的技艺逐渐形成的！”

吕吉人越说越冲动，他两眼喷着火和泪，几乎要扑向那一个个失神惊望着他的外国同事。

外国同事理解了他的冲动、苦闷与压抑，他们拍着他的肩说：“吕先生，我们理解你的心情，别冲动，别……”

他不再说话，拿起自己的工作服回到自己的工作间。他把自己关进工作间里，不知吸了多少烟，叹了多少气，他感到这种侮辱与误解要比他有一次在纽约街头遭抢挨揍时疼痛的多。因为遭抢挨揍的是肉体，这样的侮辱与不被理解痛的是灵魂；个人的遭抢挨揍痛的是他自己，这样的侮辱与不被理解却痛的是整个民族和我们民族璀璨辉煌的文化……

四

早在吉人赴美的第二年，妻子就带儿子来到了他的身边。他虽每天奔波劳累打工上学，可每当回到家里，那一身疲惫一身烦恼就顿时会被妻子的贤惠开朗、儿子的天真聪敏所化解，于是，他会从疲惫中重新爬起，从烦恼中看到希望。这天，正是美国自由女神百岁诞辰前夕，10岁的小吕朋画的自由女神像被纽约区定

为该节日的纪念图案并印在T恤上，他把印有自己手绘自由女神像的两件T恤赠给了里根总统和南茜夫人，里根感于小吕朋的聪颖和绘画，把一幅八吋的放大亲笔签名照回赠给他，他怎么能不希望爸爸分享这份快乐呢？殊不知，爸爸回到家里根本无心知道这一切，他仍深深陷入自己的苦恼里。

深夜十一点了，小吕朋已经快快地回到自己房间，妻子这才躺在吉人的身旁，她抚抚他的背柔声问：

“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吗？”

“何止是不开心，”他点了一支“万宝路”靠在床栏上，“简直是令人气愤，令人不平！”他重浊地喷出一口烟雾。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声音充满焦虑。

吉人复述了一遍白天发生的争执，叹了口气说：“他们竟然说我们的国画不是艺术！”

妻子先是心里一沉，接着又轻轻笑了起来：“这不光说明他们的无知，也说明我们介绍得不够。”她顺手拔掉他唇上啣着的香烟，就势辍进床头的烟灰缸里，“我看，你与其生这个闷气，倒不如用自己的行动自己的作品证明他们的错误！”

“对对，”他跳下床沿，边往画室里跑边嘟嘟哝哝地说，“我就画他们的纽约第五大道，完全用工笔线描，看他们接受不接受！”

……他开始忙碌，近三个月的观察速写，近三个月的汗流浃背，近三个月的潜心创作，他完全用中国的纸、笔、色墨，调动了国画中皴、擦、点、染、线、皴、簇等各种手法，吸收了西画惯用的焦点透视以表现作品的纵深感，运用了国画的散点透视以表现作品的空灵感，并在空灵中渗入东方的哲理；他忠实地利用国画中传统的工笔线描塑造对象，又借用了西画的质感、光影和理想的三维空间表现对象，绘制了有外国元首租赁的大宾馆、有唱片公司的广告、有大腹便便的大老板、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谈情说爱的青年男女、赶马车的女人、卖热狗的小贩、街头卖唱者、街头巡逻的警察、无聊闲逛的犹太人……这样一幅五色杂陈、喧哗瑰丽的《纽约第五大道》。不久，他就以这幅画参加了纽约露易斯画廊的展出。开幕第一天，画作前围满了观众并且争相竞买，因欲买者多、价格不断高抬，最后终于以一万美元卖出告罄。此举使吕吉人大出了一口胸中闷气，给了他极大的信心和鼓舞，这不独是因为他的画卖了一笔高价，更重要的是他用地道的中国材料中国笔法绘制的作品开始得到了美国人的承认，他们承认了中国画是一种可贵的艺术品。

五

……威尼斯城的圣玛丁广场。阳光和熙，广场喷泉中奏出的妙曼的音乐，白鸽子灰鸽子花纹和谐的花鸽子自由起落，自由翱翔……一群群鸽子落在旅游者的肩上臂上手手，人们亲昵地抚它们吻它们逗它们喂它们……呵，祥和的音乐，美妙的诗章，如果说巴黎的空气都充满了灵感，那么，威尼斯城则到处有诗的精灵的吟唱……

“妈妈，你看，爸爸又在拍这样的照片！”小吕朋拉了一下妈妈的手臂，朝着爸爸的背影眯着眼睛。

“别去管他。”妈妈也笑。

是的，吉人正在偷拍一对年轻恋人亲吻的镜头。亲吻对于久居纽约的画家来说本不新奇，可吉人却被在威尼斯的阳光下身着色彩绚丽和谐服装的热烈与投入迷醉了。他毫无觉察妻儿嘲弄的窃笑，举着他的相机朝街市走去。他像个巡猎的猎人，目不交睫地搜巡着每一组可能入画的对象……呵呵，街角旁，那三位姑娘的服装色彩太美了！她们在喁喁谈话，不时做着娴雅的手势，阳光下那金发漾出的光波，微风荡起的裙下的圆润的膝盖……无不激起他的艺术灵感，他调好光圈速度，他等待她们走近……

“吉人，吉人——”一家服装店前，妻子正在朝他招手。

“什么事？”

“你来试试。”她朝他举起一件夹克。

他大步跑过去，胡乱试了试妻子边为他试穿边夸奖的那件夹克，又蹬蹬跑回原地重新举起相机……那三位姑娘总算聊得告一段落，才优雅闲散地朝他的方向走来，他终于咔地按了一下快门，然后才满意地离开，为这个镜头，他整整等了四十分钟！

他们走进一座博物馆的走廊，高大的柱石，古老的井台……一切都笼罩在幽黯的光线里。他偶一抬头，二楼窗子里一位女管理员正坐在窗前看书，幽黯的世界，只有她的头部、脸部、臀部是亮的。呵，它们亮的柔和亮得雅丽亮得枯黄。他禁不住敲敲墙壁要求道：

“对不起，小姐，我想为您拍张照片可以吗？”

“当然，我很愿意。”她梳理了一下头发，笑得十分纯洁。

他高兴地揞了快门。

在威尼斯，在罗马，在整个意大利，他被那异国风情的一切陶醉了。那千桥船影的妙曼，那涟漪波光的昏

透，那幽幽水巷的古老，那桥畔约会的旖旎，那古井旁两猫相斗的妙趣……他只觉得他的相机的笨拙，他拍了近千幅照片。画了几百张速写。

回纽约后，他没感到旅途的劳累，他一任自己创作冲动的恣肆。看着摄自威尼斯水城的一张照片，看着一幅幅倾注了自己灵感的写生，他忽尔沉迷陶醉，忽尔惆怅迷离……不知为什么，那斑斓的水色水巷总使他忆起古老的苏州，那威尼斯的意境神韵总使他联想起中国的古诗词。于是，一对情侣在威尼斯桥头相会的画作融进了“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意境，此画即标作“人约黄昏后”；一幅标以“水巷”的作品深沉寄寓着他对于姑苏古城的眷恋与情思；那古井旁两只怒目相对的猫却被他画成两只喁喁叙情的“猫恋”，这不独绘出了传统国画的横生妙趣，且注入了他对生活的一片爱心……此时的吕吉人挥笔更加飘逸，技法更加老辣，寄寓更加深邃。而他所用的纸笔墨色仍然来自中国，他的技法仍然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以工笔线描为本。

他成功了。

他的《瀑布》获纽约 CWCB 电台优异奖；他的《云中玉屏》获美国亚洲协会《中国绘画比赛》银奖；他的《绿色调威尼斯运河风光》获美国专业画家联盟第 63 届全国展米尔德·丽德斯塔奖；他的作品曾九次在纽约和加州的各种画廊展出，部分作品还在纽约市长 Dinking 办公室画廊陈列展出。1991 年，他的作品被选入“日本国际美术交流协会”在东京举办的“现代中国书画之粹展”并选入画册。他的另一些作品已经进入“美国美术家同盟”在国家艺术俱乐部举办的第 78 届 91 年全美展。纽约圣约翰大学亚洲学院副院长、东方艺术收藏部主任何平南先生看了他的画后赞美说：“从没见过中国画可以画成这样！你这是向中国画的冲击和挑战！你很幸运，因为你在绘画中找到了自己！”前不久，吕吉人在北京举行个人画展时，中国文化部副部长

高占祥题词曰“扬中华传统之技法，写世界风光之精萃”，原中央工艺美院院长、壁画大师张仃先生题词曰“俱似大道，妙契同尘”。

1992 年 1 月，吕吉人的作品将由日本王子制纸株式会社赞助在东京银座王子画廊举办个展，之后，他将分别在台湾皇冠画廊和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举办个展；2 月，再度分别赴日本东京、横滨、法国巴黎举办个展；5 月，将被邀飞回纽约圣约翰大学举办个展。他真像一只风筝，一只多彩而劲健的风筝，这只风筝正在展翅高飞，翱翔于世界艺术的高天上。然而，他始终没有，也始终不会脱离那牢牢牵系着他的粗实的绳线，因为他知道，这绳线蕴含着他的血脉他的灵感他的底蕴，它是他的根。（责任编辑 刘家驹）

绘画
颁奖
仪式



风雨五十年，

今天又说陈独秀

麦 阳 ●

五十年过去，世界忘记这个人了吗？似乎没有。在历史的每一个拐角，陈独秀的名字总被人们这样那样反反复复地说着。直到1979年他诞辰百周年的时候，终于开始有了中肯的评价。此后陈独秀的墓两次扩建，立在墓前的“无字碑”，给后人留下一个再评说的机会。五十年过去，今天我们又提起他。

1942年5月13日，曾是中共一大代表的包惠僧来到四川省江津看望隐居于此的陈独秀。陈独秀正在写作《小学识字教本》，见老友来，匆匆完成笔下的“抛”字起身相迎。然而，这个抛弃的“抛”字，竟是他一生落笔的最后一个字。5月27日，陈独秀撒手而去，享年63岁。

从晚清秀才到中共总书记

1897年，18岁的安徽省安庆秀才陈独秀参加乡试落榜而归。为了却母亲心愿才进考场的他并不感到沮丧。他这样描绘清政府的考场说：“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这般的毛病”。如此出言不逊，并不出陈家的意料。早在陈独秀少年时代，他严厉古怪的祖父就教过小小孙儿以偏强的沉默所作的多次反抗。祖父曾断语陈独秀：“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陈独秀的确不同凡响。落榜回家后，他仍痛感时势日非，心潮未平，挥笔写下七千余字的《扬子江形势论略》。从此，竟使没中举的陈独秀的文名不胫而走，被人誉为“皖域名士”。

“皖域名士”却走上了自己选择的道路。作为封建社会的一名掘墓人，他的叛逆个性显露无疑。1901年至1915年，陈独秀五次浮槎东渡，留学日本，其间的传奇色彩令人瞩目。

1903年，陈独秀第二次赴日的后一年，因沙俄拒绝退出侵占的中国东北三省，中国留日学生组织了拒俄义勇军，要以尚武精神赴东北战场。但义勇军不久就应清政府请求而被日本当局解散。愤怒不已的陈独秀，相约邹容、张继等人，在一天夜里偷偷潜入清政府委派的湖北留学生监督姚文甫的寓所，由张继抱腰，邹容按头，陈独秀挥剪，剪去了从睡梦中惊醒的姚文甫头上的辫子。事后，他们被强行遣返回国。

1914年他第五次东渡日本，在江户与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在这个杂志上，他首次用“独秀”的笔名发表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又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在文章中他说“中国之为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不独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他堂堂然宣称这样的国家：“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此言一出，舆论大哗，有人诘问斥责陈独秀：“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敢为是论！”对此，性格暴躁的陈独秀，一反常态，没有辩解，他意识到重要的不在于为一篇文章摇唇鼓舌，而是要向整个旧的传统观念开战。彻底的决裂从绝望绝情开始，预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会改观！”最后一次离开日本，成熟而充满自信的陈独秀把目光投向整个中国大地。

很少有人不知道五四时期那个思想启蒙运动的火

炬——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它第一次在中国高高举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发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怒吼，它卷起了席卷全国的一场文学革命的狂飙。这是一个革命转型的时代，也是一个文化转型的时代。在新旧思潮激战中，陈独秀不屈地挺立着。

历史后来选择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这样讲到陈独秀和《新青年》：“当我还在师范学校作学生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一种杂志，我很喜欢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早已被我厌弃的康有为、梁启超，一时成为了我的模范。”毛泽东说：“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

俄国十月革命炮声的余音里，五四运动昭示的曙光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揭开了中国民主革命新篇章。1921年，中共一大的举行，正式宣告了它的成立。

这一年，陈独秀42岁。自他乡试落第以来，二十四个春秋已逝。星转斗移，换了人间。他不再是面对封建统治的孤独的叛逆者，而成了为共产主义信仰奋斗的职业革命家；他不再是安庆乡间的秀才，而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总书记。历经磨砺，陈独秀终于走向政治生涯的光辉顶点。1921年至1927年，中共先后召开过五次党的代表大会，无论他是否出席，都无一例外地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或中央执委会委员长）。

然而这一辉煌仅延续了七年时间。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被停职，从此开始不甘寂寞却举步维难的十五年人生跋涉。

大浪淘沙。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走出了书斋，肩负起具体指导现实斗争的重任。相伴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党内争论。方向明确了，却没有一条现成的路可循。

陈独秀的倔强个性在党内有口皆碑。大革命未起，他就首先起来反对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的国共两方“党内合作”的办法。争吵很激烈，结果是陈独秀终于不情愿地接受了在共产国际组织纪律约束下实现国共“党内合作”的决定，马林也认可了陈独秀提出的首先根据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的建议。

争论暂时结束。但马林恐怕不会忘记陈独秀拍着

桌子对他说的话：“各国革命有各国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

如此看来，陈独秀并不缺少独立性，可是为什么他会在以后国民党右派的步步紧逼之下表现出软弱、妥协和退让呢？

1925年底，谢持、邹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叫嚣“取消共产党在国民党之党籍”，陈独秀不但不组织反击，反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提出“退出国民党”的主张，遭否决后，又提出“退而不出，办而不包”的方针，放弃争夺国民革命的领导权；

得寸进尺的国民党右派又在1926年3月20日制造“中山舰事件”。接着抛出的《整理党务案》也为陈独秀接受，致使中国共产党的权利进一步丧失；

1926年，陈独秀力主对潮水般起来的农民运动实行种种限制，损伤了属于自己阵营的工农群众的力量；

1927年，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既起，陈独秀却继续推行依靠汪精卫限制蒋介石的错误方针，结果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挥起屠刀“宁可枉杀千人，不使一人漏网”……。

种种表现，我们不难从他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和社会各阶级》文章中找到答案，这就是著名的“二次革命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截然分开的两个阶段。既然中国革命现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么它只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无产阶级从中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等着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以后，无产阶级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这样的理论指导，除1927年的结局之外，还能把革命推向哪里？如此结局，作为总书记的陈独秀是难卸责任的，而对于刚刚成立七年年头，理论上、政治上还都稚嫩的中国共产党又意味着什么？如果说国共两党阶级利益不同，分道扬镳势在必行，那么会有和平些的最后一幕吗？

这是党史专家们的课题了。何况历史不能“如果”。不论人们今天如何说长道短，事情是这样发展的：1927

新青年



新青年
第六卷
第六号
一九二七年六月



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陈独秀停职,继而组成了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等人的中共临时中央委员会。血雨腥风之中,陈独秀隐藏在武汉工人住宅。正当他沉默不语,苦苦思索之时,“八七”会议的决议传来,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土地革命新时期开始了。

陈独秀几次拒绝接受共产国际要他去莫斯科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的要求,他要用自己的脑子思考中国革命问题。然而思考的结果,却是他一步步走向托派的歧途,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反对派。

陈独秀说过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中国革命应该有中国人来领导。”这是千真万确的。但由谁来领导,又走哪一条路呢?能选择的只有历史。一代伟人就这样在革命的漩涡中被抛甩了出来,渐渐远离奔涌向前的时代洪流。

政治家还是学者?

“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这是政治家陈独秀的一句名言,也是他生活的写照。

陈独秀先后被捕过四次,前三次由于社会各界的营救很快获释。令他饱尝铁窗生活的是1932年的那一次被捕。

10月19日,陈独秀被连夜押往南京。京沪列车上,他酣睡达旦,以至车到南京还没醒来。陈独秀面临被处决危险的泰然与安详,一时传为佳话。

后来,传来了把陈独秀转送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审判的消息,蔡元培、胡适等纷纷向他推荐辩护律师。陈独秀没有钱请律师,章士钊自告奋勇义务服务。他们是五四以前的挚友,后来在政治主张、文学体裁方面打过笔仗。章当时为闻名全国的大律师,即使高薪奉请也是难以请到的,此时他挺身而出,不取分文酬劳,被人称为“有古义士之风。”

临审前,一些竭力想营救陈独秀的人数次帮他改供词,陈独秀签字时又数次改回去。

开庭之日,旁听席挤满人群。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被起诉的陈独秀自撰辩诉状,慷慨陈辞,洋洋千言不止,证明犯有“危害民国”和“叛国”罪的不是自己,而是国民党政府,博得人群喝采。章士钊的辩护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当他讲到陈先生是站在三民主义立场上言行并不违法时,忽见陈独秀拍案而起,声明:“章律师辩护词,只代表他的意见,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护词为准!”令章士钊不知说什么才好。此语既出,法庭哗然,旁听席上传来“革命家”、“革命家”的赞声。然而,尽管陈、章的辩护名重一时,陈独秀还是被判了十三年徒刑。

我们且不说他此时的政治态度如何,如此的光明磊落所表现的又是怎样的勇气!

鲁迅对陈独秀有这样的描述:“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是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这种韬略在陈独秀一生中随处可见。

几十年来,除了在北大过了两年较安定的教授生活,他的大部分时光都在颠沛流离,险象环生中度过。对此命运,“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先驱”是他的回答。他像一匹不羁的马,任何艰难险阻都无法阻挡他奋力向自己执着的目标驰去。

陈独秀不缺乏政治家的勇气。但倔强执拗,我行我素却把他推到了政治舞台的死角。抗战以后,他脱离了托派,但又始终不接受中共中央的条件作一个公开的声明。他说:“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我绝对不怕孤立。”

但是,孤立,难道不是政治家的末路吗?

虽然陈独秀在孤立的困境中依然关心政治,然而他所能做的也只是他的学问了。他本来就是一个学者,他的学问做得和他的人一样有棱有角。

他懂日、英、法三国文字,工宋诗,写隶书,学贯中西。不仅旧学有根底,新学也有造诣。

陈独秀最有成就的还是文字学和音韵学。《干支为字母说》、《实庵字说》、《识字初阶》、《中国古代有复声母说》、《连语类编》、《荀子韵表及考释》等论著都有独到见地,可谓广证博引,丝丝入扣。他认为从文字的形成和发展,可以看到社会和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而他所做的,就是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探索一条文字学的道路。

被捕后,陈独秀把研究室搬进了监狱。一次,江苏南通一位程老先生慕名到狱中探望。两人相见互道钦佩,客气有加,不料谈到中国文字中的“文”字,竟争吵起来。

陈独秀说:“文字明明是画着一个人以手执杖指挥家人行事。”程老先生说:“文字明明是捧着一盆火,教人炊饭。”

一个说:“你不通!”另一个则说:“你不通!”

这边马上斥之:“你浅薄!”那边也不示弱:“你浅薄!”直吵得面红耳赤,拍案大骂,差点动起手来。

事后,两人又和好。临行陈独秀还给罗家伦写信,要推荐程到中央大学教文史。

程老先生最终没教成课,陈独秀依然坐他的牢,直至1937年抗战爆发后被释放。

他是政治家还是学者?抑或兼而有之,抑或两者都不彻底?如果陈独秀不涉足政治,他会是一名大学问家吗?他思想的智慧是不是多于他政治的谋略?现成的答案仍然没有。

情归何处：四次婚恋

1897年冬的一天，安庆市陈家大院张灯结彩，正办喜事。烫金双喜灯笼映照得大门两侧“乾坤谱好”“鸾凤和鸣”的对联格外醒目。客来人往，溢美之词不绝于耳。

陈独秀对此充耳不闻，想像着即将娶进门的新娘，不由添了几分惆怅，迷惘。新娘高晓岚是安庆警统领高登科之女，城内数得上的大家闺秀。这门亲事深得两家欢心，然而对于自己有何意义呢？他无法阻止，只得木偶般任人摆布。

眉清目秀，身材修长的高晓岚却满心欢喜，庆幸自己择到了如意郎君。她生在显贵人家，却丝毫没有骄横之气；她目不识丁，却决心恪守妇道，孝敬公婆，体贴丈夫，不负乡中“夫贵妻贤”的美名。

一对夫妻两样心情。陈独秀感到与高晓岚思想“相隔不止一世纪”。年复一年，这种隔膜愈深。他几次劝她多学文化，她不屑一顾：“夫主外，妻主内。女子无才便是德。”他把自己的得意之作讲给她听，她柔言轻语地说：“夫君之言，为妻懂之甚少，不必再为难妻了。我会伴君安分度日，上待父母尽心尽力，下做贤妻生儿育女。”高晓岚想不通为什么一个文采飞扬的白面书生要去做法那会招来抄家灭族的事情？

直到今天，我们也无法指责这位旧式女子什么。她心地善良，辛勤持家。一身老蓝布做成的长长的大褂是她一年四季不变的装束，宽大裤脚管系得紧紧的。她从不表露对丈夫的不满，也从来没为自己考虑过什么。

而对陈独秀，我们又能责怪他什么呢？须知，这是一个新旧时代交替的裂变期呵。

在陈独秀、高晓岚婚姻岌岌可危的时候，高君曼出现了。她是高晓岚同父异母的妹妹。迥然不同的是，她思想敏捷新颖，谈吐大方，热情奔放，特别推崇陈独秀的文章和为人。她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每逢寒暑假，总要以探望姐姐为名，与陈独秀相伴攀谈。两人相处日渐密切，时而漫步乡间小路，时而书房促膝谈心。她的到来，使陈独秀如沐春风。

而这一切，对高晓岚来说，她所能做的只是躲在房中暗自垂泪。她的眼泪，陈、高两家的严厉指责和乡中的风言风语，却没能阻止丈夫和妹妹俩我行我素，直到毫不顾忌地私奔。陈独秀与高君曼先至日本，后在杭州同居，并于1910年春西子湖畔正式宣布结为伉俪。从此，陈独秀与高晓岚十三年的婚姻名存实亡。

倘佯湖山之中，夫唱妇随，两情缱绻，相敬如宾。这段美好的生活令深感旧式婚姻之苦的陈独秀恍如梦中。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陈独秀出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与高君曼一起回到安庆，住在离陈家不远的宣家

花园。

风波并没有过去。陈、高两家始终不承认他们的关系。高家认为姐妹同嫁一人，礼教不容，把君曼逐出不认为女；陈家则视这种婚姻为败坏门风，有损祖宗荣光，比陈独秀参加革命更难容忍，不许他们踏入家门。一片指责声中，唯有高晓岚沉默不语。

风风雨雨十六年过去，这段很新式的婚姻还是触礁。1925年10月，高君曼带着孩子离开了陈独秀，孤身定居南京东厂街他们在讨伐袁世凯失败后购置的房屋中，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陈独秀。

高晓岚1930年9月9日病逝安庆老家。也已离开陈独秀的高君曼带着孩子为姐姐奔丧，在陈家住了一年多，陈家的人直到此时仍耿耿于怀。陈独秀姐姐的孩子称高君曼为“小姨”，这使高君曼心里很不舒服，她说：“叫我小姨当然可以，但对他们舅舅（指陈独秀）如何称呼？难道也叫姨父吗？”

一年之后，高君曼因子宫癌也去世了。姐妹俩情系一人，至死无怨无悔。高晓岚嫁到陈家三十三年，没有得到过陈独秀的爱情；而高君曼虽争取到了自己的一份幸福，最后却也和姐姐一样，独自吸饮着人生的苦酒。

离开高家姐妹，漂泊在外的陈独秀又先后经历了两次婚恋。

大约1926年1月初，陈独秀突然没了踪影。焦急万分的同事们不得已用化名登广告寻找，仍无线索。一时众说纷纭，猜测四起。国民党右派造谣说陈独秀“是到武汉勾结北洋军阀吴佩孚以破坏北伐革命”去了，中共中央则对此专门撰文坚决驳斥。正当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到因陈独秀失踪中央机关是否需要迁移的议程时，忽然接到了陈独秀从上海来的消息，原来他因伤寒住进医院了。后来人们又了解到照料他的有一位不知名的女伴。

这位女伴是谁？60年后，由于这位女伴的养女的出现才使事情真相大白。她叫施芝英，是个未婚医生，在陈独秀住院期间因崇拜而生爱恋，由爱恋而同居，直至1927年3月才分手。施芝英是陈独秀四个女伴中唯一活到解放以后的人。他们生活得如何？分手的原因是什么？她对此一直缄口不言，直至1973年病故，这些谜仍然没能解开。

1930年下半年，已到知天命之年的陈独秀遇到了生活中最后一位女性——潘兰珍。她出身在工人家庭，那时才二十多岁。他们的相识是因为同在上海熙华路一座石门库楼房居住，隔门相望，开门相见。陈独秀因躲避通缉，隐名埋姓在家写作，起居无人照料，生活艰难。善良的潘兰珍时常过来帮助自己十分崇敬的学识渊博的老先生。一来二去，两人同进同出，虽然年龄悬殊近三十岁，他们还是闪电般同居了。潘兰珍忠厚朴实，一直称陈独秀为李老先生。她从不打听他的去向往来，只是悉心照顾他的饮食起居，相处十分融洽。潘兰珍对陈独秀一年几次搬家的异常举动毫不疑心，如果

不是陈独秀被捕，她恐怕永远不会知道李老先生竟是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

1932年陈独秀被捕，消息被大小报纸竞相登载。“久缉未获之共产党领袖”、“匪首陈独秀”的大标题下赫然登着照片。那一天，潘兰珍因和陈独秀赌气正在浦东娘家，看到报纸惊叫起来，如梦初醒：“这不是我家李老先生吗？”

识破李老先生真面目，潘兰珍毫不犹豫赶到看守所，得知陈独秀已被押南京后，又辞去工作，打点行装赶去。她不避“共匪首领”之嫌，决心一辈子陪伴陈独秀，共渡患难岁月。

陈独秀得知潘兰珍的心愿，感动得老泪纵横。这样一个普通女子，竟是自己晚年的知己，实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他写信给友人要他劝止潘兰珍，无奈潘兰珍早已心坚似铁。就这样，她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附近租了间房子，每天早出晚归，尽心照料陈独秀，在物质和精神上都给了陈独秀很大的帮助和安慰。使他能以病弱之躯安然渡过五年狱中生活。

陈独秀被释后，两人流落到武汉，在汉口德润里正式宣布结为夫妻。自此，相伴相随漂泊长沙，避难重庆，流落江津，直至陈独秀去世。

料理完先生的丧事，潘兰珍牢记陈独秀临终前留下的“望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力”的叮嘱，带着陈独秀留下的一点稿费 and 友人送的五只东汉古碗，到重庆一家农场工作。后来迫于生活，嫁给一个国民党下级军官。谁知此人不久又病亡，剩下潘兰珍孤身一人。抗战胜利后，她从南通接回了自己和陈独秀生活时收留的养女，在浦东一所小学当炊事员，相依为命，苦度光阴。1949年10月30日，潘兰珍因患子宫癌无钱医治，痛苦而死。

“终身反对派”的晚年

陈独秀自称“终身反对派”，其中的滋味有凛然的傲气，恐怕还有苦涩与悲凉，晚年的陈独秀最终与托派破裂，但又走得更远，声称要“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自此抛弃了他曾经为之奋斗的“主义”。他虽然没有停止发表自己的政见，却已如死水微澜。

孤寂的陈独秀在江津的生活十分窘困，没有正常的经济来源，有时竟靠典当才能度日。夫妻俩住的两间厢房上无天花板，下是潮湿的泥地，遇上大雨，满屋漏水。两张木床、一张书桌和几只凳子及装满书籍的箱子便是全部的家当。动荡的生活，损害了他的健康，肠胃病不愈，又患高血压。政治生活的不断失败，思想上的缺少知音，更在他心中刻上无数道伤痕。

有不少社会名流要资助他，但这岂是他所能接受的，他不需要同情，更仇恨政治拉拢。罗家伦、傅斯年亲自送钱给他，他说得两人进退不得：“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的救济。”朱家骅赠他五千元支票，他拒绝，托张国焘转赠，又遭拒绝，最后托郑学稼寄赠，还是被退回。他的《小学识字教本》原由国民党教育部出版，曾预支出一万元钱稿酬，由于和陈立夫因改书名争执不下，书未出，这笔钱直到他去世也未动用。他对亲朋好友的资助难以推却，就常常用字条、字联、金石篆刻相赠以示报答。即便这样，这种迫于生计，却之不恭受之有愧近乎寄人篱下的生活，还是深深伤害着他的自尊。但除此之外，又能有别的路吗？

打击在不断袭来，1938年母亲谢氏去世，陈独秀悲痛至极，血压增高，两耳生鸣几乎半聋达两月之久。1940年3月，他尊敬的师长蔡元培去世，令他伤感唏嘘不已。6月，亲爱的大姐又亡，想起春天在大姐病时相聚又相别的情形，他的切肤之痛难以化解：

“姐意愿谐往，临行复迟疑。送我西廊外，木立无言辞。依依不忍去，怅怅若有思。骨肉生死别，即此俄顷时。当时未警觉，至今苦追忆。”

流亡般的生活，做“反对派”的孤立，生活的清苦，没有压倒陈独秀，而亲朋至友的死却给了他极大的刺激。嫉恶如仇，固执己见的陈独秀原来竟有如此深厚的温情。儿女情长，不免英雄气短，一种万念俱灰的感觉悄悄袭上他的心头。他的病情日重一日，他的情绪每况愈下。

1942年初，潘赞化去看他，读到了陈独秀做的一首诗：“除去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诗人枉向汨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诗句已无过去一往无前的奔放豪情和刚强之气，充满了感伤和无奈。潘赞化归来对人说，照此情形，他的生命大概不会久长了。

不幸言中，这一年5月中旬，陈独秀终于卧床不起，夜睡不安，高烧不退，多次昏厥。遍访重庆、江津名医多方抢救，均无起色，25日，自知将不久人世，陈独秀在床前嘱夫人潘兰珍自立，嘱儿子陈松年后要将他的棺木返乡安葬，叶落归根。27日，陈独秀终于闭上眼睛。

5天之后，陈独秀被葬于江津县大西门外鼎山山麓。他的死讯在报纸只有寥寥几行，寥寥几个亲近的人为他送了行。1947年6月，陈松年迁棺木回乡。仍是在寂寞之中，陈独秀又回到安庆。

中国有句老话叫“盖棺定论”。而对陈独秀，棺已盖上，却无定论。这个政治上的失败者跌宕起伏的一生给后人留下了什么？

章士钊有评陈独秀语，语曰：“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不峻之弗上，回头之草不啮，气尽途绝，行同凡马路。”

描绘的的确是陈独秀，不是吗？

〔责任编辑：己村〕

一家大饭店 与四位 国家首脑 的故事

● 李玲修

名人下榻和就餐，给饭店带来了声誉和客源，也是最佳饭店的特殊标志之一。因此，美国华盛顿马里奥特饭店将尼克松就餐的菜单，作为招待重要客人的传统菜单，纽约“21”俱乐部因是美国历届总统宴请客人的地方，而在世界享有盛名……

霍克总理答谢宴的险情

北京建国饭店的施工质量在国内算得上是优秀的，但也留下不少后遗症。“建国”刚开业那会儿，天热起来后，到处漏水。西餐厅漏，中餐厅漏，大厅也漏……弄得工程部经理高进烈焦头烂额，地上地下跑。

漏水在威胁着饭店每一个角落，抢修并非一日之功所能完成。就在这时，来华访问的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决定在北京这独一家的合资饭店举行答谢宴会。

这天，小宴会厅里气氛十分隆重、热烈，从主管到服务员都兢兢业业地忙着。他们脸上露着兴奋的微笑，谁都知道这个宴会的份量及影响，这可是外国政府首脑一级的宴会啊，不仅霍克总理要来，中国的总理也要来，不用说，还会有许多要人、名人、外宾……

“建国”饭店刚开业不久就承办这么规格高的宴会，是她的荣耀，也是对她的考验。从总经理到饮食部经理，从宴会厅主管到服务员，从西厨行政厨师长到每个厨工，从外方到中方，都小心翼翼，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

宴会开始了。好，上酒水，致词，碰杯……一切正常，一切和谐，客人脸上是满意的微笑，是轻松的笑容。经理和服务员脸上也是微笑，不过他们内心的弦是绷紧的。谁都明白，出席这个宴会里的客人，可不是一般客人，这个宴会的成败，影响远远超出北京。因此，别说出什么纰漏，就是餐饮水平不高，服务不够标准化也丢份儿……

可是偏偏在这个关节眼儿，“吧哒”！一滴水珠从屋顶滴了下来，掉在地毯上。因为听不到声音，所以也没有人发现。

但是水珠不会因此罢休，吧哒！吧哒！一滴又一滴的落下来。

“漏水了！”香港来的主管游新志心里一紧，他看着走来走去举杯敬酒、友好交谈的客人，心脏的跳速马上增加了几倍。如果这不长眼的水珠若是滴到外宾身上，滴到中国总理甚至澳大利亚总理的酒杯里，那将是什么局面，会带来什么影响？！那可就惨了！

他不敢往下想，他盯着那挂在屋顶即将下落的水珠，急中生智，走了过去。

他的脸上依然挂着微笑，任何人也不会从他的面部表情上发现有什么险情；他边走边和客人点头示意，还招呼指点服务员到那被疏忽的角落去……

他站住了，眼光扫着宴会厅，脸上依然是微笑，他甚至还用纯熟的英语问身边的一个客人法国白兰地、路易十三的味道如何……

一直到宴会结束，他始终再寸步未移。谁也没发现有什么异常事情发生。当然也没有人发现那漏水的屋顶……好，客人告别、致意，缓步地走了出去，脸上带着满意的微笑鱼贯而出……

待客人走完后，大家才松了一口气，有人就势靠在椅子上，有人还沉浸在成功的喜悦里，一切圆满，一切顺利，OK！

这时，游新志才移动了步子，他的黑色西服肩膀上，湿了一大片。有人发现了这点，才明白了他站在那个位置的真正用意！

虽然他用身体抵挡的是水珠，但其意义并不亚于用身体挡住洪流决口……

当霍克总理派人送来感谢信时，任何人都认为游新志是获得这很高奖赏的一个关键性人物……他用自己的行动体现了服务意识，而这服务意识一旦在员工心里扎根后，将会创造许多意想不到的奇迹！

西哈努克亲王的“突然袭击”

1991年11月13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西哈努克亲王在北京的官邸接见了建国饭店总经理陈军。

亲王第二天将离京回国，在这临行前的日子里当然是有许多事情要做。但他却亲自接见一家中国饭店的经理，这到底有什么缘由？

他在接见陈军时，说了这样一番话：“建国饭店是北京最好的饭店，我永远是你们忠实的客户。”

的确，亲王如果在家里设宴，就从“建国”饭店订购食品，这天他在官邸宴请洪森先生，就从建国饭店买了3200元的食品来招待各方贵宾。

此外，亲王在饭店请客时也总是在建国饭店宴请，快10年了，西哈努克亲王的确没少光顾建国饭店。这是因为他对“建国”从一开始就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

1984年3月的一天上午10点钟，有关人员通知建国饭店，西哈努克亲王要在“建国”饭店招待35位中国工作人员吃西餐。

按惯例，请这样多的人吃饭都是提前一天通知饭店，好做准备。

但亲王这宴会通知饭店时离开餐只有两个小时了。饮食部副经理陈军立刻亲临西厨房，与厨师长共同订菜单，布置冷菜，热菜，糕点……各部门噤里啪啦干了起来。大家唯恐误了开餐，都拿出最大劲头开始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大家心里都有一个意识，尽管时间紧，但不能有任何马虎，因为这关系到建国饭店的声誉……不一会儿，姑娘小伙子们的额头上、鼻尖上都沁出了汗珠。

刚准备得差不多了，把台子搬好了，白桌布也铺上了，餐具也摆好了，电话又响了。有关人员说，西餐不吃了，改吃中餐，时间不变还是中午！秘书已出发，来订菜单。

这下可使陈军紧张了，中餐一点也没准备呀，不是一两个人，那怎么也好办，好几十人再加上高级宴会，有些东西需要泡发，有的刀工很复杂，怎么来得及呢？

于是陈军委婉地对办公室说，能否还是吃西餐，开中餐有点太仓促了。

回答说：“我们和亲王商量商量！”

快到12点了，还没有回音，饮食部也慌了。陈军又打电话询问，才知就餐者已经出发了，还是吃中餐。因为西哈努克亲王说：“我请的是中国人，怕他们不喜欢吃西餐。”

这时秘书赶到，他和陈军拉了个中餐菜单。

于是西厨房松了口气，带有遗憾色彩的松了口气。紧张的氛围一下子又转到了中厨房，厨师长马上组织人力急加工，这时距离开餐时间只有20分钟了。

20分钟后，像神话里的魔术一样，台子摆好了，这时亲王和客人已到了中餐厅门口。

亲王和他的客人刚坐好，拼好的冷盘就由身材窈

窕的服务员小姐端了上来。这就像一台戏，开演时间已到，观众已经就绪，无论后台如何紧张忙乱，叫着马前！马前！人像穿梭一样跑，赶场者心里急得乒乓跳，但前台一切要秩序井然，锣鼓不能乱点，琴声不能改弦，演员更要按部就班，该亮相亮相，该甩袖甩袖，该起板起板，该开打开打，唱念做打一丝不苟，整体气氛驾轻就熟，使观众感到一切正常，一切顺眼！

宴会结束了，陈军和中餐厅经理、服务员及厨房里穿着雪白工作服的厨师们都像一场紧张战役后的指挥员和士兵一样等待着对他们的讲评。

西哈努克亲王脸上始终露着慈祥和蔼的微笑，他起身后并没有离去，而是和服务员、经理一一握手，又到厨房和厨师一一握手，对他们的优质服务和高超的烹饪技术表示赞赏，并送了大家一些礼品。

陈军聪明，立刻让人取来一些饭店做的面包送给亲王。亲王非常高兴，说：“我最喜欢吃你们的面包……”

西哈努克亲王和客人满意地走了。

第二天陈军的公关行为立竿见影，亲王府打来电话说，亲王和莫妮克公主非常赞赏“建国”的面包，还要再订购300份……

大家和陈军开玩笑：“你可真会做生意！吃小亏占大便宜……”

更重要的是建国饭店从此和西哈努克亲王结下不解之缘，亲王只要请客，必在“建国”请；只要买食品，也必来建国买。他说自己是“建国”饭店最忠实的客户决不是夸张。

现在亲王要回国了，已升为总经理的陈军带着礼品和信函来拜会亲王，并表示，“建国”将永远向亲王提供优质的服务，不论是在北京还是在金边，只要亲王需要，我们会招之即来……

西哈努克亲王非常高兴，他请陈军等人看他自编自导的影片《森林里的故事》。并在事后派人给陈军送去感谢信：

亲爱的陈军先生：

感谢你热情洋溢的信函和精致美好的礼物，我将永远铭记您的周到热情。

您真诚的柬埔寨三方联合阵线主席
诺罗敦·西哈努克

1991年11月13日于北京

尼雷尔宴请前的爆炸声

1991年10月28日出版的《建国报》第四版右上角刊登了宴会厅女经理李凡的文章：

令人难忘的一件事

1990年初，坦桑尼亚前总统尼雷尔应邀来我国访问，并在大使馆举办招待会。我们建国饭店宴会厅很荣幸地接受了到大使馆进行外卖的服务活

动。

(注：外卖是饭店的餐饮销售形式之一，就是在客人指定的地方，如大使馆内，长城、故宫、或什么地方，由饭店用车将桌子、桌布、餐具、食品、饮料及服务人员拉到就餐地点。大都是自助餐形式，但也要有服务员到场服务。宴会结束，饭店再将所有人员及餐具、桌子拉回，这种服务形式灵活、价廉，不受就餐人数和场地的制约，所以颇受使馆及一些高消费团体的欢迎。)

外卖是宴会厅的家常便饭，为各个国家的领导人以及我国的领导人服务也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放松要求，而是一丝不苟地将一切准备就绪。

到了使馆后，我们按照大使先生的要求，开始了紧张的工作、搬台、摆椅、铺台布，一切都做得那样麻利而井井有条。40分钟后，服务员们擦着额头上的汗水集中到一起开了一个简短的小会，再分头进行检查。在客人来临的前5分钟，我们各就各位，餐前酒会即将开始。尼雷尔先生及随行人员首先到达，随后，我国的国防部长及其他一些政府官员也接踵而至。我们开始了热情服务。

在厨房里，厨师们也同样紧张地做着准备工作。冷菜做好了，再有10分钟宴会正式开始。OK，可以热汤了。正在这紧要关头，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检查过的煤气灶在发出一声巨响后不能使用了。怎么办？服务员和厨师都着慌了，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也不知所措。有一部分人开始寻找第二战场。几分钟终于找到了一个煤气罐。40多人的宴会只有这一个小灶，实在是太难为厨师长了。厨师长一声不响，挽起袖子干了起来。这时，其他人员也分头行动起来。大家拿出了看家的本领，使出了浑身解数，厨师和服务人员密切配合，菜在我们手下一道道地摆到了客人面前。

尼雷尔先生吃着可口的饭菜，露出了满意的微笑，我们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宴会结束后，尼雷尔总统握着服务员的手说：“很好，很好，谢谢你们！”

送走了贵宾，大使先生疾步走进厨房，看到了我们使用的小小煤气灶，连声说“太感谢了，是你们帮助我度过了这一难关，建国饭店就是好！”这简单的几句话是对我们最好的褒奖最大的鼓舞。我们感到自豪。因为我们为国家争取了荣誉，为饭店赢来了更好的声誉。

李凡文章中提到的这位厨师长就是西厨房副厨师长二级厨师王志强。

我随即采访了他，他大高个儿，穿着一身雪白的厨师服，眉清目秀，高鼻梁，性格内向，喜欢动脑筋。

当我请王志强详细谈一谈李凡文章中提到的那次给坦桑尼亚使馆外卖中发生的意外事件时，王志强笑笑，用非常精炼的语言讲述了事情经过——

按一般外卖的程序，厨师应提前点火。坦桑尼亚使馆我去过几次，但为防万一，我还是请来他们的厨师点火。

这个灶台非常大，有3米长，2米多宽，上边有两个火眼，灶台下边有两个煤气烤箱。点第一个火眼时，正常，点第二个火眼时却发出一声巨响，灶台上的炉圈都被积存的煤气掀了起来，若大的铁板台面都震颤了。这爆炸声像一颗炸弹惊天动地，据有关人说，在会客室会谈的尼雷尔和我国国防部长秦基伟的警卫人员都冲到了领导人身边，还有一个中国警卫人员冲进了厨房，察看爆炸声原因，见是煤气灶爆炸这才松了口气。

他们松了口气，我却紧张起来，这时大使馆的二等秘书、三等秘书全都进来了，问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

宴会厅经理赵志强把情况介绍了一下，他们又急匆匆地走了。

怎么办？我想起“建国”刚开业时游新志用身体接漏水的情景，那件事对我们全体服务员震动很大，它使我们懂得了什么叫服务意识，所以我当时想，不论怎么样，也得把这些菜做出来，而且尽力要做好，不能让使馆难堪……

这时大家全都看着我，仿佛我能在无火的情况下把生菜变成熟菜。我突然想起他们似乎另有一个小厨房，是给大伙做饭用的。那里边有个小煤气罐，虽然小，和家庭用的一样，但也总能解燃眉之急吧？

于是大伙儿又七手八脚地将东西全都搬到那间小厨房去。可问题又来了，这个灶台火眼很小，放不下我们煎肉鱼的大圆煎锅，那直径有一尺多呢，而西餐上菜，头盘是冷的，主盘牛排什么的，必须是热的，而且要七八个服务员端盘鱼贯而入，不能一会儿上一盘儿，这怎么办呢？

我往那些餐具上一扫，有了，上菜用的大盘是铁的，而且受热较快。于是我急中生智把大铁盘放在了灶眼上，先把西红柿煎了放旁边烤箱里放着，然后用厨房原来蒸馒头的锅把带来的米饭蒸熟了，倒进饭盒里，用保鲜纸包好，放炉板上……

平时上灶时旁边总有个大桌子，这天的小厨房只有六七米，根本放不下，那张大桌子只能放大厨房。这样上菜时，我做完了菜，服务员就端走，到大厨房的桌子上再一份一份按菜单要求摆在盘子里端上去，上菜过程中，服务员三点一线，小厨房——大厨房——宴会厅穿梭一样地跑，那天所有的服务员全成了厨师了。如果没有大家的通力合作，那天的菜也开不了。

上完菜后，我问服务员：“客人满意不满意？”因为西餐最讲火候，在大铁盘上火候掌握的怎样没有经验可寻，只有靠感觉。

服务员说：“挺好，挺满意的！”

“有什么问题吗？”我又追问一句，因为在外卖活动中，一般使馆要求是很高的。



西哈努克亲王和饭店负责同志

“没什么问题!”

我这才觉得自己浑身是汗,满脸也是汗。我的助手递给我一条毛巾。我擦了把汗,出了厨房就两腿一软,坐到院子里台阶上了……因为刚才太紧张了。

当尼雷尔先生表示感谢时,我没在场,大使先生进厨房表示感谢时我也没在场。不过这无关紧要,只要客人记住“建国”就行……

万里委员长的题词

1991年11月30日下午,我约好和总经理陈军谈一谈,但是秘书段小姐打电话来通知我:“陈总现在在重要客人要陪,让我告诉您一下,表示抱歉,采访需推迟一下时间。”

4点钟时,陈军打来电话,说可以谈了。

我见到他时,他脸上充满了喜悦,我问他“是什么重要客人光临了?”

“是万里委员长来这赴一个宴请,万里委员长对我们饭店很关心,问我出租率是多少,当我回答他说是80%多时,他非常高兴,说:‘啊,那么多客人哪?’”

“万里委员长又问我们被评为几星级饭店,还问饭店的经济效益如何?我向委员长汇报说,我们被评为四星饭店,还说截至1988年底止,“建国”平均每年接待来自世界各地客人15万人次。历年来平均出租率高达90%,中方(即国家)从建国饭店所获实得收入(包括利税费)相当于中方当时投资的8倍,这个数字还相当于外方实得收入的3倍。截止1991年累计接待海外客人140万人次……”

万里委员长还问道:“当前中国旅游业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陈军回答说:“没飞机,主要是运输问题,客人拉不来……”

万里委员长点点头,宴请结束,万里委员长应陈军要求,为建国饭店题了七个大字

卓有成效的十年

万里

1991年11月30日

这是对“建国”10载生涯的概括与高度评价,是对中国旅游业10年的高度评价。

10年里,建国饭店所创的全部利税等于为国家赚回7.6个“建国”。

由于“建国”卓有成效的经营,1991年8月27日,陈军总经理在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向首都20几家新闻单位发布消息:建国饭店已提前3个月偿还全部投资贷款,这在全国为数众多的同类“三资”企业中尚属首家!

“建国”在中国的旅游史上又创了一个第一!难怪贷款银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驻京首席代表称赞建国饭店是“利用外资相当成功”的一个榜样!这表明建国饭店的经营管理水平已经跨入了国际旅游饭店管理的先进行列,同时也充分证明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英明、伟大!

“建国”的卓有成效不仅表现在经济效益上,而且表现在社会效益上。十年来,“建国”在我国旅游涉外饭店中一直是面旗帜,在中国旅游业的开拓创新中,一直是名开路先锋,她第一家聘请了国外饭店管理公司来管理饭店,为我国饭店业培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

建国饭店人事部经理南征是从部队转业下来的干部,他身材魁梧,戴着一副眼镜,他用十分自豪的口气告诉我,十年来,从建国饭店“流走”或调走了800余名员工,其中有500多名员工成为北京和外地大饭店的

骨干力量。

难能可贵的是10年来，“建国”不仅树立了自己的产品形象，而且树立了自己的企业形象。“建国”，这个饭店家族的头胎混血儿，已成长为一位英俊青年。有人担心他衰老，有人担心他返祖，也有人担心他变色，但事实证明一切担心都变成了放心。1990年8月29日，建国饭店举行了延长合资期6年的签字仪式。这样，合资期限由原定的1992年4月27日延长到1998年4月27日，同时对后6年的利润分配也做了适当调整。

这个签字仪式的影响当然是对“卓有成效的十年”的最好注释，不但有利于扩大我国继续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也有利于增强那些已在中国投资的其他外国的信心；同时还有利于饭店的自身建设和发展。

在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里，人们不禁想起那些曾为“建国”的诞生、成长付出心血的人：敬爱的廖承志委员长曾为“建国”的奠基剪彩，曾为“建国”命名，曾亲自参加“建国”的开业典礼……如今，他已离开了我们，可他浓笔酣墨题写的“建国饭店”4个大字永远在建国门外大街上闪光，永远在祖国的旅游史上闪光……

已故“建国”副董事长、美籍华人陈宣远先生之子，也来“建国”工作的陈跃方先生曾这样概括他的父亲：

“父亲是个很有创造性的人，进取心很强。父亲也是个很有远见的人，看到饭店发展在中国很有前景，就决定在中国投资盖饭店。

“当时中国刚刚打开国门，搞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许多外国人不摸底，怕失败，不敢投资，但父亲不怕承担风险，乐于承担风险，这样他在中国取得了成功。

“父亲这个人很自信，且很乐观。他干事很有信心。也许在别人看来认为不能做的事，他都认为能做，并且敢于去做。”

根据陈宣远先生的行动来看，他的儿子对他的了解与评价没有溢美之词。他的早逝也与他的奋不顾身干事业有关系。

陈宣远先生是因心脏病而猝死的。但并非原来没有发现他的病情。医生曾告诉他，病情较严重，需做搭桥手术，因此需住院等待。

可是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他非要先回家，这样可以做点事情。医生拗不过他，只好放他回家，约好手术前再来。

结果，他永远失去了进医院手术的机会。

他的确是那种闲不住的人。在事业上，他不仅敢冒风险，而且有持续开拓的勇气和毅力。

由于北京建国饭店的成功，他又在西安投资4800万美元建造了一座建国饭店。这个“建国”比他的大哥更有气派，有888个房间，在设计和施工上也注意到改正北京建国饭店之不足，使其更加完善。

为了这个“建国”的诞生，陈宣远先生也是一次又一次地飞往西安，他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心脏病。

他倒下了，但他的名字会留在中国的旅游史上。

正任“建国”副总经理的陈宣远先生夫人葛婉君办公桌上玻璃板下有张照片，不仅表达了她个人，也表达了建国饭店所有员工对陈宣远先生的怀念。

中国的两座建国饭店，特别是北京的建国饭店是陈宣远先生的纪念碑。

同时，他捐赠的北京网球场已于1988年竣工，黄慧珠和陈跃方一起来京参加了剪彩仪式。

每一个来这里打网球的中国人或外国人，都会想起这网球场的捐赠者——陈宣远先生。

祖国不会忘记他。就像不会忘记所有为祖国的发展和建设做出贡献的炎黄子孙一样……

如今陈宣远先生在九泉之下可以感到欣慰，建国饭店，这个他付出了无数心血的混血儿，已成长为中国饭店家族的骄子，他历经种种风雨考验，不但没有衰弱，而是愈加风发……

他即使跻身世界饭店家族之内也无愧色……

名人下榻和就餐，给饭店带来了声誉和客源，也是最佳饭店的特殊标志之一。正因为如此，美国华盛顿马里奥特饭店将尼克松总统就餐的菜单，作为招待重要客人的传统菜单，纽约“21”俱乐部因是美国历届总统宴请客人的地方，而在世界享有盛名……

在建国饭店董事长办公室里，有一个灯光辉映的柜橱，里面放着一个金杯，造型是一幢高层饭店，饭店顶端尚有一个地球。杯座上用英文刻着这样的字：

由于饭店的优质服务获西班牙
金色饭店奖杯评选委员会颁发的
1985年金色饭店奖杯

1989年，建国饭店又荣获西班牙 Business Initiative Directions 颁发的“欧洲国际质量金星奖”。

1990年“建国”再获国际商务促进会颁发的“国际金星质量奖”。成为亚太地区唯一获此殊荣的饭店。

无疑，建国饭店已蜚声海外。大批名人在这里下榻和就餐，也给她带来巨大声誉，除我们上文中提到的几个首脑人物外，在“建国”的接待史上还有这些显赫的人物：

英国连任三届首相的撒切尔夫人曾在这里举行过私人宴会，招待英国大使馆的部下；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与卡特曾在这里西餐厅就餐；

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曾在这儿吃过早餐；

美国国防部长黑格曾在这里吃过晚餐；

美国现任总统布什在任副总统时曾来“建国”赴宴；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夫人在使馆宴请是“建国”宴会厅承办的；

日本首相竹下登在日本大使馆里举行宴会指名要“建国”的日本餐厅去承办……；

里根总统女儿曾在这里下榻，并高度评价西餐厅的大虾：“在美国也算高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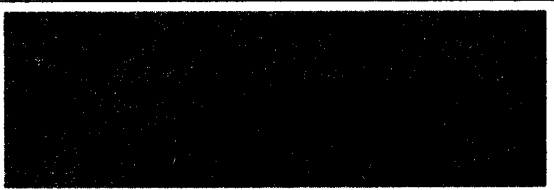
还有一些首脑人物与“建国”饭店似乎有着特殊的缘分……

1992年春天，西哈努克亲王的女婿来北京时，还专门到建国饭店用餐并拜访了陈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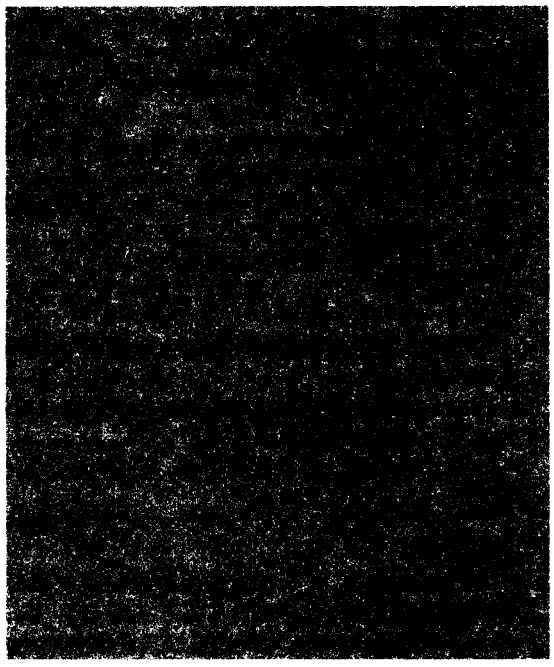
看来，“建国”饭店与柬埔寨以及各国贵宾的友谊将世代传下去……〔责任编辑：晓渡〕

赵新先与「999」交响曲

傅溪鹏 ●



1985年6月,第一军医大学委派其附属的南方医药局主任赵新先由广州到深圳筹建南方制药厂,并任厂长。投资500万元,仅用11个月零15天建成7000米厂房车间。1987年1月正式投产。几年来,经济效益十分明显突出,年产值等方面连年翻番。1990年,1000名职工的南方制药厂,年产值竟然高达3.8亿元,人均产值高达32万元,等于深圳的2.04倍、广东的4.36倍、上海的6.21倍、北京的8.03倍;人均利税高达6.8万元,等于深圳的6倍,上海的17.5倍,广东的18倍,北京的22倍;工资水平大大高于这些省市。在年产值、人均产值及利税方面均居全国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第一位。1991年,各方面又翻番,职工人数减少到千人以内,年产值竟高达6.3亿元,人均产值达48万元,人均利税达8万元。投产后的短短五年内,这个药厂的生产增长速度为60倍。这在中国是个奇迹,即使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傅溪鹏与赵新先夫妇(妻子王淑兰)

1

长长的列车，飞龙般地向前驰去。

车厢里，赵新先深思着，默默地用他双眸凝视着窗外。

44岁的赵新先，南方医院药局主任。他如今肩负着一个重担，正率领这班人马前往特区深圳，要去建设一个“南方药厂”。

他们选择了一条充满未知数的道路……

南方医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一军医大学的第一附属医院，大学与医院的驻地，均在广州市风光美丽的白云山下。

前不久，军医大学的老校长赵云宏表情严肃地坐在赵新先面前。

“你必须认真慎重地再考虑一下。你要走这一步棋，对你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第一，得脱军装；第二，得离开军医大学；第三，得离开生活安稳的大城市……”赵校长锐利的目光，透过明净的眼镜片，紧紧盯着赵新先执拗的脸膛，久久地。

“开弓没有回头箭。”赵新先声音低沉而坚定，“选择这一条路，我早就深思熟虑过了。老校长，你放心吧，我不会辜负你的期望的，不会辜负总后勤部首长们的期望的！”

“好，就这样定了。临行前，我要向你提一个要求，到深圳后，一定要发扬我们部队艰苦创业的老传统，你要把我们军医大学‘三高—少’（高技术、高效率、高效益、少用干部）的宝贵经验带过去，学过去……”

赵新先被第一军医大学委任为南方制药厂厂长，立即率兵“出征”。

1985年6月底的一天，一列火车徐徐地驶进了深圳车站。

然后，汽车载着赵新先他们往深圳市北郊驶去，荒山野岭，杂草丛生，林莽凄凉。墨绿色的笔架山出现在眼前。这美丽而又凄清的山沟，就是这群从繁华的广州市前来创业的“拓荒者”们的宿营地！

他们把简单的行李搬进了一座低矮破旧的简易平房。

身为教授学者的赵新先和年轻的知识分子们，就要在这个名符其实的“狗棚”里安身立业了！这在特区，可说是个“贫民窟”！

没有食堂，暂且到边防军的简陋饭厅寄餐。伙食标准，每人每天只有一元多钱。这在特区，可以说是个奇闻。

没有床铺，暂时搭块木板，或者席地而卧。每人平均“住宿面积”只有1.3米！

无边无际的暮色，如同朦胧的灰纱，悄悄降临了。

电灯一时没能用上。用以照明的，是原始的油灯，或带点儿文明味的腊烛……

第一座厂房在荒地上耸立起来了。1985年底，他们告别了“狗棚”，登上了大楼，住进了空荡荡的大车间。

2

夜。宁静，深沉，万籁无声。人们沉浸在美丽的梦乡。

身材魁梧的赵新先，尽管那样健壮，可他肩上沉重的担子，绝不是身体的力量可承受得了的；而必须仗仗他坚强的心力去支撑着……要知道上级批给他的120

万元,如今算来,距离他最保守的基建和设备采购计划必须支付的款项,相去的差额不是一个小数,而是一两倍以上!这些缺欠的款项,到哪里去筹?去借?向上级打报告追加投资,一再碰壁;而他又不甘心放弃他的设想,把建厂规模收缩下来!他立下的雄心壮志,绝对不会轻易退却的!这是他这个东北大汉历来办事的性格和胆识!

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拂神州大地的七十年代末期,赵新先这个敏感的军内知识分子,便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南方医院的药局,在医院里的众多部门中,当然是个后勤单位,是个“配角”。然而,主管药局工作的副主任赵新先(没有正主任)是个不甘于寂寞而勇于创业的开拓者。他果断地推出了在当时还被人看作为“异想天开”的“承包责任制”的计划报告!这在1979年的广州,绝然是个新事物。他的这个报告,在第一军医大学是第一个,在全军之中也是第一个,即使在地方上也是个“捷足先登者”!

人们对他的请求,议论纷纷。谁能料想到,坚决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的第一军医大学的领导,居然果断迅速地批准了赵新先的创举。

全医院及全军医大学的数千双眼睛,紧盯着这个“冒险者”的一举一动。他要在药局里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这样,他就得拼命奋斗;他就不能过安稳舒坦的日子!如果亏了,他怎么办?受处分?让人笑话?好心人为他捏一把冷汗;“冷笑者”则“坐山观虎斗”,等着看好戏……

然而,赵新先毕竟是赵新先!他是一个硬汉子,好汉子。他终于唱起了“主角”的戏!他终于成功了。承包的第一年,即1979年,他破天荒第一次向上级交出5万元利润!数年中,他凭借药局这个小小的舞台,居然精彩地演出了一幕幕感人的“商品经济”的活剧。到他肩起另一个重任要奔赴特区时,他在药局不仅盈利上交了100多万元,而且为医院盖起了一栋2000平方米的四层药局大楼……

站在药局大楼那高高的阳台上,军医大学美丽的校园,远处白云山翠绿的群峰,那山坡上闻名全国蜚声海内外的白云山制药厂,尽收眼底。他,留恋这些风光,热爱这里的人们;他对他们有着深沉浓烈的感情;在那里的那些日子里,他有过异样的遐想……他早就梦想着要自己办一个药厂,他不满足于药局的那种作坊式的小本经营,他不甘心于“小打小闹”!他希望干个大的事业。

“白云山制药厂是我们的模范。他们能做得到,为什么我们就做不到?”他多次与同事们议论,给下属们鼓劲,“我们军医大学有一支强大的教学科研队伍,而且我们已经有了不少科研成果……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商品?过去,体制束缚着我们。学校、医院不能办厂,不准参与商品市场的流通……

如今,改革了,开放了,我们为什么不去乘这股东

风?”

他夜不能寐,饮食无味。他在心中设计着一个蓝图……

军医大学的赵云宏校长听了赵新先关于建药厂的设想后,极为欣赏。

不久,军医大学向总后勤部打了一个报告,申请在特区创建一个军内制药厂。国务院、中央军委和总后勤部的领导同志都十分支持这个新鲜事物。

总后决定委托第一军医大学在深圳开办一个制药厂。1984年11月3日,由广东省卫生厅批文,同意军医大学在特区深圳办一个制药厂。

赵新先他们在深圳刚刚起步,便听到一些小道消息,说国家经济面临着一些难题,特区建设速度过快,特区的作法值得深思,有人反对特区这种模式。深圳何去何从?总后勤部可能会改变初衷,重新考虑特区南方药厂建设的必要性!

年轻人昂首仰望明朗的夜空。他们真想问一问那明亮的月亮、那闪烁的群星:

“请你告诉我们,我们的明天会是什么样?”

赵厂长来了。来到年轻人中间。

“厂长,要是药厂办不起来,垮了怎么办?”

“回南方医院去?”

“……”

赵厂长也昂首仰望着深沉幽暗神秘的长空沉思着。他的那副眼镜背后的两束目光,是那样锐利明亮。

“你们说呢?”厂长反问道。

“要是没有出路,也只有如此。”这是一个低弱而轻微的声音,象是没了底气似的。

“依我说,根本不要去想什么办不起来了、要跨了、回到原单位去等等这些问题!回去?有何险颜见江东父老?!”厂长的语音低沉、缓慢、坚定,“我们已经破釜沉舟,没有退路了!现在要想的,只是怎样把厂办起来,尽快办起来,而且要办好它!”

这些话,如同铁锤一般,重重地击打着每一颗心,引起了每一颗心的反响……带路人的坚定信念,让年轻人摇晃着的心儿似乎有了依靠……

“我们应该相信党中央!我认为,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会变;特区的政策不会变;你们年轻人一定要好好干。我们的命运已经紧紧地 and 南方制药厂拴在一起了。南方药厂发展了,你们也就有前途了……”

新春到了。苦了半年的同志们多么想找个机会乐一乐,轻松一下。

有人建议开个舞会吧?赵厂长笑着说,可以嘛!于是,年轻人们便在新盖的大车间里布置起一个舞场。用彩纸剪成彩花,连成彩带,把会场装扮得五彩缤纷,艳丽照人;还胡乱弄来个音响……

元旦联欢会开始了。有种种娱乐活动:用小铁环套啤酒瓶的有奖竞赛;轻盈的交际舞开始了;自编自演的节目登台了……

小合唱的歌声在“大厅”里回响。这是一支《长江

之歌》，一支从心里唱出的歌：

你从高山走来，春潮是你的风采；

你向东海奔去，惊涛是你的气概。

……

我们依恋长江，你有母亲的情怀。

啊！长江！

啊！长江

……

不久后，中央领导在对深圳特区考察之后，明确地重新肯定特区政策及方向是对的，是不能动摇的！

赵厂长的预见被证实了。

3

广州发来急电：王淑兰病重住院，速归！

王淑兰是赵新先的妻子，赵新先被迫返回广州。他带着一颗内疚的心，跨着铅块一样沉重的脚步，迈进家门。

脸色焦黄苍白的妻子躺在床上。孩子们还没有放学。见丈夫回来，妻子鼻头一酸，泪水扑簌簌地往下掉。她捂住了嘴，低声哽咽起来……

良久，妻子才止住了泪水。

“瞧你！又黑又瘦，疲惫不堪，象是从劳改所里出来的……”妻子心疼地说。

“嘿，没事。”老赵赶忙动手收拾东西，干活，“我身体硬实着呐。厂里的事太多太急迫，我没日没夜地干，从来也没觉得累过……”

两个孩子放学回来了。一见爸爸回到家里，孩子们欣喜若狂，如同见到了“救世主”。

“爸爸，你可把我们想死了！”孩子们围着爸爸身边转，“妈妈是累病的……爸，这回可不要走了！”

“是呀！你就多留几天，帮帮我。求你啦”，妻子接过头话。

老赵怎么回答他们呢？马上说他还得走，未免太残酷了！妻子已无能为力，眼前这个艰难处境……

他说，他有点事出去一下，便回来。小儿子，生怕爸爸瞒着他们悄悄溜走，直跟到门口外头……

老赵跑到药局，又赶到好友邻居那里，千嘱咐，万拜托，请他的同事帮一把，照顾一下他的这个几乎半崩溃了的“家”……

他回到家里，孩子们还没有吃饭，眼巴巴地等着爸爸回来。

老赵紧赶慢赶地做了饭菜，让孩子们吃，侍候妻子吃……他这才匆匆扒了几口饭。他心里记挂着厂里的事。他一分钟也不能留下了！

“我有急事，得马上走。”老赵横下心说出了这句话。他把两个孩子拉到身边说，“你们的妈妈有病。你们要懂事，要学着在生活上自理，而且要多帮家里干活，减轻你妈妈的负担。你们做不了、做不到的事，我都拜托阿姨叔叔们了。他们会带来帮忙的……”

儿子一听爸要走，哇地一声哭起来了。这些天，他

们一家人实是苦极了。他明白妈妈没有爸爸的支撑是很难过好这个家的日子的。他多么需要爸爸呀！

“爸，你不能走！”儿子一把抱住爸爸的大腿，紧紧地，久久地不放，“我不让你走，姐也不让你走，妈更不让你走！”

“好儿子，乖，听爸的话。”他深情地抚摸着儿子的小脑袋。“爸爸一定抽空回来看你们……爸爸对不起你们！”他再也说不下去了，“爸……”

“还是让他走吧。”妻子王淑兰有气无力地说，“他的心儿早已飞到深圳去了。咱们想留他是留不住的……亮儿，让你爸走吧。”

还是妻子体察丈夫的心。老赵更加感到内疚，一种重重的负罪感使他痛苦极了——他是个不称职的父亲，不称职的丈夫。

后来，为了减少“后院”起火，在建厂最艰苦的时刻，赵新先用尽口舌，动员妻子和孩子跟他来到深圳过苦日子，来支持他的事业，来帮他更好地挑起这副重担。

他全家的到来，让追随他的这批创业者们眼睛一下子更为明亮了——赵厂长的妻子和孩子们同他们风雨同舟来了，他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他们只有更加坚定地把这艰苦的路走下去！

不久后，其他一些同志的家属也陆续搬来了。

赵新先一家挤在一个简陋的破工棚里。工棚拆掉后，搬进了空旷冰凉的大车间里。那水泥地上常常冒着水珠，到处潮湿得不得了……

他们一家在这里一住就是一年多。王淑兰牺牲了自己的专业，由眼科医生变成厂医兼卫生员；由于搬家转学，耽误时间，影响了学习，女儿没能考上大学，只好在深圳自费上夜间大学，每年要多交500元学费。他们两口子工作太忙，没有时间操持家务，只好全家在食堂里用餐。

在90年代初，这个药厂已成为军内甚至全国企业中的豪富之时，人们走进赵厂长的家，看到的情景是想象不到的。这个为国家每年赚来几亿元利润的大企业家的家里，除了彩电冰箱外，再也没有多少现代化的家庭用品了。

4

赵新先为了筹办南方制药厂，从1983年起至1986年的3年多时间内，于广东省的省级机关及至深圳市的市级机关的卫生、工商等等层层叠叠的种种厅局中，上下奔波周旋，跑了难以计算的路程，费尽了数不清的口舌，才盖了整整56个“红色公章”，使创建“南方药厂”成为合法化……

作为一个学者专家，赵新先为了办厂放下架子，以普通人的身份，带着年轻的李红兵，到一个机关去求办一个手续。

进了办公室，老赵和小李立即客气地同一位中年模样的干部打了个招呼。（后来听说他是个科长）那位

干部爱搭理不搭理地哼了哼,大半天没有“下文”。

“坐吧!”见老赵和小李站久了,大约科长有些“良心自责”,才发了个“号令”。

老赵和小李坐定。

“有什么事”?官不大,官腔不小。

“我们是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院的,我们想办个药厂,来申办个手续……”老赵说明来意。

“办药厂?”对方不屑一顾地在鼻腔里轻轻哼了一声,“依我说,你们就别操那份心了。”对方半奚落半教训地说,“你们和地方不一样,部队医院嘛,就好好为病人治病得了,办什么药厂呀?!”

这下,把老赵也惹火了!他霍得站起身来,想反击,可又一转念,不能因小失大!他是知识分子,不管怎么说,应该“斯文”点。他把差点冲出口来的话又咽了回去。

“我们上级总后勤部的首长已经批准了,希望你们能支持……”老赵又耐心地讲道理。

“好吧,你们把申请留下,我们研究研究。”再也不吭声了。

老赵和小李看看“没戏”,就撤了……

回来后,和朋友同事谈起这次受气的事,有的人就对老赵说:“唉呀!你这个人也太书生气十足了!怎么一点也不晓得人情世故!得有见面礼的呀!如今办事,能少得了这个?!”

尽管不情愿,可为了“批件”,只好“入乡随俗”。小李去打听到那个科长的家,之后,便送去些苹果,算是点薄礼吧,还是老赵小李肩扛手抬送到单元楼上的……

后来,在办一个个批件中,他们逐渐摸到了“门道”。老赵借用自己部队的车,多次主动帮助那些掌管“红印子”的单位办事,为他们买水果、买白菜、萝卜,买大葱土豆……

市药局是老赵跑得最勤的单位之一。在这里,他遇到一位既好心又固执的“老太婆”。其实,她并不老。“老太婆”不过是人们对她的尊称,因为她为人热情健谈。跑多了,老赵同她也闹熟了。可她就不放手盖那个“公章”,因为她看中了老赵的才干。

“老赵呀,何苦去白手起家建厂?去吃那份苦,受那份罪呀?”她苦苦地劝说道,“你干脆脱下军装,到我这里来。我给你安排个现成的厂长,如何?”

“谢谢你的好意。”老赵摇了摇头,“说实在的,你还不了解我这个人。我有我的追求。我要自己安排自己的命运。”

“你这个人好顽固,真有些不识好歹……你不听话,我不盖这个章!”

心诚则灵。老赵那样地勤跑勤求,使那“老太婆”终究没能倔得过老赵。最后,还是为他开了“绿灯”……

5

赵新先亲自设计的 NF-A 自动化生产线安装完

毕后,进入了试车阶段,开始出样品。

1986年7月,当时的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前来视察。他参观了厂房和生产线。他看着生产线的指示灯亮了,“三九胃泰”产品源源不绝地从机器中流出来,十分高兴。

“为什么注册商标叫‘999’?”他问道。

“这种药的主要成份有三桉苦和九里香,取其草药名之字头,999,表示天长地久,是老百姓爱听的话,有吉祥之意,999 商标,容易为海外人士接受,为将来打入国际市场准备条件……”赵新先详细地回答。

历经千辛万苦,南方制药厂于1986年9月19日,投入试生产。

试投产后,“三九胃泰”的新产品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了。眼下,最突出的矛盾,自然是怎样把这些药品推销出去?

赵厂长一声号令,全厂人员,除了生产部门等不能离开岗位的外,所有的干部职工总动员,分头出去奔波推销。有亲戚的找亲戚,有朋友同学老师的,找朋友同学老师……产品,终于打开了销路。

6

不管是美国或日本或西欧,实业家、企业家、富商们的广告意识,是极为浓烈的;而中国呢?

南方药厂投产初期,就花了不少精力和财力,在报刊及电视台等做了不少广告;而这些广告也为药厂的发达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到香港考察,偶而从电视节目中看到一种奇特的广告形式。他十分欣赏,便默记在心中。

有一次,赵厂长到广州办事,遇见了从事广告设计联络业务工作的孙冕。

“我想在广州马路上的‘的士’顶棚上做个活动广告?这种形式,我是从电视上看来的……”赵厂长说,“你看行得通吗?”

“这种背在‘的士’背上的‘灯箱广告’,大约可以有40×98公分高与宽,正面写上突出的‘999’商标;背面写上‘胃药之王,三九胃泰’……”

“好,我马上行动。”

要办这件事,涉及到工商、交通及公安等许多关键部门;而且这是从来没人见过也没听过,更没人干过的新鲜事。在这些部门中恐怕很难打通关系,很难办手续的……

不过,孙冕还是神通广大。他说服了这些部门了。于是,他便飞快去找一家小轿车出租公司联络。

没想到,事情竟然很顺利地办成了。

说实在的,这个活广告的出现,首先就让南方药厂交了好运——扩大了影响,订户更多了,产量又提高;而广州汽车出租公司也交了好运了,他们赚了广告费,还扩大了影响,不少乘客要小车时,就特地等乘他们的车;没有这“999”广告的小车,他就不坐,宁愿等着……

390多辆小轿车与背上的“999”广告,从1988年8

月做到1989年8月。其间遇到正在开广州交易会。“999”小车，在交易会会场前面就更活跃了！街上到处跑着“999”小车。“外商”和“内商”都是做生意的人，更迷信喜欢“999”了……

电视台摄制记者都摇头道：“我们拍的电视镜头，不少画面都被999小车给占领了，真没辙！”

“999”小车“灯箱广告”在广州风行一时。在广州市影响太大。后来，广东省工商局开会时，多次提起了此事，这种崭新的形式、做法引起了争论，并且有人对车背上灯箱上的“胃药之王、三九胃泰”八个字，颇有意见，说这样的广告词，没有经过批准，怎么可以随便乱用？！其实，中外所有的广告上的广告用语从来也不需哪个上级单位去正式批审，也实在没有什么专设的机构来干这种事，这是众所周知的，然而，有关机构出来过问了。在“999”小车于广州街头奔驰了一周年之际，上级有关部门下令叫它们“休假”了。

“小孙啊，你能否再想办法帮我们联系及设计个更有特色的广告？一定要能打响的！比小轿车背上的‘999’广告更有气魄的……”在小车背上的广告被停用之后，赵新先厂长又琢磨开了，他用他的那种每办一件事都表现出“超前意识”的特殊功能引导着孙冕，“在海外发达的国家，像美国，名演员做广告，是很流行的……我也想请些名演员为我们的‘999’做广告。”赵厂长说到这里，歇了一口气，沉思了一下，“不过，我们请名演员做广告，绝对要区别于现在那种争相请漂亮女演员做广告的流行风气！我有我的独特要求，必须具有下列条件：知名度高、男演员、一贯演正面角色的、形象威严的、年龄大些的……”

“赵厂长，你的条件也未免太苛刻了？”孙冕一听，吃了一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选人做广告，条件如此特殊！这比挑一出重戏的主角还难……”

“我们的目的是，要通过这位演员的高大正面形象，来辉映出我们三九胃泰的美好形象……”

“那么，赵厂长，你看中谁啦？”

“孙道临、李默然、陈锋……”

“太有眼光了！”

“现在，我们三九胃泰商标不断被人窃用。所以做好这个广告很重要。小孙，你要认真地设计。你先起草个方案，让我看看……”

“好。我去试试。”

经过反复做说服工作，李默然同志同意做“三九胃泰”广告，其影响之大，就甭提了；李默然本人没有拿一文广告费，不想，其间又引起了极大“题外”风波……

南方制药厂特邀名人为“三九胃泰”做广告的事，并没有因此中断，而是仍然在继续做下去。这回，是特邀了扮演“孙中山”的名演员刘文治出场的。

之后，又特邀了扮演“蒋介石”的著名演员孙飞虎，做“正天丸”的广告。特邀著名演员史进、方化，做了“999感冒灵”及“999皮炎平”的广告……

在1991年夏天，中国大面积遭水灾之际，南方制

药厂为灾区捐献了价值130万元的各种药品；同时，又摄制了“999与灾民风雨同舟”的广告，以广告费的支付方式再次捐献了一笔款项……

7

南方制药厂经过14个月的试生产之后，于1987年1月正式投产。

正当人们庆幸于吃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跨出这关键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时，一个令人恐惧万分的“灾难”突然从天而降；赵新先“出事”了！犯了重大错误！总后勤部派的调查组，已进驻到深圳“医疗中心”，正在采取非常措施……

这叫人心悸的“小道消息”，不翼而飞，顿时传遍了南方药厂……

据说，赵新先的罪状有四条：

(一)独断专行，目无领导；

(二)违反财政制度，目无法纪，私自挪用巨款；

(三)先生活后生产，私心太重；

(四)大搞高级舞厅，讲究享受。

猛一听这些“罪状”，便使人脑瓜子里立时闪出四个大字：“罪大恶极”！

赵新先在总后勤部的熟人，为他捏了一把冷汗。这些罪状如属实的话，老赵就彻底完了，撤职处分是逃不脱的，弄不好恐怕得去蹲牢房……

可是这些传说，赵新先还不知道。人们哪敢告诉他呀？何况，许许多多与他日夜相处生死与共的人，是了解他，明白真相的，根本不相信这些“天方夜谭”……

但是，总后勤部派来的调查组真的进厂了，这确是人们亲眼目睹的事实。

以焦万里同志为组长的总后勤部调查组，一行5人。安顿下来后，便在深圳医疗中心召开第一次干部会议。

这是1987年2月。人们正准备欢度春节。南方制药厂刚刚正式投产不到两个月。

会议上，焦万里同志的谈话十分平和。他说，调查组是下来考查考查“中心”与南方药厂的工作，了解了解情况，听听同志们的汇报，看看大家有什么困难……

赵新先是个典型的只知道苦干不知道提防“身后暗箭”的善良的天真纯朴的知识分子。他从来没有把人家看得那么坏，也没有时间、心思去捉摸别人的“暗算”……

焦万里等调查组的同志找赵新先谈话时，赵新先认真仔细地汇报着他的工作，汇报着南方制药厂的建设进展情况，有哪些成绩，有哪些问题和困难。

他甚至还抱着一个极其天真的想法——他以为，现在南方药厂的资金正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以为总后勤部来得正是时候。他设想，只要向调查组诉说他的困难，也许上级会再拨些款项，为他解决燃眉之急。他真心地把调查组看作是救星——“雪里送炭”来了……

直到焦万里同志第二次找赵新先谈话之前，才有人悄悄地把这一切“内幕”告诉了他……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怎么也想象不到有人会在背后整他！？当然，他心里十分镇静，因为这些所谓“罪状”，一丁点都不沾他的边，全是不实之词，全是胡言乱语，全是诬告陷害……可是，他也不能不提防点儿！

他想来想去，怎么也想不出有谁会去告他的状，他在艰苦创业的过程中，总后的首长和军医大学的赵校长等领导同志，是关心和支持他的呀？！群众是理解支持他的呀？！那么，还有谁会与他作对呢？

难道是他的“上级单位”医疗中心的某些人？

这个念头，从模糊，而有所显露，而逐渐清晰了……

他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一件一件的回想起与“中心”某些个别头头在工作上的不同见解，种种矛盾。他们处处卡他，甚至演化成激烈冲突……

在向焦万里同志作第二次汇报之中，他不得不认真地仔细地谈了他与“中心”个别领导的分歧意见及矛盾冲突……他希望总后调查组能真正深入基层，多听干部群众的心声，能尽快明白真相，能够不要影响他的药厂的工作，更担心因此而使药厂的事业中途而废……

他相信上级会秉公办事！

他平静地等待着“法官”的“评判”……

“深圳医疗中心”的某某负责人回北京休假，在总后勤部大院里，有时间总要去串串门，看望老朋友老同志，拜访老上级老领导。交谈中，难免要叙叙在深圳的工作生活情况。这位“老同志”不知出于什么意图，有意无意地谈了不少对南方制药厂的看法，谈了对赵新先这个人物的看法。在这位“老同志”心目中，这个开拓型的敢于奋不顾身创业的赵新先，是位叫人十分头疼的人物。赵新先的许多“高速度”、“高效率”的想法做法，都叫他看不惯。他觉得，赵新先不尊重他。南方药厂是他的下级单位，可赵新先时常不听他的指挥，往往不请示、不汇报、独断专行、目无上级；总后勤部副部长赵南起首长1985年底到深圳视察后，所下的关于“中心”暂停“发展”，静观后效，可能“下马”；而南方药厂却继续“上马”，抓紧建设的“现实”，对这位“老同志”也许是个“刺激”，他可能“隐隐约约”地感受到一种“危机感”或“失落感”……

也许，是保守，偏见，加上“道听途说”，从而使思想僵化的人，可能会简单地从一些表面现象中，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例如，为什么赵厂长急于把老婆调来？局外人哪里明白南方药厂这个“特区”是个什么样子呀？人们想象的“特区”，那是灯红酒绿极其享乐的“天堂”呀！

如此种种推想……便编织了一幅赵新先“反面角色”的形象！

古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在总后大院里，赵新先的“形象”被传来传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材料”最后传到了总后首长们的耳朵里……

“老赵呀，赵新先是不是有些问题呀？”总后的首长给广州的第一军医大学校长赵云宏打了个电话，把听到的情况查问了一下。

“不会吧”。赵校长一听，不禁吃了一惊，“南方药厂的工作是我亲自抓的呀；我经常去深圳医疗中心和药厂跑动，赵新先这个人是在经长期考察后起用的，能不了解？……”

总后勤部毕竟离深圳太远，有些情况难以一下子辨别真伪。因此，有人主张派调查组下来查一查，弄个清楚明白，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谁知，那位“老同志”听到他“散布的‘材料’居然如此惊动了总后的首长，而且还要派调查组下来，一时便慌了手脚。于是，他急忙通过关系去疏通领导。说：“嗨！这些事就算了，不必那样兴师动众，花那么多人力物力去折腾。”继而，他又声明说：“他不过是随便聊聊而已，仅供领导参考。可是，他又不公开明确地承认。他提供的‘材料’是‘不实之词’……他害怕派调查组下来。如果是那样，便会马上戳穿他的‘西洋镜’。如此，总后的首长对这件事也就淡化了，想暂时搁放下去……”

可是，广州的赵云宏老校长却“不平”了。他绝对不能就此“甘休”！他一定要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不可！他听到有人去北京告赵新先的状，十分生气。他哪里允许有些人想“诬告”就“诬告”，想“撤诉就撤诉”呀！

赵校长特地给总后首长提出请求，无论如何一定得尽快派调查组来。他希望总后领导能亲自来实地考察一下南方药厂和赵新先的真正“品格”！

在赵云宏老校长的请求坚持下，总后勤部终于派来了这个“调查组”。

这个用意当然是十分明显的。赵校长是希望以“调查组”的形式，来为南方制药厂，为赵新先“正名”……

8

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一切真相都明白了。

调查组表示，赵新先的所谓“四条罪状”完全是莫须有的，立即予以平反。

调查组请示总后勤部，于1987年5月宣布：

- 1、总后勤部对深圳南方制药厂的工作是肯定的；
- 2、南方制药厂脱离“医疗中心”，归军医大学直接领导；
- 3、“中心”的×××调回北京……

所谓赵新先“独断专行”、“目无领导”的罪状，是有来历的。当时，药厂的建设资金严重不足。赵新先一再“到中心”汇报，求援，打报告。可就是感动不了那个“上帝”。他火了，急了，飞快赶到“中心”，要去评理。那个“上帝”正在那里悠闲地下棋……这可把老赵气坏了！“药厂按总后的指示，正在快马加鞭地建设……现在就

快投产了，可资金不够，困难很大。我打了那么多报告，你为什么是不批？你安的是什么心？你想拖跨我们药厂吗？你想拖跨我老赵吗？”

“我不能随便批款项给你呀……”这个老头大约有些老朽，他说，“要是我批得不合适，就要犯错误……”

老赵与这个“老同志”的冲突越来越多了，大多全是老赵要飞快地建设和发展生产，而对方却偏要拉后腿。可老赵还是想尽办法，把药厂的事办得不错，而不经过这个上级的许诺……于是，便有了“目无领导”，“独断专行”的罪过了……

至于“违反财务制度，私自挪用巨款”的真相是：NF—A 生产线等设备的最后价格是 110 万元，而药厂准备购买设备的经费只有 50 万元，大大短缺。老赵向“中心”汇报请求，批不下款项来；向人家借也借不来。他无路可走，只好从自己的“粮草”中去谋出路……他同厂里的干部商量，决定临时把盖办公楼和食堂的那笔款项，暂时挪用过来。这个决定，实在是迫不得已。可反倒是老赵坚持“先生活后生产”的有力见证了……

什么“先生活后生产”的罪状，实在是不可自破的笑话。人们心里明白，老赵把老婆调来，把家搬来的目的是十分明显的。这个内幕在前面已经介绍了……

有趣得很，调查组焦万里同志在宣布结论时，开玩笑地说：“如果有人要把老婆调来，把家搬来，我马上批准！”

话音未落，底下便哄堂大笑。……

9

生产的飞跃发展，使南方药厂的流动资金等方面的需求量剧增，有时必须去向银行贷款。这本来是正常的业务往来，不会有什么纠葛。可谁想却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奇事。

1988 年，国家紧缩银根。因此，向银行贷款的难度加大了。有一回，南方药厂的财务部长吴镇国与一家银行商谈贷款之事。

“给你贷款可以，但是，我们必须收 2% 的回扣！”对方居然明目张胆地提出这种要求。

“我搞的是财务。从来也没听说过有此怪事”，小吴一听吓了一跳。

“没有什么奇怪的。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

吴镇国自然不敢自作主张。他急急回来，向赵厂长汇报。

赵厂长说：“特区也不是只有一家银行？我们总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我相信，搞这种歪风邪气的毕竟是少数……”

“好，我再跑跑其它银行……”

“记住，我们厂办事，都要走正道……”

厂长的话完全被证实了：南方药厂没有付出任何附加条件，便向中国工商银行贷款 100 万元；向建设银行贷款 50 万元；向发展银行贷款 50 万元。

有一个时期，特区出现一股疯狂的倒买倒卖风，不少单位提出用公款出去参与这种违法经营活动。

有一回，同是部队单位的一位同志前来拜访赵厂长。

“厂长，告诉你，有一件好事！你干不干？”

“什么事呀？”

“现在，湖南和深圳两地的水泥价格相差极大。如果我们来合作这项经销业务，肯定赚大钱。这样吧，你们生产任务重，就不用出力气了；你厂长一句话，能出一笔资金，由我们去办，去跑。你们坐等分红吧。”

“你也不是搞那行的？你怎么去干这个呀？”赵厂长有意摸一摸底细。

“我已经拿到批条了。在湖南可以以国家批价买进，每吨 78 元；运到深圳那就高了，每吨可以出手 350 元。净赚 272 元！”

“你不觉得心跳？”赵厂长问，“我们是部队企业。就应该安分地搞生产嘛。不要去搞那些歪门邪道！”

“嘿，厂长，不管怎么说，咱总是兄弟单位……你不想参与？那就借些资金给我们，支援支援……”

“咱都是部队的兄弟单位。不错！我实在应该劝你一句。古人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想，我们都是军人，都是党员，难道连古人的君子都不如吗？！”赵厂长真挚诚恳地劝说对方，“这件事，你就别干了。好好把正事干好，这才是咱军人的本份呀！”

赵新先的这种坚持靠自己的艰苦劳动去赢得正当收入，而反对以非法手段牟取暴利的正确经营思想，早于建厂初期便十分明确了。

早期“三九胃泰”药品还没有广泛地为人们所知，而推销工作十分困难时，厂里前去江西参加一个全国性药品订货会的同志，见各个厂家竞相使出各种“招术”去拉客户：有的给“茶水费”，有的搞“异型包装”（内装重礼），送皮箱、高压锅、冰箱、彩电等等。表面看上去，似乎颇有收效。于是，有人便向赵厂长建议说：“咱的产品新，人家不了解。推销时何不学学人家的办法，不送些礼，恐怕竞争不过人家，很难打开局面……”

“这不是好办法，不是长久之计。”赵厂长引导道，“我们要靠科技的力量，产品的质量、药厂的信誉和优质的服务，去推销产品，去参加竞争。只有坚持走这条正道，我们的产品才能广泛持久地占领市场，立于不败之地……”

几年来，赵厂长经常教育他们厂的干部和职工说：“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个人，一个企业，不管做什么事，都不能走歪门斜道，都不能存侥幸心理……”

赵新先厂长的话说对了；他们的路走对了！

南方制药厂犹如一艘航船，正在历史的长河中航行。赵新先站在船头，正极目远眺，前面的路正长，浪正急……

〔责任编辑：穆 图〕



- 傅作义再二再三地向蒋介石发电要求辞职
- 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傅作义率部逃跑
- 林彪急切地问：那封信交给了傅作义没有？
- 傅作义向陶铸提出要见毛泽东

舒云

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的傅作义

蒋介石批准了傅作义扩军备战、坚守北平的计划

直到40多年后，经历过北平当年那些曲曲折折和平进程的人们，还都不无感慨地说，他们没想到北平最后是那么圆满的结局。

不仅仅是他们，就是毛泽东，就是蒋介石，也没有想到北平这座地球上最后的古都，完全幸免了现代化的炮火而平安无事。

蒋介石是有不放一枪一弹撤退华北的动议的。但是，他不是心疼北平的古建筑，而是想让傅作义的几十

万军队去华东南保卫他的半壁江山。蒋介石把他的意思通过何应钦转达给了傅作义。

傅作义当场表示不同意。

他搜肠刮肚想出了一大堆理由，以主战派的面貌出现在蒋介石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上。进门时，主张和平的张治中对傅作义说，老兄是主战派，请先入瓮。傅作义也不推辞，率先进去坐好。蒋介石表示任命傅作义为华东南军政长官，所有军队均归傅指挥，并说撤退军队的船只已经准备就绪。

傅作义胸有成竹地表示要坚守华北。

蒋介石也不甘心不放一枪就丢掉华北，华北一放弃，等于长江以北全姓“共”了。美国方面已经明显表示不信任蒋介石，甚至还威胁过，如果华北丢掉，那么美

国将不再支持蒋政府。

所以，傅作义一慷慨激昂，蒋介石就连连赞许，或许奇迹出现了呢，华北一旦坚守住，长江以南就不至于出现危机。于是，蒋介石批准了傅作义扩军备战坚守北平的计划。

傅作义再二再三地 向蒋介石发电要求辞职

别说到华东南了，就是再早，去北平，傅作义也是犹犹豫豫地不想去。

傅作义的心腹王克俊，是傅作义时时不可缺少的智囊。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后来说，王克俊是最能揣摩我父亲心思的。傅作义这个人，一向谨慎，话很少，常常该说的话也不说，等对方领会。不少部下摸不准傅作义的心思，唯王克俊例外。王克俊不仅能揣摩出傅作义的心思，还能锦上添花或者雪中送炭，颇得傅作义的青睐。傅作义在很多事上都要听听王克俊的意见。就是解放后，傅作义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部长，也把王克俊要到身边，继续帮他出谋划策。

王克俊说，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是很不愿意的。他宁肯呆在他的张家口，而不愿去北平就职。他知道，蒋的嫡系是不会听他指挥的，而自己的部队却被更牢地绑到了蒋介石的战车上。后来，傅作义不得已带了参谋长等少数几个人到北平上任。又过了一段时间才把总部迁到北平。

但是，傅作义不让他的总部进城，而是安放在北平西郊日本人建的新北京里。他不愿他的部队被花花世界搅昏了头，更不愿与蒋的嫡系们掺和在一起。直到后来解放军围城，傅才把总部搬到城里的中南海。

1948年2月。傅作义主持召开华北“剿总”会议研究军事工作。傅作义提出有权使用战斗序列的整个部队的问题。

但副总司令陈继承反对。

陈继承是蒋嫡系，他还兼北平警备总司令、军统特务头子。陈继承表示中央军的行动必须通过他，甚至象青年军208师只有他能使用。而傅作义的直属部队使用他也要过问。

两人争吵起来。

会后，傅作义坚决向蒋介石辞职。

傅作义气愤地对亲信说，想用军统中统两条绳索来捆我的手脚，要我充当地主豪门的鹰犬去咬沿门乞讨的老百姓，我是不干的。

他又再二再三地向蒋介石发电要求辞职。

蒋介石极力挽留。

最后没有办法，对他说，你若能荐举一个如你一样的人才，可以接受辞呈。

傅作义说，陈继承可以。陈继承已经掌握了军事、人事、警备、舆论等各方面，完全可以胜任有余。

蒋介石这才明白傅作义的气由何而来，息事宁人

地撤去陈继承，并大方地让傅作义自己挑选副手。这才把傅作义稳在了北平。

尽管如此，傅作义心里明白，蒋介石只不过是利用他，看他还有一些部队和地盘。如果撤到南边，地盘是人家的，军队一改编，傅作义可就成孤家寡人了。蒋介石排斥异己的心一向很重，对傅作义也不会例外。

所以，傅作义不愿离开华北。

这中间还有一些原因。

傅作义自从守涿州出名以后，又在长城抗战中成了英雄，被冠以名将，一枪不放匆匆走掉，面子上不好看。再加上他自己的嫡系几乎全是绥远或者山西人，去南方绝对不习惯，如果硬要去，肯定不少人会留下。

那就只有守守看了。

傅作义明白，历来孤城坚守，没有不最终陷落的，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只好走一步说一步了。但愿东北秋风扫落叶般的败势不要在北平重演。

毛泽东最最担心的就是 傅作义率部逃跑

此刻，在河北的一座山村小院里，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正在布置华北的大会战。平津战役最后的结局是一步步演化来的，正象辽沈战役解放全东北的辉煌战果是逐渐演化来的一样，刚开始，华北是准备恶战一场的。

毛泽东最最担心的就是傅作义席卷他的部队逃掉，这样，东北大军入得关来，固然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而获得华北，但却给日后的长江以南作战陡增了巨大的困难。所以，一定要把傅作义的部队消灭在华北。毛泽东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全是围绕着如何把傅作义拖住在华北而制定的。

这时候，毛泽东已从北平地下党频频发来的情报中得知傅作义并不想离开华北，但是，他迟迟不放弃张家口说明他并不想一条胡同走到黑。他可以西逃绥远。又可以南逃东南。逼急了，狗还要上墙头呢。

毛泽东先是商量，后又严肃命令东北野战军放弃休整，连夜秘密入关。

当傅作义发现攻打密云的正规部队是东北野战军时，他吓坏了，连忙飞到张家口，命令去救援张家口的35军速速回到北平。

毛泽东这边也连发几次大火。他先批评程子华先遣兵团打密云耽误了时间，叫后卫变前卫前进。又批评包围张家口的杨成武部队放跑了35军。继而又一封接一封电报催杨得志兵团，话说得很严厉，如果放跑了35军，由杨得志负责。幸亏杨得志兵团把35军堵在了新保安，毛泽东这火才没有继续发下去。

当然，如果35军回到北平，北平还会守不住的。但是，平津战役的结局就是另一番文字了。

有了战斗力最强的嫡系35军，傅作义能不能在北

和平解放的协议书上签字,就很难说了,或许北平要象天津一样打一场恶战呢。

傅作义不是初次 与毛泽东打交道

毕竟北平无战事。

据傅冬菊回忆,傅作义萌发和平之举是在1948年11月初。那时东北的解放军主力还没有入关,但是,久经沙场的傅作义已经很清楚,东北战事结束,林彪的大军一定会来吃华北这块肥肉的。他想趁自己还有堂堂60万兵力和华北这一大块地盘,撇开蒋介石,单独跟毛泽东谈判成立联合政府。

傅作义信心十足,他给毛泽东拍了电报。

这不是他初次与毛泽东打交道。

1931年9·18事变后第4天,傅作义等晋绥将领15人联名通电全国,请缨抗日。傅作义向全体官兵进行抗日动员,宁做战时鬼,不做亡国奴。他规定部队早晚点名时要齐声高呼,誓保国土,以尽责任,不惜牺牲,以雪国耻。

1933年5月14日夜,日本主力第八师团沿北平至古北口的大道向北平进逼。傅作义的部队在牛栏山一带设伏。傅作义动员时慷慨激昂。

激战一昼夜后,日军遗尸遍野。后来日军迂回到蒋嫡系部队的薄弱环节处,才打开缺口,包围了牛栏山。傅作义派预备队,对日军形成反包围的态势,直恶战到夕阳西下。

这场牛栏山之战,日军死亡246人,伤500余人。

傅作义在长城线上的捷报一传出,天津大公报等纷纷以相当重要的地位大字刊出,以血肉挡敌利器,傅部空前大牺牲,最有力最光荣之一战等,报道傅作义抗日战况。就连日本朝日新闻也不得不承认,战地离北平城只有60多华里,如果不是傅军的精锐阻挡,日军早已进入北平城了。

以后,傅作义又在绥远抗战,接连打了好几个大胜仗。平型关战斗中,傅作义作为侧翼配合打援,后来有人说,如果傅打援不成功,林彪的平型关大捷就不能成为大捷。

那时候,全国上下以及国外华侨纷纷募捐前线将士,钱和物源源不断地送到傅作义手里。中共中央也派南汉宸持毛泽东的亲笔信到绥远,与傅作义共商抗日大计。两个月后,中共代表彭雪枫又携带毛泽东的信来到绥远。

八路军派了不少政工干部到傅作义部队帮助建立政治工作网,后国共谈判破裂,傅作义没按蒋介石的要求杀掉这些共产党,而是把他们全部送回延安。

毛泽东知道,傅作义与蒋介石不那么一样。蒋介石对共产党不容,宁肯错杀一千,不肯放过一个。而傅作义,对共产党比较宽容,他甚至在某些地方例如政治思

想工作方面还向共产党学习。再加上傅作义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时时处处受蒋介石的气,有起义的可能。

但是,毛泽东刚开始并不相信傅作义是真心的。或许,傅作义本身也并不是真心。毛泽东在电报中对林彪他们说,傅作义经过彭泽湘及符定一和我们接洽起义,据称傅起义大致已定,目前考虑者为起义时间,对付华北蒋军及与我党联系等问题。现符定一已到石门,明后日即可见面。我们拟利用此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以便迅速解决中央军。

直到后来北平和平解放协定签字后,人民解放军仍以战备姿态等待国民党兵开出北平城。1月31日,佩戴平警标记的41军的一个团,从西直门开进北平时,仍荷枪实弹百倍警惕的。这个团的政委周之同,后来是总政的一名军级干部。他说,那时,每个营都是两个连队荷枪,一个连队押子弹。他是坐第一辆指挥车的,进北平就是准备战斗的。部队一进去,首先抢占了景山等处的制高点,布上了警卫。

做为第一个进入北平以林彪代表身份参加北平和平谈判的苏静,在40多年后说过这样一番话。傅作义自从35军被消灭,张家口被占领,尤其是天津战役后,条件越来越低,最后几乎没有条件了,只剩下金圆券之类如何处理之类的鸡毛蒜皮了。

其实,已经兵临北平城下的人民解放军比傅作义的部队强大多了,这不仅指人数上,而且也指武器装备上。整个东北蒋介石从美国人那里拿来的精良武器全叫东北野战军搬到华北战场上来了,傅作义如何比得了。再也不是小米加步枪的时候了。你不起义,照样把城池攻下来。起义当然十分欢迎了,但不许附加条件,必须放下武器。

傅作义当然不愿意放下武器投降了,他好面子,创造了出城改编的方式,为自己也为部下赢来了最好的命运。

林彪急切地问: 那封信交给傅作义没有?

但是,交出军队和平解放北平之后的某一天,傅作义从广播里听到历数自己罪行的严厉通牒,他气坏了。

他的卫士郝德振40多年后回忆,那次真生气了。郝德振看见傅作义马上叫来周北峰和邓宝珊,问,怎么回事?

邓宝珊吞吞吐吐地说,他在1月16日从林彪手中接过这封信。为什么要接这封信?傅作义狠狠骂了几句,接了为什么不给我看?

邓宝珊心想,能给你看吗?看了,能不能实现北平和谈还难说呢。他说,这信交给傅冬菊了。

傅作义又把傅冬菊找来骂了一顿,说他们误了他的事。

本来,说好在林彪他们入城时,傅作义去城门口迎

接的,因为这件事,他没去。

1月16日,参加第三次谈判的邓宝珊谈妥北和平条件后,准备回城了。林彪在吃完晚饭后,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封没有封口的信,请邓宝珊回城后立即交给傅作义。

邓宝珊在林彪走后,当着苏静的面,抽出信读了一遍,然后对苏静说,这信太严厉。这样交给傅先生,怕已经谈妥的出城改编一事再节外生枝,是不是暂时先别交给傅先生?

苏静没有读这封信,不知道内容。林彪叫邓宝珊立即转交,现在想拖一拖,苏静也没有权利表这个态。

邓宝珊又说,谈得差不多了,万一傅先生看了这封激烈的信,变了卦,他可担不起责任。

邓宝珊深知傅作义的脾气,过去上学时,无论哪门功课都要争取第一名,好胜心极强,又敢于冒险,素有一不做二不休的干到底精神。他现在处于深深的矛盾之中,看了这封数尽他罪状的最后通牒,干脆不出城改编了,战场上拼个鱼死网破也未可知?

邓宝珊把这些话讲给苏静听。

苏静知道,邓宝珊已经从林彪手中接过了信,也答应立即转交,不好再去找林彪,只好通过他来迂回一下。于是,苏静把邓宝珊的意思告诉了林彪。

林彪说,这封信是激烈了一点,暂时不交也可以。他嘱咐苏静不用去答复,先默认下来,过几天谈得差不多了,再说。

第二天,苏静与邓宝珊一起进城。邓宝珊还惦记着那封信,又问怎么办?

苏静因为有了林彪交给他的底,就含糊地说,你看着办吧,你也可以决定。

这样,这封信就暂时没有交给傅作义。

大概是1月25日,中央军委发电给林彪,询问那封信交给傅作义了没有?如果还没交,请尽快交,中央决定在报纸上公布那封信。

苏静向林彪汇报后,林彪把信机械递出的情况向中央军委作了汇报。

林彪认为信与邓宝珊谈话的口气不大协调,对是否递出通牒踌躇。最后考虑时间所限,乃机械递出。并且告诉苏静可在入城途中,以个人谈话的方式要邓宝珊考虑对事态发展的有利办法,是否可先与傅作义谈。如一切顺利解决,则不交出通牒,如谈无效再交出。

因为苏静进北平没带电台,林彪也搞不清那封信交了没有。所以,他通过傅作义留在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电台往北平发报叫苏静立即来一趟。

这时,平津前线司令部已从蓟县孟家楼前移到通县的宋庄。

那封信交给傅作义了没有?苏静刚一进门,林彪就急切地问了一句。

苏静说他也不知道交了没有。

林彪顿时显得很着急,叫苏静赶快回城。他说,快去快去,如果邓宝珊没交这封信,务必叫他在今明两天

交出去,否则就不好了。

至于为什么不好,林彪没有说。

苏静不敢耽误,立即进城去找邓宝珊。

邓宝珊不在。

苏静好不容易问到邓宝珊在亲戚家,赶紧去找,总算找到了。

那封信交给傅先生了吗?苏静劈头就问。

邓宝珊没有说话。

苏静知道他还没给,就告诉他,你赶快给。

邓宝珊以为北和平的协议已经由傅作义签字,一切大功告成,那封信就自动作废了呢。没想到解放军还是坚持要递交通牒。他不理解,又不好明朗地拒绝,只好不说话。

苏静有点着急,催促邓宝珊,如果你还没有交信,我陪着你,我们一路把信给傅先生。

邓宝珊勉强答应。

苏静认为这下邓宝珊该把信面交傅作义了吧?没想到,邓宝珊一进傅作义的办公室,把苏静交待给傅作义,他就到后面傅作义女儿傅冬菊的屋里去了。

傅作义不知苏静他们来的目的,以为就是一般做客,就与他说起一些与客人常说的客套话。

苏静暗暗着急。

邓宝珊呢?还是不敢交信,他去托傅冬菊转交。傅冬菊读了信,也吓了一大跳,也不敢交。邓宝珊说,不交恐怕不行。两个人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商量来商量去,决定把信放在傅作义的办公桌上。

这样,傅作义没见到。后来,冷不丁从报纸和广播中知道了这封信,傅作义能不火冒三丈吗?

傅作义向陶铸提出要见毛泽东

傅作义骂完傅冬菊,立即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说,我既然是战犯,你让我干嘛我干嘛。你让我投监我立即自动投监,反正现在北平的监狱全空了。他一口气写满了两张纸。还没等墨迹干掉,傅作义就叫周北峰把信送去。

当天下午,陶铸来了。

陶铸个子不太高,穿一身棉军装,扎了个腰带,挺土。这时陶铸作为东北野战军的代表已经入城好几天了。他进来时,北平守军还没有全部开出城外。

陶铸以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的身份与傅作义交谈了一会儿。

傅作义提出要见毛泽东。

他的这种思想状况反映到西柏坡,毛泽东叫林彪他们先与傅作义谈一谈。

1949年2月8日,林彪、聂荣臻、叶剑英以及苏静等人请傅作义在北京饭店吃了一顿饭。他们边吃边谈,

主要谈话者是林彪。

事后，林彪给中央一封电报，报告他们谈过了。中央军委紧接着来电要他们把详情报来。这样，林彪给中央发了一封长达千余字的电报，详细叙述了他们跟傅作义谈话的经过。

林彪说，北平和平解决，这个文化古都没有遭到破坏，傅先生是有贡献的。共产党决不会亏待对革命事业有贡献的人的，对傅先生也不会例外。

林彪还说，我们的理想是建立革命政府，发展生产，这必须党内与党外共同合作才能办到，我们也愿意傅先生和我们共同合作。

傅作义也比较坦率地说，过去内心矛盾很大，主观上有心替人民办事，客观上却成了有钱人的保镖。我参加国民党进行的内战是错误的，这是在人民解放军打下沈阳以后我才认识到的。

傅作义认为仗不应该再打下去了，但是，不打又怎么办呢？他谈了他的苦恼，他的想不通。他说，林彪将军你岁数比我小，经历也远不如我，为什么是你林彪将军胜利而不是我胜利？

林彪说，华北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这里的原因不是我个人的，也决非个人才能问题。你也不是败在我林彪手下，你是败在人民解放军手下了。国民党违反人民的利益，为人民所反对，必定失败。在任何战场，在任何人指挥下，均无例外地要遭受失败，非仅华北一处如此。

林彪还说，战争的胜负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人心的向背。即使不是我林彪，换了别的人，国民党在东北、华北还是不行，还是要失败。因为国民党脱离了广大人民，与人民为敌，失败是历史的必然。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才会胜利。

接着谈到1月16日那封信，林彪说，我们共产党办事，一是一，二是二，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那封信是合乎你过去的事实，事后公布这个通牒，乃是将你过去的错误作个结束，以便根据北平和平解放，开始与你进行新的合作。过去我们有过不愉快的历史，现在我们重新开始。既不因为你过去之罪，抹煞今日之功。当然也不会因为今日之功，而含糊过去之罪。我们并没有跟你算总帐的意思，你现在做对了，我们是欢迎的。

傅作义说，过去我对你们民主缺乏了解，今后愿为人民服务，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对于部队改编和政权接收，你们不要有顾虑，怎么办好就怎么办。

林彪说，傅先生，你这样说很好。

叶剑英也对傅作义所谈的对北平政权移交的态度表示钦佩。并且说自我批评也是很需要的，我们工作上有不妥之处，我们自己批评，也希望傅先生批评。

邓宝珊陪傅作义一同赴宴，他表示他的心与人民解放军完全一致，虽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今天谈话把一切问题都说清楚了，他很满意。

席间，大家频频举杯，气氛热烈。

苏静注意观察了一下傅作义，很难说他经过谈话就显得很高兴，尽管林彪请他吃饭是为了让他高兴。

后来，傅作义在西柏坡见过毛泽东后，才真正比较高兴起来。

[责任编辑：穆图]

北宋大臣司马光与王安石同仕一朝。司马光是列宁称为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变法的激烈反对者。他与宋神宗谈话时，是怎样议论甚至诋毁王安石的？宋神宗又是怎么处理这两位爱臣之间的矛盾的呢？请看本文——

今

年1月22日，我到日本东京内阁文库查阅海内孤本《司马温公全集》，意外发现未曾披露过的司马光的作品《手录》和《目录》，2月26日日本《每日新闻》报导了这一发现，香港《大公报》、《报刊文摘》转载，已引起宋史界的关切。在我有关的书稿整理发表之前，为让《炎黄春秋》的读者们先睹为快，拟在这里介绍一下《手录》中司马光所记他与宋神宗的谈话，从谈话中，我们可以真切地了解到皇帝怎样和大臣议政，可以看到二人不同性格和特点，体味君臣的关系，为我们留下许多耐人寻味的思考。

一、谈话的背景

司马光和宋神宗对话的时间在熙宁元年至三年。熙宁元年(1068)，宋神宗21岁，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也是中国古代经济、科技、文化最为发达的王朝，然而，它在军事上却是弱国，每年需向辽和西夏交纳大量钱、帛，以换取和平，而纳贡以及庞大的军费和官吏的开支又导致国库空虚，为了改变这种贫弱局面，收复燕云失地(今京津唐地区)，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实行变法。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法，设置变法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大力引进拥护变法的少壮派，撤换不同政见的官员，控制舆论，科举考试以王安石等所撰三经新义为准。这些措施损害了一些官员的利益，违背了较为民主的传统，引起许多官员的反对。如何正确对待不同意见，成为宋神宗最为焦虑的问题，也是他与司马光谈话的中心。

司马光比神宗大29岁，是个正派、清廉的儒生，治学严谨的史学家。神宗之父英宗本来不是皇子，后立为太子，与司马光多次向仁宗进谏有关，神宗对他有敬重之心、感激之情，愿意与他商讨朝政大事。司马光与王安石私人关系很好，都想治理好国家，但方法路子大不一样，王安石主张大改大变，司马光主张稍作修补，王

司马光与宋神宗

密谈实录

李裕民

重在开源，光重在节流，王用人看观点是否和自己相同，不强调人品，而光首先强调人品，王排斥不同政见，光则强调民主，两人关系渐趋紧张，神宗很想同时重用两人，却又不得不在两人中作痛苦的抉择。

二、评论大臣

熙宁二年(1069)10月3日，宋神宗任命陈升之为宰相，下诏后，问司马光：外边对此有何议论？

光说：陛下擢用宰相，臣愚贱，怎敢议论。

神宗：你谈一下吧！

光：现在已经下诏，臣说有何用呢？

神宗：虽然如此，你还是说说吧！

光：福建人狡险，楚地人轻率，现在两位宰相都是福建人，两位参知政事都是楚地人，他们必将引用老乡，充塞朝廷，天下风俗怎能变得更醇厚？

神宗：现在大臣中没有更合适的人选，唯有陈升之有才智，通晓民政边事。

光：升之确有才智，但恐怕碰到大事未必经得起考验，汉高祖用鲠直的王陵作右丞相，又用多才智的陈平去辅佐；宋真宗用有才的丁谓、王钦若为宰相，又用正直敢言的马知节辅佐。凡是才智之人，必须有忠直之人从旁制之，这是明主用人的方法。

神宗：对，升之的毛病，朕已经告诫过了。

光：富弼为人老成、有威望，离开相位，太可惜。

神宗：朕曾极力挽留，是他坚持要走嘛！

光：他所以要调任地方官，是因为他的意见未被采纳、与同事意见不合之故。

神宗：如果他真有作为，因朕不听从而去是可以的，自他担任宰相后，没有新的作为，只知调走，还说虽然看到国家大事，也不想参与，那就只好批准他调任

了。

神宗又问：王安石这个人怎么样？

光：有人说他奸邪，太过分。他的毛病只是不太懂事，又很固执。

神宗：韩琦敢作敢为胜过富弼，只是太倔强了。

光：琦有忠于国家之心，短处在于不敢抵制错误的东西，反而顺着它。

神宗又问了几个大臣，当问到吕惠卿时，光说：惠卿是个巧伪人，王安石信用他，才受到舆论的谴责，近来，他的越级提拔，大家非常反感。

神宗：惠卿应对明辩，也还象个美才。

光：惠卿确有辩才，但其心术不正，陛下可慢慢考察他，汉朝红充、唐代李训如果没有才，怎么能说动皇上呢！

神宗又转移话题，谈到负责提意见的台谏上。光说：台谏是天子的耳目，陛下应当自己挑选，现在凡是敢给掌权者提意见的都被赶走，全换成掌权者的亲信，臣恐怕皇上会受到蒙蔽。

神宗：谏官难得，卿可推荐一些人。

事后，司马光推荐了苏轼等4人，称苏“晓达时务，劲直敢言”。

三、讲《通鉴》后的对话

熙宁三年(1070)4月24日，司马光在迳英殿，为神宗讲解《资治通鉴》，讲到汉代贾山上奏直言时，强调从谏之美和拒谏之祸，指出近来掌权的大臣凡逆己者贬官，顺己者越级提拔，这样，拍马的越来越多，正直的愈加疏远，这可不是庙社之福。

神宗：如果台谏官欺罔为谗，怎能不调走？

光连忙说：刚才是讲课顺便谈到，当今时事，臣不

敢论。

讲完课，神宗留下司马光，对光说：吕公著说，要动用晋阳的兵马，清君侧。这难道不是谗言？

光：公著平日和我们说话，常三思而发，为何在帝前随便这样说，大家都怀疑，这不象是公著的话。

神宗：这就是《尚书》里说的“静言庸违”（言行不一）嘛！

光：公著是有罪，但不在此，而在以前，朝廷让他推荐台谏官，他却全推荐条例司中的官员。使他们势力膨胀到这个地步，现在迫于公论，又说他们不好，这才是他的罪。

光问：公著与韩琦是亲戚，为什么要说那样的谗言？

神宗：这不是对付韩琦，而是想清君侧。

光：从诰词看，是谗韩琦。

神宗：王安石不爱官职，可称为贤者。

光：安石是贤，但太固执，他不应当信任吕惠卿。以致天下骂安石为奸邪。

说到这里，神宗笑了。

光问：李定有何异能而超级提拔？

神宗说：孙免和邵亢推荐他，朕召见他，发现他有经术，所以给他言职，试用一下。

光问：宋敏求退回李定的任命书，为什么要免宋的官职？

神宗：敏求免职，与李定事无关。朕命他起草吕公著诰词，提到“兴晋阳之师，除君侧之恶”，曾公亮不同意这样写，敏求不遵从圣旨而听公亮之言，只能“援据非宜”而已。

光：公著即使说过那样的话，不过是要求听从韩琦的意见，取消青苗法。话虽过头，可以谅解，现在写到诰词上，让天下人都知道，皇上如泄露君臣间谈话内容，作为罪状，今后臣下谁敢为陛下“尽言”？

神宗：有人写谤书，说“天不保佑陛下，以主没有儿子”，有人说是卿所写，也有说是韩琦。

光：臣上的书，陛下都见过，臣从来没有给别人看草稿。

神宗：是的，卿说的，外人不知道，但台谏的话，朕尚不知道，而外界已广为流传了。

光：陛下应该审察是非，现在条例司的措施，只有安石、韩绛、吕惠卿认为对，天下都认为非，陛下难道只和这三人治理天下？

司马光说完，便告退回家。

四、司马光要求下放

熙宁三年8月8日，宋神宗在垂拱殿召见司马光，

光要求离开政府，出任地方官。神宗说：卿怎能出外，朕还想重申上次旨意，命卿升任枢密副使，卿应当接受。

光：臣旧职都难以再任，要求下放，怎能再进用？

神宗问：为什么？

光不直接回答，只说：臣必不敢留。

神宗沉吟好久，猜到司马光是为避开王安石才要走，便点破此事，说：王安石和卿关系一向不错，卿何必自疑？

光：臣一向与安石不错，但自从他执政以后，和他观点不同处甚多。现在苏轼因为观点不同，得罪安石，平日节操都被诋毁，几乎被法办。臣不怕贬官，只想保全自己节操。臣和安石关系不错，但还不如吕公著与他密切，安石当初推荐他，后来又贬斥他，同一个公著，为什么前是而后非呢？

神宗：安石与公著如胶似漆，以后公著有罪，安石不隐瞒其恶，这正表明安石有至公之心。

神宗又说：青苗法已取得明显效果。

光：此事，天下都说非，只有安石之党以为是。

神宗：苏轼不是佳士，韩琦送他银300两，他不接受，却去贩卖盐和苏木、瓷器。

光：凡谴责人应当考察具体情节，轼真要爱财，应当接受赠银，它比贩盐等小利要大得多，安石一向讨嫌苏轼，陛下岂能不知？他以亲家谢景温为鹰犬，使他攻臣，臣岂能自保，不可不早点离开都城。再说，轼虽不佳，总比不服母丧的李定强，然而安石喜欢李定。总想提拔李定当台官。

五、余论

上面所记司马光与宋神宗三次对话，象是知心朋友谈心，神宗没有摆一点帝王盛气凌人的架子，司马光也坦诚相见，敢于陈述不同意见，绝无奴颜媚骨。这种相当民主自由的讨论朝政大事，在其它朝代尚不多见，而在北宋，则几乎成了传统。例如，寇准有一次向宋真宗上奏，真宗听得不耐烦，便宣布退朝，离座而去，寇准一个箭步上去，扯着他的衣角，说：回来！臣还没有说完，真宗只好回到龙座，忍着性子听下去，最后觉得寇准所奏有理，点头同意了，这是何等胸怀！再举一例，宋仁宗应张贵妃请求，一口气封了岳丈4个官衔，当即被包拯等人以不符合祖宗之法驳回，仁宗返宫后，贵妃问起加封事，仁宗指了指脸，别提了，他们的吐沫都溅到脸上来了。这类事，要放在明清，早就把敢犯龙颜的人折磨得没命了。我想，政治上的相对宽松、统治集团内部的民主气氛，这应当是宋王朝在经济、科学、文化上居于中国封建社会高峰的重要原因吧。

〔责任编辑 卢弘〕

神农架,是牵动着华夏五千年历史的一个梦吗?炎帝神农氏,这位中华民族农业文明的开山祖留给今人一个怎样的背影?一名来自神农架林区的学者,向我们全面而深入地介绍了神农氏、炎帝文化与神农架不可分割的联系。

神 农 氏 与 神 农 架

尹笋君

神农架——多么美妙、神奇而独具魅力的名字!鄂西神农架不仅以其古老的历史、浩瀚的林海、珍奇的物种、壮丽的风光、古朴的民俗风情、诡谲的自然奥秘而蜚声中外,被誉为“绿色宝库”、“动植物王国”、“科学迷宫”、“中华国宝”,而且,神农架还是中华民族的始祖——炎帝神农氏长期活动、为民造福的圣地,成为海内外十多亿炎黄子孙非常向往的“洞天福地”。它的神话色彩,令多少人梦牵魂绕!

神农架的名称是怎么来的?

神农架的称谓较多,仅笔者收集的名称就有神龙山、神农山、神农架山、老君山、南山、景山、熊山、太阳山、野人山、木城、森林架、巴山老林、南山老林、中央山地、华中屋脊、华中第一峰、一万英尺之巅,等等,多达20余个,其中有的是借代名。

1970年划归神农架林区行政区域内的房县、兴山县、巴东县所在地,自三皇五帝至西周分别为彭部落方国、后夔国、康君国地,春秋时属麇、庸二国和夔子国,公元前634年楚灭夔后至战国时期属于楚国。由此可见,春秋之前,神农架所在地属于多国之间的边缘地区,是“蛮荒之地”中的孤岛;加上这一带千里高山,人迹罕至,长期处于原始封闭状态,成为被遗忘的角落,或可望不可及的洪荒之地,使倾国倾城的神农架“藏在深山人未识”,宛若虚无缥缈的仙海市。

神农架最早的名称,被称为“熊山”。《山海经·中次九经》云:“又东一百五十里,曰熊山。有穴焉,熊之穴,恒出入神人,夏启而冬闭……熊山,帝也”(从王念孙校)。一些学者认为,《山海经》讲的“熊山”,从名称、地望、方位来看,即今神农架。其中的“神人”,是屈原《山鬼》诗中的“山鬼”,即今轰动全球的神农架高大的“野人”。“熊山,帝也”,是说神农架是古代帝王的圣地,这位帝王,当指炎帝神农氏。

《史记·楚世家》记载:约公元前11世纪,周成王曾将熊绎封于楚,“熊绎辟在荆山,萑露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左传·宣公十二年》也很赞赏楚先王熊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苦创业精神。当时的荆山,包括今神农架林区全境及房县、兴山、巴东、秭归。“筚路蓝缕”这句成语,是说架柴车穿破衣去开辟土地,后形容创业艰苦。

熊绎如此,而比熊绎早两千多年的神农氏,在此创业肯定更为艰险。神农架作为神农氏驾临、创业的领地,其地位是崇高的,“神农架”名字本身就寓意着神农氏当年在神农架、鄂西北一带万山丛中披荆斩棘、搭架采药的艰苦历程。

“神农架”的名称是在清代正式见诸方志的。清同治年间编纂的《兴山县志》云:“老君山其最高处曰神龙架,悬崖削立,林木蒙茸,人迹罕至”、“神龙架终年有积雪。”随后出版的《湖北通志·舆地志·山川四》也有类似记载。民国初年重修的《兴山县志》则说:“县西北之神农架,县境第一高山也,神农山脉出自四川……入县境为神农山,一名神农架山。”“最高处曰神龙架”,就是指今神农架林区老君山(主峰海拔2936米),西面的神农顶(海拔3105.4米),大神农架(海拔3052.7米)、小神农架(海拔3005米)等高峰。

学术界认为,“神龙”即“神农”,“神龙架”即“神农架”。“龙”与“农”谐音,有时通假。中国是龙的故乡、龙的国度,同时又是悠久的农业之国;而神农氏是中华民族始祖,是农业之神。

炎帝神农氏是我国远古传说中的神龙皇帝,而在中国正史中也有一位“神

龙大皇帝”，他就是唐中宗李显。李显也在神农架一带长期生活过，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资治通鉴·唐纪》记载，李显是唐高宗的第三个儿子，公元683年嗣位，685年被武则天废于房县（地域包括今鄂西北房县及神农架大部分地区），在此整整居住了13年。李显在705年复位，改年号为“神龙”，自命为“神龙皇帝”。李显之所以这样做，无不与他景仰神龙氏、长期生活于神农架有关，意在表明他顺应上天安排称帝，是再现上古时代的“神龙皇帝”。李显有可能认为：历史上复辟的皇帝极为罕见，像他这样失位21年后复位的皇帝，古今中外绝无仅有。若不是他到神农架长期居住、生活过、并得到神农氏在天之灵的庇佑，能复位吗？

“神农架”，由此又可解释为神龙皇帝——炎帝神农氏和唐中宗李显驾到的地方。“架”、“驾”二字在汉字中是可以假借，通用的。

神农架之“架”字，除了上述“驾”字的诠释外，还有“搭架采药”、“架木为巢”、“架木为屋”、“架木为城”、“（城：木城）”、“架木为坛”（祭祀之用）、“架木为梯”、“架木为桥”、“架柴车穿破衣以启山林”、“稼穡”之“稼”等多种含意。至今，神农架林区以“架”字组名的古老地名还有黄连架、架上、雪架光、龙架垭等；以神农尝百草的传说故事而命名的古老地名则有百草冲、百草垭、百草园、百草坪等二十多处。

神农氏与神农架的传说

炎帝神农氏是传说中上古时代三皇五帝中的一位贤圣的帝王。我国许多史籍，如《左传》、《礼记》、《汉书》、《荆州记》、《帝王世纪》、《水经注》、《括地志》、《汉唐地理书钞》、《路史》、《大清一统志》等，都认为炎帝神农氏的出生地是厉山、列山或烈山，（即今湖北省随州市厉山镇）。相传，神农氏生于厉山镇南九烈山第五座山头半山腰中的神农洞。神农洞的附近有古庙一座，内供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的塑像。随州市厉山镇距神农架林区只有两百公里，前者是神农氏故乡，后者是神农氏长期生活的地方。至今，两地的民俗风情、方言、有关神农氏的传说故事，都大抵相似，都是炎黄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神农氏真的到过神农架吗？

民间传说，远古时太上老君曾从天宫来到此地炼过长生不老仙丹，与炎帝神农氏一起建起冶金炉，冶炼铜铁打制农具，为民造福。后来，人们就在这里修建了老君庙（老君观），供奉太上老君神像和神农像，此山便称为老君山，比老君山更高的山就称为神农山。这件事说明，在人民心目中，神农氏的贡献远远超过了天上的神仙。可惜，这些庙宇奇观均毁于近代。使人感兴趣的是，通过近些年的考察，神农架的老君山到宋洛河一带几十里山林中，果真蕴藏有丰富的铜矿、金矿、铁矿等，并且发现了一些古人在此开采冶炼矿物的遗迹。传说与现实，基本证实了远古时代神农氏前来神农架冶炼

铜铁打制农具一事并非完全虚构。

传说中的神农氏是什么样子呢？

1985年秋，笔者陪同文物工作者来到天门垭、留香寨考察，在留香寨下两公里处的红河村，发现了一座神农氏骑仙鹤上天庭的清代石刻雕像，令人啧啧称奇。一些史籍方志描写炎帝神农氏的形状是：身長八尺七寸，声音宏亮，额角很宽，眉棱圆而突出，胡须很多，鼻子很大，嘴唇很厚。这些特征正好与这幅骑仙鹤的神农氏的石刻像完全相同。

《史记·补三皇本纪》则记载：“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媧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人身牛首。”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云：“炎帝神农氏人身牛首。”北魏酈道元《水经注·沔水》记述：“（沔）水西径厉乡南，水南有重山，即烈山地。山下有一穴，父老相传云，是神农所生处也，故《礼》谓之烈山氏。水北有九井，子书所谓‘神农既诞，九井自穿’，谓斯水也。又言‘汲一井则众水动’。”

以上史书记载，也与神农架林区的考古发现不谋而合。1985年，文物考古工作者来到燕子垭、留香寨北麓的官封乡塔坪村，对当地一座古塔遗址进行了清理。当地老人说，此塔系6棱9级宝塔，名曰“神农塔”。一说是远古时神农氏所建，一说是唐中宗李显被贬房县时所建。据说宝塔原有9座，到了明清时代只剩1座。宝塔附近有9口古井，9井之水相通，汲1井则众井水动。

这座宝塔系清乾隆56年补修，补修时所立的碑石至今犹存，但该塔始建年代却无从查考。考古人员在塔基房找到了一块“人身牛首”的神农氏砖雕像，系古塔上的装饰部件，长28厘米，宽16厘米，厚11厘米。它的发现，引起了许多专家的重视。

神农氏为何被刻画为“人身牛首”的形象？

神农时代的《扶犁》、《丰年》皆与牛相关，牛是农民的宝贝，也是勤劳、丰收、富裕、安居乐业、为民造福的象征。神农塔砖雕及史籍中将神农氏喻为牛的头、人的身子。笔者认为起码有三种含义：其一，神农氏发明了耒耜、牛耕、稼穡，是农业之神；其二，神农氏与耕牛一样，任劳任怨，勤苦劳作，一心只为百姓造福，为民多作奉献，舍身忘己；其三是原始社会里牛的图腾信仰。在上古时代生产力很低的情况下，人们依靠牛、热爱牛、崇拜牛，是天经地义的。所以，古籍和民间传说中以及神农塔砖雕中认为神农氏是“牛首人身”，也就理所当然，不足为怪了。

神农架民间关于神农氏的传说很多。故事大多反映这样的内容：他架木为巢，供老百姓居住；他搭架采药，编写药书，为民治病；他斗凶兽、惩恶人，弘扬人间正气；他教民稼穡、养蚕、种树、采茶、纺织、制陶、制耒耜、饲养禽畜、创集市贸易、作琴瑟、创歌舞，与民同乐，创现太平盛世。

人们传说，神农氏为了抢救四方患病的百姓，不畏艰险，赤脚踏遍了神农架的山山水水，寻求治病救人的

良药。有一些珍稀药草生长在悬崖绝壁之上，“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险恶的地势吓不倒神农氏，他勇敢地攀藤附葛、伐木搭架而上，终于采集了许多仙草妙药，救活了许多病患者的生命。

据1979年出版的《神农架》资料集记载：神农氏在神农架采药时，登上仙境之称的燕子垭、天门垭，继而又攀登回生寨，以便将回生寨的七十二种还阳药记入他的紫竹筒——《神农本草经》。据说这回生寨的还阳药能起死回生，当神农氏在跨过回生寨中一座独木小桥时，不慎将《神农本草》竹筒失落桥下。此桥因而得名“失书桥”。神农氏正处在惋惜为难之际，忽然从碧空飞来一群白鹤，把他接上了天庭，成了“药仙”。回生寨从此一年四季香气弥漫，遂改名“留香寨”。如今，燕子垭、天门垭、留香寨（又叫刘享寨），是神农架林区三处紧连的著名风景区。这里奇峰崔嵬，直插蓝天，云蒸雾绕，奇禽异兽在枯藤老树、奇花异草间出没。人若身临其境，如入洞天仙境。

神农架的宝藏

在神农架，有一个流传极广的故事：一次，神农氏采药尝百草时中毒，生命垂危，他顺手从身旁的灌木丛中扯下几片树叶嚼烂吞下去，以解饥疗渴。不料奇迹出现了，这几片树叶救了神农氏的命。于是，神农氏将这种树叶命名为“茶”，并倡导植茶、喝茶。有学者长期以来认为，中国的野生茶树分布于云南，神农架不可能有。所谓神农氏在神农架遇茶解毒的传说是无稽之谈。

然而从1987年至1990年的国家“七五”期间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神农架作物种质资源考察表明，在神农架林区红花乡、下谷乡和兴山县万朝山等地的原始森林中有大量野生茶树，最大的达3米多高，属野生灌木型大叶茶，是我国出现的野生茶树的又一新类型。这个发现并使我国野生茶树起源地由北纬22度的云南省红河流域大大延伸到北纬31度的神农架，向北推移了数千公里，立即引起了国内外科技界的瞩目。这个发现还为远古时代神农氏采药中毒时用茶叶解毒的记载与传说提供了可靠的佐证。

民间传说还认为，神农架有“帝女桑”即特大野生桑树，神农氏之妻借此树养蚕织布。这种传说同样吸引了人们前来神农架探谜：神农架，真的有野生大桑树吗？

的确。神农架作物种质资源考察队1986年以来在神农架林区，多次找到了我国过去尚未发现过的特大古老原生桑树，树龄分别达到800年和500年；发现了桑椹长度是普通桑椹2.5倍的果、桑兼用的桑树；甚至发现了无籽桑树，该树高达9米，桑椹果呈圆柱形，椹无籽，汁甜蜜。这三种桑树可列为中国之最或世界之最。

神农架作物种质资源考察队的总顾问、70高龄的

研究员彭启元认为：“神农架，神农架，顾名思义，就是古代神农氏尝百草传稼穡之处，是古老的种质资源中心之一。”

《神农本草经》记载有紫石英、赤石脂、朴硝、滑石等矿物药，认为具有无毒、养精神、补不足、益气明目等功能，“久服通神明不老”、“轻身延年”，“补髓益气”、“轻身神仙”。这些矿物药均已在神农架林区发现，水晶、冰晶石、冰淋石等在神农架的蕴藏量甚丰。其他如火芝（灵芝的一种）、柏实（柏树籽）皆为神农架特产。

《山海经·南山经》所载的“堂庭之山，多木，多白猿，多水玉”，中国之大，恐怕只有神农架与之相符。水玉，即水晶椈木，指蔷薇科的花红、海棠、山楂等，这些野生的“椈木”，在神农架有大面积的群落。白猿，即白色猿猴类动物，神农架林区已多次发现过白猴、白色金丝猴、白毛“野人”。神农架是“世界白色动物之乡”，早已驰名中外。

在神农氏的故乡——随州房山，以及神农架等民间，一直流传着独角兽麒麟或药兽白熊协助神农氏尝草辨毒、采药治病的故事。

令人惊异的是，独角兽麒麟和药兽白熊这两种传说中的神奇动物，至今仍生活在神农架。《兴山县志》、《归州（秭归）志》记载当地清末还发现了独角兽或麒麟。新中国成立四十年来，神农架多次捕获过白熊，多次发现甚至打死过独角兽麒麟（见1987年7月1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神农架发现的两种独角兽（麒麟）》）。这两种奇异动物的发现均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而且与民间传说、史志记载互为印证，启迪人们去思考、推断炎帝神农氏的史事。

1984年以来，在神农架发现了汉民族首部创世史诗《黑暗传》和清代木刻珍本《太阳经》、《太阴经》、《太阳太阴经》、《灶王本愿经》、《灶王新经》，此外还发现了《神农传》、《三神传》、《女娲尊经》等民间神话唱本。这些流传至今的大量手抄唱本及木刻珍本，绝大多数与炎帝神农氏有关。《黑暗传》中，仅叙述炎帝神农氏的诗句就多达150多行，比我国有关史籍中记载的炎帝神农氏的内容更为详尽。《黑暗传》用生动的诗句描述了神农氏的形象：“女娲在位30年，又有神农来出世……神农皇帝本姓姜，指水为姓氏，又称烈山氏，南方丙丁火德王，又号炎帝为皇上。提起神农有根痕，他是少典亲所生，母亲娇氏女贤能，安登夫人女钗裙。配合少典结为婚，生下两个小娇生，长子石莲次神农，烈山之上长成人。神农生下三天能说话，脑壳长角牛头形，五天站立能行走，七天牙齿俱长齐。接了伏羲女娲位，智慧仁义有道君。他今教民耕稼事，女子采桑重蚕织。当此之时瘟疫广，村村户户死了人。神农治病尝百草，编成医书济万民……”

保存到今的炎帝神农的材料既少又零碎，难以勾勒其生平，汉民族创世史诗《黑暗传》如此完整介绍神农氏一生的事迹，更显得极为珍贵。

元戎兼诗人的

黄兴

吴泰昌

辛亥革命期间，涌现出众多文武兼身的先烈。当时与孙中山齐名的黄兴(克强)，是军事行动的重要指挥。为革命工作需要，他的行踪，很带有点神秘色彩，他是神枪手，从海外南洋进出大陆几十次，甚至还乔装过“和尚”呢！

我国现代大画师齐白石在其“自述”一书中，谈到他壮年时在桂林与一姓“张”的“和尚”邂逅相遇的趣事：

有一天在朋友那里，遇到一位和尚，自称姓张，名中正，人都称他为张和尚，我看他行动不甚正常，说话也多可疑，问他从哪里来，经何处去，他都闪烁其辞，没曾说出一个准地方，只是吞吞吐吐“唔”了几声，我也不便多问了。他还托我画过4条屏，送了我20块银元。我打算回家的时候，他知道了，特地跑来对我说：“你哪天走？我预备骑马，送你出城去！”这位和尚待友倒是很殷勤的。到了民国初年，报纸上常有黄克强的名字，是人人知道的。朋友问我：“你认识黄克强先生吗？”我说：“不认识”，又问我：“你总见过他？”我说：“素昧平生。”朋友笑着说：“你在桂林遇到的张和尚，既不姓张，又不是和尚，就是黄先生。”我才恍然大悟。

1907年下半年黄兴为发动钦州、防城起义和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两次去广西。据《蔡松坡先生年谱》记载，是年10月，黄兴变姓名为张愚诚，偕赵声潜赴桂，密计起事镇南关。这就从旁证实了白石老人回忆之可靠。

黄兴在戎马倥偬性命朝夕未卜中，不忘向白

石求画，足见其对艺术之喜爱。他虽事军务，却写得一手好诗词，以清丽婉约之笔，抒发英雄豪迈之情，风格别致，读来感人至深。作品为数不多，大抵写于武昌起义之前，赠送战友，吊挽烈士，感情沉痛悲愤，充分体现了诗人视死如归的革命决心。萍乡、浏阳、醴陵起义事败，挚友刘道一被害，黄兴在日本听到这个消息时，和刘道一兄刘揆一相抱痛哭，当下写了《吊刘道一烈士》：“英雄无命哭刘郎，惨淡中原侠骨香。我未吞胡拔汉业，君先悉首看吴荒。嗷嗷赤子天何意，猎猎黄旗日有光；眼底人才思国土，万方多难立苍茫。”结尾两句，诗人因痛失人才而久久伫立，凝望苍茫大地，一位忧愤深广，胸臆开阔的革命领导者的形象活现在我们眼前。《蝶恋花·赠李沛基》，是一首赠友的佳作：“画舸天风吹客去，一段清秋，不诵新词句。闻道高楼人独住，感怀宜有登临赋！”

“昨夜晚凉添几许！梦枕惊回，独自思君语；莫道珠江行役苦，只愁博浪推难铸！”这首词作于1911年秋，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在香港写给准备暗杀清朝驻粤大员的李沛基兄弟的。下半阙，写诗人得悉李氏由香港抵达广州后自己的思念，他想起李沛基临行时的壮语：“莫道珠江行役苦，只愁博浪推难铸！”行役之苦算得了什么，担心完成不了指派的任務！诗人既勉励战友，又在鞭策自己。1911年4月27日黄兴率众在广州举事，凌晨他向党人写了绝命书：“本日当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这更是一曲激越人心振奋我民族精神的革命赞歌。

神农架发现的《太阳经》、《太阴经》、《太阳太阴经》等清代木刻珍本，则用大量篇幅颂了太阳神和月亮神，表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崇拜日月的传统。我国文化巨擘郭沫若同志生前曾从甲骨文殷商卜辞中考证出华夏先民每天都有礼拜太阳神的仪式，这从神农架《太阳经》中得到了生动的佐证。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湖北省群众艺术馆研究馆员韩致中教授考察鄂西北和神农架时发现，当地山民至今仍存有念《太阳经》、拜太阳神的千古风俗。韩致中教授说：“炎帝就是太阳，也就是太阳神，有时称东君，有时称羲和。崇日为古代楚俗是无疑的。日中古代交流史研究会会长野村孝彦先生正在研究炎帝神农对日本的影响，他最近来访对我说：“日本现在还有人同时敬奉神农氏和太阳神”，由此可见，神农氏的影响早已超过了国界，同时说明民间敬奉神农氏和礼拜太阳神，二者是紧密相关的。神农架林

区不仅有神农山、神农庙、神农洞，而且还保留了太阳山、太阳坪、太阳村、阳日湾等与神农氏、太阳神有关的古老地名。

神农架《黑暗传》、《太阳经》、《神农传》等古代珍本，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从而进一步论证了炎帝神农氏与神农架密不可分的关系。

著名作家柯云路曾感慨万分地说：“这里确实有一种神农气！非神农架三字不能命名它！这儿神神秘秘，这儿原始，这儿自然，这儿深邃，这儿有老神农攀山越岭采集草药的形象，他衣衫褴褛，皮肤黝黑，眉宇凝重，目光炯炯，他弓着腰爬着用大树搭成的架子……”

是啊，神农氏的英名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万古长存。神农架山高水长，林海苍茫，魅力无穷。炎帝神农氏的高大形象，将同神农架巍巍群峰一并凝固在华夏史册上。

〔责任编辑：小玫〕

明末张居正改革

失败始末

黄爱平●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产生过三次大规模的变法改革运动,这就是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宋代的王安石变法和明代的张居正改革。它们分别出现在封建社会的早期、中期和后期,各自反映出封建社会在其产生、发展乃至衰亡过程中所出现的剧烈矛盾和变动。而发生于晚明时期的张居正改革,就是在封建社会走下坡路时,由统治阶级内部的有识之士发起的一场挽救危机的运动。

改革背景：“势不容于不变”

建立于公元1368年的大明王朝,在延续了一百多年之后,至明代中叶,已经犹如一座年久失修的大厦,千疮百孔,破败剥落,呈现出末世之相。土地集中,财政困难,吏治腐败,外患频仍,这一连串的问题纠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冲力,动摇着明朝江山的基石。

明代的土地兼并十分严重,地主阶级贪得无厌,肆无忌惮地侵吞大片的土地。最高统治者皇帝不仅直接占据土地,不断扩大皇庄,而且还把大量的土地作为赏赐之物,分送皇亲国戚,河南开封的周王府曾经一次就得到赏田五十余万亩。

豪强势力则在各地巧取豪夺,霸占土地,致使土地高度集中。这种状况,不仅直接加剧了阶级矛盾,而且还严重影响到国家税收。那些皇亲国戚、勋臣官绅,依仗特权不纳赋税,豪门富户、不法地主则勾结官府,瞒田逃税,使得“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家财政收入每况愈下。与此同时,财政支出却大幅度增加。官僚机构的不断膨胀,加重了政府财政的负担。有增无减的皇室开支,成了填不满的无底洞。

军费支出也十分庞大,北方的蒙古,沿海的倭寇,时常骚扰内地,每有战事,军费开支便直线上升。嘉靖

二十九年,蒙古土默部发兵南侵,一路杀掠,直逼京师,史称“庚戌之变”。这一年明朝的军费开支高达六百万两,超过岁入白银的两倍。出多入少,国库空虚,当时的国家财政,已经到了不捉襟也具肘的地步。国家的状况如此糟糕,处在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的生活,更是日益穷困。失去土地的农民,或沦为佃户,或外出流亡,所谓“到处灾伤,四方盗起”。整个社会如同布满了干柴,随时都有可能燃烧起来。面对这种情势,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却一个个浑浑噩噩,居危而不知危。这些在优裕环境中生长起来的帝王,既无处理政务的实际经验,也无治国安邦的雄才大略,只知吃喝玩乐,骄奢淫逸,视国事如同儿戏。

眼看明朝统治江河日下,愈益衰败,一些有识之士忧心如焚,相继提出除弊兴利的主张,解决当时的统治危机和社会矛盾。嘉靖年间,大臣海瑞首先上《治安疏》,直言贪官横行,民不聊生的状况,要求实行变革。其后,内阁首辅徐阶、高拱也在整顿吏治、裁减冗员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但是,相对于当时沉痾难起的官场痼疾和社会弊病,要求变革的呼声和某一方面的整顿,犹如杯水车薪,远未能解决问题,危机依然存在,并且日趋严重。张居正主持的改革运动,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的。

改革初起：“谋定而后发”

张居正出生于嘉靖四年(1525),二十六年(1547)中进士,从此进入仕途。怀有治国抱负的张居正,十分关心当时的社会状况,嘉靖二十八年,这位年仅二十五岁的翰林院编修就写了《论时政疏》,尖锐地指出当时朝政存在的五大弊病,即宗室恣意横行,官吏素质低下,办事因循拖拉,边防不被重视,以及财政入不敷出。并大胆提出,要去除这些弊病,就必须皇帝亲理国政,接近大臣,广开言路,上下一心。这表明年青的张居正对实行改革已经有了初步的考虑。由于当时世宗一意

修炼,不问政事,朝中大权掌握在奸臣严嵩之手,张居正的抱负无法施展,于是,他闭门读书,研究典故,探索治国兴邦之道,等待时机来临。嘉靖四十五年(1566),世宗去世,穆宗(隆庆)继位。张居正由徐阶的引荐进入内阁,这为他日后掌握大权打下了重要的基础。隆庆二年(1568),张居正再上《陈六事疏》,提出了六条具体的改革方案:一、少发议论,多做实事;二、整顿纲纪,严明法令;三、有令必行,有法必依;四、考核人才,赏罚分明;五、安定民生,与民休息;六、整场武备,激励士气。这些主张大都切中时弊,并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由于皇帝昏庸无能,内阁大臣又多因循守旧,所以张居正的建议仍然是一纸空文,未能得到实施。

在专制主义的封建社会里,权力是至高无上的,要想施展抱负,就必须掌握大权。因此,张居正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内阁首辅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隆庆六年(1572),穆宗去世,临终前,他嘱托内阁首辅高拱以及大学士张居正等人辅佐年仅十岁的嗣皇帝,以维持大明江山。高拱是一个老臣,在隆庆年间的内阁斗争中屡屡获胜,权势炙手可热。但是穆宗死后,他和内廷太监的矛盾立刻尖锐起来。大太监冯保与之早有仇隙,此时双方为争权夺利,冲突更加激烈。不管结果如何,二者必去其一,已经是十分明显的了。张居正当时在内阁位居第二,与高拱也不相和睦。在神宗及其生母李太后的支持下,张居正与冯保联合,挤走了高拱。于是,张居正自然而然地登上了内阁首辅的位置,实际上掌握了明帝国的大权,一场蕴蓄已久的大规模改革运动随之拉开了帷幕。

改革措施:兴利除弊 匡世救时

从隆庆六年(1572)六月出任内阁首辅,到万历十年(1582)六月因病去世,在整整十年的时间里,张居正在全国上下推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

一、整顿吏治,选拔人才。当时官场废弛已久,朝廷选拔官员只重资格,惟看年限,而不问能力,不讲才干,官吏大都无心任事,更不思进取,只知假公济私,敷衍塞责。针对这种现象,张居正首先加强中央权力,严肃法纪政令。他明确规定,中央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必须听命于内阁,各省督抚巡按必须听命于中央六部,各地知府县令则必须听命于督抚巡按,一级服从一级,使内阁能够有效地控制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机构。为有效地扭转官场积淀已久的颓废风气,张居正又制定考成法,把中央要求办理的事情一一登记在案,规定期限,限令完成,并逐月考核,每年总结。失职者罢官降级,尽责者奖励升迁。在大力整顿吏治,加强集权的同时,张居正还果断摒弃以往论资排辈的用人方法,不拘一格,大胆选拔人才。

二、节省开支,去除浮费。明中叶以来,皇帝大都追求享乐,挥霍无度。武宗喜好游玩,世宗醉心营造,穆宗也经常动用库银购置珍宝,致使皇室开支无限增加,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张居正深悉此情,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对年幼的神宗皇帝反复灌输治理国家应该节

俭去奢的道理,并将国家财政的收支情况呈报神宗,力戒其随意挥霍。万历五年,神宗原打算重修太后的宫室,即因张居正的劝阻而作罢。在尽可能节省宫廷费用的同时,张居正还十分注意裁革弊政,堵塞漏洞。明代初年,为方便官员因公出行,政府在各交通要道都设有驿站,来往官员吃、住等一应费用及所需交通工具均由当地就近向百姓摊派。本来驿站的使用有严格规定,但随着法度的松弛和吏治的腐败,许多官员公为私用,大量的非公差人员频繁使用驿站,而一些办理公事的官员,也讲究排场,随意勒索,搞得地方民穷财尽,不少驿站难以维持,名存实亡。张居正重申了使用驿站的各种规定,严禁非公差者使用驿站,对公差者的用度标准也作了限制。他自己则身体力行,亲属外出,都自雇车马,不用驿站。这一改革,不仅恢复了全国的交通系统,而且大大减轻了地方负担,深受民众的欢迎。

三、抑制兼并,改革赋税。张居正改革最重要的内容,是对经济制度的改革。在以农为本的古代社会,田赋历来是国家赋税的主要部分,国家掌握的耕地越多,财政收入也就越高,明朝政府也是如此。然而,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很多土地集中到了豪门富户手中,使得国家所控制的耕地数字由明初的八亿五千余万亩,下降到正德年间的四亿五千余万亩,减少几近一半。明代的徭役又是按人丁分派的,占有着大量土地的豪门和缺田少地的农民都据人丁数承担徭役,这在事实上已经很很不平等,更何况许多有钱有势的地主还利用各种手段,把赋税徭役转嫁到小农的头上。这就造成了社会赋役不均,国家税收锐减的严重问题。为这一问题,张居正不顾豪强士绅的阻挠和反对,力排众议,坚持清理丈量全国的土地,结果查出了二亿多亩隐瞒的土地,从而严厉打击了豪强地主,扭转了财政亏损。在此基础上,张居正进而实行了全面的赋税改革,把各种名目的赋税徭役全部归结在一起,按田核算,统一征收,并允许农民以交纳银两的方式来代替服役,这就是著名的“一条鞭法”。一条鞭法推行以后,占田多的就要多交赋税,占田少的或无田者大大少交,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赋役不均的问题,同时,这一以银两为主要结算单位的征税方法,扩大了货币的功能和流通范围,为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整饬武备,安定边境。张居正十分清楚,一个安定和睦的周边环境,对改革而言,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必需的。当时,明代的两大边患已基本平息,北方的蒙古自隆庆议和后,已息兵止戈,双方转而开始贸易活动;沿海的倭寇经过几次大的扫荡,气势已失,只剩一些余部时而骚扰海疆。但东北土蛮和女真,仍经常侵入边关。张居正把防御的重点放在东北一线,任用戚继光、谭纶等著名将领镇守北部边防,大力修缮边墙城关,加强边防守备系统,在保持强大军事力量的基础上,对边境少数民族实行招抚。与此同时,继续实行与蒙古的和好政策,扩大相互间的贸易关系。张居正实施的这些措施,使边疆出现了军民乐业的安定环境,进一步保障和发展了改革的成果。

张居正所领导的十年改革,成效十分显著。政治局

面有所更新,社会矛盾得到缓解,财政收入趋于好转,国家实力有所增强。业已走下坡路的明朝统治政权,一段时间内又出现了转机。

改革失败:十年经营 付诸东流

然而,张居正的改革,并没有能够持续多久。万历十年,随着张居正的病逝,晚明这场大规模的改革运动,很快成了落花流水。朝廷上下出现了一股清算改革的风潮,张居正所赏识、任用的官员,相继遭到罢职、降级的处罚,而一批原被撤换,排挤掉的官员,又纷纷掌握了实权。不久,清算的矛头就直接指向了张居正。先是赠官被夺,谥号被除,接着家又被抄,亲属也遭到牵连,他的兄弟和儿子,有的入狱自杀,有的发配充军,处境都很悲惨。而张居正殚精竭虑推行的许多改革措施,也都遭到废除,可谓人亡政息,“身后一败涂地”。一度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为什么顷刻之间就夭折了呢?这确实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大凡改革,都是针对当时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对规章制度加以修改调整,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张居正改革的锋芒,主要指向威胁明朝统治根基的土地兼并、赋役不均和吏治腐败等现象,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触犯那些豪门地主、庸官贪吏的利益,遭到他们的抵触和反对。因此,张居正主持的改革运动,也象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改革那样,始终伴随着尖锐的对立和斗争。

清丈土地开始后,那些有权有势的地主,贿赂官府,隐瞒土地,还攻击清丈会导致农户逃亡。张居正不为所动,坚持清丈,规定凡有阻挠清丈者,一律从重处罚。山西代王宗室等人,就是为此而受到严厉处置的。考成法推行后,又有人指责“执事太严”,“时政苛猛”,张居正针锋相对,把反对改革的主要官员,相继撤职、查办。可以说,每项改革措施的出台,都会损害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从而造成改革的对立面。

同时,在改革过程中,张居正与神宗的矛盾,即相权与君权的矛盾也日益尖锐。神宗十岁登基,还只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张居正大权在握,在李太后和冯保的支持下,实际上代行着皇帝的权力。但随着神宗年龄的增长,其独立意识和帝王思想也逐渐滋长起来,日益不满张居正操纵一切的局面,特别是当他追求奢侈挥霍的欲望和要求因张居正的劝阻而得不到满足时,积怨更深。这种不满与怨恨,当张居正独揽大权时,神宗只能隐忍不发,一旦人去楼空,君权不再受到限制,就会

恶性膨胀,为所欲为。因此,张居正去世不久,神宗就借机发难,直接纵容并推动了那些改革反对派掀起的否定张居正及其改革措施的风潮。

如果说反对派和神宗帝的反攻清算造成改革失败的直接原因,那么张居正本人的某些局限和品行,也对改革的失败产生了一种加速作用。作为封建社会后期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张居正自然不能不带有时代的和阶级的特征。他独断专行,刚愎自用,用行政,不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样一来,一些阿谀奸诈的小人往往得到重用,持不同意见者则受到排挤打击。凡是得罪过张居正的朝廷大臣,无一不被降级、罢职,甚至受刑、入狱,招来杀身之祸。这种以一己之好恶、个人之是非为准绳的用人方法,既对改革的进行造成了困难,也给改革的失败埋下了危机。事实上,善于讨好张居正的人,并非都真心拥护改革,如得到张居正提拔重用的张四维,在继任内阁首辅之后,即随神宗亦步亦趋,对改革进行清算。而受到张居正排挤甚至迫害的官员,有的倒还坦诚正直。曾经因激烈抨击张居正而遭廷杖致残的邹元标,就敢于在他人纷纷落井下石之时,肯定改革的作用,并为张居正的平反昭雪积极呼喊。

此外,重权在握的张居正,尽管在晚明的官场中还是比较廉洁,但也并非完全清白。他运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为家人谋求功名,长子为状元,次子在会试中本来名列二甲,神宗任意将其移入一甲二名,张居正也坦然接受。万历以后科场舞弊严重,显官要员的儿子很多成为进士,导致人心不服,议论纷纷,乃至风气败坏,张居正是有责任的。他的家人在湖北老家也横行一方,收受贿赂。张居正十分清楚这种情况,还写信要求当地官员对此严加管束,然而却未能采取什么有效的措施,因此也难免招致他人指责。后人评论说,张居正“功在社稷,过在身家”,是有一定道理的。

领导一场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本来就是满途荆棘,困难重重。张居正本人又独断专行,排斥异己,用人不当,树敌过多,再加之不能严于律己,约束家人,因而其结局只能是人走茶凉,人亡政息,不仅身后声誉一落千丈,十年经营也随之付诸东流。在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走上末路的时代,历史留给张居正的活动舞台实在过于狭小了。张居正的改革,虽然给明王朝带来了短暂的生机,但却无法改变其衰亡的历史命运。改革最终失败的同时,也奏响了明朝政权的挽歌。

〔责任编辑 晓渡〕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中国人凭刻苦耐劳精神不但在异乡扎根生长,还能在当地重现乡土风貌。

走在唐人街,几乎忘却此身在天涯。唐人街比想象中好,干净不杂乱。举目便见中国字,七行八业样样有。

伦敦唐人街的范围较广,什么俚人行,小新港街、爵禄街等,横横直直成了一块唐人区。商店装修富有“中国味”。在此进出的十之八九是华人。上饭店喝茶的多数也是中国人。

而且——一片广东话——外省到此的华人也不得不学广东话。

单单唐人街,就有五十多家中国餐馆。很多人在

伦敦唐人街

此谋生工作,住宿欲在偏远的地方,因为唐人街的房租并不便宜。

唐人街爵禄路旁,建有两个中国庭园式的拱门。上有“国泰民安”四字。

街坊会会长丘添先生说:“该区是经过修整的,不能让老外感到中国人脏乱,还在要此宣扬中国文化,吸引老外了解中国文化。”街坊会每年在此举办新年龙舞会,中秋节,吸引不少老外到此参观。一些无经济条件到中国观光的洋人,可在此了解一些中国民俗民情。

唐人街如“麻雀虽小,五脏俱备”,就是一句英文不懂的人也可以在此生活一辈子。〔香港〕玫林

周恩来 与谢和赓夫妇

●谢和赓口述

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是南京失陷前的1937年末，地点在武汉

那时，我已是蒋介石大本营的秘书兼白崇禧总参谋长的机要秘书。周恩来作为中共派驻国统区的代表，负责着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面工作。我们初次见面，他就象兄长见到小弟弟一般，和我热情握手，亲切拥抱，使我一点不感到陌生和拘束。他的记忆力很惊人，早已从北方党和广西地下党向中央的汇报中，了解了我的经历。知道我在1926年大革命时参加过桂林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时，加入过“社会科学家联盟”和“反帝大同盟”等进步组织；1933年春被北方党派到张家口协助冯玉祥将军筹组民众抗日同盟军，担任过吉鸿昌将军的秘书，由黄埔军校出身的老共产党员宣侠父介绍入党；察哈尔抗战失败后，北方党利用我在广西的社会关系，派我回广西从事桂系上层的地下统战工作。所以，见面后，他详细询问了我在广西和南京做李宗仁、白崇禧工作的情况。我们一谈就是两个多小时。

第二次见面时，周公又把董必武、叶剑英请来一同听我的汇报。他告诉我，在我请示南下工作的方针时，他曾特别指示北方党南汉宸等同志，要我千方百计利用各种关系，争取在桂系上层站稳脚跟，接近李宗仁、白崇禧，秘密进行发动全国抗日宣传鼓动工作。明确指示我的工作是非绝密的，只与宣侠父单线联系，绝不能与广西地方党发生关系，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的政治面目。

当我汇报到已经取得白崇禧的信任，担任了他的机要秘书时，周公马上提醒我，要我在脑子中一刻也不要忘记，我是在人称“小诸葛”的人身边做工作。如果不事事注意，步步留心，那是很危险的，遇事要有勇有谋，做到智勇双全。他还指示我说，虽然是国共合作抗战了，但对过去的

政敌决不可掉以轻心，放松警惕，过去血的教训决不能忘记的。他又以坦荡胸怀指示说，对于李宗仁、白崇禧这些桂系首领，我们要多做工作，争取他们积极抗战，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去。我们党是以挽救国家危亡为己任的，只要李、白决心抗战，不动摇，我们党会不咎既往，和他们很好合作。鼓励他们做爱国者、民族英雄。

我还汇报了大本营国防会议中汪精卫派的陈公博、政学系的张群、张家傲、CC的徐恩曾、张厉生这些人，对抗战前途缺乏信心，连蒋介石本人也缺乏长期抗战的方针。所以，根据党长期抗战的指导思想，我起草了《全体性全民总动员纲领之一——全国游击战争之方案》，呈给了正副总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转呈蒋介石。与此同时，也通过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转呈给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

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同志听了都很感兴趣，让我把打印件给他们审阅。周公等审阅了我的建议书，认为符合中央的抗战方针，内容很丰富具体，方法也很周密，建议我把12000多字的建议书删短成七、八千字的文章，寄给海内外报刊广为宣传。他还亲自用红笔把许多分析敌我力量对比的数字和一些说明抗战必胜的理论部分删去。后来，这个方案在香港《天文台》半周评论上发表了。经过白崇禧的推荐，蒋介石也采纳了这个方案，照我的建议，一起从事游击战的组训工作。我本人马上被白崇禧提升为上校，这样也才可以跟随他参加国民政府每周召开的“总理纪念周”。在周公的指导下，我打响了这第一炮，对我做好统战工作更为有利了。

白崇禧作为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部长，要向军师长以上的集训团发表重要讲话

1938年3月初，有一件十分有趣的事令我终生难忘。白崇禧作为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部长，要向国军师长以上的集训团发表重要演讲，题目是《军队政工与群众政工之关系》。他令我和其他两位同事同时拟稿，限一周内完成呈他。借此，也想考考我们。我连续夜战，写成了14000多字的讲稿，先与王莹商量。她看后说太长了，应当删短。我不知从何着手，突然灵机一动，想到了周公。他当过黄埔军校和北伐军的政治部主任，现在又是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是大内行。我就把讲稿交给李克农，请他转给周公审阅。周恩来认为这对我进一步取得白崇禧的信任很重要，所以在日理万机之中，迅速为我修改。第二天，当我拿到修改后的稿子时真是喜愧交集！他用红墨水笔逐字逐句删去了2000多字，删去的部分是过大地指责国军政治工作的文字。因为白崇禧是以军训部部长的身份讲话，删去了才符合他的身份。周公还让李克农转告我，讲稿中提出的政治训练内容

和方法，不要与我党我军的太相似。我根据周公的指示又重新修改了一遍，誊写清后交给了白崇禧。

训话那天，白崇禧通知我们三个起草人一同乘车前往。我与两位同事并肩坐在车上，心中忐忑不安，不知他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走上讲台，把我们起草的三份讲稿都放在讲台上，也不看一眼就滔滔不绝演讲起来。我仔细地听着，从头至尾他都使用了我们起草的讲稿，心中一块石头才落了地。有党做我的后盾，有周公当我的“改文老师”，使我在白崇禧身边又打响了第二炮。谁能想到，一个国民党军事领袖的重要讲演稿，竟事先得到中共领袖人物亲笔改过呢！难怪事后李克农听了我的汇报，笑容满面地拥抱着我说：“小鬼，你真幸运。有恩来同志做你的改文老师，这也算是国共合作中的一个绝密佳话了。”

周恩来同志长期与国民党打交道，统战工作经验是很丰富的。他对我不光是言传，而且还身教。一次，他与白崇禧途中相遇，同车促膝谈心，对我的教育特别深刻。

那是在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前夕，周恩来和白崇禧相继从武汉出发，经沙市到长沙去。出发之前，白崇禧从军委会总办公厅主任贺耀组那里知道，周恩来将同政治部的高级官员乘车从武汉转长沙去衡山参加军事会议。白率随从自武汉撤退，在离武汉不远的集镇停留时，发现周恩来的汽车也停在那里。白崇禧主动提出要同周恩来同车而行，有事商谈。因为从当时抗战形势看，白崇禧预料到日寇有继续南侵之势，会威胁到广西的安全，他希望中共支持他保住他统治的广西地盘。周公对形势的看法也早已成竹在胸，马上邀请白崇禧坐他的车同行叙谈。他先赞扬广西的军队在台儿庄战役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赞扬白崇禧在北伐时指挥军队一直打到北平的进取精神，因而赢得了“诸葛”的美誉。周公还利用北伐时，在龙潭之役胜利后，国民党行政院长谭延闿先生写的一副对联：“指挥能事回天地，学语小儿知姓名”赠白以示勉励的事，来激励白崇禧，希望他与李宗仁继承北伐精神，抗战到底，一直打到鸭绿江边，做永留青史的民族英雄。

白崇禧听了很受感动。他对周恩来博学多才和大度的胸怀十分敬佩，所以也对周恩来说：“自从广州黄埔建校以来，你是最出色的政治家，对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白崇禧还坦率承认，如果没有中共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合作逼蒋抗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日寇早已长驱直入，深入沿海各省和西南大后方了，后果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周恩来趁机进一步分析形势说，英美两国怕日寇侵华会对其在远东的利益造成威胁，但是又不愿意直接对日作战，国民党领导人物也随时有向日寇妥协的可能，日寇必然会加强与德意法西斯勾结，支持其侵华政策。在这种形势面前，要想战胜日本侵略军，只有国内的抗日力量进一步团结起来。中共是愿与所有坚持

抗日的地方军队合作的,特别希望与广西军政当局和
五路军合作。

白崇禧听了这话正中下怀,当即表示愿意与中共
进行全面合作。他还表示希望中共能派一个有游击战
经验的教官团来,帮助他共同在南岳组训游击战干部。

周恩来爽快地答应了白崇禧的请求,决定派叶剑
英为首的教官团去南岳,从事组训工作。他又趁机问白
崇禧,有没有看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书,告诉他关
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书中都谈到了。

白崇禧告诉周恩来,他在武汉时,我就推荐给他看
过这本书,他十分欣赏毛先生的战略眼光和高见,打算
在训练班开学时,让教育长汤恩伯将此书摘要印发给
军官们学习。

周恩来听了高兴地说:“我一定把你对这本著作的
评价转告毛先生”。接着,他又提出打算在桂林设立八
路军办事处的事,希望白给予支持。为了打消白的疑
虑,周恩来诚恳地对白崇禧说:“我们是你们的好朋友,
办事处主要是与广西军政当局加强联系,我党决不会
挖你们的墙脚,请白先生放心好了。”

白崇禧听了也笑起来,当即表示说:“我们也正希
望与你们加强合作呢。”他说回桂林后要组织“西南行
营”,指挥大江以南各省,正好可以转告黄旭初主席协
助建立,并且保护办事处的安全,在工作上给予必要的
便利,还欢迎北伐时的老朋友叶剑英常驻桂林。

周恩来见大功告成,很高兴告诉白,叶剑英要和他
去重庆,准备让李克农去桂林主持办事处的工作。李克
农曾任过八路军驻上海和南京的办事处处长,是一位
很能干的干部。

白崇禧表示欢迎李克农去桂林。为了表示诚意,他
对周恩来来说,他办公室有一位刘仲容参议,在西安事
变时,曾派他作为广西的代表,到过西安、延安,拜见过周
先生和毛泽东先生。如果李处长有什么事要广西方面
协助,可以直接和刘仲容接洽。

白崇禧说的刘仲容,其实正是我的亲密助手和我
与党组织保持联系的联络员呢。

周公感谢他的一番好意后,觉的互相谈得很投机,
又提出建议说:广西和第五战区应该广为罗致人才,注
意招贤纳士,这对建设广西,复兴中华都是很有必要
的。

白崇禧听了深以为然,他说一定把周先生的建议
转告德公(李宗仁)今后还希望周先生多多指教。

周公也风趣地回答说,今天大家在抗战的旗帜下
工作,你是军委副总参谋长,西南行营主任,又兼军训
部长,我不过是个政治部副部长,你还是我的上级哩!

白崇禧笑笑说,周先生你也太客气了!你是贵党
的代表,是贵党重要的领袖之一,你我只能算是老朋友
罢!

周恩来听了谦逊地回答说,我党的领袖是毛泽东
先生,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本着毛先生和党中央的指示

工作的,算是具体执行任务罢!

他们走了一路,谈了一路。周恩来同志做统战工
作那种真诚平等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循循善诱的方
法,机敏风趣的才智,永远值得我学习,使我获益匪浅!

直到解放后,李克农谈起那 件事,还感到很内疚,要是谢和 赓出了问题,他无法向党,向周 恩来交待

自从在武汉与周恩来第一次会面后,几十年来,我
和王莹一直在他的亲切关怀和热心爱护之中。我们对
我们也可以概括三句话:一是严格要求,决不含糊;二是
想方设法,排忧解难;三是实事求是,公正对待。

1937年下半年,我与王莹在战地前线相会、相识、
相恋。那时候,我知道她是个少年时代就接近中共的进
步演员,也猜想她可能是党内的青年。但她还不知道我
的真实身份,只觉得我除了有才能外,还很热情、直爽、
爱国,没有国民党军官的种种恶习。所以,她和抗日演
剧二队的队长洪深,副队长金山总想做我的工作,让我
多接近当时拥护中共的文化界人士胡愈之、郭沫若等
人。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前夕,她和于立群邀请我去
郭老家聚会。在郭家大客厅里,我见到胡愈之、田汉、洪
深等一些文化界的著名人士,他们正在谈诗论画,挥毫
题字,抒发忧国忧民之情。当知道我也喜欢写字作诗
时,就鼓动我即兴题个字。在于立群、王莹的怂恿下,我
年轻气盛手发痒,便拿起笔在宣纸上写下了“富贵不能
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真理不能离”。几句表达
我修身养性宗旨的话赠给于立群。正在大家拍手称好
的时候,周恩来笑容满面地突然跨进了大客厅。他一对
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扫了大家一眼,又瞧了瞧我写的字,
高兴地同客厅里的人一一握手,但走到我的面前,便冷
若冰霜把脸沉下了,装作不认识似地走了过去,大步踏
进了郭老的内室。当时,我觉得十分尴尬,王莹也感到
莫名其妙。

第二天一早,我就接到了董必武同志的通知,要我
马上去看他。一见面,董老便开门见山地批评我不该到
郭老家去,讲了许多理由,还声色俱厉地警告我:“恩来
同志要我转告你,如果今后再发现你去郭老家,便要考
虑你的党籍问题!”

我连忙向他保证决不再去郭老家。董老见我态度
诚恳,又安慰我说:“你知道恩来同志一向是怎样关心
爱护你呵!你是在‘小诸葛’身边工作,他早就提醒过
你,要特别谨慎小心,一举一动,都要三思而后行。你肩
上的担子十分重,组织上对你过去的工作是满意的。但
决不能麻痹大意暴露了身份,去郭老家的人很杂嘛!”

董老和周公的批评虽然很严厉,但我听了心里觉
得热乎乎的。因为这确实是对我的关心爱护呀!我在那

样的岗位上战斗,如果不是周公这样防微杜渐地不断提醒我,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对我是这样,他对李克农那样身为中共长江局秘书长、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处长的高级干部,也是一视同仁,决不含糊。1939年春天,李宗仁、白崇禧要金山、王莹负责的抗日演剧二队去南洋宣传演出,同时向海外侨胞筹赈支援国内的抗战。这一打算也得到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的热情支持,让李克农负责落实。李克农同志指示我与金山、王莹商量后搞个去南洋演出的计划,交白崇禧审批。计划批下来后,我马上坐车去找金山、王莹,通知他们作出国演出的准备。不想在桂林城内的一条马路上,正好遇见李克农挽着金山、王莹的手迎面走来。我怕暴露与李克农之间的关系,想方设法躲避,没想到李克农看见了我,一时忘乎所以,当着金山、王莹的面,大声招呼我,我只好停下车。他问我计划批下来没有,要我把计划的批件交给他。这样,就在金山、王莹的面前彻底暴露了他与我之间的秘密关系。同时,我也知道了他与金山、王莹之间的非同一般的关系。我和王莹心中都暗暗窃喜,互相识破了庐山真面目。

事后,李克农同志发觉了自己的错误,一方面让王莹转告金山,不要与任何人谈起我们在马路上见面的事;一方面向周恩来、董必武同志作汇报,进行了检查。周公知道后严肃地批评了李克农,指出我是党中央直接领导的绝密党员,决不能把我暴露在任何人面前,尽管金山、王莹两人都是极其可靠的党员,也不应该把我暴露给她们。我要出了问题,要由李克农负责。直到解放后,李克农谈起这事,还感到很内疚,要是我因此出了问题,他都无法向党、向周公交代呢。

周恩来说“真是丈八的灯台,照见了别人,照不见自己!让他们还是好好地做自己应该做的工作吧!是王莹谈恋爱,又不是他们谈恋爱,急什么!”

皖南事变后,金山、王莹率领的剧团完成了在南洋的演出任务回到重庆。1942年春天,在重庆文化界掀起了一股反对王莹和我恋爱的风波。因为当时除了极少数人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外,一般人都以为我是国民党营垒中的人。我是国民党上校军官,又是白崇禧的机要秘书,众所周知白崇禧参与了策划皖南事变的阴谋,人们对我的愤恨也不言而喻。可是,作为进步明星的王莹,却依然和我热恋着,这对一般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甚至无法容忍。王莹在文化界、新闻界、教育界中的一些朋友、同事、老师,出于对王莹的爱护和关心,想方设法劝导她,甚至给她施加压力,要她与我断绝关系。但王莹心里十分明白我的真实身份,采取了我行我素

的态度,既不分辩,也不采纳。这事一直反映到文化界的党组织那里。有人直接去找周公,希望他来制止王莹与我的恋爱。周公早从党内有关人士那里知道了王莹与我恋爱的事,也知道我过去的婚事内情。我原来的妻子是白崇禧夫人马佩璋的表妹,其父是国民党中将,也是广西的一个军阀,是经过马佩璋和她弟弟马仲孚的介绍,硬把我们拉扯在一起的。结婚不到一年,因志向、生活情趣等方面的格格不入,便同室分居了。为了工作的需要,一直没有正式解除关系。所以,当有人去找周公反映王莹与我恋爱的事时,周公巧妙地对文化界党组织的同志说:“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你们要相信王莹,她对事业,对工作一向认真负责,对个人的生活,也是一向严肃认真的,劝同志不要随便说三道四。你们党组织也不要管她个人生活上的事”。

那位同志不理解周公的意思,又提出复旦大学和新闻界的一些教授、朋友,想给王莹施加压力,阻止她与我的恋爱,周公生气地说:“真是丈八的灯台,照见了别人,照不见自己!让他们还是好好地做自己应该做的工作吧!是王莹谈恋爱,又不是他们谈恋爱,急什么!王莹是可以信赖的好同志嘛!”这样才把这场风波给制止住了。

事后,周公分别找我和王莹谈了话,一方面肯定我们的恋爱完全是正当的,希望我们要互帮互学,真诚相爱,不要受社会上各种风言风语的影响。一方面又要求我为了工作需要,不能马上解除旧的关系。忠告我们俩在我的旧关系正式解除之前,决不能正式结婚,也不能同居,只能保持恋爱关系。我和王莹完全遵照周公的指示,从1937年认识起,一直到1950年我正式解决了旧关系止,我们俩热恋了整整13年,才在美国纽约正式登记结婚。我们能够正式结合,是与周公的关怀、帮助、力排众议分不开的。

我和王莹经周公和党组织的批准,于1942年5月去美国留学前,党内外有些同志反对王莹与我一起动身去美国,想出种种办法来加以阻挠。周恩来知道后,亲自过问,先后找我和王莹谈话多次,详细地给我们布置去美国后的任务,提出了在工作中需要注意的问题,生活上要我们互相关心,相依为命,相依革命,勉励我们学好本领,做好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为党争光,为祖国争光。同时,他还亲自找党内的同志做工作,排除障碍,使我们得以双双出国留学。

我们在美国留学、工作的13年中,周恩来同志仍旧常常惦念我们。有人去美国时,他总是带来亲切地问候。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刘仲容奉周总理之命,连续三次给我们写信,催促我们尽快回国,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当时我们正在坚守进步的《纽约新报》这块阵地,一时难以脱身,只好写信向中央说明情况。后来,周公又让李济深、王昆仑写信给我们。让我与《纽约新报》董事会商量,把该报当作民革中央在美洲的机关报,向海

外华侨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团结广大侨胞支持祖国的建国大业。

在《纽约新报》被国民党抢夺走后，当我们处在美国移民局迫害，经济上十分困难的时候，周总理两次派外交部的一位徐同志去美国，向我们转达他对我们的亲切问候，并给我们带去了回国的路费。

1954年，我们准备回国时，又遭到美国移民局的迫害。当加入美国籍的要求遭到我们拒绝后，美国移民局竟先后把我和王莹投入了拘留所和监狱。周总理得知我们在美国受迫害后，马上指示外交部通过第三国向美国进行交涉。最后，不惜答应美国政府的无理要求，用侵朝战争中被我们俘虏的美国战俘，把我们交换回国。

周总理让王莹站在他身边 与大家一起合影留念

总理关心爱护别人，还表现在对别人总是实事求是，公正对待上。

我在美国是专门学习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1957年我在人民出版社整风学习时，对全国特别是首都的城市规划建设向人民出版社的一些领导提出过意见和建议，结果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1958年3月又被下放北大荒农场劳动改造。王莹当时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剧，因我的问题受到株连，被停止了党的组织生活，并逼着她与我划清界线。她只好抱病避居香山，租用一间农民的房子，继续完成我们俩人共同担当的《宝姑》和《两种美国人》两部长篇小说的创作任务。我在北大荒劳动改造了一年多，周总理知道我们的情况后感到很吃惊，对李克农说，谢和廉是个好同志嘛！他怎么被划成了右派呢？他一向忠于党、爱对党的工作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他回国不久，不太了解情况，发表一点偏激意见，也是难免的，不能当右派来揪！快点把他调回北京，让他与王莹团圆。他和董老又多次派李克农、何莲芝同志（董老夫人），到香山探视王莹，了解她的写作和生活情况，劝她好好治病，保重身体，安心写作。又让有关部门在香山找了一处过去富商造的别墅，让王莹搬进去住。王莹深受感动，由衷地写了一首诗寄给我。诗中写道：

教导莫忘周董叶，
热情关怀有克农，
平生最爱是“九秘”，
万苦滴甘也相从。

诗中说的“九秘”是我，因我在国民党中先后给吉鸿昌、白崇禧、李宗仁等要人，以及在大本营中担任过八任秘书，最后又在美国给王莹当顾问，所以戏称“九秘”。

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我很快从北大荒回到了北京。当我们夫妇团聚时，深深感谢周总理那种实事求是、公正待人的精神。这只有心底无私，对同志充满热爱的人才能做到。他不光是对我们夫妇，对其他许多老同志、知识分子、广大人民群众也都是这样做的。所以，他才被称

作人民的好总理。

还记的1960年7月1日，周总理在第三次全国文代会期间，特意在香山饭店邀请电影界的部分人士聚会。他看到在场的人中没有王莹，马上让电影局的领导蔡楚生、司徒慧敏等来到我们家中把王莹接去。还把王莹介绍给大家，说她是我们党内的少年党员之一，是我们党最早派到电影界工作的演员之一。她曾到抗战前线、南洋等地演出，被侨胞们称为“民族之花”、“马来亚情人”、“中华女杰”。她还在美国白宫给罗斯福总统演出过，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周总理让王莹站在他身边，与大家一起合影留念。席间，还专门向蔡楚生、司徒慧敏问起我们在香山的生活情形，我的身体情况，嘱咐司徒慧敏常代他去探望我们。周总理在向大家敬酒时，特地走到王莹身边，对王莹说：“你们在美国工作的情况我都知道，你们做了不少的工作。祝你们保重身体，为党作出更大贡献！”

“文革”中，我与王莹都受到江青“四人帮”的残酷迫害，王莹身陷囹圄七年，于1974年3月3日惨死在狱中。我被关押达八年之久。在被关押期间，有一次我利用写交代材料的机会，把我耳朵听觉和讲话发音都已成问题的情况写进材料里，请“文革”负责人转告周总理。过了一周，守卫的解放军偷偷地告诉我，说总理已下令要把关在狱中的10多人，也包括我在内，调到其他牢房去，改善待遇，由医生给予治病。过了两天，这个消息得到了证实。我们的伙食得到了大大改善，医生还每天来给我们检查身体，治疗疾病，让我们吃人参汤等补药，使我的病有了好转。

1975年7月，我在周总理的直接指示下，得以释放，获得了自由。可是，当我得知王莹已被摧残致死时，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得了精神分裂症，被送进北京安定医院。根据医生诊断，认为我的记忆力不可能再恢复了，成了精神上的残疾人。当时，我还身患高血压、气喘、吐血、全身肿痒、头痛、失眠等6种疾病，可以说是在死亡线上挣扎着。由于周总理、邓颖超大姐和罗青长同志的直接关怀，医院领导、医护人员精心治疗，才出现了人间奇迹，使我在半年之内恢复了记忆力。可是，就在我恢复记忆力的时候，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却在遭受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的阴谋集团的种种惨无人道的摧残和折磨后，终于离我们而去了。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万分悲痛，以及对总理的无限思念之情，写下了追悼他的诗句，聊表寸心。

人间同泣九州哀，
青史永铭大智才，
百炼真情深似海，
遗思能不痛伤怀？

人间自有真情在。

周总理一生实事求是地公正对待别人。人民也实事求是地公正对待他。他的光辉业绩，他的伟大人格，他的崇高精神，必将与世长存，世世代代永远铭刻在亿万中国人民的心中，真正是永垂不朽的。

题图照片： 谢和廉、王莹在纽约中央公园
张志才、陈桂英整理
〔责任编辑：张 蕾〕

民初怪杰杨增新

辛 平 ●

“杨增新学问渊博，眼光远大，心胸恢宏，手腕灵活。如果他生长在欧洲的社会，必是政治上的伟大人物。他是一个代表中国旧社会、旧文化、旧道德、旧传统的最后典型人物。”

瑞典著名学者斯文赫定这样说。那么，杨增新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审 奇 案

一日，官为甘肃省河州知州的杨增新正在后堂批阅文牍，忽闻有人报案，急着官服，升堂审理。报案者为河州乡民，其为谋生计，三年前往迪化（今乌鲁木齐），省吃俭用，一晃三年，攒下银元两大锭而归。河州向为穷乡，穷则思变，时生盗窃。乡民恐生意外，在返乡途中见一大树，枝叶茂密，树冠之中有一鸟巢，心想，此处藏银最为保险，一定无人知晓。于是攀缘而上，将银锭藏于鸟巢，准备过几天再取回。回村后，凡人问起，他便拉下一副苦脸说：“辛苦三年，一无所获。”人们见他家生活并无改观，也都信其所言。某日黄昏后，乡民携妻往取银锭，岂料，鸟巢已空无一物。乡民惊吓之余几乎发疯。幸好其妻是一个明白人，告之：“物既已失，急有何用？不如报官，或可追回银锭。”

杨增新听完乡民的叙述，一时也摸不着头绪，此案一无被告，二无旁证，无从下手。传村民来问，皆说报案者自言，在新疆一无所获。杨增新闻之，更拿不定主意。此案是不是编出来的呢？杨增新想：“观此乡民，似属忠厚之辈，不像刁钻之人，更何况，谎报案情，罪加一等，谅此小民也无这等胆量，看来此事确实不虚。那么……”

杨增新左思右想，终无良策，只得问计于幕僚。有一聪明的幕僚对杨增新说：“老爷可以审问大树，或可找到线索？”杨沉吟良久，忽然以掌击桌说：“就这样，我已经有主意了。”并马上命令张贴告示，定期公审大树，追查赃物。

到了公审的这一天，杨增新命人将公案排于树前，煞有介事地指着大树问东问西。好奇的人们密密麻麻地围观，都想看个究竟。树本无灵，何以对答。杨增新便命差役挥杖击树，说：“速速回话，免叫皮肉受苦。”倾之，叶在杖击下纷纷坠落。这时，只听得人群中有一妇人呼其子：“叶儿快来！你前几日攀登的大树，树叶都让府台老爷叫人击落啦！”杨增新听到此话，马上命人将妇人传于案前，将惊堂木猛击案上说：“具实招来！”妇人跪拜于案前说：“几日前，我儿叶儿牧羊于此树下，闻

树上鸟叫，一时兴起，登树掏了鸟窝，竟在窝中掏出两锭银子。叶儿将银锭拿回家，让我代为收藏。现银锭就在我家中，未动分毫。”杨增新命人将银锭取回，归还失主。

这河州乃回蒙汉杂处之地，民间民族纠纷时起，历任知府都对此束手无策。杨增新吸取前任的教训，兴教育，办水利，建治安，更兼杨本人是一个办案能手，处理案子迅捷，断案比较公正，颇得民心。由此得了一个“杨青天”的美名。

鸿 门 宴

1908年，杨增新因与陕甘总督升台不睦，郁郁不得志，经王树枏向新疆巡抚联魁保荐，奏调来新。曾先后任阿克苏兵备道、镇迪道兼提法使等职。

杨增新到新疆后的第三年，便爆发了辛亥革命，在新疆的革命党人亦起义响应。巡抚袁大化急忙调兵镇压，在伊犁与起义军对峙。杨增新熟读史书，深知此时天下大乱，正是拥兵自重的大好时机。他对袁大化说：“如果要想平定暴乱，非招募回兵助战不可。”并乘机自告奋勇。袁大化处在用人之时，答应了杨的请求。

杨增新之所以提出招募回兵，是颇费了一番苦心的。新疆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民族歧视和仇杀长期存在，汉族梁子（军人）外出，常被少数民族群众杀掉。而回族百姓虽然在新疆的人数也不多，但它与维吾尔族都信仰伊斯兰教，所以成立回兵队不仅不会遭到维族人的反对，而且还可以得到支持。那么，由谁来带领招募来的回兵呢？杨增新的标准是，这个人既是回族人，又与自己有一点渊源，于是他选中了马福兴。马福兴原籍云南，行武出身，因得罪了地方要人，被发配新疆。此人讲义气，有胆识，能带兵，会打仗，正是杨增新心中最合适的人选。

杨增新在较短的时间内便组织起了三个营的回队。但他却不急于将队伍开往伊犁前线，而是隔岸观火，以便坐收渔人之利。袁大化三番五次地催令回队增援，杨增新却以种种理由按兵不动。

久居官场的袁大化已经洞悉杨增新的心思，他下决心要除掉杨，以绝后患。

这日，袁大化在巡抚衙门的二堂上设宴，请杨增新等人吃饭。杨欣然赴约，没想到袁大化劈头问道：“当初我同意成立回队，是为了平定暴乱，可是，现在队伍成立了，我却指挥不动，大概藩台自有其他的目的吧？”

这句不痛不痒直刺隐私的话，说的杨增新如坐针毡。若不是杨在官场上混了多年，善于察言观色，巧于应付机变，早就不知所措了。杨没有马上回答，待情绪略微稳定了一下，才有板有眼地说：“大帅，回队当然是受您的节制，岂有指挥不灵的道理呀！请您息怒，回队之所以没有马上开赴前线，皆因队伍草创，军中粮草、辎重尚在筹措，待准备就绪，即可往西开拔。望大帅万勿轻信谣言。”

对于杨增新的花言巧语，袁大化早有所料，但又不便当面戳穿，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唉！人心不古啊！既然你有困难，就把回队交出来，本帅也就既往不咎了。”

杨增新一听要夺他的兵权，知道话不投机，没有了兵就等于失去了在新疆立足的根本，而杨拥兵自重，并非是为了保住一个藩台的位置，他已经开始觊觎巡抚的宝座了。因此，他拚死也要保住这支队伍。

“不行，队伍这样拉上去，非垮不可！”杨增新寸步不让。

“为了大清帝国，我们就是剩下一兵一卒也要打下去。”袁大化步步紧逼。

宴会的气氛越来越紧张。杨增新的副官一看情形不妙，悄悄地溜出巡抚衙门，直奔回队驻地，将宴会上的情况告诉马福兴。马感到情况紧急，恐杨有生命危险，立即抄起一把刀，朝巡抚衙门奔去。到了衙门，他一言不发，提刀连闯三道岗，直入二堂，口出大气，豹眼圆瞪，跨到袁大化跟前。

袁大化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吓坏了。但他毕竟老于事故，马上故做镇静地问杨增新：“这是怎么回事？”

因为马福兴闯堂，并非杨增新所安排设计，杨一时也摸不着头脑。巧于机变的杨增新，马上随机应变，向袁大化介绍：“大帅，这是回队统领马福兴。”

马福兴见杨增新安然无恙，一颗悬着的心放下了。他听杨将自己介绍给袁大化，马上急中生智，双手抱拳，左腿一曲，跪在地上说：“小人叩见大帅，刚才一时鲁莽，请大帅饶恕小人。只因藩台的太太病得很重，危在旦夕，小人一时慌乱，闯了进来，是特来禀告杨大人的。”

袁大化一时也辨不出真假，随口说：“既然藩台的太太有病，那就快回去看看吧！”

杨增新随马福兴匆匆走出抚衙，边走边问：“内人究竟有何急病？”马福兴粗声粗气地说：“太太没病，只是我听说大人身处险境，特赶来护驾。大人难道对今日之事毫无觉察吗？”

杨增新沉思片刻说：“我观新疆局势，袁大化已属强弩之末，他若杀我，如同自断手足，何益之有？不过，他杀了我，可得数营之兵，还可勉强支撑几天。人急少

虑，铤而走险，袁大化确有可能杀我，多谢统领赶来救我。”

杨对马有知遇之恩，如今，两人又多了一层生死之交。

庙与神

南北议和，清帝退位，袁世凯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民国大总统的宝座。效忠清廷的袁大化见大势已去，为保身家性命，只得通电易帜，并保荐喀什道尹袁鸿祐为新疆都督，杨增新为布政使。袁鸿祐未及上任，便被喀什哥老会众刺杀。

自袁、杨失和之后，袁大化对手掌重兵的杨增新便心怀忌惮，为了早日脱身入关，袁大化只得将都督的宝座让给了虎视在侧的杨增新，自己则席卷府库藏银，溜之大吉。

1915年，袁世凯谋称帝，引起全国之反对。杨增新却与袁世凯暗送秋波，并指派其弟杨增炳运动新疆蒙回各王公拥袁早日登基。

时有昌吉县知事匡时来省办事，杨增新视其为心腹，故征询其意见，是否赞成袁世凯称帝。匡答：“现已中华民国，哪里来的皇帝；袁乃一民贼，人人欲得而诛之，望将军三思。”并于袋中取出讨袁万言书，下面署有清末武将徐效功等名字。杨阅过问：“这些署名者，皆敌世之人，何又作崇？”匡说：“我之万言书，惟有去世君子讨逆，贪生怕死之小人才拥袁也。将军以为如何？”

杨增新听后，默然，起身向门外走去。匡时亦随其后。杨说：“你先坐坐，我有事，就回来。”

匡就座静候。有顷，杨之副官来请：“将军现在花园，请你到花园去谈话。”匡时欣然向花园行去，不想被人从后一刀砍下，当时便身首异处。

匡时，字可行，湖北人，有才气。辛亥革命爆发后，新疆革命党人纷起响应，匡时亦暗地串联，被巡抚袁大化的密探侦悉，随即捕押。袁大化离省时，令人将匡时秘密处决。押解执行人以为，袁大化即他去，杨增新已视事，应征得杨之意见。杨闻后说：“杀之无益，送往哈密，令其自行回籍。”匡能侥幸不死，对杨颇为感激，于是返身进省，叩见杨增新，谢再生之恩，并请赴伊犁，促成和谈早日成功，以图报答。杨询以办法。匡说：“我与不少革命党人相识，此去伊犁，定可取得对方信任，谋得较为重要之工作。我可随时向都督报告伊犁方面的情况。”杨允其请，嘉其行。匡果不负杨，提供了不少情报。至伊犁方面与杨妥协后，仍有少数革命党人坚决不与杨合作。杨又通过匡时，勾结民军营长马得元将为首者冯特民、李辅黄等杀害。事后，杨以昌吉县知事酬谢匡时。

杨增新将匡时除去后，曾撰一联以讥笑匡时：“官居昌吉原非吉，名叫匡时不识时。”真可谓生也增新，死也增新。

自从袁世凯欲称帝的消息传至云南，云南都督唐继光便准备联络杨增新，促其独立。因杨增新是云南

人，自从他取得新疆都督之后，不少云南人前往投靠，并身居要职。唐继光对此情况了若指掌，为能与新疆保持联络，特派马一赴新，并给杨增新写了一封推荐信，请其任用。

马一到新疆迪化后，先拜会了云南籍军政人士，然后晋见了杨增新，送上了推荐信。杨让其先休息，待有合适位置，再予安排。随即将之安置在一个回族旅店就宿，并派密探谢文富严密监视马一的行动。马一根本不知道杨增新考查干部的办法，满以为杨待之以诚，竟毫无警惕，每日与云南籍同学故旧往来接触，甚为亲密。杨增新得知情况后，对马一很是怀疑，遂不予安排，以静观变。

马一来新日久，多方串联，准备以云南籍军官为主，拥伊犁镇守使杨飞霞领衔，在伊犁宣布讨袁，逼杨增新宣布独立。其中表现最为激烈者有都署副官长夏鼎，都署警卫营营长李寅等。此计划全部被密探谢文富侦悉，报告了杨增新。杨表面不动声色，听之任之，暗地里却在寻找时机，除去夏、李等人。

1916年正月十五，杨增新以元宵佳节，宴请各厅处负责人及部分军官。酒至三巡，杨借故外出，突然拥进马弁十余人，分立于云南籍军官身后，众人皆大惊失色。只听杨增新在门外大声说：“杀李寅。”立在李寅身后的马弁手起刀落，将李寅之首斩于席间。杨随之入内公布李寅罪状：“李寅谋叛，我为大局，出于无奈，将之处决，与诸位无关，请诸位宽心饮酒。”说完，又转出门外，大声说：“杀夏鼎。”夏闻声跃起，企图夺门而逃，被众马弁拥上，乱刀加身，顿时气绝。而对突起事变，众人皆呆若木鸡，不知所措。少顷，又呼马一入堂，马一昂然而入，刚到天井，枪声大作，马一亦死于非命。

这时，杨增新再入，命马弁将云南籍军官刘应福、李森春、杜国珍、向友益等四人囚禁。过了一个月，袁世凯宣布退位，杨增新将四人资遣回籍。自此，不再重用云南人。

杨增新认为，谁当总统，谁当皇帝，并不重要，只要你插手新疆，我都承认，故不论是袁世凯还是黎元洪、溥仪还是段祺瑞、张勋，只要你承认我杨增新的“小国寡民”，我就通电拥护。对于部属，则采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策，如若反对，格杀勿论，时人谓杨是“只认庙不认神”。

文武幕僚

杨增新是进士出身，能文善诗，故其僚属文人墨客不在少数。先有属员于亮生得佳句云：“胡桐泪尽乡关怨，红柳花残塞国秋。”杨赞之逼近杜工部（杜甫）。后观建设厅长阎毓善诗云：“碧柳伊谁为著色，黄花何处得来香。”杨誉之为如出李白之手。为此，杨增新曾写打油诗一首，中有：“我生爱咏无佳句，李杜能诗是属僚。”并对人说：“李白、杜甫在我幕中，吾足自豪耳。”

这个被称为有李白之才的建设厅长阎毓善大人，却是个不务正业的家伙，整日以诗酒自遣，不顾“建设”

二字，甚至连整修街道市容卫生也从不过问。故使新疆各处的通衢大道高低不平，车行十分艰难。就连眼皮子底下的迪化市，也被搞得泥泞不堪，步履维艰。故有好事者感赋“竹枝词”一首曰：“二月北庭雪渐残，一城却被水泥淹，大街小巷难容足，不过清明路不干。”这首词传入杨增新耳中，也觉得实在过意不去，令阎厅长整肃市容，打扫卫生。这样，迪化或可得几日清洁，过后便又恢复如初。如此不称职的官吏却能稳坐显位，真也令人匪夷所思。

又有一幕僚李晋年，善书画，兼通诗词，喜食鸦片。一日，杨增新到李晋年卧室，时李正在吸食鸦片。杨说：“你真自在，还作这种勾当！马上起来，我请你绘一张留侯运筹图。要白描，不要上色。”李起身盥漱毕，俯案伸纸作画。杨站在一旁观看，并称赞道：“子昭书画长于尺幅，有老、小、巧三绝之美”。倾之，画已完成，杨又命题赞。李略思片刻，挥墨落笔：“一散家财，再报国仇。仰天而笑，俯首而愁。秦项既亡，韩亦遂体，侧身四顾，环海归刘。田横逃矣，荒岛征头。韩信王矣，钟室被收。弟子王孙，泡灭云浮，子处汉庭，渺然寡俦。贵无可乐，仙不可求。吁嗟！吾将安归兮，空握箸而莫展一筹。”题毕，杨叹息而赞，临行笑曰：“近有人讥食鸦片烟者集句云：‘重帘不卷留香久，短笛无腔信口吹。’你就信口吹吧！”杨增新便是如此摧残人才，为了不让这些有才之士过问政治，宁可让他们无所事事，自甘堕落。

杨增新主政新疆后，高唱振兴边疆的调子，推行了一些新政，禁烟（鸦片）便是其中之一。每年春初，全疆各县都贴有八个大字的公告：“禁种烟苗，违者枪毙。”每县还派有禁烟委员，协助县长禁烟。因公告上只讲了禁种烟苗，却未讲禁止吸食，所以贩烟的照贩，吸烟的照吸，官府却不与干涉。更兼当时各级公务人员大多有烟瘾，一般百姓吸烟者甚众，故此烟馆、烟铺到处林立，人进人出，车水马龙。甚至在省府中、军营里也有人公开吸烟，人们见多不怪，习以为常。而杨增新对此更是乐在心头。

杨增新对其文武幕僚曾有一精辟的论述。一日，杨宴请僚属，于席间兴起曰：“吾之僚友，各有所好，今有十多告与大家。”众人洗耳恭听。杨侃侃而谈：“民政厅长易抱一好弄麻雀，赌瘾多；财政厅长潘震好施舍，慈悲多；建设厅长阎毓善无病呻吟，诗词多；教育厅长刘文龙唯利是图，生意多；参赞汪步瑞东涂西抹，书画债多；师长蒋松林出身行伍，经验多；外交员樊耀南礼节多；伊犁镇守使杨太虚喜禅恒，经卷多；喀什提督马福兴好渔色，姬妾多；我的案牍多。”众人听后，满堂大笑，后有人评杨，对僚属不仅识其嗜好，更知其才能。可谓识其嗜好，无非是抓住他人的弱点，以便把握而已；至于才能，大可不必发挥。正所谓英雄不需有用武之地。

因果巧合

被杨增新称为“礼节多”的樊耀南，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律系毕业的留学生，并于留学期间参加了同盟

会。1910年，他到新疆，出任迪化检察厅厅长；不久，检察厅裁撤，樊返回内地。辛亥革命后，任职于北京总统府。1917年，被任命为新疆阿克苏道尹。

杨增新知道樊耀南是革命党，故不准其赴任，而改任为迪化区行政长，以便就近监视。以后又改任对外交涉署署长，兼军事厅长，代教育厅厅长等职，成为新疆要员中兼职最多的一个。杨之所以委樊众多职务，并非是对樊的器重，而是想用繁琐的工作缠住樊，使之无暇他顾。樊来新疆一心想发挥自己的才能，故工作格外努力，诸事皆能应付裕如。如果樊只挂名，不干事或少干事，杨增新对他或还放心，樊越多能干，杨对之越不放心。樊亦知杨不能相容，曾多次请求入关，均遭拒绝。

1928年6月，张作霖军政府垮台，7月1日，杨增新按照过去的惯例——认庙不认人，起草了一份通电，表示拥护国民政府，并草拟了一份报请审批的新疆省政府委员的名单，其中包括各厅道第一把手，却将樊耀南排除在外。樊感到杨可能将不利于己的行动，于是秘密串联了一些平时与自己过从较密的人，准备推翻杨增新。

樊本一介书生，一向做事光明磊落，此次密谋，不觉眼跳不止。当时，瑞典医生赫迈尔正住在迪化，于是，樊每天下午请赫医生到外交署为之治疗眼病。

7月7日，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的第一批学员毕业，樊耀南遍邀省府要人出席毕业典礼。杨增新对此非常重视，率领卫队前来参加。

典礼之后，樊耀南又请各位要人在学校就餐，政务厅长金树仁借口有事先走一步。而杨增新的卫士们则在学校教务主任张纯熙的劝说下卸去武器，另室就餐。

正当大家吃的兴高采烈之时，张纯熙起身为杨增新等人酌酒，然后将酒壶重重地往桌上一放，只见一人闻声而起，对准杨增新就是一枪。这一枪虽然击中了杨，但未中要害，如果杨侧身躲到桌下，或可不死。然杨主政新疆17年，颇具声威，直到生死关头，他还想用自己的威力来镇慑行刺之人。他猛然站起身来，大声呵斥：“你们想干什么？”随着话音，杨又被击中五六枪。一代怪杰就这样结束了一生。同时遇难的还有杜发荣旅长等人。

樊杀杨得手后，便带着十余名亲信直奔杨增新办公处都署衙门三堂，向值班副官索取印信。此时，金树仁尚在都署二堂批阅文件，樊令人请金到三堂谈话。金心怀鬼胎，怕中樊的杀人灭口之计，故拒绝见面，恰好杜发荣之子杜国治率兵赶到都署，在金树仁的指挥下，将三堂围住，开枪射击，樊终因寡不敌众，弹尽被擒，随

即被枪决。

杜国治何以如此之速赶到都署，这里还有一段插曲。原来，俄专首届毕业典礼，樊遍邀省府要员，其中也有建设厅长阎毓善。阎为清末举人，好舞文弄墨，颇有才气，故持才傲物，对被时人称为“樊圣人”的樊耀南一向轻视，并撰联以讥讽，联曰：“谨慎小心，未睹霍光之过；谦恭下士，颇有王莽之风。”樊闻知大为不满，怀恨在心。故“七·七”事变中，阎也未能幸免，中弹倒地。阎未被伤及要害，怕再中弹，只得倒地装死。樊在离校时，恐杨增新还未真死，又在其身上补了两枪，顺手又给了阎一枪，所幸只击中了腿部。等人散尽后，阎才翻身爬起，一瘸一拐地逃出俄专，正遇上杜国治带兵赶来，准备弹压学生造反，为父报仇。阎告之：“此次叛乱，纯属樊耀南所为，与学生无关。”并述之详情，请杜赶紧带兵到都署抓拿樊等。阎一介书生，却借武人之手报了一枪之仇。

金树仁杀死樊耀南之后，一面清理政敌，一面杀人灭口。当初樊耀南准备政变时，曾与省府许多要员秘密串联，其中有与金秘密联络的章华甫（金的盟兄），此人被金捕后秘密枪杀于后堂子。因此，许多人不知金是否参加了政变，直到几十年后，还有人为其辩护，以为金当时根本不知其事。

更为有意思的是，杨增新生前信奉老子，却喜谈禅机，某日与幕僚钱绘巨聊天，对因果报应之说大发了一通议论：

“佛菩萨善谈因果。因果两字，极有道理，自韩子辟佛，而后世托儒名者，并因果亦不敢谈。余固不信佛，而深信因果。盖因果是释家语，谓人之所作所为为因，所受所得为果。更谓：因此而生彼为因，犹因种子而生果实也。谚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本此，推而言之，种善因必得善果，种恶因必得恶果，乃自然之道理最著者也。然自我种因，自我收果，宜也。乃有时彼种因，此收果，抑何说也？革命因也，共和果也；孙中山先生偶言革命，是种因也，袁世凯为共和总统是收果也。这个大因果，吾殊不解，谅绘臣亦不能解。”

杨增新以一封建政治家自不能说出袁世凯何以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然若论新疆伊犁革命之果，不也一样让杨某得去了吗？杨喜设鸿门宴，其身不也丧于鸿门宴吗？更喜的是，樊耀南搞政变，竟让金树仁坐享其成。杨增新万万也不会想到，由他一手选拔的得力干部，竟参与了谋杀事件，并从容地登上了新疆王的宝座。

更正 致歉

本刊总第6期所发《欧战风云中的萧乾》，本属“英杰谱”专栏，由于编辑工作上的疏漏，误将此文排为别的专栏，造成不好后果。仅向萧乾先生及作者傅光明先生深致歉意。另外，第6期特邀编委将戴逸、韩劲草、魏久明、漏排，特此一并致歉。

本刊编辑部



法医

陈西

杜凌●

16年的法医生涯中，陈西检验各类尸体650具，活体735例，未发生差错。最近他当选为珠海市十佳文明市民。

他才48岁就白发如霜了，体重不足百斤，挂在脸上的总是憨憨厚厚、朴朴实实的微笑。如果不是那身令人肃然起敬的公安制服，你一定会以为他是水乡老农呢。

同事们亲切地叫他“老西”，青年人尊重地称他“西叔”。当然，那些口边无遮无掩的调皮仔，戏嬉时大呼其“棺材佬”“死人医生”……。可是，不管人们唤他什么，他都是那么坦坦然然、平平地和地接受了，脸上依然挂着憨憨厚厚、朴朴实实的笑容。

他不善于言谈，是个开起玩笑来有理也拗不赢的老实人。别看平日他不声不响，不显山不露水，可是在斗门县公安局里却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似乎这里发生的每件大案、要案都离不开他的“诊断”。再有本事的侦察员，再有经验的法官，对他下的结论都不敢小觑。

他就是法医陈西，一个专门与尸体打交道的人。

糊里糊涂入了行

那还是1975年8月的“文革”期间，陈西从卫生院调到斗门县公安局当了一名法医。那套笔挺的公安制服使他不高的身材平添了几分英气，这份得意之情还没从心头消褪，刑侦队队长余华勤就匆匆而来，说了声出发，于是，就一人一部单车上路了。

这是陈西第一次参加侦破工作，他正了正帽子，拉直了警服，雄纠纠的样子，大有擦拳磨掌大干一场的壮志豪情。

陈西是1962年毕业于中山医士学校的，他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毕业后分配到卫生院当医生。当时，社会上流行“医生、司机、猪肉佬是三件宝”之说。在缺医少药的农村，医生是个实在令人羡慕的职业。逢年过节，被治过病的乡亲出于感激之情，总要提着糖果糕点登门拜访。陈西有了个女儿，有些热心的乡亲非要叫自己被治好过病的儿子认他为“契爷”。

组织上调陈西到公安局当法医，老实巴结的陈西连想也没想就一口应允了。当医生的不就是看病嘛？给普通人看病是看病，给犯人看病也是看病，反正都是工作。他不在乎犯人有没有礼送。更何况，更何况公安局破案、犯人……对一般人来说有种神秘感，哪个青年人向往富有刺激性的工作？

走了十三里的崎岖山路，汗水湿透了他的衬衣，山风又吹干了，蓝色的警服上留下一层薄薄的盐渍。

一阵山风送来一股恶臭，抬头寻找，一具男尸吊在老松树上。皮肉腐烂，蛆虫蠕动，苍蝇密密麻麻绕着尸体打转。一阵恶心，陈西忙捂着鼻子，连连后退了几步，悄悄地把眼光移开去。尽管几分钟前，他还在有滋有味地盘算着怎样打好漂亮的第一仗。

当医生的哪能没见过尸体？可这是一具……唉！

当他竭力平静下情绪，重把眼光转过来时，余队长已经利索地爬上树，解开绳索，把尸体平放在地，然后解开死者的衣服验伤……。

直到此时，陈西才明白过来，法医原来是“验尸官”，是专门和死人打交道的人。他仿佛掉进了冰窖里，顿时，从里到外凉透了。

虽然，余队长十分体谅他第一次的心情，没让他去碰一碰尸体，但是回到家，他仍然想作呕，就象吞了个死老鼠般难受。他把肥皂抹了一次又一次，用清水冲洗了一遍又一遍，一块肥皂转眼少了一半，他仍然觉得没洗干净，仿佛非要刷掉几层皮才能干净似的。

晚上，他吃不下，睡不着，一合眼，白天的情景就一幕幕浮现。

“那不舒服？”也许他的唉声叹气，也许他的辗转难眠惊醒了妻子。

平日不爱吭声的陈西，此刻更不愿多说话了。何必

认认真真的好法医

1985年深秋，平沙农场一条内河里发现一具浮尸。

陈西匆匆赶到现场时已是夜里十时左右了。这具尸体高度腐烂，体积膨胀，肿胀得连脖子也没有了，外观检查没有发现伤痕。人们心头紧绷着的那根弛松弛了下来。

“西叔，可能是偷渡仔从海里浮过来的。”

这一带是珠江入海口，水网纵横交错，河海相连相通，不时会有从海上或内河冲过来的浮尸。

那天，天下着冷雨。海风在旷野上肆无忌惮地戏嬉着，把冷风冷雨一把把地往人们衣领、袖口里灌。人们打着寒颤，跺着脚，瑟缩着身子，开始变得不耐烦起来。

别看陈西平日笑眯眯的好说话，凡事总能顺从迁就人；可是那股认真劲一上来，没人能拗得过他。他对人们的议论和不耐烦仿佛根本没有听到，没有感觉到一样，依然故我地、专心致志地摆弄着那具象吹胀了橡皮人般的尸体。尸体浑身是黑色的泥污，在手电筒微弱的光线下，连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也难以辨清。陈西弯着腰，吃力地检查着，那开始花白的头发在冷风中抖擞着，那单薄的警服也显得格外宽大。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终于抬起了头，轻轻地，却十分肯定地说：“颈部有被勒的痕迹。”

“凶杀案？”

“凶杀案。”陈西坚定地说。

出乎意料的结论，使人们震惊了。刚才心里还不耐烦地骂：“这老头算够烦人”的青年干警，此时不得不刮目相看了。

刑侦队出动了。很快查明，死者是被他的朋友谋财害命勒死又踩进淤泥里的。案发五日后，尸体腐烂浮出水面。凶手被缉拿归案了。

事过很久了，提起此事，人们无不钦佩地这样感叹：“如果不是西叔认真，恐怕这具浮尸就会被当为偷渡者的尸体处理了。死者冤枉，凶手逍遥法外。”

那是1988年6月，井岸镇新堂供销社22岁的女青年吴某十天前服农药自杀了。当时家人没有什么怀疑就将尸体埋葬了。一个女孩子无缘无故为什么会自杀？旁人的猜测、议论引起了死者家属的不安。是啊，究竟为什么？越想越有蹊跷，会不会是被其老板强奸后灌药毒死的？于是，死者家属找到了公安局。

任务落在陈西身上了。

听说要开棺验尸，一大早墓地里三层、外三层围了許多人。有死者的亲朋好友，更有不少看热闹的。

棺木一打开，一股难以忍受的恶臭冲出来，直把围观者逼退了十几米远。陈西知道死者亲属中有个是医生，于是特地请他站在自己身边观看。尸体腐烂了，

让妻子跟着自己心烦呢，他不敢再翻身了，就这样眼睁睁地等到天亮。

第二天，他找到余队长，象犯了错误的小学生站在严厉的老师面前一样，他啃哧了老半天，脸都憋红了，终于吐出一句：

“队长，这工作我、我干不来，太可怕了。”

老余微微一笑，好象早料到他要对自己说这番话似的，轻轻拍着陈西的肩膀，和蔼地说：“是呀，和死人打交道是件很艰苦、很艰苦的工作。但是破案离不开这项工作。”他讲述了这样的一件往事。

“四清”时，有位被清查对象突然死了，工作队认为他是被人杀的，但是余队长进行了现场调查和走访群众后认为是自杀的。

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双方各持己见，争执不下。大半个月过去了，这场官司仍无法结案。最后，从外地请来一位法医开棺验尸。法医用科学的依据证实了是自杀，这样才使工作队信服了。

“如果没有法医，这场官司还不知如何收场呢？”余队长不无感叹地说。说得那么恳切、那么诚挚，那么语重心长，陈西只好默然了，他是个不善于争辩的人。

这一年的九月间，组织安排他到佛山公安局跟一位姓严的法医学习法医的基础知识。

老严是个热爱本职工作的法医。他传授法医基础知识的同时，也为陈西揭开了法医这个特殊职业的神秘面纱，使陈西对法医的酸甜苦辣有了心理上的准备。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法医比在殡仪馆工作更脏更累；一来是工作无定时，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还是逢年过节，只要是破案需要，就得随叫随到。二来是接触的多是高度腐烂的尸体，要开颅破腹，甚至把五脏六腑翻个个来检查。全凭眼看、手触、鼻嗅。因此，再脏再臭也不能戴口罩。三是是在县一级公安局检测手段、工作环境简陋，往往在现场就地检验，或是烈日当头，地气上蒸；或是寒风冷雨，无遮无挡，或是狭窄闷热的停尸间……。更苦的是社会上许多人对这件工作不理解。有一个县的一位医生改行当法医后，恋爱多年的对象竟和他“拜拜”了。

法医也有他的“甜”。比如，发现一具尸体，如果把他杀错定为自杀，就会使凶手逍遥法外，放虎归山，也影响了公安干警的威信；如果把自杀误判为他杀，刑侦队花费了不少精力却竹篮打水一场空。法医是公安部门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在破案中有着无法取代的作用。

懂得了的东西不等于就能透彻地理解。陈西对这种“甜”的感受，是在以后十多年的实践中，是在一宗又一宗案子的侦破中，是经过多少痛苦的磨炼后才慢慢地品味出来的……

蛆虫涌动，足有一斤多。一刀下去，蛆虫顺着手术刀直往手套上爬。这时，陈西已是位技术精湛、胆大心细的法医了。他一边解剖检查一边给身边的医生讲解。检查的结果是：全身没有发现损伤痕迹，处女膜完整，胃内积储着大量甲胺磷农药。排除了是被奸后毒死的可能性。这个结论使死者家属信服了。

可是为什么无缘无故自杀呢？刑侦队进一步调查，原来这女青年死得确实冤枉。

两个月前，小吴和阿婆一起去拜神。小吴家有四个姐妹和一个弟弟，偏偏父母寄予传宗接代希望的儿子患有精神病。阿婆说，要你弟弟病好，除非你们几姐妹中间去一个。为了治好小弟的病，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小吴服毒自杀了。然而，小弟的病并没因此而好。小吴姑娘死于愚昧、死于迷信、死于重男轻女的旧观念。可悲啊。

陈西用自己的工作为死者的老板洗刷了“罪名”。摘掉了那顶“不明不白”的黑帽子。老板又可以挺起胸来做人了。

象这样的民事纠纷陈西不知“平息”了多少回。

有一次，莲溪公社一个妇女突然上吊了。娘家一口咬定是男家吊死的。男方家矢口否认。双方聚集了一百多人，拿着棍棒锄头，横眉冷对，大有一触即发的火拼势头。公社干部劝阻不了，只好向公安局求救。

陈西等人赶来时，停放在厅里的尸体已始腐烂了。陈西认真地解剖检查，证实死者是自杀的。在双方代表参加的座谈会上，陈西用大量的科学依据，说服了死者娘家那村的人。

一场械斗被制止了。

望着渐渐散开的人群，陈西深深地透了口气。大热的天，赶了几十里路，到现在他才感到口渴。一杯白开水灌进冒烟的喉咙，啊，真甜。陈西抿抿干裂的嘴唇。这水没加糖没加蜜却直甜到心坎里。

生活本身就是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的。没有吃过苦的人，永远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甜”。

陈西的工作说苦，可谓真苦。发案的地方多是在人烟稀少的荒岭僻乡，汽车开不进，单车骑不了，全靠两条腿。水乡河沟多，一根树干、几条竹便是“桥”了。走上去颤颤悠悠的，叫人心惊胆颤。遇到天黑或下雨，戴着老花眼镜的西叔，简直是四肢着地，爬过去的。

陈西的家属也跟着苦。他的女儿说，从记事起，家里吃剩菜剩饭多过吃新鲜的饭菜。因为陈西来去无定时，这边刚端起饭碗，突然电话铃响了，筷子一放，扭头就走。一次过中秋节，中午，家里来了几个亲戚，妻子上班去了，陈西便准备杀鸡招待客人，正用开水烫鸡毛时，电话来了，他把湿漉漉拔了一半毛的鸡往盆里一丢，就要走。临出门前对亲戚说，你们自己煮饭吧，我有任务。

几个亲戚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主人不在家，留着干啥？门一关，也走了。

妻子下班回来，看见那只拔了半边毛的阴阳鸡，不用说，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她叹了口气，接过丈夫未完成的“事业”干下去了。

晚上八时多，陈西回来了，拖着一身的疲倦。家里静悄悄的，桌子上的饭菜早凉了。妻子女儿们没精打彩地坐在厅里等着他，小女儿顶不住饿倒在床上睡觉了。

“真是失魂公！”心直口快的女儿忍不住埋怨了起来，妻子忙向女儿递了个眼色，聪明的女儿住了嘴。

象这样的节日，在他们家是习以为常的。十六年的法医生涯中，似乎一半的节假日不是和家人一起过的。幸好妻子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英雄能过名利关

比，是人类一种竞争的心态。有人说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

50年代到60年代初，人们喜欢比贡献、比艰苦朴素。不知从何时起，攀比发生了倾斜、移位，人们开始追求比地位、比金钱了。这究竟是社会文明的进步还是倒退的表现？结论让社会学家去做吧。但是，职位升迁的快慢与一个人进步的大小不成正比。而职位高低的变迁又确实实地与房子、票子、车子等诸多待遇紧紧相连。存在决定意识，意识产生于存在。对某种人来说，对名利地位热衷的追求，恰同太阳从东边升起一样自然了。多少英雄豪杰败倒在名利关下。

八十年代，一股强劲的跳槽风在中华大地上刮起，它飞舞着，旋转着，七十二行，无行不入。有一技之长者，年富力壮者，有门有路者，纷纷另择高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国营企业的向合资、乡镇企业跳；当教师、医生的转行当个体户……贫苦地区的向经济发达地区人口大流动。旧的稳定被打破了，动荡带来裂变、分解；分解又引致新的排列、组合，达到新的相对稳定。在新的组合中，人们根据个人的爱好、意愿、需要与追求找寻着自己的最佳位置。人尽其能，人尽其才，使社会分工趋于合理化。

这时，陈西已经是斗门县唯一的一个技术精湛的法医。县里发生的大大小的案件，无论是凶杀还是自杀，无论是工业事故、是交通事故还是医疗事故，无论是尸检还是活体检验，都少不了他，但他仍是个普通的法医。他的同学有的当了市级卫生局局长，有的当了卫生院院长，最低的也是主治医师了。和同学们相比，陈西工作不比人家轻松，贡献不比人家少，天天和尸体打交道，只多了十多元的营养补贴，真是霉透了。

“如果你想调换个工作，包在我身上了。”老同学们爽快的打了包票。

在这次大排列、大组合中和陈西一起学法医的同

事,大部分都转了行。

陈西犹豫了。他向老余流露出了想跳槽的念头。

“提拔不是衡量一个干部表现好坏的唯一标准,而是工作的需要。”老余最了解陈西。

“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得到党和群众的信任是人生的快乐。”军人出身的政委邹驱更是语重心长。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是入党时的誓言。几个晚上,辗转难眠,陈西头上又添了几根白发。

他忘不了,1983年5月间处理那桩案子时的情景:上横公社有个女青年失踪三日,后来女青年家属在码头附近发现了一具女尸。县公安局李局长副局长、余队长都赶来了,李局长和余队长踩着半尺深的河泥,把从河里打捞出来的尸体抬到沙滩边。李局长亲自为陈西传刀递剪,陈西干了三个小时,李局长也赤着脚在泥里水里站了三个小时……

此情此景,历历在目,陈西脸红了。

1991年,局里提拔一大批干部,其中不少人年纪比他小得多,工作时间比他短得多,甚至有的还是他看着长大的调皮仔,如今一下子成为了自己的上司。这个面子关、感情关是不好过的呀!但陈西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现实。

当一个人能够战胜自己,超越自我时,他就不会再为个人的名利功禄而烦恼,精神世界得到升华。

这批干部提拔的名单公布没多久,陈西的痔疮发作了。他站不起、坐不稳、躺不安,偏偏这时发生了一桩凶杀案。尽管这时局里又来了一个法医,是大学毕业刚分来的青年人,但是因为这案子要提交到高级法院审理,尸检报告必须十分准确,局长希望陈西到现场。

陈西放下电话二话没说,不顾妻子、女儿的拦阻,一拐一拐地走了,走向那神圣的岗位……

〔责任编辑:晓渡〕



李先念走

西路军惨败后,余部兵分三支。其中两支均被马家军打垮或因冻、饿、伤、病而亡散。唯独李先念率领的一支转战到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

到迪化后,有人问他:“先念同志,你打算去苏联,还是去延安?”他不加思索地回答:“去延安。”

正是这样一种坚强的信念,才使他克服难以言表的艰难险阻,战胜一个又一个的“死区”,带出一支骨干队伍来……

1

那是1937年春末,祁连山冰雪覆盖,寒风料峭。在这气温零下30多度的冰天雪地里,行进着一支不足千人的队伍,他们穿着破烂不堪的单衣,裹着脏兮兮的毯子,胡子拉茬,蓬头垢面,两颊塌陷,浑身颤栗,一个个疲惫到了极点。那些破盔残臂的彩号,举步艰难的病员,或被人搀扶或驮在骨瘦嶙峋的战马上,亦在人群中蠕动。

谁能相信这支溃不成军的红军队伍,竟是当年使敌人闻风丧胆的红军30军呢!

走在前头的军政委李先念回头张望那稀稀拉拉的人群,不禁摇头叹息。他也很难相信这是自己曾经带过的威武雄壮的队伍。

3月14日,是西路军宣布彻底失败各奔东西的日子,代军长程世才牢记心间,李先念也忘不了。这一天,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也是最后一次会议。

会议认为,自去年10月下旬西渡黄河以来,在无后方面又孤立无援的条件下,与数倍于己的马家军苦战了近5个月,虽毙、伤敌前敌总指挥马廷祥、马元海以下2万余人,但自己也由2万余人锐减至不足3000人,“已战斗到最后”,“只有设法保存骨干了。”

会议决定将现有人员编为三个支队分散活动,以红30军剩下的

无草，我们的战士大多数还着单衣，有的没鞋穿，用破布裹脚走路，能在祁连山上生存下去吗？我看应当趁着甩掉敌人的机会，放大家自寻生路……”

李先念惊愕地望李特一眼，他知道，李特现在仅仅是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的成员，既不负指挥又不是支队领导人，当然可以说些不负责任的话。

但他的话也是出自部队的现实。左支队深入渺无人烟的祁连山，这里既无房舍避寒，又无处取粮就食。掉队，自动脱离者时有发生，怎样才能把这千余人的生命维持下去，的确是一个大难题呀！

革命军队岂能散伙不管？

要我们这些领导干什么？

李先念这样想，没有和李特争执，但到了丰达板宿营时，事情并未算了。因为首先是要有东西填饱肚子，支队领导人倒还有点炒面充饥，而战士们把干粮袋翻了个底朝天也不见一粒米，李特的旧话又重提了。

“我不同意。”李先念有些愤愤然。

不同意又有什么办法解决呢？满目冰雪衰草，一片荒凉，他想不出什么办法来解决，人无食如同进入“死区”，“保存基干”则是一句空话。

负责政治领导的李卓然在一旁沉默了半晌之后，说道：

“我同意先念同志的意见不能散，没有吃的想办法嘛。这个原则还要告诉右支队和中支队都要坚持。我们是革命军队，是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武装集团……”

“我的主任同志，你胡说了吧？我们有电台和那两个支队联络吗？还是想想我们自己吧。”李特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把李卓然顶了回去。

程世才忍不住了：“那样做是对战士不负责任。”

“是对革命不负责任。”李先念进一步指出李特主张的危害性。

“对革命不负责任的不是我李特，也不是你们，而是……”

李特的气话还没说完，警卫班长“黑皮”巴方庭扛着一头黄羊喜气洋洋地走来，大声嚷嚷：“首长，有吃的了。”

李先念像落水者抓住了木板，奔过去把那只黄羊翻看了一遍，惊喜地：“好肥的羊！”又朝巴方庭的胸前打了一拳，“黑皮，你在哪里打来的黄羊？”

“黑皮”指着山崖下的树丛，绘声绘色地说开了：

“就在那里，一群黄羊正在啃吃干草。开始我匍匐前进，慢慢地接近它们，快到它们跟前。我猛地扑上去抓住一只。其余的撒腿跑了。”

李先念对程世才说：“我看可以通知各单位组织打猎队，捕捉黄羊或许还有野牛，毛驴什么的。”

一只剥皮的黄羊，吊在篝火上烤的油流。你撕一块，我拽一条，大口吃起来，尽管无盐，甚至还带着血丝，也比那山珍海味还要香甜百倍，黄羊进肚，李特无

屈德骞

出“死区”

5个营（每营二、三百人）组成左支队，由李先念、程世才带领向南，深入祁连山区游击。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成员随该支队行动；以红9军剩下的5000余人及百余名骑兵组成右支队。由副总指挥王树声带领向北，依托祁连山北麓展开游击战；以总直特务团两个连和伤病员组成中支队。由红5军参谋长毕占云带领，就地坚持游击。

会议还根据西路军军政委员主席、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的提议，决定徐向前（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陈昌浩离开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汇报情况；另由李卓然、李先念、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等8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各支队。并由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

西路军军政一把手离去，李先念成为新的工作委员会的军事指挥者，无疑收拾残局的重担就落在他的肩上了。其时，石窝山下人喊马嘶，马家军已围上来，又如何出得去呢？就算突出去了或是把敌人甩掉了，各自游击又如何生存？何时会合？又到何处去？这些在会上都没有研究，一切处在茫然之中，但李先念还是坚定地挑起了这副重担。

2

左支队摆脱敌人，到达了祁连山，李先念、程世才那紧锁的眉头舒展了。

西路军参谋长李特却是更大的担心：“人无粮，马

江西方面西路军干部合影



西路军部分干部

任何理由再坚持“放大家自寻生路”了。

打黄羊，捉野牛，寻山果，偶尔碰上牧人换点粮食，或买几头牛羊，总算可以凑合着活下去。

当然也有打不到黄羊断顿的时候，加上衣衫单薄，天寒地冻，受不了的也就溜号了。

夜晚燃篝火，是李先念在祁连山战胜第二个“死区”而采取的措施。夜间零下30多度，身着单衣疲劳困倦的战士们，一躺下就有人与世永别了。此刻，李先念见警卫班不生火闲坐着，便问：“你们是怎么了？个个脸上阴云密布，嘴上挂油瓶。”“黑皮”只好如实报告：他的班有两个不辞而别了，李先念听了双眉紧蹙，身边的人都在动摇，下面的又如何？他想了这些，又问巴方庭：“黑皮，你跑不？”

“政委，你在，我就在，你到那，我也到那。”

李先念心里感到莫大的欣慰，提高嗓门对大家说道：

“听见了吗？你们班长的态度是端正的。大家要知道，革命道路上的挫折、困难和失败都可能发生，但革命一定会胜利，这一点应当坚信。你们想干革命，就跟我走，不干，你们走，我也不阻拦。”说罢，他又把“黑皮”拉到一边，悄声问道：哎！那些黄金你可要保管好，那是我们的生命线啊！”

兵败祁连山下的石窝时，李先念为防不测，将维持部队给养的两斤多黄金交给巴方庭保管。准备在无粮供应部队时，用于换取给养。

“黑皮”拍拍肩上的挎包，狡黠地笑笑：“政委，在这里呢。日夜不离身，丢不了。”

李先念高兴地朝“黑皮”胸前一拳，继又关切地说：“快生火，暖暖和和睡一觉。”

3

已经第7天了，左支队仍在祁连山里彷徨，日行夜宿，没完没了地走路，不知落脚点在何处？李特性子急，

受不了，又嚷嚷起来。

“向南向北，朝东朝西，总要有个目的嘛。”

不仅李特受不了，广大指战员也受不了。近千人的队伍在这茫茫冰雪地，整天是觅食、走路、睡觉，到底要干什么？没有一个目标。

于是，召开会议，研究部队行动方向，会议根据多数同志的意见，决定率部翻越海拔5000余米的祁连山雪峰，向西行进，到达有生存条件的地方。

3月23日，进至海巡堡以北祁连山分水岭时，李先念电告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现已脱离敌人，深入祁连山中，露营雪山，无粮食，仅觅一些牛、羊肉充饥，甚困难，但我们不灰心，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在自主、独立与依靠自己的路线上，克服任何困难，求得最后胜利。”

同日，中央回电，要“保存力量，团结一致”，“设法去新疆。”并谓将派“陈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和滕代远同志前往迎接。”

一纸电文，使彷徨中的左支队如大海里的夜航船看见了灯塔。大漠中的迷路者听到了驼铃声。指战员们无不欣喜若狂！

“到新疆去！”

驱散了人们心头的迷雾，前进的方向明确了。

左支队扶伤带病，在冰山雪岭中，艰苦行程24天，于4月16日来到安西县东南之石包城。跨出祁连山口，全队尚存850人。

部队在石包城休息三天。得知安西城仅有马家军一个防防守，便准备打下安西城休整几日，补充粮弹，再西去新疆。

当部队发起冲锋时，即遭到炮兵火力阻拦，接着，城楼上的机枪也疯狂地扫射起来，密集的火网，压得红军战士不能抬头。

李先念好生奇怪，一个排的守敌竟有如此之多的炮兵和机枪？情报绝对不准。他命令部队转攻东关。连

续发起几次冲锋又未能克。只得退回原地对峙。

此刻，两个战士送来一名俘虏。李先念立即审问得知，敌在城中有两个团的兵力。

左支队在石包城了解是一排也是实情。只是过了时。三月底，马步芳就通电河西各路驻军：“剩余红军将有千余人，深入祁连山，似有向嘉峪关外奔入安西、敦煌，西入新疆的模样。”并令李增荫率骑兵尾随追击；令马忠义的骑兵团取道嘉峪关，前往堵截；令驻防肃州（今甘肃酒泉）的100师298旅旅长马步康尽快派兵防守安西。

李先念根据新的敌情变化。断然放弃攻打安西城的计划，趁着夜暗转移到城西王家屯一带，并立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

会上，李先念陈述自己的看法，他说：

“敌众我寡，不能在此与敌纠缠，等马家军围攻上来，我们不仅不能按既定方针进军新疆，甚至会有导致全军覆没的危险！为此，我的意见是尽快摆脱敌人抢时间向新疆前进。”

程世才闷声闷气地说：“不能再拖了，马上出发！”

李卓然、李天焕等人亦赞成放弃打安西，马上西进。但李特仍持有异议，他激动地说：

“西进我是同意的，但不打掉这股敌人，我们是走不脱的。”是的，不打掉这股敌人是很难走脱，力量悬殊又怎么能打得掉呢？就在这犹豫不决之时，已到了翌日拂晓。敌步骑蜂拥出城，向王家屯庄围攻过来。

李先念指挥部队依托围墙阻击，连续打退敌人几次集团冲锋。

4月25日的整个白天，双方处于拉锯状态中。入夜，敌军在王家屯庄四周燃起篝火，不时打炮鸣枪，困扰红军。

午夜，待敌人闹腾得疲劳了，李先念下令：“突围！”部队从事先推倒的围墙处冲出，神不知鬼不觉地向西北方向疾进。

4月26日，天刚破晓，左支队来到甘肃入新疆的要隘——白墩子。

白墩子周围全是沙漠黄沙。据说，在古代这里是新疆与内地传递信息必经的驿站，而今已成为过往行人歇脚喂马的“兵站”了。

部队正要喝水吃干粮，东南方向却扬起高高的尘土，传来得得的马蹄声，两千多马家军追踪而来。

左支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且战且走，向西北转移，于4月26日黄昏到达红柳园。

左支队好几天没吃热饭了，在红柳园架锅烧水，准备热乎乎地饱餐一顿。就在此时，砰砰的枪声掠过沙尘滚滚的夜空，尾追之敌又逼近了。

战斗到午夜，李先念来到警卫分队，告诉巴方庭，“今晚让你们打头阵，每人带四颗手榴弹、20发子弹、一把大刀，把马肚带系紧，从敌包围圈中冲杀开一条血路，保证部队突出去。”

动用警卫分队打头阵，也是无可奈何而为之。因转

出祁连山后，连续与敌苦战，战斗部队损失大，伤员剧增。所以，李先念只好忍痛割爱了。前面打的几仗，伤亡虽大，但也从战场上缴获补充了弹药和粮食，不然根本无法支撑着西进。

午夜时，战场上一片死寂，只有呜咽的寒风。20余名警卫战士背插大刀，手提20响驳壳枪，腰别手榴弹，翻身上马。成散兵队形展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敌包围圈冲去。他们先是甩出手榴弹，后是举枪射击，最后抽出大刀斩杀，一条血路终于杀开。李先念率部紧跟其后，向西北方向的沙漠地带疾进。

4

沙漠无草无水，人迹罕至，又是一个“死区”，马家军不敢进，反倒成了安全地带。

左支队在沙漠里走了两天，所需饮水全部用完。

4月28日，李先念来到沙丘上，望一眼似火的骄阳，脱掉军衣，光着膀子，用舌头舔舔干裂的嘴唇。沙漠的气候变化无常，晚上冷的要命，白天热的要死，威胁最大的是无水。

忽有一个阴影从他身边掠过，李先念抬头仰望苍穹，忽见一只隼鹰展翅南翔。他脑子里闪出一个念头，有鸟必有水，他立即命令两个战士乘马追鸟！

两小时后，战士返回，老远就欣喜地大喊：

“政委，南边沙丘下有一眼泉水！”

顿时，戈壁滩上狂欢了。

部队赶到泉边，人马饱饮一顿之后，又把葫芦、羊皮袋等能盛水的工具都灌满，开始向星星峡前进了。

5

4月底，李先念率领左支队420余人进至星星峡附近，发现对面丘陵上，摆着几辆汽车，还有一些穿灰军装的士兵，并附着一面六星红旗。

李先念明白，“六星红旗”是盛世才军队的标志，是友军派人来接应了。

盛世才是新疆的“土皇帝”，祖籍辽宁，少时就读于上海中国公学，两次赴日本留学，后涉足军界，先后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参谋本部作战科长，新疆督署上校参谋等职。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后，他当上临时督办，总揽军政，统治新疆，他大权在握，或因所处地理位置的关系，公开倒向苏联，而蒋介石又鞭长莫及，任其割据称雄。当时，党中央通过共产国际，争取盛世才中立，盛对西路军的遭遇表示同情，下令驻防东疆一线的部队上山了望，发现红军失散人员即予以收留，还派出汽车沿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哈（密）公路巡逻营救突围失散的红军战士。

左支队与盛世才的部队对视片刻，双方挥手呼喊，顿时，到处洋溢着笑语欢歌。

6

5月1日，这一天是左支队大喜的日子，中共驻新

疆代表陈云、滕代远带领满载被装、食物和药品的汽车赶到星星峡，迎接慰问左支队。

左支队的将士们，转战40余日，冲破无粮、严寒、围追堵截、无水四个“死区”的困扰，终于来到了安全地带，见到了党派来的亲人，无不落泪，欢呼、雀跃。

陈云紧握着李先念的双手，党感谢你，感谢你从死亡线上带出了一支队伍。

旋即，陈云、滕代远和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李天焕等热烈拥抱，相互紧贴着那满是胡茬的干瘪的脸，久久不分离。

陈云在向左支队的指战员转达了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关怀和慰问之后，说：

“你们辛苦了，受罪了，西路军的广大指战员是英勇的，壮烈的。革命有高潮也有低潮，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的教训，会使我们变得更聪明，更强大，更成熟。毛主席说了，现在剩下的几百人，是在烈火中锻炼出来的钢和铁，是革命的宝贵财富。我们相信，这几百人将会发展成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的革命大军。因此，我们一定能够打败一切反动派，革命一定会胜利。”

40余年后，徐向前元帅在他的《历史的回顾》中，对李先念这段历史的功绩深表感激和赞美：“李先念同志受命于危难时刻，处变不惊，为革命保存了一批骨干，这是很了不起的。”

7

1937年底，李先念怀着游子的激动心情，和李卓然、程世才、李天焕等乘飞机经兰州到西安，受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热情接待。并在此过了元旦后转程去了延安。

在到达延安的当天，毛泽东接见了他们。他慈祥面孔上那对大眼睛湿润了。他在向大家表示慰问和鼓励之后，说道：

“西路军是失败了，但这不是说西路军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没有努力，他们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冬季没有棉衣，伤员没有医药，没有子弹。用大刀、矛子和敌人拼杀。”他动情地继续说，“那一

带是少数民族地区，人烟稀少，群众中革命工作基础又很差，地势又不好。”“敌人多是骑兵，我是步兵，又缺乏同骑兵作战的经验。这些情况，使西路军没有能更多地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

在延安，李先念先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中央马列主义学院学习。

一天，组织部门的同志找李先念谈话：先念同志，组织决定你到八路军129师当营长，你有什么意见呀？

由军政委降到营长，一下子掉了六级，犯了什么错误？是西路军的惨败怪罪于他？但李先念没有想这些。只要是扛枪打日本就行。

但是，这样处理，毛泽东知道后坚决不同意。他没有忘了为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出过力的年轻军政委；没有忘了同马家军围追堵截的拼杀中，在无粮无棉衣的冰雪祁连山中，带出一批骨干到达新疆的前途无量的军政委。他愤愤地说：

“这样处理李先念是不公平的！”

他亲自为李先念作了安排。并托刘少奇找李先念谈话。少奇坦诚地说：

“先念同志，主席同我谈了你的事，中央作了研究，决定派你回老家去。”

李先念听了先是一愣：“回老家去”，解甲归田？就疑疑惑惑地问：“是回黄安李家大屋？”

“不！”少奇同志笑了，知道先念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心态。“确切地说是鄂豫皖，是中原，到河南省委当军事部长。”

“任务呢？”李先念心中一块石头落地。泪水在眼眶内涌动。“我只给你讲三点：一、回去后，要抓武装。二、仍然是抓武装。三、还是抓武装。”

李先念明白了，到敌后去抓武装同日寇厮杀！

于是，他带领一批红军干部从延安出发，日夜兼程，于1938年12月底到达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开始了新的征战。

1967年，毛泽东在回顾这段历史时，称李先念是“不下马的将军。”

〔责任编辑：刘家驹〕

欢迎由新疆回来的西路军全体同志摄影
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一日于延安



由新疆回来的西路军全体同志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一日在延安合影



红土地的召唤

——记川味作家沙汀

阿 蕾 ●

太阳，还是那个太阳，天空，仍是那片有时瓦蓝有时阴郁的天空。然而，1991年4月，对于已近九旬的老作家沙汀来说，却是个极不寻常的月份。

这天，他的秘书一进门便兴奋而又略带神秘地问：“沙老，这个月是什么日子，您还记得吗？”

“想不起了。”他沉思片刻后，无可奈何地回答。

“您的创作生涯满六十周年了。”秘书忍不住提示道。

“都六十年了，可真不容易啊！”沙汀感慨万千，象是对自己，又象是对秘书说。

六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是，在人生的旅途中却是一段漫长的跋涉。多数人只知道沙汀是位老作家，川味作家，或谓“土著”作家。但是却不知道，他还是位党龄长于创作年龄的老布尔什维克。

他的写作生涯是从寻求中国革命真理开始的。

大山外面的风

1921年秋凉的一天，一个瘦削的，浑身散发着土气的青年，穿着当时流行的灰布长衫，外套羽纱马褂，和一位同乡一道跨进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大门。

这时，享誉文坛的作家沙汀还没有诞生，他的名字叫杨朝熙。

从荒僻闭塞的大山里，来到革命风云汇集的成都，从习惯于跑码头，坐茶馆的生活环境，一下子踏进风气开明，生活正规的著名学府，城市生活与乡村习俗，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对心理造成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杨朝熙整个被一种自卑的情绪包围了。年青人自有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本领，很快，他懂得了在同乡以外的同学中觅友，并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

第一个把“五四”新思潮播入杨朝熙心中的是同班级友张君培。

一个星期日，张君培外出去高等师范看望从前的老师，杨朝熙怀着一颗好奇的心溜进自修室，偷看了张君培的一个手抄本，发现里面摘录的都是一些《学灯》、《觉悟》和流行小册子里的文字。人生观是什么意思？社会主义应该作何解释？圣西门又是怎样一个人？他越读问题越多，求知的欲望也就更强烈，索性将抄本偷偷拿出，想带回寝室细细地读。就在他拿着窃物穿过天井时，正巧碰上了返校的张君培。于是，他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从张君培那里,杨朝熙“认识”了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刘砚僧先生,四川建立共产党的第一个组织者王右木先生,看到了各种进步书籍、刊物和手抄本,了解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中国带来的思想变动。“五四”给予他的影响虽然迟到了两年,但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同时俱来,使他犹如空山新雨,换了副脑筋。

杨朝熙的第二个好友是启发并影响他接受“五四”新文学的伙伴汤道耕(艾芜)。

汤道耕最初引起杨朝熙注意的,是他的读诗和写诗。杨朝熙最早读到的,体现“五四”新文化风格的白话诗《尝试集》(胡适)、《草儿》集(康白情),以及代表“五四”狂飙突进精神的《女神》(郭沫若),都是从汤道耕处借来的。星期天,他俩常常一起去成都的通俗教育馆,少城公园,在望江楼俯瞰滔滔的江水,情不自禁地诵读郭沫若的《女神》,在不知不觉中,陶冶了文学气质。

鲁迅和郭沫若的作品打开了杨朝熙心中另一块待开垦的新地,培养了他的文学兴趣。他开始热衷于创造社那些“思想大于艺术”的激进作品,《创作月刊》,《创造周刊》,《未名》,《语丝》等进步书刊,他都如饥似渴地拿来读,还广泛涉猎了国内外许多优秀文学作品。他开始参加各种政治活动,让思想去经受时代之风的激荡。为了表示这种觉醒,他改名为杨子青。

“沙汀”这样诞生

1926年7月,北伐战争拉开序幕。同年同月,杨子青完成了省一师5年的学习,这时他22岁。思想羽翼的丰满,使他像只急切离巢的小燕,他要远行,去看看更大的世界。

这是他第一次出川。尤其是途经武汉时,亲眼看到北伐军占领长江重镇的胜利情景。那宏大的游行队伍,青年学生街头宣传的场面,旗的海洋,飞扬着传单的海洋,还有一张张兴奋激昂的脸孔……,他的心灵受到强烈地震动。他需要行动,恨不得立时返回家乡,掀起一场革命。改变那里的贫困、落后和闭塞。

回到四川,杨子青加强了与进步同学的串联,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在共产党员周尚明的指导下,参加了具体的革命实践,于同年夏天加入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位置。

大革命的失败并没有改变杨子青的人生选择。1929年夏,他第二次离开四川,来到埋藏着大批革命火种的上海。失掉了组织的联系,这段时间是他情绪最低落最抑郁的时期。他把自己关在闸北区一间破旧的后楼屋里,没日没夜地疯狂读书,天气再热,也不肯出门一步。大量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使他沉入一个新的世界,他要探索一条从未走过的路。他结识了周扬、周立波、任白戈等一大批革命的进步文学青年,踏入左翼文学活动的行列。终于,他发现自己意识深处强烈的叙述欲,表现欲无法按捺了。

1931年4月,在上海的马路上,在千万个匆匆擦肩而过的人中,他碰到了阔别六年的汤道耕。6年的南洋漂泊生活,同样撞击着他的创作欲望。两人一拍即合,很快便搬到一处,共同开垦起各自的文学处女地来。不久,汤道耕的小说《太原船上》和杨子青的小说《俄国煤油》及《风波》问世了。这之后,杨子青便一发而不可收,接连写了《恐怖》,《在码头上》,《法律外的航线》等12篇小说,于1932年结集出版。

在为自己选取笔名时,他想起了家乡对淘金工人的称呼,便取名“沙丁”。这时已更名艾芜的好友汤道耕说:这也太不像个姓名了,不如将“丁”改成“汀”。从此,“沙汀”这个崭新的名字,伴随着杨子青的第一部集子,第一篇刊载小说和一个新人的诞生,震动了文坛。

以笔做枪

频繁的创作活动和与左翼文人的密切联系,终于引导沙汀跨进了“左联”的大门。他一面写出使人耳目一新的小说,一面在“左联”的领导下从事各种活动。就在他动笔创作小说《老人》的3月里,好友艾芜在杨树浦工人区被捕了。随后,丁玲、潘梓年被捕,应修人拒捕坠楼遇难。7月,洪灵菲在北平被捕并遭枪杀……,一大批进步书刊和作品被查禁,沙汀的《法律外的航线》也在遭禁之列,左翼文化界面临着白色恐怖的高压。不久沙汀担任了“左联”常委会秘书。这段日子,沙汀和妻子黄玉頔不得不常常搬家,躲避敌人的搜捕。他们把文件和书稿捆扎在身上,若无其事地走出危机四伏的旧居,换一个地方重新安个家,继续开始党的工作。

左联的深层活动,使沙汀又结识了一大批进步的知名作家,鲁迅、茅盾、巴金、欧阳山、冯雪峰、赵树理等人,带着各自与众不同的风格走进沙汀的视野,使他的创作有了新的转机。这个时期,虽然他的具有强烈时代使命感的小说在“左联”内外受到赞扬,但是,他自己却感到有些写不下去了。内心深处的艺术之神在召唤着他:用自己最熟悉的笔调和结构,去写自己最了解的人物。

母亲的去世使沙汀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然而,这次家乡留给他的印象却是冷漠可怕的。荒年的凄凉,乡里间和亲属间的争斗,官府与贪官的勾结,帮派间的火并,满身破布片,腿瘦得跟鸡脚一样的流浪儿童,以及倒毙在路旁的尸体……,他感到憋闷和痛楚。家乡的人和事,乡土人情,一夜之间在心底复苏了。虽然丧事后他很快便回到上海,但故乡却好象化做一个幽灵,一刻不停地跟随着他。他被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攫住了,像一个迎接新生儿的虔诚的父亲,他放弃了教书工作,把家搬到环龙路一个背静的楼上,用家乡卖田产余下的一点钱维持清淡的一日三餐,沉下心来,醉心于扯住那根灵感之光的尾线。不久,《苦难》,《兽道》,《在祠堂里》等一大批描写家乡人民苦难生活及表现底层黑暗的、

带有强烈忧愤情绪的小说问世了。这些小说构成了沙汀故乡“黑暗王国”的图式,情节和描写让人惊心动魄,形成了一次暴露的高峰。同时,也完成了他本人向乡土文学的彻底转移。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沙汀的革命活动和创作更加繁忙。1937年11月,他从上海回到四川,与受到严重破坏的四川党组织车耀先、张秀熟取得联系。不久,车耀先与罗世文重建了四川党组织,沙汀便一面教书,一面协助组织上做文化界的统战工作,并发起组织成都“文艺界抗敌工作团”。

延安之行

1938年9月2日,沙汀经过18天的长途跋涉来到延安,开始了他新鲜而又陌生的军旅生活。

不久,他见到了毛泽东主席。

会见之后,沙汀被安排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主任。沙汀一心想着上前线,在给学员们讲课的同时,冷静、扎实地做着写作的准备。

当时,延安风行讲演。沙汀不仅领略了毛泽东生动幽默的讲演风格,而且还聆听了周恩来、王明等领导同志各有特色的讲演。这天,“鲁艺”的名人讲演会请来了贺龙将军。

贺龙高矮适中,厚实实的却不显得肥胖。宽大的脸两道浓眉,细小的眼睛笑时布满了皱纹。唇上蓄着黑色的短须,显得很威严。可一开口,全身竟充满诙谐,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地道的农民,一个浑身散发着光彩的农民。沙汀被这种性格的力量迷住了。他不由自主地去接近贺龙,采访他,靠近他,直至跟随他上前线。“阔大不羁”,是沙汀形容贺龙性格时选用的第一个词儿,贴切而又形象。

1938年1月25日,部队到达冀中军区司令部附近的河间惠伯口时,遇到了相当严重的局面,日军两个师的兵力围攻这块平原根据地,周围六、七个地县相继失守。这时,贺龙的副官处通知沙汀、何其芳等人到10里外的李村集中。待他们紧张地赶到李村时,才知道原来是一二〇师和冀中军区在开联欢会。散戏时,沙汀听到有人来报告:20里外发现日军汽车。而贺龙却神色安详,微笑自如,全然一副超脱的样子。他向脑后掀了一下帽子,亲切地关照沙汀等人回去睡觉,眼神里藏着一股意味深长的暗笑。这真实生动的感受和巨大的感染力,是任何一个作家坐在房间里无法臆造的。

15个月的军旅生活,不仅锻炼了沙汀,而且,为他的创作积累了不少素材。带着满身的战尘和一颗激烈跳动的、为艺术献身的心,沙汀率领文学系的学员们辗转2个月,于7月1日从敌后回到延安。

趁着新鲜的印象,趁着喷薄的激情,沙汀在延安的窑洞里写成了长篇报告文学《贺龙将军在前线》。这是沙汀作品中少有的一部感情外溢的作品,字里行间洋溢着热情,完全打破了他以往冷峻、不动声色的创作格

局。自此,延安与冀中的人和事,带着新的气息纷纷走进他的乡土世界。书一完稿,萦绕在心头的那根故乡的绳索就抽紧了。他知道自己创作念头多半盘旋在故乡,文艺思想与延安当时的某些主流理论不合拍。他反对“旧瓶装新酒”,用卖梨膏糖小调为群众演唱。不同意为大众服务就得降低艺术水准。于是,他的四川犟脾气上来了。尽管意识到内心要求返回故土的呼声和不能走的道理是那样的不谐调。

1939年冬,沙汀回到山城重庆。去曾家岩五十号的周公馆报到后,在华裕农场安顿下来。

从解放区回到国民党统治的重庆,沙汀经历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安静下来的时候,对延安的怀念情绪便包围了他。他怕这些临时闯入的印象不像乡土的印象那么根深蒂固,因此便不顾一切地写,生怕它们淡漠下去。创作与思考使他时时有意识地拿延安遇到的新型人物与家乡的人们做比较,越比,对自己乡土在整个民族战争中显出的守旧陈腐,越加剧了认识。所以,写起来比任何时候都要轻松,差不多三五天一篇,以至让熟悉他创作情况的同志们感到吃惊:这个在上海时的难产作家如何写的这么快?

正当他写《敌后琐记》时,形势急转直下,罗世文和车耀先突然被捕。4月,日机开始轰炸山城,6月,轰炸进入了高潮,城里的街道遭到很大破坏。可是,沙汀的写作却在飞快地进行。一大批反映解放区和部队生活的作品,及有关文艺思想的论文从他的笔下诞生。报告文学《到华北前线去》、《毁路与修路》、《小鬼》、《老乡们》、《游击县长》、《知识分子》等,从各个层次和各个角度,揭示了共产党人和民众的革命热情。短篇小说《在其香居茶馆里》,代表了他这一阶段创作的顶峰。但是,这部小说的完成却引动了更大的创作欲望——对中国丑恶政治缩影的一次巨大描写。沙汀再一次被一种巨大的魔力攫住,长篇小说《淘金记》中的情节在他心中翻腾、旋转……

情系红土地

1941年,“皖南事变”震惊中外,项英牺牲,叶挺被俘的消息传来,中央准备面对更大的分裂。曾家岩繁忙起来。周恩来根据南方局“荫蔽精干,积蓄力量”的方针,召集沙汀等人讨论组织重庆进步文化人士的疏散问题。在别人的疏散问题就绪后,沙汀向党组织说出了自己的打算——回安县老家。

安县的大山迎接了它们的儿子。这个描写地狱,自己却走进地狱的人,能够在出产红薯和鸦片的红土地上收获到什么?连历史也感到惊讶,倔强的沙汀竟笃信故乡贫瘠的土地上能找到丰富的文学矿藏。

艰难的创作伴随着贫困和被追捕的生活。母亲留下的家产已被抽大烟的哥哥挥霍一空。沙汀只好去舅父家里寄居。不久,国民党成都行辕在安县成立特委

会，新任的军官对沙汀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于是，舅父急忙让沙汀躲到10里外的何家沟去。果然，很快便传来了成都行辕密令县府逮捕沙汀的消息。在舅父的安排下，沙汀转移到离安县60里的睢水，在一间蒸笼似的碉堡小楼屋里，囚徒般的生活了3个月，他潜心写作，不断给山外寄去呼唤自由的作品。

暑假过后，局面较平静了，沙汀开始出门散步。这时逮捕令还没撤销，为了更好地隐蔽，他搬进刘家酱园废弃了的后院，一间据说常闹鬼的房子。这里荒凉破败，而且开门就是大山，决没人想到会有人住。安静的环境，使沙汀很快沉入长篇小说《淘金记》的创作。那没落乡坤、恶棍争夺金矿的殊死角斗，饱蘸着心血从他的笔下流淌而出，构成了一幅大后方最黑暗的缩影。家乡的人和事儿他知道的太多太熟，有关乡镇茶馆、赌场、烟馆、戒烟所、保甲、地主内宅等各种黑幕生活的积累，使他下笔如有神。1942年秋，他完成了代表他创作顶峰的作品《淘金记》。

沙汀以巨大牺牲换来的这一生中创作的高潮，并没有随着《淘金记》的完成而消失。长篇小说《困兽记》，中篇小说《过关》的相继完稿，使他再次认定回到家乡是正确的选择。

三年一晃而过，刚从大山里钻出来的时候，朋友们几乎不认得他了。长袍大褂，配上一顶剪去帽檐，像毡窝子一样的黑呢礼帽，手上还戴着金戒指，活脱脱一个乡绅士保长的模样。他竟然把自己融进了书中的人物。当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路上的安全。重庆党组织召集的整风学习活动，给他带来了延安的气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他想得很多。他的创作是为一定的政治服务，这似乎不成问题。“有意识地进入生活，向它毫无止境地掘取创作源泉”，他一向就是这样做的。谈到描写工农兵，他似乎有些对不上号，只注意“农村小市民以上的人物”。如果按照整风文件衡量，就不是主要的写作方向，这个问题他想不通。

分散学习时，沙汀听着长期在香港工作的乔冠华检查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对他的影响时，想到的很多。他想起前几天王若飞对他开的一句玩笑，“怎么走了就不转去啦？”他的“去”，是指边区。不久前，周扬在给他的信中说，听周副主席讲，你在重庆做了不少联络工作，这几年写作也有成绩。但比较起来，还是反映新的抗日根据地的现实意义更重大，是不是考虑再来延安？周扬的话充满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他应该怎样答复？

沙汀为离开延安而羞惭，但是又坚持一个作家的立场。他考虑川北以外，自己理解不深的生活不能写。反映落后的生活，讽刺、暴露，是不如歌颂党和党所领导的斗争来得重要，但他只能“退而求其次”。他的讽刺是对新生活期望的一种反衬，他热爱和同情那些被压在生活底层还无缘当家做主的“工农兵”，他要挖掘他们遭侮辱，被损害的心灵中的光明！

学习结束后，带着朋友们相通相助的温暖，沙汀毅

然回乡，在一块搭着木板的拌桶上，他开始入魔地构思第3部长篇小说《还乡记》。

抗战胜利的喜悦是短暂的，随着国共合作的破裂，形势又严峻起来。沙汀除了在乡下写作以外，还定期到重庆从事革命活动。有的同志牺牲了，多数同志转移了，克制着熟识的朋友一一离去带来的惆怅，他担任了“文协”总会理事，筹组重庆分会事宜。

1947年，四川省政府对沙汀下了通缉令：“缉拿归案，就地正法，以烟匪报闻”。四川省保安司令部也发出通令，说他“飘忽于康定、川西北一带，假借亲戚之掩护，准备在安县睢水一带建立根据地”。到1948年，这个保安司令部编发的《一周匪情综合通报》中云：奸匪杨子青，即沙汀，“近在睢水活动”。绵阳专署的专员说沙汀《困兽记》写糟了，宣传了“反动思想”。严酷的形势，使沙汀不得不躲进深山坳里的若竹庵深深地隐藏起来。危险、清贫和夜以继日的写作，摧残着沙汀的身体。他带着没写完的小说，只身在安县的大山里转来转去。孤独侵蚀着他的心，比恐怖更可怕。有时他觉得神经都快断裂了。

终于，他病倒了。

他有了一次死的体验。大口地吐血和昏迷，随后是2个多月的卧床不起。贫病交加，所幸的是外界朋友纷纷相助，寄来钱和药品，这四面八方涌来的温暖帮助他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半年后，当他从一些旧报纸上得知半个中国已经光明的消息时，他兴奋不已，病也好了一半。不久，传来了县委通知他进城的消息。

10年的半囚禁生活结束了。沙汀带着家乡红土地的气息和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三部长篇小说和30余部中短篇小说满怀喜悦地走出大山。他不用再化装，不再怕碰到任何人，他可以自由地呼吸，大声地讲话，大声地笑。因为，祖国——解放了！

“我的心思永远‘不可救药’地留给我的故乡。”谈到这段日子的创作生涯，沙汀没有后悔和遗憾，他坚持了一个大山里成长的作家的立场，无私地将自己和大山，以及它的子民们展现给了大山外面的世界，并在中国文学史上争得了一席之地。他知道自己不是奔腾喷溅的瀑布，只是一块与大山默默相连的，生长红薯的坡地，他热爱这块家乡的红土地，更热爱这块红土地上长出的“红薯”。

去年，岁月老人引导着沙汀走到87岁高龄，虽然他因病双目失明，连说话都很吃力，但是，他仍旧坚持着用心在写作，将自己最后的文思留在录音带上。他是大山的儿子，他要像大山一样挺拔、刚强……

1992年初冬，迎着京城乍起的寒风，沙汀踏上了征程，他挡不住红土地的召唤，带着欣慰和岁月的磨砺，再一次扑向家乡的怀抱……

本文照片摄影 李舒

〔责任编辑：古力〕

诗

城

益

阳

巡

礼

80年代中,我收到一本来自湖湘益阳地区薄薄的《散文诗》季刊,无意中翻翻,不知不觉将它看完了,反倒奇怪起来,为什么这样一种新颖的纯文学读物,竟然会出自我的故乡益阳这座闭塞的内陆之城?到80年代后期,这份《散文诗》已在全国打开了局面。变得精美有派,风姿绰约,引起了全国青年的关注,据说创刊是在1985年冬季,那时全国的散文诗刊仅此一家。创办人排除种种阻力,终于站住脚跟。这份刊物后来由40开本改为袖珍型32开本,更加俏丽了。作者中的年青人一直占绝大多数,各省、市、自治区的作者都有。里面家乡作者群显出了相当的优势。这推动我去思考:益阳的新诗创作队伍是怎样形成的?为何能出现偌大的气候?中国新诗的队伍在全国愈聚愈众,是在我家乡树起的这杆诗之旗,要坚持走发展散文诗的路。这是一种怎样的文化现象?

去年初秋,我回益阳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专题讨论晚唐五代一位僧人的诗作,他叫齐己,是益阳老乡。《全唐诗》收他作品的数量,2千多位作者中他排第5。不但数量多,而且繁枝硕果,妙句生辉,有许多精警可诵的佳品。这次会议的参加者,中老年占绝对优势,都是写旧体诗的里手。早在60年代初,益阳就有人开始自发组织诗词吟唱活动,以油印诗稿形式散发同好,相互酬答。至于正式成立诗社则在1983年至1986年之间。影响广泛在当地负有盛名的,就有地区的桃花窗诗社,市会龙诗社,县碧云诗社,桃江县天问诗社。4个诗社社员加在一起有700人。再加上奎星诗社等其他诗社社员,大约有千人之多。这些诗社都有自己的社刊。如今再也不是油印的本本,而是装帧上考究、印刷上精良的类似线装本的样式。与国内一些省、市的兄弟诗社定期交换,往来唱和,也与海外一些兄弟诗社有交流,互相酬答。常于元旦、春节、端午、中秋、重阳、国庆之日兴起吟唱。仅以会龙诗社为例,从1987到1991的4年光景,该社社员在全国各类诗刊发表的诗作就超过3000首,有的诗词已分别收入《中华诗词年鉴》、《当代中国诗词精选》等诗词专集。他们在海外诗刊发表的诗作也很可观,近400首分别登载于日本的《一衣带水》,新加坡的《新声诗社》与《神州客诗词》,泰国的《国风吟苑》,马来西亚的《南洲诗社》,美国的《四海诗社》,香港的《春秋诗社》等诗刊上。诗社社员个人出诗集也不少。我见到好几位老年诗友,都是一身正气而经得起折腾的人。一旦淑气回春,和风解冻,则益自奋发,竭尽全力从事所分配的工作,业余便将平生这份写诗的爱好好好拣起来,广收博采,晨吟夕咏,乐在其中。有一位杨道伟先生,自1958年突起仓猝,蒙冤以至身陷囹圄,即使在如此困境中,仍坚持写诗。假如劳动中有灵感来,便立刻把诗句偷偷写在手上胳膊上,劳动后再偷偷转移到政治学习与业务笔记本里,挟藏其中。管理人员发现不了他自编的程序。这种办法居然完整地保留下来不少诗篇。他的《丹心集》中有这样的诗句:“半世沉浮嘲野鹭,一腔心血托春蚕”,这就是他的心声心愿。还有一位王子羲老先生,他在《晚晴小集》中自言:“人之一生,如优伶演剧,或喜剧,或悲剧,变动不居。余自来发受书,迄于不惑,十载负笈,专习师范。出长龙师,初试锋芒。设帐潭州,崭露头角,此演喜剧之岁也。不惑之后,被错划右派,斥逐农村,荆妻捐帷,稚稚失恃,糟糠不厌,命几难保,此演悲剧之岁也。及至耳顺,遇时清明,得以平反,重登黉堂,将欲献其余力,以补念年之所失。课生绩,校典籍,创诗社以求友,建民盟以参政,栖栖遑遑,冠履不暇,而不知老之将至,此复演喜剧之时也。”不知怎的,我读着心里很不是滋味。这种情形,在这一代知识分子中实在不乏其人。一场风暴过去,年已60,犹是年青人的抱负,仁人志士的博大胸怀。这种气派,这种恢宏器识,怎不令人钦敬!

益阳这地方,古代处八百里洞庭之滨,资水注湖之处。优越的湖湘自然环境,与三千年湖湘文化历史,日渐形成了这一地带独具特色的良好人文环境,有益于人才辈出。相传屈原再次遭放逐,跨澧、沅、资、湘四水,来到湖湘中心地带的益阳、桃江地区,流连忘返,辗转行吟,达九年的时光,他忧愁幽思,徜徉山泽,见楚先王庙及公卿祠堂的壁间画有天地山川神灵及古圣贤人物,因作《天问》于壁,呵而问之,以泄幽怨。桃江人尊屈原为凤凰神,故上有天问阁,下有凤

鳳廟，祀屈原与夫人及三个儿子。惜乎今日只留有一块“古天问阁遗址碑。”两千多年以来，桃江人没有忘记这位一直被称为“三爷爷”的三闾大夫。许多人家的神龛上，犹立着三爷爷的塑像，虔诚敬奉。每到端午三爷爷忌日这天，这一带龙舟竞渡，无论桃江、益阳，历来比其他地方狂热。每年的龙舟参赛，多至半百之数，那是一年中热闹的一天。

桃江即著名的桃花江。“桃花江是美人窝”是否始于《离骚》屈原的自况，引发出后来的湘潭人黎锦辉的创作激情，或是当地历来多美女，黎先生情不自禁，涌出了创作灵感，实不得而知。但是，当我站在天问台上极目远望资江边那优美动人的羞女山时，才恍然悟出了美人窝的来历。原来羞女山下流淌着一股永不干涸的羞女泉，喝了它的人就细皮嫩肉长得出色。又因桃花江水渗进了羞女泉，不但这一带女孩子长得俊，而且象征这美女地带的桃林成荫，花开如霞，是别处所没有的稀景。因此有人说：这羞女泉中含有一种美之素，是可以从其物质成分中分析出来的。我曾寻思：九年徘徊于这一地带的三闾大夫，以他那浩淼磅礴的诗人气质，难道会拒绝羞女山的美与羞女泉之素所赋予他的灵性与创作中的灵感吗？难道不是源于他所眷恋的此一带自然山水风光，欲借以排遣、洗濯他人事与国事上遭遇的巨大不幸而不能，便相撞出《离骚》这部千古巨著的么？而后来历代纪念这位诗人的本地百姓，不也正是从羞女山泉这一带的资水风光中获得灵性，引出种种浪漫的怀念形式，来抒发对这一伟大诗人的热爱，与对家乡山山水水的眷恋之情么？

诗乃情的花朵，情为诗的根系，端午节这一天理所当然成了益阳人的诗歌日。这一天不仅诗歌爱好者少不了写诗，此地寻常百姓家也要附庸风雅，这已是千古的习俗。除了门框上的楹联，还得把《唐诗三百首》或《千家诗》翻出来，这是凡识字的家庭都必备，经常与《皇历》摆在一处的家用宝书。他们要从诗集中觅个韵脚，借点词语，获得启迪，谄出一首绝句，或一首律诗，找懂行的人指点一下，就这样共同参与并掀起那五月的诗潮。这就是那部开创了炎黄民族抒情长篇光辉起点的《离骚》，与充满怪力乱神的《天问》诗篇流传至今的群体性回响；这是后来齐己上人诗歌中所描画的“园林红桔柚，窗户碧潇湘”那红与绿双色之美，在这一带黄色土壤中生长出的湘桔，此前就已成为屈原借以表现他人性光辉的《桔颂》，永远构成湖湘文化的灵魂之故。

益阳的名胜古迹，星罗棋布。历代诗人李白、杜甫、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至清代郑板桥、孙绍基等，包括益阳诗人陶澍、汤鹏等 200 多名诗人，都有对此间名胜古迹的吟咏留传于世。由桃花论诗社编造的《益阳历代名胜诗词联赋》，收唐宋到明清诗作 400 多首，20000 多字，辑录了裴玄亭、栖霞阁、碧云峰（即小庐山）、奎星塔、天问台、淳邱山、赤松亭、楚贡亭、范蠡山等几百十

余处景区的诗作，包括沉江的“洞庭秋月”等潇湘 8 景，益阳“艺苑弦歌”等箴言 8 景，桃江“大洞瀑布”八景与“石船载月”双江景点等，胜迹珠联，佳句络绎，正如该书主编蒋天桂先生说的：“沉地以人传，人以诗传，诵其诗而益仰其人，仰其人而益重其地”。

记得解放前我在县立一小读书时，那里的语文老师，历史老师，以至体育老师，都能随意甩出诗经篇章中的句子或楚辞警句。他们相当熟悉唐诗，常听他们陶醉式吟咏，调子悠扬，我现在还记得一清二楚。甚至还能吟咏。

益阳的诗歌创作群体中，办《散文诗》刊的这一帮，虽然没有诗社形式的组织，但大家细心扶植它，紧紧靠拢在它的身边，同样具有凝结力与亲和力，同样是传统文化在这一地区的拓展与光大，同样表现了益阳人文化参与意识的新觉醒。散文诗人邹岳汉是一位远见卓识的拓荒者。6 年前，他力排众议，办了这份在黄色刊物开始泛滥时与之对立的《散文诗》。从开办时印数 1500 册到 1991 年的 50000 册，6 年的奋斗，终于走俏了。如今读者遍全国。该刊有三精，一是精选，即作品的采用率为百分之二，只认稿子不认人；二是精美，即设计装帧上不断改进、变化，防止老面孔；三是精良，即严格把好校对、印刷、装订关，让每一本都如同桃江美人般俊俏。凭这三精，终于博得了全国范围内的广泛信誉和支持。这个编辑部的座右铭是六个字，求新、务实、高效。我以为他们切实做到了。这份刊物每期都有碰你心、动你情的好作品。难怪也难得诗论界的谢冕教授称赞它“是第一流的”。老诗人郭风也认为它“为发展中国的散文诗作出了贡献。”还有一位美国朋友陈先生说：“我为故乡能出这样高质量的诗刊而骄傲，更期待她能打入海外”。

我有幸进入过该编辑部办公室，即：市文联办公室加《散文诗》刊编辑部二十四平方米房间。室内三桌两柜，外加几把椅子。所有稿件、信函、刊物、书报、资料，堆满了一屋。若赶上发刊的日子，则四周大包小包，天上地下，甩出房外，占领台阶，来人哪有插足之地？就是这三位干部（编辑部的全部人马），6 年中在认认真真发现并培养作者，组织并审定稿件，加上对外联络，来稿登记，设计制版，校对，以至打包，装卸，发邮，全都是这三位干部去干。此外，还得一人兼会计，一人兼出纳。实在忙不开时，各自的夫人与丈夫来帮忙，不取报酬，共襄义举。这是一种怎样的事业精神啊！当我置身于这间编辑室，与这几位默默耕耘的开拓家们对话，我始悟出《散文诗》高雅格调与时代精神的根系何在。我的思绪又回到屈原身上那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追求精神上来。他们所共有的就是那种为理想而甘愿全身心投入的执著。在益阳这块土地上，生发出最早由屈原为代表的华夏诗魂，一代代传递下来，在当今全民奋进的时代，不正是体现人生价值的一种质地么？



卢云●

华人王安

美国电脑界的巨子

计算机是能够完成计算的机器，俗名叫电脑。在现代人的生活中，计算机的应用越来越普遍，它的发展，主要是近半个世纪的事。

40年代末,美国早期计算机的制作工作中,就有一个名叫王安的人参加。在其后的30多年中,王安为电脑技术的发展所作的贡献,被美国人广泛认可,并且被誉为“电脑奇才”。王安在麻萨诸塞州经营的拥有3万多员工的跨国电脑公司,被美国人称做“麻州奇迹”。

王安的成功,不仅使炎黄子孙引为骄傲,而且使世人为之倾倒。

王安的面面观

名声显赫的电脑大王,其实是个很普通很随和的人,他温文尔雅,和善亲切,一脸儒雅气质,为人谦和朴实,决无大老板财大气粗的神气活现。因此,深受公司员工们的尊敬,被人们亲切地称作“博士”。

王安通常穿一套深色的西装,在白衬衫上老是系一只领结,不刻意打扮,不善于交际,也不喜欢抛头露面。他能打一手出色的网球,喜欢持一把特大号网球拍,挥洒自如地在球场上奔驰。学生时代,他经常作为校队代表外出比赛。此外,他还是乒乓球爱好者,是大学乒乓球队一名出色的队员。

初中时,王安就偏爱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和数学,而对历史、地理、政治等人文科学兴趣索然,以致需要补考,才能升级。1948年,他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应用物理学博士学位。他在数学方面的造诣,对于他日后利用电学进行运算至关重要。

王安的事业,是从小小的“王安实验室”起步的。它是1951年王安开办的一家个体企业。王安既是老板,也是雇员。小店开张三个礼拜,才接到头一笔生意,四套磁心存储器,每只定价四元。第一年做下来,营业额总共只有1万5千美元。王安并不以此来衡量成败,他认为,初步商界,摸索入门的经验更为重要。

王安是个很有决断力的人,他的行事哲学是:行动胜于犹豫。那时,计算机才出世不久,美国只有一台电子计算机在运转,人人都知道,电脑不是一门赚钱的行业。科学家们也正在大学的实验室里为这门诞生不久的科学伤脑筋。为商业用途生产这种机器,没有任何现实的可能性。王安丢掉研究工作去办企业,被人看作是一项前途未卜的风险投资。但是,王安仗着手头攥着一个磁心存储器,王安预见到这项发明在商业上可能产生的用途,毅然决定从研究人员转到创业的道路上。他迈出的这一步,引导他走向了世界的征程。

王安迈出第一步后,总是从远处着眼,近处着手,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达到一个目标又向下一个目标奋进。但是人生的道路并不平坦,世事往往充满变数。在自信和决断之外,又需要节制和耐心。王安把这些看来互相牵制,彼此冲撞的品质,巧妙地揉合在一起。“你无法想像,在我的决策当中,有哪一项决策是这些品质没有起过作用的。”王安这样说的时候,从中概括出一个平衡的概念:“平衡,其实就是一种定位过程。它能使你意识到在任何一种特定的局面下你自己所处

的地位。正是它,可以防止你由于受到看不清前进方向和如何对付的压力而匆匆忙忙地采取行动。正是它,可以缓和你的果断性,使你的果断性不至于导致独断专行。也正是它,可以缓冲你的自信心,从而使一种有益的品质不致变成一种危险的品质。”王安还把平衡这一概念,索兴解释为孔子的中庸之道。

王安本着取之于社会应还之于社会的想法,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他的名字上了美国富豪榜以后,他还是住在30年前住的旧房子里。但对公益事业的捐献却从不吝惜。哪里的公益事业需要,不管是学校、医院,还是慈善机构,他总是大方地开出一张又一张巨额支票。他认为,他之所以乐于捐献,是因为他觉得有义务报答曾经给他以帮助的社会。

王安相信运气,认为冥冥之中有一位幸运之神。他说:“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运气这个因素都在其中起着巨大的作用。”他把自己的某些成功,看作是在某种程度上走运的结果。他说:“我从来没有忘记运气是人的一生中的一个因素。”如果你想同他深谈,他会跟你展开来谈下去,理直气壮地告诉你:“一个人要是认为他的生活,完全是他自己的决定和行动的产物,那就是在自己欺骗自己,那甚至是十分危险的。那种自以为完全控制了自己命运的人,是误解了这个世界,对于这种自以为控制了局势的人,对世界的误解必将让他付出昂贵的代价。”

对王安的面面观,因为限于篇幅,不可能精雕细刻,而只能粗线条地勾勒一下。

王安把他在事业上的成功归结为:典型的美国经营进取心、中国儒家道德观念和信仰,以及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和技能。

当你在凝视这幅王安自画像的时候,千万不要忽视王安是个合二而一的人。他的一半是科学家发明家,另一半则是企业家。

王安的一半

王安的科学生涯,始于哈佛大学计算技术实验室。

他在哈佛拿到博士学位后,需要找份工作做。听说校园里有个计算技术实验室,便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前去碰运气。凑巧,被录用了。1948年5月的一天,他走进这个专门研制数字计算机的实验室,开始上班。一两天后,实验室的主持人艾肯博士交给他一个研究课题,要他解决计算机存储信息问题。

艾肯博士是美国研制计算机的先驱者之一。他深知这个问题的难度有多大。为探寻一种解决问题的途径,研究人员已经绞尽脑汁。虽然设想了许多方法,但都被各自的缺陷推翻了。

王安没有因袭别人的思路,独辟蹊径地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原理。随后不久,又设计制造出一种能迅速存储的工具。这就是“磁心存储器”。

这项成功,使28岁的王安从动脑筋中得到快乐。

他兴高采烈地说：“在我为这个问题奋斗了3个星期之后，我自然而然地找到了解决办法。”他甚至十分奇怪，为什么以前竟没有一个人想到它。他并没有想到这是计算机技术中的一项重大突破，更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参与创造历史。在研制芯片于60年代末出现之前，世界上生产的所有计算机，都采用王安发明的存储器作为信息储存和检索的手段。

世人都以为，王安在哈佛大学是专攻计算机的。其实，他拿的是应用物理学博士学位，而不是计算机学博士学位。那时，计算机科学是新冒出来的，在大学里还没有专攻计算机学的博士。但在哈佛实验室的3年，王安充分利用它的实验条件，倒是真正地钻进计算机科学中去了。他日后接二连三的发明，每每使他难以忘怀在哈佛实验室的岁月。

王安的发迹，与他的发明密不可分。

60年代中期，王安推出世界上第一台操作简便的台式计算器。一进入市场，便使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商人和银行职员为之着迷。几乎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它迅速在北美和西欧占领市场，成为极其畅销的产品。

70年代中期，王安又推出世界上第一台可以直接在荧光屏上随意编辑文稿，随意存储和检索文稿的文字处理系统。到80年代初，王安电脑的文字处理系统，完全取代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的机器，成了美国这一市场的统治者。

王安先后推出30多项高科技产品。他把每一次发明，都归功于突然闪现的“想法”或“念头”。他说：“它们几乎都是我的下意识送给我的礼物。”作为发明家，王安被誉为30年来对美国电脑事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人。今天，走进全美著名发明家纪念馆，你会看到王安博士被列为美国第69位大发明家所受到的崇敬。他的业绩，与发明电灯的爱迪生、造出第一架飞机的莱特兄弟、发明电话的贝尔和造出汽车的福特等人陈列在一起。

王安深深懂得，一个企业要想不断更新，必须抓住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两个环节，因此，在他创办的公司里，建有王氏学院和王安研究所，统称王安研究中心。他通常要花40%的时间来主持教学活动。在科研和教育上花钱，他出手大方。单是1980年，公司花在科研和教育上的经费，就达7亿美元，相当于40亿元人民币。

1986年7月4日，美国总统里根在美国国庆庆典上，授予王安一枚全美杰出人士荣誉奖章，作为表彰他对美国科技发展所作的贡献。

王安的另一半

人们通常都认为，有科技头脑的人不一定懂得经商。

美国还有人出于歧视，认为中国人除了开饭馆和洗衣店，不会做别的生意。王安，这个从中国来的留学生，到美国才6年，人生地不熟，想在高科技领域插一

脚，许多人预料他不会成功。

做生意得有资本。王安的资本是600美元。他在波士顿市哥伦布大街296号租了一间店面，每月70美元。开张前，又花钱买了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装了一部电话。就这样，“我，王安博士，将要以王安实验室的名义开始经商了。”他有一项发明在手，虽然资金少得可怜，然而身怀数字电子技能，具有独立作战能力。他自信，经商是个聪明的选择。

王安的起步是一步一个脚印踩出来的。他说：“事实上，我从来不希望王安实验室的发展每年超过50%。因为，无论是哪一年，我都感到我只能学会管理一个比当时管理的企业大一半的企业。”小店开张4年后，1955年6月，王安在他实验室的原址上，成立了王安电脑公司。王安说：“我是个稳扎稳打的人。”他在网球场上是这样，在企业经营中也是这样。

王安没学过工商管理，但具有超一流的管理能力，堪称“工商管理博士”。他这方面的管理才能从哪儿来的呢？

王安的诀窍是善于学习。在王安实验室成长的每个阶段，他都要结合实际学习管理下一个发展阶段所需要的知识。他把自己比做是学徒，随时学习。他说：“当出现业务管理方面的挑战时，我就得学会去对付他。”他还说：“你不必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不必看工商管理硕士们的脸色，不必追随那周期性地吸引美国各种董事会注意力的管理热，也能使你的企业繁荣昌盛，蒸蒸日上。”

王安经常琢磨的一个问题是，让发明与市场挂上钩。从50年代初第一台商用计算机出现在市场上以后，王安就密切注意把每一项发明与商业用途联系在一起。王安说：“我确实很关心新的发明，但是我只关心那些能够为市场需要服务的新发明。”每一次科学上的发现，他都要尽力去探索进一步应用的一切可能性。

王安平均每1年至少有一件发明创造，不是用以发展新产品，就是使老产品推陈出新，更新换代。他在搞发明创造时，眼睛不停地瞄着市场，不断地发掘下一个“大热门”产品，而把推出不久的新产品看作是过渡产品。60年代后期，他们推出的台式计算器还在风靡市场时，王安就在动脑筋生产新的通用机器来取代它了。

王安把用户看作“上帝”。他以自己的名字来为公司命名，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表明公司为打上WANG（王安）印记的任何产品负责。他向用户提出的口号是：“铁一般的保证。”

王安在世界上105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370多个分销办事机构。在产品维修服务方面，信誉卓著。

王安以600美元资本起家。30多年间，年营业额从1万5千美元升到30亿美元，跃增20万倍。从一个侧面看，是感动“上帝”得到的回报。

王安把公司的决策权牢牢抓在自己手上。他说：“一旦创办者失去对其公司的控制权，他就不再能指挥

公司朝着他所制订的目标前进。”

70年代初,公司的台式计算器在市场上继续走俏,王安却决定放弃这个产品的生产。许多员工包括一些高级管理人员想不通,反对这个决策。他们说,这个产品的销售额占到公司总收入的70%,别的公司眼馋,正准备上同类产品,我们为什么要丢掉!有的说,台式计算器已经打向世界,我们不但不应该放弃这个市场,而且应该扩大做下去。王安相信自己对市场走势的分析,认为这个产品的前景不会好,坚持立即开发新产品,放弃老产品。果然不到两年功夫,台式计算器每台价格从600美元滑落到20美元。

当然,王安不是那种独断专行,听不得逆耳之言的人。在许多情况下,他认真倾听员工的意见,倾听各部门管理人员的建议。他说:“依靠独断专行地决策来管理公司,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因此,他总是一面握紧手里的控制权,一面又让耳孔里响着众人的声音,使管理工作掺有员工的智慧,员工干起活儿来也卖劲。

当王安实验室初创时,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就在计算机行业处于霸主地位。它资金雄厚,人才汇集,年收入比王安实验室大1万倍。1956年,IBM花了40万美元,从王安手上买过磁心存储器的专利使用权。它决没有想到,这个小小的王安实验室奋斗30年,把两者年收入的差距缩减到只有20倍。IBM这个不仅全美而且全球最大的电脑公司,发现自己身边站着另一个巨人。

经过多年经营,王安电脑公司为自己塑造了这样一个电脑巨人的形象:拥有坚强的研究发展部门,庞大的市场占有率,以及健全的市场行销系统。

王安当初独立经商时,并没有期望要成为一个富翁。他只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证明王安能够出人头地,获得成功;同时,也想去改变一下美国人头脑中的华人只能开饭馆和洗衣店的形象。

80年代中期,王安电脑公司的财产净值达16亿美元。王安一跃而成为亿万富翁,登上全美富豪排行榜,列为美国第五位最富有的人。那个不起眼的王安实验室壮大了,跻身于美国200家最大企业的行列。如以营业额的年增长率计算,则名列前10名,居全美各大电脑公司之首。王安作为科技企业家,在美国的科技领域开拓了一条成功之路。

王安匆匆离去

1990年3月24日凌晨,时年70岁的王安博士,因患食道癌,在波士顿的一家医院里,停止了心脏跳动,离开了他的家人和他亲手创办的公司。

王安走得太急了。他眷恋着桑梓故土,原想再回去看看。

王安晚年两次回到祖籍江苏昆山寻根。他的先辈

在这里住了600多年。他的少年时代,大部分时间是在昆山度过的。他在这里上小学,在这里一个小小的图书馆里,阅读过达·芬奇、牛顿、伽利略等科学家的故事。为反对日本侵略者,他和小同伴一起上街游行。这个当时只有1万人口的小城市,在少年王安的心灵中留下很深的印象。故乡的老屋更是时在魂牵梦绕之中。当睽别30多年以后回到一往情深的故土时,他感到,岁月给这个小城带来的变化太大了,而变化不大的倒是自己一口浓重的乡音。

他的大学时代在上海度过。他是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生。1945年争得官费留学的机会,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他没有忘怀曾经哺育和培养过自己的故土。头一次返国,就特去上海探望了母校,表示愿为祖国电脑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随后,在上海建立了合资企业上海王安电脑发展公司。1986年10月,王安第二次回到祖国,亲自主持了这家公司的投产剪彩仪式。这一次,他在访问北京时,受到邓小平主任的亲切会见。他的成就,受到这位中国领导人的赞赏。1988年,他拨出专款设立王安奖学金,专门用于帮助祖国培养高科技人才。

他离去前,对故国有难以割舍的思念之情。他生前说过:“中国是我的出生地。一个中国人永远不可能丢掉他自己的根。”

王安晚年,在事业上遇到严峻的挑战。

1986年,王安退出公司的管理,将总裁职位交给长子弗富德后,公司没有出现预期的发展。1989年,在公司出现前所未有的亏损之后,王安选贤任能,总裁职位改由美国人里察·米勒出任。

由盛转衰,不光是主观上的因素。美国从1989年萌发的经济衰退,给包括电脑业在内的各个产业部门,带来停滞萧条的局面。不管是哪家公司,新推出的电脑,在市场上不再像以往那样抢手。连全球最大的电脑厂商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都遭到紧缩的厄运,王安公司自难幸免。也许正应了王安说过的话:“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运气这个因素都在其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在王安匆匆离去时,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公司的命运。

王安在医院合上双眼那一天,上任不久的公司总裁米勒,通过王安办公室电子邮件系统,向全世界王安公司员工发出讣告。讣告的最后一段这样写着:

“王安博士地下有知,将欣见我们继续他所开创的事业。生前,他坚信王安电脑终会再执电脑界牛耳。如今,这就是我们要完成的志愿。”

王安虽然走了,这位电脑巨人的奋斗精神却留在了人间。

〔责任编辑:张蕾〕



引子

1990年8月6日上午9时20分。

交通部大连轮船公司(下称大轮)的15名年轻漂亮的女孩迈进了大连国际机场的大门。每张年轻的脸上都挂着泪珠,充满着迷惑。她们是出国留学吧?怎么没有少年得志的春风满面。就连送行的人也是个表情严肃。

在候机大厅门口:

一个50多岁的老者悄悄地将一个折叠的牛皮纸信袋塞进一个女孩子的手里:“这是200美金,不行就自己打张机票回来!……”

一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一边替女朋友擦眼泪一边说:“哭什么,不就一年嘛?多大点事!”小伙子这么说的时侯,就使劲睁大眼睛,好不容易把眼眶里的泪水咽了回去。

多么难分难舍,多么凄凉悲壮。显然,这不是一般的送行,也不是一般的离别。她们是应聘去台轮上工作的大陆女船员。这15个姑娘面临的是第一次远离家乡、远离亲人;是恐怕她们难以承受的外轮的严格管理和沉重的劳动负荷……更严重的是她们即将赴约应聘的那条船上除了她们和30名大陆男船员外,还有来自台湾、香港、南朝鲜、新加坡和多米尼加等5个国家和地区的20多名男女船员,船长、老轨、大副、报务主任、报务员和事务长等主要干部船员都是男人。这些如花似月的姑娘们面对的是在那块资产阶级土壤上成长起来的、把男女之间的事看作穿衣脱袜一样司空见惯的一

台湾 船上的 大陆小姐

庚乘堂●

群男人,而且,这条船经常出入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

于是乎,舆论大哗!

有人断言:这15个女孩子能有一半回来就不错了;

有人更邪乎:即使是回来的也不会是“原装”的。

……

骚动的心

一个月之前。

台湾某船舶有限公司总船长W先生全权代表船东来到大连轮船公司,与“大轮”签了雇用46名船员的劳务合同,雇佣期为一年。46名船员包括16名女服务员,其中:餐厅部10名;客房部6名。除了一名带队外,租方要求15名女服务员的雇佣条件就是6个字:年轻、漂亮、未婚。

招聘启事在“大轮”一张榜,公司上下立时刮起一股强台风。

几乎所有的女孩子都跃跃欲试:

开放的年代塑造了姑娘们开放的心态。这些常年跑海的姑娘们早就对塘沽、青岛、烟台、威海、龙口……跑马灯似地绕来转去厌倦了,腻歪了。同样是跑船,她们更羡慕那些驾驶万吨远洋轮满世界兜风、满口袋里装外汇的男人们!现在,敞开的国门终于给她们提供了一次闯世界的机会,傻瓜、笨蛋才不去!当然了,最叫女孩子们神魂颠倒的还是W先生对她们即将赴约的那艘超级豪华游轮——C轮的那一番空前绝后的描述:“C轮是当今世界上最豪华的旅游客轮之一。船

上仅工作人员就有 200 余人(天! “大轮”最大,也是国内目前最豪华的客轮船——“天鹅”号充其量也只不过七千九百多吨,工作人员一百略余)。船上有娱乐场,酒吧间,舞厅,健身房,中餐厅,法餐厅,仅游泳池就有 7 个……(啧啧! 到这样的船上干上一回,这辈子就是死了也闭上眼睛了)。姑娘们豁上了,去!

然而,几乎所有女孩子的父母、亲朋都举手反对:

台湾?香港?那是什么地方?那是资本主义的地盘!长出来的花草草都有毒!把 15 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往那儿送,等于把 15 个鲜嫩鲜嫩的羊羔往狼嘴里塞……! 去不得! 万万去不得!

去! 不去?

不去? 去! ……

一些姑娘拿不定主意了。

漂亮姑娘王军第一个拿定了主意。

“你想去不去?”

“想去。”

“你父母会同意吗?”

“肯定同意。”

“你男朋友能支持吗?”

“保证支持。”

回答客运主任的问话时,王军两只眼睛瞪得溜圆,眨都不眨一下。

从客运主任室出来,王军撒腿就往家跑:

“我们不同意!”家里人异口同声地说。

王军转身去找男朋友:

“我也不支持!”

王军傻眼了:“我偏要去! 偏要去!”她开始跟男朋友撒娇了。

“我是怕,在那儿要是有人欺负你怎么办? 谁来保护你?”

“我又不是小小孩儿,还不会保护自己?再说,船上还有咱们的 30 个男同胞,他们能不管!”

男朋友低头,不语。

王军一看有门儿,马上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我这辈子恐怕就这一次机会了,求求你,只要你同意,咱们就可把比分扳成 2:2 平,这样,就有希望说服家里人”她这么说着,一脸的真诚。

男朋友摇了摇头,终于妥协了。

紧接着,王军又搬来了念大学的弟弟,终于以 3:2 的微弱优势获得了进军 C 轮的第一张入场券。

周魁伟、韩玉杰、寇平的

男朋友都是“大轮”的船员。船在国外,“请示”已来不及了,她们干脆来个“先斩后奏”。这边忙着报名、办证、检查身体,那边又煞有介事地写上一封:“亲爱的,你一定会同意,是吗?”字样的信扔进信筒。未等万里波涛中的男友收到信,她们人已到香港了。这些姑娘鬼精鬼灵的。

说实在的,吸引她们的不是外汇、大件指标等等,她们大部分是“大轮”子女,老子跑船,男朋友也跑船,还能亏了她们吗?她们身上穿的、手上戴的、脚上蹬的、脖子上挂的早已是货真价实的洋货。从父兄那里,从朋友那里,她们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可都是听来的,听得她们心里痒痒的,真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何等精彩,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无奈。这是“冲出‘大轮’,走向世界”的一次机遇啊!

一周的工夫,报名者达 60 余人。经推荐,公司考核,16 名女服务员正式拍定。除了带队潘吉敏,43 岁,其余 15 人都是 21—25 岁的年轻姑娘。面试那天,W 先生把 15 个女孩子从头到尾看了两遍,最后说了八个字:无可挑剔!非常满意!第二天一大早匆匆上飞机,向他台湾的上司汇报去了。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香港外锚地。这里是船的世界。

在这船的世界里,有一艘很不起眼的小客船,长不足 80 米,宽不过 30 米,载重不超过千吨。不要说与周围的那些庞然大物相比,就是从“大轮”的远洋船队中随便拉出一艘也比它大。

46 名大陆船员乘坐的交通艇在小客轮左舷处停下。

W 船长笑容可掬地伸出右手,“到了,各位请!”

92 只眼睛同时睁大了,难道这就是 W 船长吹嘘的 C 轮吗?

15 名大陆妹使劲拨弄着脑袋,难道一个 50 多岁的老头子还会说谎吗?他们抱着一线希望爬上舷梯,船上船下、船头船尾搜了个遍,游泳池在哪?健身房在哪?超级豪华游轮在哪?……最后,终于在后甲板上找到了一个不足三米见方的喷水池……

大陆妹火了,气哼哼地去找 W 船长,然而船上船下找遍了,也没他的影子。

W 船长没找到,却找到了一位 H 船长。H 船长还算诚实,他解释说,所谓的超级豪华游轮实际上是一艘已有 30 多年海龄的陈旧的小型客轮。由于航行中主机经常



“熄火”，被迫退役，在台湾近海做非法赌博生意。近年来由于台湾当局严加干预，他们不得不改换门庭，到香港注册。90年3月香港政府突然下令查封了三条类似的赌船。因此，C轮今后干什么还不知道……至于游泳池吗，H船长摇头晃脑憋了半天：加上船长、老轨、报务主任、事务长卫生间里洗澡盆，总共也只有6个……。

这就是C轮。

当天晚上，船上举行欢迎舞会。

热情的台湾、香港、新加坡船员争先恐后地上前邀请大陆妹。

大陆妹还没有摆脱受骗后的气愤，气哼哼地说：不会！心里想：会也不跟你们跳！

上露胸背，下露肚脐眼的多米尼加小姐也娇滴滴地上前来拽大陆男船员。

大陆男船员挣脱了：不跳！男船员们也沉浸在气愤中。

如果说，前面发生的这一切给大陆船员带来的仅仅是被骗、羞辱的感觉，那么，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则使大陆船员毛骨悚然……

一天，船上事务部的3名台湾小姐突然把潘吉敏拽到大厅里，关上门，小心翼翼地对老潘说：“船上的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在你们之前有一批南方女孩子，有一多半都‘下水’了。结果合同期不到就撤回去了……就在你们来的前几天，船上几个男船员气哼哼地去找船长：‘你船长也太不够朋友了，上一批的漂亮妞儿都让你一个人独占了，这回也该轮到咱们弟兄几个开开斋了……’。你猜船长说什么：‘同舟共济，有福共享嘛，好说，好说……’。不骗你，我们都是亲耳听见的……。”

台湾小姐的话好比在大陆妹受伤的心灵上又扎了一把刀。如果这里是一个狼窝，那今后不要说实现走向世界的理想，连生存也不能安宁呀！以后的几天里，姑娘们始终都不敢正眼看那些男人。如果这时候可以自由选择是走是留的话，15个大陆妹准是二话没有，打起背包就走。

其实，不是我不懂你的心

大连的山美、水美、土也美，造就了大连姑娘特殊的美，也造就了北方妹子敢爱、敢恨、敢斗的性格。几天下来，那些男人们感到，这些北方女孩和上一批南方女孩大不一样，她们漂亮、单纯、可爱、有味道，而且，也很难对付。

“你早！”H船长热情地跟小A打招呼。

小A没有反映。她不想让船长把礼貌误认为亲热。

H船长火了：“你见了长官为什么不问好？”

“谁是长官？”

“我呀，我是一船之长！”

小A：“在我们那儿，干部是群众的公仆，不象你们当了官就觉得了不起了。”

H船长气得一鼓一鼓的。

“B小姐，你今天好漂亮！”S大厨笑模滋滋地拍拍小B的肩膀。

“不漂亮！”小B冷冰冰地回了一句。心里说：哼，漂亮也不是给你看的。”

那天，S大厨在餐厅里给大陆妹表演端盘子。他右手托着盘子，左臂在胸前不停地摆动着，两半屁股一扭一扭的。大陆妹身上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中午饭都没吃好，直想吐……

还有一次，一位香港船员拿出一双女式皮鞋问小D：“这是我给太太买的，你帮我参谋参谋，我不大会买女人的东西。”

小D说：“挺好的。”

那位香港船员马上凑到小D跟前，小声地说：“你喜欢吗？”

“……”小D不解。

“我就是给你买的！”

小D一转身走了。

……

终于，这些男人们对大陆妹的这种冷漠、无情、不屑一顾和无动于衷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她们是真的不明白还是假正经？

这天，W船长召集16名女服务员到大厅训话。

“你们谁知道，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什么？”

“信誉第一，文明待客，周到服务……”

“错啦！全错了！我们的服务宗旨就一句话：‘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一切代价，把顾客腰包里的钱统统地骗到自己的腰包里！’W伸手理了理头顶上那可怜巴巴的几根头发，以老卖老地说：‘女孩子嘛！就应该嘴甜一点，腿勤一点，乖哄一点，温柔一点。上一批的女孩子就很乖的啦！当然喽，她们也得到很多的好处啦……’说到这里，W伸出右手在大陆妹跟前晃了晃：“你们猜猜，我的这颗钻石戒指值多少钱？……不知道了吧？价值连城哟！只要你们乖乖地听话，我是不会亏待你们的……”

相比，H船长虽然年轻，却显得很有头脑。

这天，他来到潘吉敏的房间：“潘小姐，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咱们到大厅去说吧，”潘吉敏说。船上有规定，不准男女船员互串房间。

两人来到大厅。

潘吉敏：“你有什么事，说吧。”

“我想跟你耍个女服务生伺候我，你不会介意吧？”

老潘没有思想准备，一时不知怎么回答。

“其实，无非就是给我冲冲咖啡、洗洗衣服、叠叠被子，当然了，我是不会叫她白干的。”

老潘说：“咱们合同上没有这一项，你还是去和我们的总带队庞相臣商量商量吧。”



在基隆港停泊留念

庞相臣是大陆 46 名船员的总带队。他当然不会答应的。

H 船长一脸不高兴的走了……

事隔不久，S 大厨突然对一个大陆厨工说：“我这个人什么都会，就是不会洗衣服。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个大陆妹，我不会亏待她的，我有的是钱！”

“我去给你问问看吧。”大陆厨工敷衍着。

当然也是白问，没人稀罕他的钱。

一天，S 喝醉了，唾沫四溅地跟大陆厨工讲起他跟上海的一个南方女孩儿的风流事。说着说着，S 突然一拍桌子，咬牙切齿地说：“潘吉敏，你这个死老婆子，我恨你！……”不久，他找船长要求下船。理由是：这条船上没意思……

S 走了，W 船长、H 船长、老轨、报务主任好生凄凉。这天，四人在船长房间支起火锅，一杯接一杯地喝酒。越喝越闷，越喝越气，在一阵“大陆没有真正女性”的哀叹中全都趴在了桌底下……

不是我不小心

面对着活生生的丰满和健壮，男人和女人眼中的感情小岛怎么会不起波澜呢？有人说：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男人和女人存在，就有不可抑制的冲动，就有生命沉醉的体验，就有幸福的款款而来和痛苦悄然而至。况且，又是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

一天，W 船长拿着一块巧克力，绕过中餐厅里的七个大陆妹，笑咪咪地直奔小 E 跟前：“E 小姐，这个给

你好啦！”E 小姐就调皮地学着 W 船长的腔调：“W 先生，这个我不要好啦！”W 并不生气，在他看来，E 小姐比刚来的时候好多了。至少，不象以前总象躲狼一样地躲着他。女孩子嘛，稍微有点羞涩总是给人以好感的……

Z 大副不仅有 1 米 80 的个头，还有一副挺帅的模样。与 W 船长、H 船长不同的是，他对那些性格开朗的大陆妹子似乎不大感兴趣，倒更注意文静寡言的小 G。这天，Z 和甲板部二副、三副、水手长在后甲板喝酒，见小 G 从船尾款步走来，就喊她过来坐坐。小 G 见有大陆船员在坐，就大大方方地坐了。Z 大副一扬脖子，把半杯白酒倒进肚里，突然对小 G 说：“你做我的干女儿怎么样？”小 G 笑笑，以为 Z 大副跟她闹着玩呢，不置可否。小 G 平时吃完晚饭总愿到法餐厅去看书，Z 大副就时不时地走过去不是亲昵地拍拍小 G 的肩膀，有话无话地搭讪几句，就是疼爱地用手拽拽小 G 的秀发。小 G 呢，每每羞涩地笑笑。后来呢，Z 大副就把船上事务房的钥匙给了小 G，让她没事到这里来练习英文打字。再后来，Z 大副就花了 560 元港币给小 G 买了一台英文打字机，并告诫小 G 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尤其是庞相臣和潘吉敏。再后来再后来，就有人传话说，Z 大副给小 G 买了 5 条金手链，最重的一条有一两多重。还有人听见 Z 大副亲口对小 G 说，他想把小 G 带到台湾去……

当然，坏的东西永远都是坏的。但是，好的东西如果不好好地把握也会变成坏的。由于 C 轮一直处于停

航状态,70多个男男女女成天被困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一方是年轻漂亮,一方是血盛阳刚;一方是困得难受,一方是憋得发慌。于是,就有大陆妹和男人们一起碰杯、打牌。就有大陆妹大大方方地伸手去接外籍男船员手里的巧克力。就有大陆妹心安理得地让外籍男船员掏钱买票逛公园……。

一天,两个大陆妹在香港下地回船晚了半小时,可同天晚归的还有H船长。

四个大陆妹到H船长房间吃火锅。吃火锅,叙家常,也无可非议。

然而,她们却触犯了大陆船员铁的纪律:在外下地,三人一组,日出而出,日落而归,违者必究。

不准男女船员互串房间。这不仅是大陆船员的纪律,也是C轮的规定。在15名大陆妹居住的走廊入口处就赫然写着:男士止步!

H船长带头违犯船规,老庞老潘无权干涉。

大陆船员违犯了纪律,不管不行。

庞相臣、潘吉敏召集全体服务员到大厅开会,一脸严肃地对下地晚归和到船长房间吃火锅的女服务员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庞相臣对外公开的身份是洗碗工(船上最低的职务)。但除此以外,他还有三个令外籍船员挺害怕的头衔:46名大陆船员的总带队、党支部书记和工会主席。这位有着几十年海龄的老政委临来的时候,经理、书记和人事处、外派办的领导三番五次地找他谈话,千叮咛,万嘱托,说的最多的就是这15个女孩子。话也说到根上了:“15个女孩子就交给你了,回来的时候不准少一个,也不准多一个!”最最叫老庞感动的是那些女孩子们的父母,他们拉着老庞的手:“老庞啊,求你了,就把她当成你自己的孩子,打骂随你!就一条,千万别让她们做出有辱国格,有辱家门的事儿……”

潘吉敏,尽管大陆船员也入乡随俗地一口一个“潘小姐”。然而,她毕竟不是小姐,而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比起老庞,她的责任更直接、更具体,也更艰巨。上船后,三个台湾小姐的话叫她心惊肉跳,坐立不安,一连几天吃不下,睡不安,每天晚上就象“老母鸡”看小鸡似的,直到最后一个女孩子进了房间,锁了门,她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自己的寝室,一头倒在床上,长长地吁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又平安地过去了一天……。

和这15名大陆妹一起上船的还有30名“大轮”男同胞。打上上船那一天起,这些男人们的心目中就陡然耸立起一种绝不让姊妹们受到任何欺凌和侵犯的强烈的责任感。大管轮杨锡舜、电机员高敏、服务生张志刚、厨工马永泰等不只一次地对姑娘们说:你们还小,又是第一次出远门,千万要多长个心眼儿。毕竟你们还要回去,还要做人。你们要是缺钱花,吱一声,我们有!……

老庞讲得更实在:咱们都是跑船的,航行中的两条船不能靠得太近。太近了彼此就会产生引力,这样很容易出事。人也是一样,太近了就容易产生感情,有了感情就容易冲动,一冲动就把握不住自己了。后来有人把

这段感情五段论起名为“庞氏定理”,在46名大陆船员中广为流传。

后来,这些不知怎么就传到了Z大副的耳朵里。Z大副听了很不自在并因此对老庞怀恨在心,以至于后来终于爆发了一场由女人引起的男人之间的战争。这是后话。

改变所有的错

一个叫三毛的女人说过,男人和女人之间要是不打仗,活得实在没意思。

然而,C轮上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战争却怎么也打不起来。

当初选拔这15名大陆妹时,除了租方的“年轻、漂亮、未婚”三个条件以外,“大轮”还格外增加了三个条件:思想过硬、作风正派、业务熟练,同时,必须具有三年以上的海龄。这就意味着她们不仅有着较好的“自然条件”,较好的服务技能,而且还具有一定的防腐和免疫能力。从那次全体大会之后,大陆妹的言行举止更加谨慎了。

一次,大陆妹在法餐厅打扑克,W船长来了,亲热地拍拍这个,摸摸那个。大陆妹起身来到中餐厅打。W跟着追到中餐厅。大陆妹转身回到房间,把门插起来继续打……。

Z大副用自己的薪水买来的巧克力、口香糖、水果、瓜籽等小吃往茶几上一撒,挣钱不多的大陆妹宁可咽口水,就是不伸手。

船上每周一次“PARTY”(舞会),开始,大陆妹经不住那音乐,那魔灯的诱惑,偶尔也结伴来放肆一下,但也只是偶尔为之,浅尝便止。后来干脆连面也不照了……。

就连那几个曾经与外籍船员一起碰过杯的女孩子,也明显地对她们冷漠和疏远了……。

一天,Z大副突然在后甲板堵住小G:

“你最近怎么不到法餐厅看书了?是不是老庞他不让?”

小G说:“不是的。”

“是,就是他!”Z大副猛地一转身,气哼哼地走了。

这天吃过晚饭,老庞和往常一样来到法餐厅,边喝茶边听音乐。H船长突然问老庞:

“你以前来过几次香港?下过几次地?”

老庞觉得话里有话,反问H:

“怎么了?”

“你们两个女孩子第一次来香港,下地迷了路,晚回来几十分钟,你大会点名,小会批评,是不是有点太过份了?再说,我们的男船员和你们的女船员在一起交谈交谈,还有什么问题吗?”

老庞说:“这是我们内部的事情,你还是不要过问的好。”

坐在一边喝酒的Z大副突然插话:

“老庞,你那天在大厅里讲的感情五段论是什么意思”

思？”

老庞一怔，说：“这和你们没关系。”

“有关系！”Z大副霍地站起来，把手中的酒杯往桌上一拍，顿时手上鲜血直流。

“你，算什么东西！不就是一个洗碗工吗？”

老庞不愠不火地说：“你只说对了一半，我还是46名大陆船员的总带队。”

“我管你是什么，我们要想炒你，就不费吹灰之力！”

“你大副还没这个权力吧？”老庞说着，站起来走了。

然而，Z大副的满腔怒火还远远没有发泄完。

这天，大陆船医刘恩美吃完晚饭，来到法餐厅听音乐。正在餐厅里喝酒的Z大副醉醺醺地对大陆船医说：“刘大夫，你回房间睡觉去！”

刘恩美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还不到七点。以为大副喝多了跟他开玩笑，就没说什么，仍坐着听音乐。

Z大副气呼呼地来到刘恩美跟前：“我让你回房去睡觉，你听见没有？你还坐着干什么？”

刘恩美说：“现在还不到七点，睡什么觉？”

Z大副把手里的酒杯往墙上一摔，冲刘恩美吼道：“我让你回去睡觉你就回去睡觉！”说着就要动手。闻声赶来的两位大陆厨工见状忙将刘医生推走。

第二天早晨，刘恩美躺在床上还在纳闷：我和Z大副无怨无仇，他干吗冲我发这么大的火？上次他摔杯子扎伤了手，死活不让我给他包扎，说我非给他包死不可……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刘恩美当然什么也没做错。只不过他和老庞的关系密切，两位老同志经常在一起，Z大副看着，心里不痛快……

刘恩美正在想着，突然，走廊的喇叭里传来了Z大副的叫喊声：“刘恩美，你到中餐厅来！”

刘恩美以为船上发生了急病号，趿拉着鞋就往楼上跑。被迎面而来的水手长拦腰抱住：“大哥，你千万不能去，大副喝多了。”

Z大副喊了半天不见人，转身进厨房拽起一把菜刀，大陆服务员李巧红等见状猛地扑上去将菜刀夺下……

算这一次，Z大副已经是好几次无理取闹了，如果说前两次老庞的忍耐纯是考虑双方的关系，那么这一次，大副的确有点欺人太甚了！

当天，老庞召集全体大陆船员开会。

第二天一早，老庞把一封盖有“全体大陆船员”字样的辞职信扔到了H船长的写字台上。条件只有两



在C轮中餐厅摄影留念

个：要么大副走，要么我们撤！

H船长毛了。

撵走大副，这等于砸了大副的饭碗。这万万使不得。况且，老庞和大陆船员还都不知道，H船长和Z大副除了是航海上的老搭档以外，还有一丝沾亲带故的偏亲呢！

辞退全体大陆船员，这更使不得。这不仅仅砸了大副的饭碗，也砸了他船长的饭碗，更要命的是断了老板的财源，其后果不堪设想……

无奈H船长只得赔着一副笑脸来到老庞的房间，说：“大副喝多了，真的是喝多了。一切都是大副的错。我先代表大副向你赔礼道歉。明天，我还要大副亲自向你、向刘医生以及全体大陆船员赔礼道歉。你们不能走，你们一走，我和大副全完了！共产党不是讲‘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吗？求你了，拜托了……”

第二天一大早，一向趾高气扬的Z大副一扫往日的威风，亲自来到老庞和大陆船医的房间：“我做不好，真是太失礼了。我40多岁了，这是第一次向人家赔礼道歉。我没干过客轮，更没带过大陆船员，这是第一次，没有经验，请多包涵。”说着，又拉起船医的手：“我向医官道歉！我向医官道歉！……”刘恩美说：“道歉就完了？你昨天要是真的把我杀了你就完了！我是谁？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员。”“那是，那是，”Z大副连忙点头：“我已经把酒戒了，这两天，我光喝茶，不信你问问船长……”

老庞说：“既然你这么说，过去的事就一笔勾销。咱们本来就是兄弟，同船更是缘分，何必同室操戈，相煎太急？”说着，从H船长手里拽过辞职信，一扬手，抛进了大海……

无言的结局

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政治信仰,不同的生活习俗和习惯,形成了大陆船员和外籍船员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一些被大陆人嗤之以鼻、恨之入骨的东西,而在外籍船员眼里却是习以为常。就象男女之间拍一拍,搂一搂,甚至吻一下,摸一下,算不了什么?而受着多年传统文化熏陶的大陆人就怎么也接受不了。同样,一些在大陆人看来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又令外籍船员百思不得其解。

一次,C轮在台湾基隆港上客。见大陆妹木讷地站在舷梯口,甲板上的台湾船员和香港船员急得挠耳抓腮,团团直转,偷偷地跑去告诉大陆妹:你们傻楞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去帮顾客提行李!大陆妹忙去帮着老人提包裹,帮妇女抱小孩儿。台湾和香港船员赶紧跑回来把大陆妹拽到一边,悄声说:错啦!错啦!要帮男人,那些提皮箱的男人……

大陆妹糊涂了:干吗?看着老弱病残不帮,却要帮那些油头粉面的男人,这是什么逻辑?!……

偶然一试,果然就有一叠一叠的美元、港币、日币源源不断地塞到大陆妹的手里。大陆妹的手象触电似的一个劲儿地往回抽:不要!不要!这下,轮到那些男人们傻眼了:怪事!这世界上居然还有给钱不要的小姐?于是,男人们就感动了,越不要越是给,站在一边的台湾、香港船员终于憋不住,冲大陆妹喊:“不要白不要!”

事后,就有台湾船员问一名大陆妹:

“嗨,今天赚了多少钱?”

大陆妹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

“噢,你不认识外汇吧?快拿出来我帮你数数。”

“我都交给潘小姐了。”

台湾船员一拍大腿:“哎哟我的傻妹子她,那是服务小费,是给你个人的!……”

终于,这些男人们不得不从心底里承认:这些大陆妹纯朴、正直、善良。傻的可以,也傻的可爱!

一次,船过台湾海峡,海面上突然刮起8级大风,本来平稳性很差的C轮此时就象一个醉汉,以左右二十多度的幅度剧烈地摇晃着。姑娘们一个个吐得死去活来,却没有一个离开岗位的。H船长感动了,对老潘说:“去年,也是这个时候,也在这个地方,也是这么大的风浪。餐厅里找不到一个服务小姐……”

如果说,这些男人们开始对这些貌若天仙的大陆妹还想入非非,甚至下了很大的决心要开垦这片处女地的话,那么现在,大陆妹崇高的人格则强烈地震撼了这些男人的心,在他们心中悄然升腾起一种民族之情!兄妹之情!

一天,H船长急匆匆地来找老庞:“她们太寂寞、太枯燥、太可怜了,我建议让她们参加船上每周的舞会,娱乐娱乐。”老庞说:“你这个建议很好嘛,我同意!”

Z大副用自己的薪水从陆地上租来了图书和录像带,令大陆妹感动的是,这些图书和录像带的内容都是非常健康的。

60多岁的报务主任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大陆妹

没事总去求教,老人教得极耐心。当他知道大陆带队对这些女孩子要求非常严格时,总不忘及时提醒大陆妹:“这么晚了,你们带队会不会说你们?”

一天,H船长对小G说:“你去找大副,就说是我说的,让他领你去海洋公园玩玩。”小G摇摇头。H船长马上明白了:“如果我让潘小姐和你一块儿,你不去?”小G去向大副,大副说:“我不去,你要去,我给你路费和门票钱。”小G说:“那我也不去了。”Z大副突然动情地说:“不是我不想陪你去,我是怕别人知道了说三道四。我无所谓,可你呢?你还要回去,还要做人……。”小G突然眼睛一热,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有一天,Z大副找到老庞,对他说:“小G天真,纯朴,象个孩子,我很喜欢她,我一直把她当亲女儿看,请你不要有其它想法。”老庞说:“这个,我心里有数……”

一年的合同期到了。

临分手的时候,已接任船长的Z大副把老庞叫到自己的房间,把一件台湾产的短袖衫送给老庞。说:“相处快一年了,真的要分手了,倒有点舍不得了。公正地讲,你们这些人相当不错。尽管我们之间也发生过一些误会和不愉快,不是你们的错。俗话说两座山到一起不容易,但两个人再见面是很可能的。以后如果有机会到大连,我一定去看你。”说着,拿起纸和笔,给老庞留下了他的住址和电话。

老庞说:“毕竟我们两个制度下的人嘛,有点误会和摩擦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也有错。比方:一开始可能把你们这些人想象得太坏,戒备心太强,后来相处久了,觉得你们这些人并不象想象得那么坏。历史是在进步,我们都应该向前看。”说到这里,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尾 声

1991年8月5日下午4时30分。

交通部大连轮船公司外派C轮的最后一批男女船员带着南国骄阳馈赠的一身热汗,满面春风地走出大连国际机场。

在机场出口外:

一位姑娘娇嗔地把一副金灿灿的项链挂在了母亲的脖子上,然后趴在母亲的耳朵上悄声说:“妈,女儿是清白的!”

一位姑娘把一套价值2000元港币的名牌西装塞到一个小伙子的手里,然后挽起小伙子的胳膊,走出了机场。

那位叫寇平的姑娘则比比划划地跟她的小姊妹们说:“台湾有什么!香港有什么!我们逛这些地方就象在大连逛天津街一样!……”

你听听,把她们张狂的……。

一九九二年三月于大连

(责任编辑:张君)

吴昌硕先生的风趣

吴长邨

吴昌硕先生是个富于风趣的人。早年遭遇坎坷，生活艰困，但仍能保持乐观精神，生活态度十分洒脱，绝不斤斤计较于细小的得失。他的风趣往往表现在自己的题画诗中。例如，他在一幅《砖砚水仙图》上题句道：

“出庐长物惟砖砚，古来分明宜子孙。卖字年来生计拙，商量改作水仙盆。”

更有趣的是任伯年为他画一幅《酸寒尉像》中，昌硕先生以简炼遒劲的笔触，夸张又生动地刻划出一个谨慎小心，惟恐有失的小吏形象，题句自嘲，这样写道：

“达官处堂皇，小吏走炎暑。束带趋辕门，三伏汗如雨。传呼乃敢入，心气先怯沮。问言见何事，欲答防齟齬。自知酸寒态，恐触大府怒。怵场强支吾，垂手身低俚。朝日嗟未饱，卓卓日当午。中年人衰老，腰脚苦酸楚。”

嘲笑他自己的一副窘相。而实际上有力地鞭挞了那些权势所谓“达官”，仗势迫使小吏们见了他们不得不然的窘相，其含义既深刻又诙谐。

顺便说一说这幅画的来源故事。当时昌硕先生在苏州县衙担任佐式小吏。某天，任伯年到苏州来探望他，恰巧昌硕先生下班回家，所谓“官服”还未及脱卸，任见厥状可晒，立即要为昌硕先生如实写照，吴也不加拒绝，就端立容任审视作图。任操起画笔，认真地对着吴的姿态勾划起来，直到天色已黑，图犹未竟，为了一气呵成，就秉烛连续作图至完为止。图成，二人见了相互哈哈大笑，吴提笔就写了这首自嘲诗。

又如在一幅《兰花》图题上这样一首诗：

“临抚石鼓琅玕笔，戏为幽兰一写真。中有离骚千古意，不须携去赛钱神。”

字字句句都含有讽刺意味，这就是昌硕老人诗才的独特风格。

晚年，先生定居上海，收入较丰，不必为衣食发愁，但他待人接物却更多风趣。那时，他身负盛名，远近求书画者接踵而至，如能得其片纸只字，即视同瑰宝，但他自己却一点也不矜持，反而显得更加

谦虚。有人对他说：“目今一般人鉴赏书画，多半以耳代目，真是怪事”。先生听了微笑答道：“幸亏他们是以耳代目，如果他们都有鉴赏的目力，那我们这班人岂不都要饿死吗？”虽然是一句笑话，从而可以看到昌硕先生晚年，还是勤于艺事，精益求精，绝不自满的谦虚态度。

其次，王一亭为他画了一幅小像，他题上一篇非常有趣的“像赞”：

“是酸寒尉？是乡阿姐？（先生小名）少壮及老，果何为者？白龙山人，谓真能写。翁曰不然，我视为假。耳病已聋，词拙则哑。书画篆刻，在古人下。……发短尚髻，骨瘦为把。生护已成，身尚不舍，沧海横流，苟全若瓦。南山之寿，悠无见也。”

这篇“像赞”，近乎自嘲，但在字里行间也流露出老人的冲淡谦逊的襟怀。

他并不笃信佛，但他每晨起来，总爱对着诗桌上的一尊笑口常开的瓷弥勒佛像，燃香静坐，一舒胸怀，藉助构思，而对一些惯于过着寄生虫生活的和尚、尼姑、道士等深表厌恶。有一次，他借题发挥画了帧大腹布袋佛像，题上这样的辞句：

“袋藏何物？或曰五谷。吾为尔计，何不散之大陆，使年岁丰熟，普救白屋。无寒号饥哭。非然者，人呼尔菩萨活佛，我斥尔行尸走肉，无赖之秃。姑备尔像，为众生祝。尔听我言，毋但窃天禄。”

充分流露出老人家对这些人的愤懑，同时予头直接刺向上层统治者，把那些祸国殃民的贪官污吏痛斥为行尸走肉。

有人请昌硕老人绘册页，老人在这部花果册页上题曰：“予素不知画。衰病，多睡虑伤脾，时以作篆之笔，横涂直抹，丑态毕露。人谓似孟皋、似白阳、似清湘僧，予姑应之曰：“特健药而已，奚画为？”这样富于风趣的题跋，绝非矫揉造作，正说明他老人家平生一贯的谦逊姿态，对艺术高度负责精益求精作风的具体表现。



崇
炎
秋
春

明末張居正改革失敗始末



周恩来和谢和赓夫妇

開國第一文化冤案

风筝，在大洋那边

神農氏與神農架

北平解放前后的傅作义